# 寻求历史的谜底

杨天石　著

（京）新208号

Yang Tian—Shi

**Seeking the Answers to the Riddles of History**

—The Politics and Figures of Modern Chin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寻求历史的谜底**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

**编　　著**　杨天石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邮政编码 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义北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数**　0,001—3,500册
**字　　数**　470千字　**印张**　20.625
**版　　本**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39-053-8/K·2
**定　　价**　17.00元

# 目　录

# 插图目录

# 关于宣南诗社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中说："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满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他在1830年（道光十年）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这一小诗社中人，黄爵滋发动禁烟运动，龚、魏发动维新思潮，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首领……。"①自此，有些关于林则徐的研究著作常常提到宣南诗社。陈友琴同志在《略谈林则徐的诗及其文学活动的影响》一文中甚至说它是后来的"'南社'的先驱"，"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较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结合，目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起的进步作用也不小。"②既然宣南诗社是关涉到近代历史重大事件的一个组织，那末，关于它的成立始末以及经过、活动情况，自然就有注意的必要了。但是，当笔者接触过一些材料以后，却发现：宣南诗社虽然有这么一个组织，却并非成立于道光十年；林则徐虽然参加过，但关于林、黄、龚、魏结宣南诗社的说法却完全不可靠。

## 一

宣南诗社，亦称宣南诗会、宣南吟社、城南吟社、消寒诗社。

诗社初建于嘉庆九年(1804)，参加者有陶澍(子霖)、顾莼（南雅)、朱珔(兰坡)、夏修恕(森圃)、吴椿（退旃)、洪介亭等。这儿

① 《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版，第16页。
② 《文学遗产》第305期，《光明日报》，1960年3月20日。

个人都是嘉庆七年的同榜进士，当时都在翰林院中担任着编修、检讨、侍讲、庶吉士一类的官职。初名消寒诗社，在朱珔的双槐书屋举行过“消寒第一会”，内容是赏菊并赋诗，第二会在吴椿斋中，以“忆梅”为诗题。陶澍在《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一诗中说：“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销寒纪。”①这确是实录。第二年秋，陶澍因丁忧归里，其他人亦风流云散，诗社活动停顿。

嘉庆十九年冬，翰林院编修董国华（琴南）复举诗社：“一为登高呼，应者从风靡。”参加者除陶澍、朱珔外，尚有胡承珙（墨庄）、钱仪吉（衎石）、谢阶树（向亭）、陈用光（硕士）、周蔼联（肖濂）、黄安涛（霁青）、吴嵩梁（兰雪）、李彦章(兰卿)、梁章钜（茝邻）、刘嗣绾(芙初)、周之琦(稚圭）等。这些人也大都是进士出身，在翰林院供职。人多了，活动也频繁了，胡承珙的《宣南吟社序》说：“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詠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并不独诗也。”② 这一时期，诗社举行过哪些活动，写过哪些诗呢？举例如下：

第一集，集董国华花西寓圃，赋明宣宗醮坛铜盏歌。

第二集，集朱珔斋中，赋宝晋斋第二砚。

第四集，集胡承珙斋中，观沈暐本元祐党人碑。

第六集，集陶澍印心石屋，试安化茶，并赋诗。

写的诗题还有《拟李长吉北中寒》、《拟温飞卿塞寒行》、《九寒诗(云、月、雁、鸦、柳、竹、钟、灯、山)》、《菩提叶》、《瑯琊台秦刻石》、《甘泉宫瓦砚》、《岳麓碑》等。

又，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梁章钜、李彦章等曾发起

---

① 《陶文毅公诗集》卷五十四。

② 《求是堂文集》卷四。又见梁章钜：《师友集》卷六，文字小有异同。

为苏轼作生日。

嘉庆二十四年，陶澍以补川东道出京。林则徐入京，加入宣南诗社。这一年入社者，尚有程恩泽（春海）。六月二十日，黄安涛召集京都二十四位诗人集会于净业湖李公桥酒楼为荷花作生日，张维屏应邀参加。事后，黄安涛辑诗社同人唱和诗为一编；宣南诗社图成，胡承珙作序。①

嘉庆二十五年，潘世恩在京为长子潘曾沂报捐中书。道光元年，潘曾沂入京后，"同人招入宣南诗会，月辄数举，以九人为率。"② 这九人是：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和潘曾沂。道光二年，梁章钜去湖北，程恩泽去贵州，朱珔归里，又吸收了张祥河（诗舲）、汤储璠（茗孙）、李彦章三人参加，仍为九人。此外，鲍桂星（双湖）也曾列名社籍。这一时期，诗社举行的活动除消寒饮酒外，尚有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作生日等。关于这一时期诗社的情况，朱绶有《宣南诗会图记》，可参阅。③

道光四年，潘曾沂自京师归里，诗社渐趋停顿。道光六年，梁章钜已有"诗会中人出京者多"之叹。至道光十年，诗社已经完全停止活动，其证有四：

一、潘曾莹诗：《得陈石士阁学（用光）书并诗却寄》："往者西江盛诗派，主其会者陈元龙（公在京师，诗会极盛）。先生别后颇寂寥，天风几度吹飞蓬。"④

二、潘曾莹诗：《陆祁孙大令（继辂）属题宣南话旧图》："往日骚坛盛，宣南雅集时。"⑤

三、张祥河诗：《赠张南山司马即题其〈听松庐诗稿〉后》：

---

① 以上材料，据《陶文毅公诗集》、梁章钜《退庵诗存》、胡承珙《求是堂诗集》等辑录整理而成。

② 见《小浮山人年谱》。

③ 见《功甫小集》卷八。

④⑤ 《红蕉馆诗钞》卷五。

“宣南诗社近寥落……健笔何人控胥崿？”①

四、吴嵩梁诗：《宣南诗社图为潘功甫作》“论诗旧结城南社，踪迹频年感断蓬。”②

以上四首诗都作于道光十年。既曰“往者”、“往日”、“旧结”、“近寥落”，可见当时宣南诗社已停顿很久。林、黄、龚、魏在这一年也没有另结一个宣南诗社。

道光十一年，由徐宝善（廉峰）、张祥河等发起，诗社活动再起，举行消寒集会。参加者大都是新人，有卓秉恬（海帆）、汪全泰（大竹）、吴清皋（小谷）、吴清鹏（西谷）、朱为弼（椒堂）、彭春农等。自此二、三年后，即一蹶不振，消沉下去。③

宣南诗社的成立始末及其经过、活动情况大致如此。

## 二

宣南诗社是不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结合”、，“起的作用也不小”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宣南诗社是清王朝处于暂时稳定情况下的产物。它始建的嘉庆九年，正是延续八年之久的白莲教大起义被镇压下去的一年；它继建的嘉庆十九年，正是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后的一年。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被镇压，清王朝得到喘息机会，给了这些文人学者以错觉，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国家间暇可清吟”④，他们才有这份心思饮酒赋诗，歌咏升平。事实上，它的目的也正是如此。陶澍说：“匪曰筑骚坛，庶以广经垒。润色太平业，歌咏同朝美。”⑤朱绶说：“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

① 《诗舲诗录》卷五。又见张维屏《花地集》卷四。
② 《香苏山馆今体诗集》卷十三，《今体诗钞》卷十八。
③ 参阅吴清鹏：《笏庵诗》卷六，张祥河《诗舲诗录》卷六及《张祥河年谱》。
④ 潘曾沂：《宣南诗会图自题》，《功甫小集》卷八。
⑤ 《陶文毅公诗集》卷五十四。

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①”但是，道光年间，清王朝的各种危机都日益尖锐，屋倒墙圮的征象愈加明朗，诗社的这种“扬翊休明”的活动自然不能长期吸引人们的兴趣。

其次，从它的活动内容看，不过是文酒唱酬、消寒避暑、摩玩古董、议论考据，并未触到任何一个现实问题。

从它的成员看，都是“文学侍从”之官。其中一些人后来官做得很大，例如吴椿，官至户都尚书，是所谓“以诚悫受知”的。又如梁章钜，官至江苏巡抚；陶澍，官至两江总督。他们在任内，虽然也做过一些“开水利”之类的对人民有益的事，但亦无大建树；对于如何改良当时的封建政治，也并无见解。其他人则更是平庸的官僚，在当时即无大影响。另一些人则是朴学家，他们在故纸考据上有许多努力。例如胡承珙，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毛诗后笺》、《仪礼古今文疏义》、《小尔雅义证》等书；程恩泽，“对于天算、地志、六书、训诂、金石，皆精究之”；朱珔，著有《说文假借义证》、《经文广异》、《文选集释》等。

从它的文学主张上看，在散文方面，许多人是宗法“桐城派”的，例如朱珔、陈用光等。陈甚至被誉为“守惜抱轩宗旨，不逾尺寸。”在诗歌方面，许多人是推崇宋诗的，梁章钜、刘嗣绾、陈用光、李彦章等都是翁方纲的“苏斋诗弟子”。在嘉庆、道光间，桐城派和在翁方纲影响下的宋诗派都具有较严重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没有什么进步作用。这些人的诗文集中也大都是缺乏现实社会内容的作品。

因此可以相信，宣南诗社并不是一个具有进步作用的组织。

---

① 潘曾沂：《宣南诗会图自题》，《功甫小集》卷八。

## 三

现在，我们来考察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和宣南诗社的关系。

林则徐是嘉庆二十四年加入宣南诗社的。[1] 但第二年四月，即因授杭嘉湖道出京。道光元年，引疾归里。二年，秉承父亲的意思入京，引见，仍发浙江做官。至道光七年五月，入京，授陕西按察使，再出京。道光九年，因父亲病卒，家居，道光十年四月，服阕入京，六月，补湖北布政使，出京。他在京停留的日期不多，如他自己所说是："况自分符辞帝京，萍梗随流无住著。两度朝天未久留，觚棱回首栖金爵。"[2] 因而，他和宣南诗社的关系也不深，仅仅是"偶喜追陪饫文字"而已。龚自珍只在道光二年应邀在吴嵩梁的石溪渔舍参加过为欧阳修作生日的纪念活动，与会者有陈用光、黄安涛、汤储璠、张祥河、李彦章等，他们都是宣南诗社成员，但与会的另一些人如朱方增、徐松、潘锡恩、李彦彬等都不是宣南诗社的成员。[3] 因而，不能据此认为龚自珍参加过这一组织，宣南诗社的成员中也没有任何人承认他。

至于魏源、黄爵滋，笔者还不曾发现过他们任何与宣南诗社有关的记载。

## 四

那末，上述关于宣南诗社的传说是怎样发生的呢？考其本源，这就是魏应祺的《林文忠公年谱》。其道光十年条云："与龚自珍、潘曾莹、潘曾沂、黄爵滋、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楫结宣

---

① 据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诗。
② 林则徐：《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云左山房诗钞》卷二。
③ 《功甫小集》卷六。

南诗社，互相唱酬。”下注：“张维屏《南山集》。”笔者设法查阅了这部《张南山集》。它是张死后由其子编辑的，流传较少。其第十六册《松心宴集诗》中有这样两首诗：

其一题为：

庚寅六月初二日龚定庵礼部（自珍）招同周芸皋观察（凯）、家诗舲农部（祥河）、魏默深舍人（源）、吴红生舍人（葆晋）集龙树寺，置酒蒹葭簃

其二题为：

庚寅六月十三日，潘星斋侍诏（曾莹）招同卓海帆（秉恬）、朱椒堂（为弼）两京兆、林少穆方伯（则徐）、周云皋观察（凯）、黄树斋（爵滋）、周梦岩（作楫）两太史、彭咏莪舍人（蕴章）、查梅史大令（揆）、顾杏楼工部（元恺）集寓斋即事有作

魏谱所提到的宣南诗社的几个成员除潘曾沂外，在这两首诗题中都有。这两条材料给人的印象是：第一，龙树寺在北京宣武门南；第二，这些人中也恰有好几个，例如张祥河、卓秉恬、朱为弼、林则徐等都是宣南诗社成员；第三，熟悉宣南诗社历史的人也清楚，它的活动方式就是这样，几个文人凑在一起，或于某名胜地，或于某人寓斋，吃吃酒，写写诗。笔者分析，魏应祺就是根据这些作出结论，然后从中挑选了几个有名的人写进林则徐年谱中去的。

但是，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当时北京这样的文人活动很多，今天在什刹海看荷花，明天去陶然亭登高，后天在龙树寺置酒，宣南诗社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官僚、名诗人，也就常有参加的，岂能一概视为宣南诗社的活动？而且，诗中又未明言是结宣南诗社，又岂能轻率地作出结论？龚自珍在龙树寺请客，不过是一般的宴集。潘曾莹请那么多人到他家里去，不过是为了给他儿子过周岁。潘的《红蕉馆诗钞》卷五有一诗，题为《庚寅六月十三日，同儿试周，诗以纪之》中云：“季夏十三月，吾儿试

周期，堂前设戈印，盘内罗珍奇……”句中注云：“是日招林少穆方伯、周芸皋观察、张南山司马……（都是上面的那些人，不赘引——笔者）”可见，和宣南诗社完全无涉。

最后，附带说一句，陈友琴同志把道光十年林则徐邀集“辛未同岁生三十四人宴会于龙树院”一事视为宣南诗社的“文酒聚会”也是不确的。实际这是林则徐邀集同榜进士的一次纯系官场应酬的宴会，细读林则徐的《龙树院雅集记》便知。

（作于1961年）

# 龚自珍的《明良》四论

《明良论》是龚自珍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历来为龚自珍的研究者所注意。但是，关于它的写作年代，却一直没有正确的考订。1908年刊行的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据文后段玉裁评记所署“甲戌秋日”字样，定为嘉庆十九年所作(1814)，时作者二十三岁。自此以后，许多研究者都采取这一说法。黄守恒的《龚自珍年谱》是如此，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前言是如此，1961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吴松龄《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有资本主义倾向吗？》一文，也是如此。其实，这一说法是没有确切根据的。段玉裁所署年月，只是自记他看到这几篇文章的日期，并不就是龚自珍的写作日期。只有侯外庐先生的说法比较稳妥，他根据作者文后自记“四论乃弱岁后所作”及段评，定为作者二十岁至二十三岁之间的作品。①但是，究竟是哪一年写的，却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我的意见是：《明良》四论始作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二十四日以后的若干日内，时作者二十二岁（写定的时间不可考），较现在通行的说法虽只一年之差，看来关系不大，但其中却包含着一个很重大的历史事件。

查《明良论》(二)有云：“昨者上谕至，引卧薪尝胆事自况比，其闻之而肃然动于中欤？抑弗敢知；其竟惰然而无所动于中欤？抑更弗敢知。”这篇上谕是我们考订《明良论》写作年代的线索。检《仁宗实录》，它保存在第二五七卷中，节录如下：

嘉庆十八年癸酉九月丁亥（二十四日）谕诸王大臣：“逆

①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匪突入禁城，实非常之大变，今虽首逆伏诛，余党就戮，闾阎安辑，城市如常，此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日，永怀安不忘危之念，励精图治，夙夜在公，庶几补救前非，仰承天眷。"①

按：嘉庆十八年九月，天理教徒于直隶长垣、河南滑县、山东定陶、曹县等地起事。15日，天理教首领林清等联络宫内太监，攻入禁城，后被逮捕，牺牲。"上谕"所说的"逆匪突入禁城"事，即指此。《明良论》(二)既云"昨者上谕至"，则必作于九月二十四日以后不久。

《明良论》是在林清事件后不久写的，为林清事件而发，搞清楚这点，对于研究龚自珍的思想很重要。首先，《明良论》更好读了；其次，龚自珍是在农民暴动的威胁下开始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的，于此也是一个明证。

林清事件曾经给封建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被认为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统治集团曾经采取了若干无关痛痒的措施，颙琰也曾发了不少谕旨，企图挽救通过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封建社会的危机。一时热闹异常，颇有一点"改革"的样子。《明良论》(四)所云"圣天子赫然有意于千载一时之治"，即系对此而言。九月十六日，颙琰颁《罪己诏》。二十日，召集诸皇子、诸王、文武大臣训话，下诏求言："如能洞见致患之原，官常吏治有亟须整饬修明者，各据所知，剀切直陈。"②同日，免去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的大学士庆桂、刘权之的职务，宣称现在是"整饬纪纲之时"。二十七日，颁《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十月三日，颁《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十一月十日，定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调例。十二月二十四日，颁《致变之原说》、《原教》、《行实政论》。此外，还有一些通饬各衙门甄别衰庸、各大臣"博举贤能"之类的谕旨，不备举。龚自珍的《明良论》正是在

---

① 《大清历朝实录》，第六五三册。
② 《仁宗实录》，第二七四卷。

这种情况下向统治阶级的进言和议政之作。研究颙琰的上述谕旨，不仅可以勾勒出四论的思想背景，有助于对它们作出切实的评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们之间以及龚自珍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间，还存在着若干观点上的联系。不避繁冗，作一比较。

（一）龚自珍直接批驳谕旨的观点。例如颙琰在《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中痛骂群臣："只知私家为重，国事为轻，诚昏愚之极矣！有国然后有家，国破家岂能存？"①（着重点系引者所加）又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指斥山东、直隶、河南的督抚州县官"私心太重，以致吏治不肃……良知泯而利心深，恋人爵而轻天爵。"②而龚自珍则对此提出异议，在《明良论》（一）中指出，统治者对臣下太苛刻了，俸禄过薄，群臣"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呼。当是时，犹有如贾谊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忠诚之士不能，能以概责乎三院、百有司否也？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后来，更有《论私》一文，鼓吹"私"以反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公"。

（二）和颙琰指出的某些现象类似，但出发点不同，找的根源不同。如颙琰在谕旨中把林清事件的责任都推给了奴才们，指斥群臣"自甘卑鄙"③、"顽钝无耻，名节有亏"④，骂他们是"寡廉鲜耻之徒"⑤。原因呢？"皆君不正群臣之咎，而内外臣工亦各有不能正己之处"⑥实际上是把自己开脱得一点责任也没有。在《明良论》（二）中，龚自珍也指出了官僚集团上下无耻的现象，但是却指出，这是最高统治者威逼过甚，奴仆视臣下的结果："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把账算到了颙琰头上。后来，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他更说："（霸天下之氏）大都积百年之力，

---

① 《仁宗实录》，第二七五卷。
② 《仁宗实录》，第二七六卷。
③ 《罪己诏》，《仁宗实录》，第二七四卷。
④⑤⑥ 《原教》，《仁宗实录》，第二八一卷。

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岂不暮乎！”“一旦责有气于臣”的历史内容，原来指的就是颙琰这一时期对群臣的责骂。又如，颙琰也承认当时“中外已成痼疾”①，但是原因呢？却认为是由于官僚们“因循怠玩”，“遇一公务，彼此推诿”②，“文不能办事，武不能操戈”③。一句话，都是奴才们不好：“吏治之坏，至今极矣！”在《明良论》(四)中，龚自珍把封建社会的危机比作“人有疥癣之疾”，但是，其责任却在于最高统治者专权果甚，臣下无权，“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的结果，鲜明地反对颙琰的看法。

(三)提出的某些改良措施的语言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尽相同。如颙琰也准备“改例”、“破例”，他曾要各督抚保举贤能之员，专折具奏，表示：“即与例未符，朕自能鉴别，加恩允准。”④表面上，他甚至也反对只作某些细枝末节的改动，对官僚们说：“若琐琐焉摘一事，改一例，博建言之名……朕甚无取焉。”⑤但是，颙琰所准备改的不过是“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调例”一类的东西。而龚自珍则赋予这个“例”以更深广的内容：“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行一谋，专一事。夫乾纲贵裁断，不贵端拱无为，亦论之似者也；然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这里，接触到了封建主义专制极权制度问题，要求皇帝让出一点权力来了。龚自珍要求更法，从更彻底的意义上警告统治者，不要只作“琐琐焉屑屑焉”的改革。当然，龚自珍这里所要破的例，也还只是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并不如一些论者所说，似乎就是封建主义制度。我们不能把古人理想化。

根据这些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明良论》的许多观点是针

---

① 《原教》，《仁宗实录》，第二八一卷。
② 《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仁宗实录》第二七六卷。
③ 《原教》，《仁宗实录》，第二八一卷。
④ 《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一月己卯谕》，《仁宗实录》，第二七九卷。
⑤ 《癸未谕内阁》，《仁宗实录》，第二七四卷。

对颙琰这一时期的谕旨而发的，或反对，或引申，或作了不同的解释，有其具体的战斗内容。我们必须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来加以考察。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1月12日）

# 龚自珍的戒诗与学佛

读过定庵集的人，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即龚自珍为什么戒诗。嘉庆二十五年秋，龚自珍发愤戒诗，不再写作。道光元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录，赋《小游仙诗》,遂破戒。至道光七年十月，编定这一时期所作的诗为《破戒草》后，又发愤戒诗："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此后，就不大动笔。道光十九年，辞官出京，又破戒写成了有名的315首《己亥杂诗》。

这是为什么呢?

搞清楚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龚自珍生平、思想和创作的某些侧面。

## 一

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有《观心》诗：

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哗梦鬼论文。
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

观心，佛家语，佛教"四观"之一，即观察心性如何，是一种修证方法。佛教天台宗特别强调"观心"功夫，有所谓"一心三观"法。在这首诗里，龚自珍说自己"幽绪"繁杂，新诗如云，万虑纷纷，不能平静，即使有挥日的鲁阳之戈也无法把它们排遣。龚自珍不满意这种情况，他要忏悔，于是，写了《又忏心一首》,再次陈述思潮起伏的情况：白天，考虑的是"经济文章";晚上，是"幽光狂慧"。来时汹涌，去尚缠绵，简直无法抑制。这一切，构成了龚自珍的"心病"。在无可奈何中，他只能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寓言决欲就灯烧"了。这次烧掉的是什么，已不可

考。但稍后，龚自珍又把他的《丞相胡同春梦诗二十绝句》烧了。理由呢？是因为“梦中伤骨醒难支”。这些诗，使他梦中、醒中都很痛苦。

烧，只能毁已成的作品；要使思想平静，排除纷纷的万虑，还是干脆不写好。这一年秋天，龚自珍开始戒诗了。他有《戒诗五章》，中云：

> 律居三藏一，天龙所护持。我今戒为诗，戒律一如之。
>
> 我有第一谛，不落文字中……百年守尸罗，十色毋陆离。

尸罗，梵语，意译为戒。龚自珍宣布，要像佛教徒守戒律一样戒诗。他高兴地说：自己早年得了“心疾”，充满了幽想奇语，现在终于走上“康庄”大道了。他又说：“不遇善知识，安知因地孽！戒诗当有诗，如偈亦如喝。”“善知识”，佛家语，好朋友之意，这里指龚自珍的佛学导师江沅（铁君）。《戒诗五章》前，龚自珍有《铁君惠书，有玉想琼思之语，衍成一诗答之》，诗云：

> 我昨青鸾背上行，美人规劝听分明：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

这里的“美人”，即指江沅。“不须文字传言语”，可见，龚自珍的戒诗是江沅“规劝”的结果。江沅对龚自珍的学佛有过很大希望，曾称赞他有“般若根”①。道光元年以后，龚自珍不能守戒，江沅还曾写信责备。江信今不传，但其内容从龚自珍的回信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与江居士笺》云：

> 至于手教，虑信根退，想戏弄之言……顾弢语言，简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

这是龚自珍的辩解之词：自己虽然想少说话，少为诗作文，但“外境迭至”，实际上做不到。

---

① 《怀友诗三十二首》，《染香庵诗录》卷下。

值得注意的是：《戒诗五章》中有一首诗和他的一篇皈依佛教的《发大心文》中的一段内容很相似：

舌广而音宏，天女侍前后，遍召忠孝魂，座下赐卮酒。屈曲缭戾情，千义听吾剖。不到辩才天，安用哆吾口！

——《戒诗五章》

我生天上，身有千头，头有千舌，舌有千义，气足音宏，辩才第一。当念众生冤枉蹇涩，若忠臣，若孝子，若贤妇、孝女、奴仆，种种屈曲缭戾，千幽万隐，我皆化身替他分说而以度之。

——《发大心文》

文恰是诗的注释，它们当作于同一时期。龚自珍有许多"屈曲缭戾"之情，不愿意在尘世说，他把希望寄托在成佛升天以后。

这就是龚自珍第一次戒诗的颠末。

## 二

道光七年，龚自珍有《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诗。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龚自珍的心情很不好，仍处于极大的烦恼中。他说：

中年何寡欢，心绪不飘渺。

人事日龌龊，独笑时颇少。

污秽的现实使他非常痛苦，早晨醒来，常常清泪盈把。他表示，要用"道力"来与他的"寸心"交战，使之空无所有："实证实悟后，无道亦无魔。"他认为，仙、侠、百家之学都非要道之津，只有佛家才是他的归宿："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空王"，佛家语，诸佛之通称。龚自珍决心按照佛教教义来进行修养，使自己的心复归到佛心的境地。于是，他决定首先祛除"恋文字"的嗜好，再次戒诗："忏悔首文字，潜心战空虚。"他改了名字，投牒更名"易简"，以示"万缘简尽罢心兵"之意。又去北京红螺寺祭扫

近代净土宗大师彻悟禅师的塔，写了《四言六章》，表示他对西方佛国的向慕，并且把它作为《破戒草》的最后一篇，自誓从此搁笔，“至于没世，亦不以诗闻，有如彻公”。



这就是龚自珍第二次戒诗的颠末。

## 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龚自珍的两次戒诗都是他学佛的直接结果。

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窒息、沉闷的时代，到处隐藏着危机，到处充塞着庸俗、丑恶和无耻。他孤身奋斗，渴望看到未来的曙光，然而，长夜漫漫，没有一点黎明的迹象。在科举和仕进的道路上，又始终郁郁不得志，不仅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压抑、侮辱和迫害，而且也不为一般友人所理解，被目为“古狂”①和“龚呆子”②。因而，他长期陷入烦闷、痛苦、忧郁、愤激的境地。

嘉庆二十二年，他自题文集为《伫泣亭文》，取“伫立以泣”之义。③

道光元年，他在《能令公少年行》中说自己“少年万恨填心胸”。

道光二年，他和当权贵族有过一次激烈冲突：“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根。”这一次冲突的内容虽也不可考，但他受了很大侮辱，是很显然的。在《黄犊谣》中，他写道：“儿出辱矣！”又在《与邓守之书》中写道：“吾辈行事，动辄为人笑。”④

道光三年，他激愤地自题居室为“积思之门”，卧室为“寡欢之府”，凭几为“多愤之木”⑤。

---

① 孔宪彝：《报罢旋里途中寄怀诸君》，《对岳楼诗续录》卷一。
② 《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2页。
③ 王芑孙：《复龚自珍书》，《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④ 龚自珍佚文，《越风》22、23、24期合刊。
⑤ 参见《与江居士笺》。

道光六年，他幽默地写了一首《赋忧患》，说人间与自己相伴的故物很少，只蒙“忧患”永远跟随着。年华虽增，光阴虽逝，但“忧患”永存。同年，他又在《寒月吟》中说自己“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承老天爷宠爱，把“忧患”交付给了自己，自己只能再拜承受。

道光七年，他受到了当权派的猜忌，决定“守默守雌”①。同年，自述正在“八苦”中度过光阴②。“八苦”，指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等，亦为佛家语。

道光十一年，他在《与张南山书》中说：“近居京师，一切无状，昌黎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二语，足以尽之。”③

龚自珍不仅精神上很痛苦，身体也在急遽衰老：“中夜慄然惧，沉沉生鬓丝。开门故人来，惊我容颜羸。”④他渴望能从忧患、痛苦、矛盾中解脱出来。这样，就逐渐逃于禅了。佛教以虚构的“彼岸世界”的幸福补偿了龚自珍现实中坎坷的命运，以禅观、心证的修持方法消弭了他精神上的矛盾。在《发大心文》中，他自称为“震旦苦恼众生某”，表示要皈依佛门，从此断绝嫉恶心、怨懑心、难忍辱心、善感心、缠绵心，等等。

龚自珍学佛很早。嘉庆二十一年，他于苏州过访归佩珊女士，归即称他为“定庵居士”，赠诗即有“艳才惊古佛，妙想托莲花”之语⑤。嘉庆二十五年前后，他与江沅过从甚密，诗中自述：“春愁古佛知”⑥。道光元年，自称“逃禅一意皈宗风。”⑦道光二年，他度过了一段“缄舌裹脚”，“坐佛香缭绕中，翻经写字”的生

① 《释言四首之一》。
② 《自写《寒月吟》卷成续书其尾》。
③ 龚自珍佚文，见张维屏《花甲闲谈》卷六。
④ 《柬陈硕甫并约其偕访归安姚先生》。
⑤ 《代简寄定庵居士、吉云夫人》，《绣余续草》卷四。
⑥ 《才尽》。
⑦ 《能令公少年行》。

活①。道光四年，与江沅、贝墉等校刻《圆觉经》。道光十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他睡不着觉，"闻茶沸声，披衣起，菊影在扉"，忽然觉得自己已证"《法华》三昧"②。魏源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③，这里所说的"西方之书"，指的当即《法华经》一类佛书；"造深微云"，即"已证《法华》三昧"一类意思。

在佛学思想上，龚自珍倾向于天台宗，而又兼修净土。他曾作有《以天台修净土偈》，又在《己亥杂诗》中自述："狂禅辟尽礼天台"，"重礼天台七卷经"。这里所说的"天台七卷经"正是指鸠摩罗什翻译而被天台宗视为理论根本的《法华经》七卷本。这一时期，龚自珍自称诵习《陀罗尼经》已满四十九万卷，这里的《陀罗尼经》乃是"净土七经"之一。龚自珍特别推崇明末和尚紫柏和蕅益，蕅益是天台宗的二十八世祖而又兼开净土法门。他受佛学于江沅，江沅受佛学于彭绍升，都是信仰净土宗的。

天台宗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佛学交流中所产生的流派。它企图通过戒律的守持和禅观的修证来求得所谓证悟。净土宗则滥觞于东晋时慧远等在庐山所结的莲社。它要人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便往生"无有众苦，但有诸乐"的"莲花国"——"西方极乐世界"。两宗的教义虽有繁简的不同，但都要求人们摒弃物质世界，灭绝精神活动，使内心归于寂灭，无为，无念。这就是天台宗大师智顗在《法界次第观门》一书中所说的："正观之心，犹如虚空，湛然清净"，"心心寂灭，自然流入大涅盘海"。④龚自珍的戒诗正是基于佛教教义的这种要求。他说：

> 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
> 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
>
> ——《戒诗五章》

① 龚自珍佚文，《越风》22、23、24期合刊。

② 《己亥杂诗(狂禅辟尽礼天台)》自注。三昧，佛教修养中的理想境界。《大乘义章》："以体寂静，离于邪乱，故曰三昧"。

③ 《〈定庵文录〉序》，《古微堂外集》卷三。

④ 《大正藏》卷四六，第624页。

枕上逃禅，遣却心头忆。

——《凤栖梧》

既然诗使得龚自珍思潮起伏，痛苦万分，自然要烧诗、戒诗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逃避现实矛盾，也逃避自己的内心矛盾呀！

## 四

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不是由于这一现实加给龚自珍的种种迫害，龚自珍是不会“逃禅”，也不会戒诗的。“避席畏闻文字狱”，雍正、乾隆时代那些血淋淋的高压政策给龚自珍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龚自珍写道：

黄尘澒洞中，古抱不可写。

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移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

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则叱矣；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则淬矣；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也乎？

——《与江居士笺》

从这些地方看来，龚自珍是感到了言论不自由、不为人理解的痛苦的。这对他的戒诗未尝没有影响，然而，从根本上看，学佛毕竟是龚自珍戒诗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

强者是不会逃避现实的。龚自珍的“逃禅”，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思想的斗争中，他还是个弱者。但是，他屡戒诗而屡破戒，又反映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龚自珍始终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

从龚自珍戒诗——破戒——再戒诗——再破戒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龚自珍思想中所进行的痛苦的斗争，看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先进分子的悲剧性格，也曲折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面影。

（原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 读黄遵宪致王韬手札

光绪五年（1879），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王韬自香港来游。二人相识后，很快结为好友，“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①。七月初六日，王韬归国，转返香港，继续主编《循环日报》，二人仍经常通信，交流对时局、写作等方面的看法。王韬致黄遵宪的信，有三通收录于《弢园尺牍》及《弢园尺牍续钞》中，容易见到；黄遵宪致王韬的信，则向未刊行。这里，笔者介绍见到的十九通，并作初步探讨。

手札分藏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上海等处。有些署有月日，有些则未署时间，而且篇页错乱，经考订排比，其顺序为：

第一通，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二通，同年七月初。本函未署时间，从内容看，系王韬归国，黄遵宪约他参加饯行宴，故知当作于此时。

第三通，同年七月十一日。

第四通，同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五通，同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六通，同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通，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函正页已佚，仅存附页，未署时间，据第八通“腊八后七日奉书”等语及两函所述“翻译球案”一事情节推断，当作于此时。

第八通，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九通，光绪六年（1880）二月下旬。本函未署时间，信中

① 王韬：《日本杂事诗序》，《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说："十九日舍弟均选来署，带到惠函并《杂事诗》诸件，一一照收。拙诗宠以大序，乃弟生平未有之荣，感谢实不可言。"王韬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作序在本年二月初一日，故知本函当作于此时。

第十通，同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一通，同年四月十日。

第十二通，同年四月中下旬。本函为托人带地图等物给王韬的便札，未署时间。

第十三通，同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四通，同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通，同年七月。未署时间，函中有"弟未往箱根前"等语，知当作于上函之后。

第十六通，同年八月。本函正页已佚，仅存附页，未署时间，从内容看，信中谈到曾纪泽向沙皇递国书，俄国海军卿率舰队东来等事，知当作于此时。

第十七通，同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十八通，同年九月十日。

第十九通，光绪七年(1881)六月十三日。

这些信，为研究黄遵宪、王韬及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 二

使日期间，黄遵宪正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这批信件，有助于了解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有助于了解他写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某些情况。

黄遵宪和王韬非常契合。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函云：

> 前把臂得半日欢，觉积闷为之一舒，承赐《弢园尺牍》，归馆读之，指陈时势，如倩麻姑搔痒，呼快不置。昔袁简斋

戏赵瓯北，谓吾胸中所欲言者，不知何时逃入先生腹中，遵宪私亦同此。但宪年来愤天下儒生迂腐不达时变，乃弃笔砚而为此，始得稍知一二，而先生言之二十年前，冠时卓识，具如此才，而至今犹潦倒不得志，非独先生一人之不幸也。

《弢园尺牍》初版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它提出了初步的改良主义主张。王韬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只有变法，才能自强。他主张学习西方的“良法美意”，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科举制度。黄遵宪读后感到“如倩麻姑搔痒，呼快不置”，说明了他和王韬在思想上已经成为同调。“愤天下儒生迂腐不达时变，乃弃笔砚而为此”，这两句话表示出，在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的新形势下，黄遵宪也在寻求救国真理，逐渐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了。

同函附诗二首，为今本《人境庐诗草》、《人境庐集外诗辑》所不载，其一云：

司勋最健言兵事，宗宪先闻筹海篇（君著有《普法战纪》诸书甚富）。团扇家家诗万首，风流多被画图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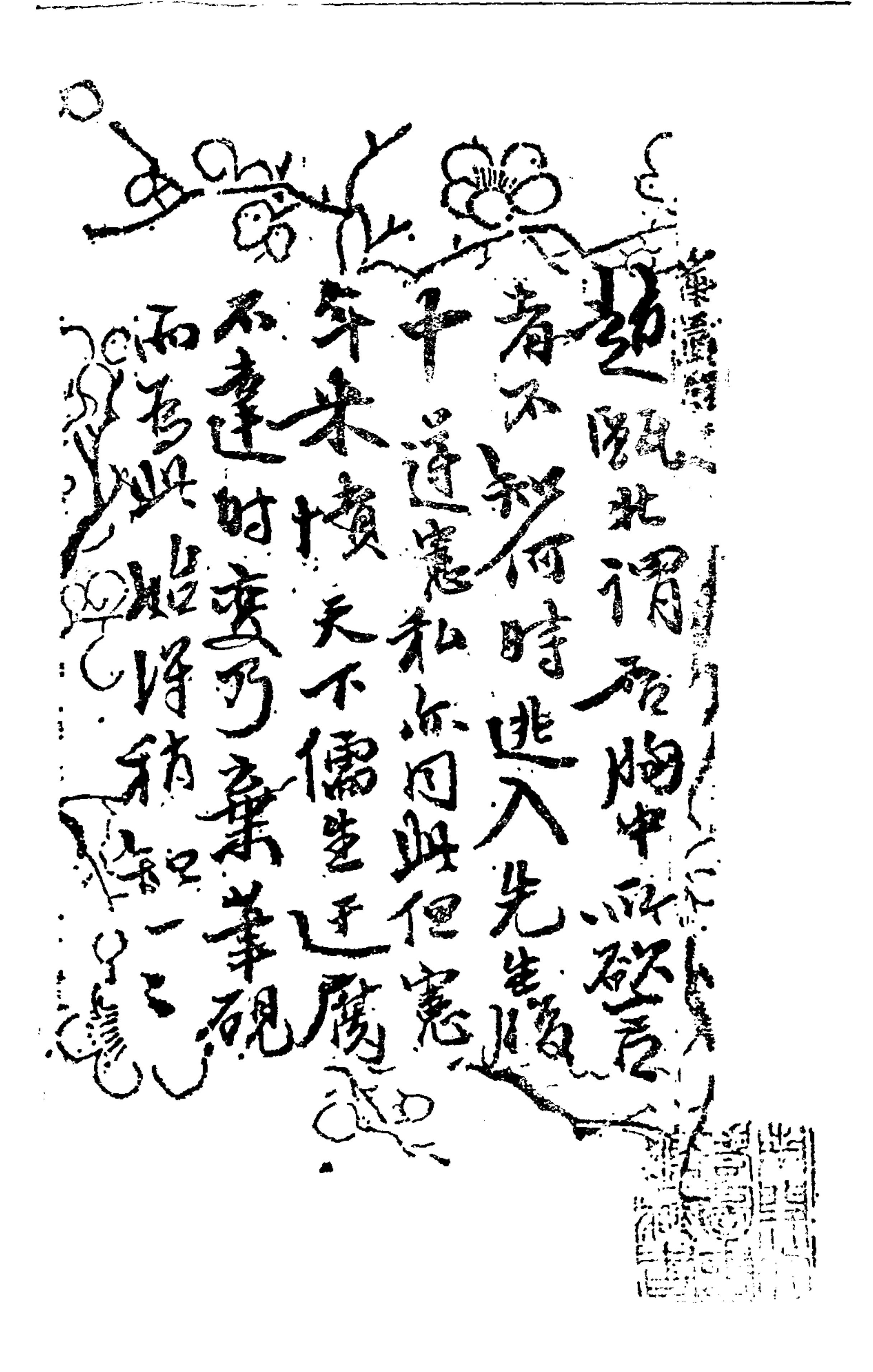
司勋，指唐代的杜牧，曾任司勋员外郎。他喜欢谈兵，注释过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宗宪，指明代的胡宗宪，为防止倭寇侵扰，著有《筹海图编》。以杜牧和胡宗宪来比喻王韬，显示出王韬在黄遵宪心目中具有相当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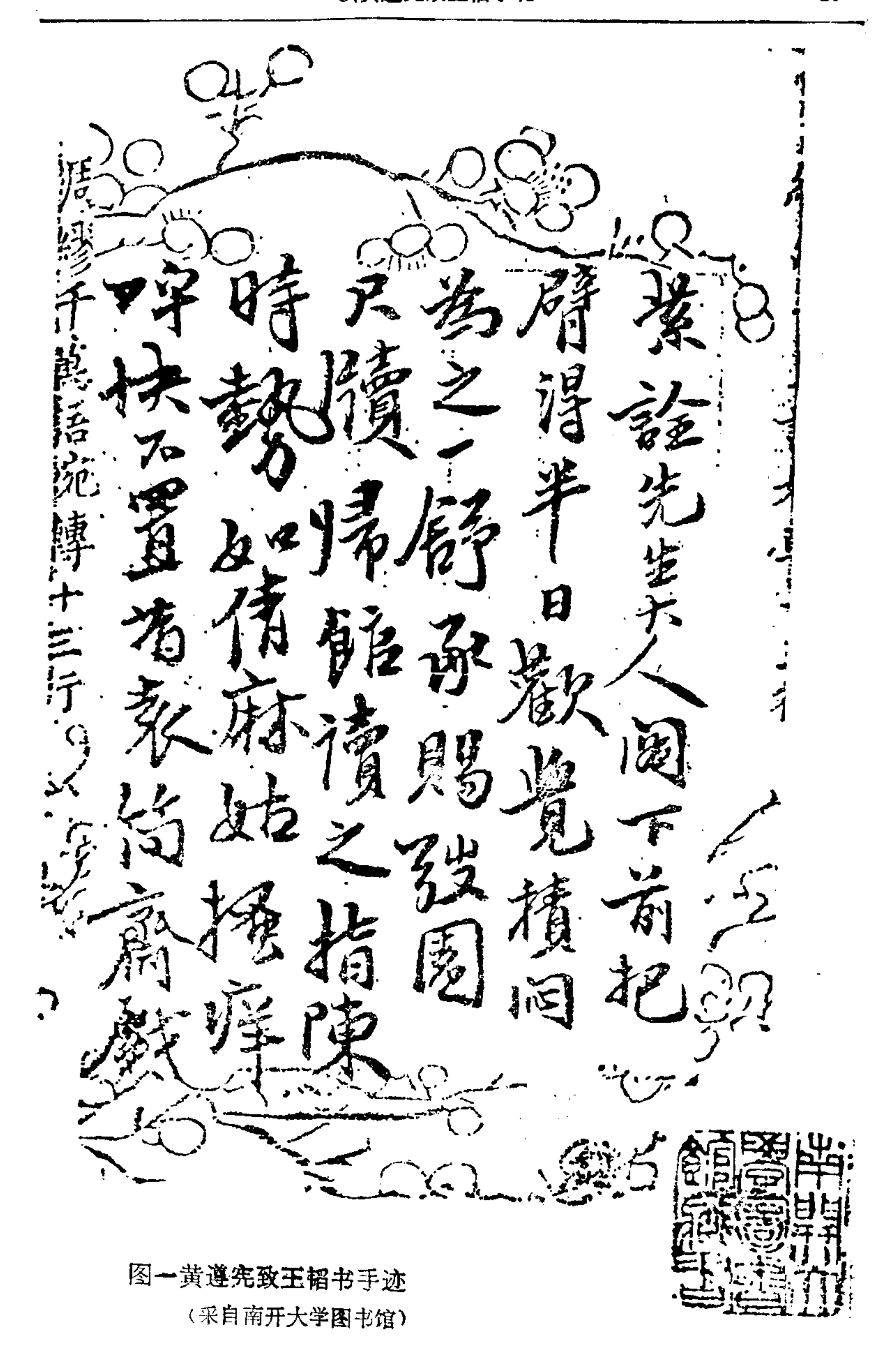
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函又云：

弟近日归自箱根，获读五月中所发二函，前后凡四、五千言，其揣摩时势之谈，尤为批隙导窾，洞中要害。弟昨评冈鹿门一文，谓古人论事之文多局外之见，纸上之谈，可见诸施行者，百无一焉。乃今读先生所议，多可坐而言起而行者，真识时之俊杰哉！

黄遵宪一生不轻易许人，他认为王韬的思想“批隙导窾，洞中要害”，“多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是相当高的评价。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另一个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者，黄遵宪向





紫詮先生大人閣下：前把臂得半日歡，覺積悶為之一舒。承賜弢園尺牘，歸館讀之，指陳時勢，如借麻姑搔癢，呼快不置。有袁簡齋戲

屠綴千萬語宛轉十三行

图一 黄遵宪致王韬书手迹

（采自南开大学图书馆）

王韬打听他，渴望读到他的著作。光绪六年八月函云：

再读贵报有《杞忧子〈易言〉书后》二篇。是公著述，偶曾一读，心仪其人，访其姓名，仅知为岭南人，姓郑。尊处有《易言》稿本，可赐一读否？深山穷谷，不无奇才，在上之人拔而破格用之耳。

“杞忧子”是郑观应的笔名，《易言》是《盛世危言》一书的初名。在这一部著作中，郑观应提出了设议院，行西法，振兴商业，变法自强等主张。光绪五年春，王韬从郑观应的友人处读到了《易言》稿本，认为它“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第二年，王韬在香港《循环日报》发表《杞忧子〈易言〉跋》，称赞这部稿子是“救时之药石”。文中，王韬说：“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他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只要“竭我之心思材力，尽我之智慧经营”，仿效西方所长，那末，完全可以“出乎其上”①。黄遵宪所说《杞忧子〈易言〉书后》，即指此文。信中，黄遵宪不仅表示“心仪”郑观应其人，而且表示希望清朝统治者“破格”拔用这样的“奇才”，这一点，同样显示了黄遵宪改良主义思想立场的确定。

黄遵宪之所以能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发展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这固然由于他是个爱国主义者，渴望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但同时，也和他注意研究外事，了解世界有关。黄遵宪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致王韬函云：

仆所著《日本杂事诗》，本欲刊布之，以告中人之不知外事者。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无不睁眼看世界，写了不少“睁眼”著作，《日本杂事诗》是其中之一。从黄遵宪的信中可知，他写作目的很明确，很自觉。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的另一部“睁眼”著作。关于此书，黄

① 《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遵宪光绪七年六月十三日致王韬函云：

> 中土士夫于外国事类多茫昧。昔辽主告宋人曰：汝国我皆知之，我国事汝不知也。即今日中外光景。日本年来依仿西法，类为依样葫芦。弟之穷年屹屹为此者，欲使吾国人略知东西事耳。

西方当时比中国先进。黄遵宪认为，可以学习西方，但不能“依样葫芦”，这一思想是可取的。

为了研究日本，写好《日本国志》，黄遵宪孜孜兀兀，“友朋往来，大都谢绝”。[①]他不仅搜求文献，征询故实，而且注意实地考察。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致王韬函云：

> 弟以三年居东，行赋曰归，念日本山水素称蓬壶，屐齿不一至，虑山灵贻笑，而村乡风景亦窃欲考风而问俗，故恣意为汗漫之游。居箱根山中凡二旬，而温泉七所仅一未至。山路险峻，止通一线，而箱根驿有大湖在万山顶，宽仅十余里，深至五十丈，乃知古人比之函谷，称为关东咽喉之地，盖真不啻金汤之固也。随后尚欲游日光，走上州，过北海，抵箱馆。他日归途，更由陆达西京，经南海诸国，访熊本城，问鹿儿岛而后返。但恨文笔孱弱，不足以自达其所见耳。

后来，黄遵宪在写作《日本国志》中的《地理志》和《礼俗志》时，曾经吸取了这次“汗漫之游”的成果。在游历中，黄遵宪除“考风问俗”外，还注意研究日本的新兴工业。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致王韬函云：

> 弟自箱根归后，游兴勃发，旋复袱被独行镰仓之江岛、豆州之热海，皆勾留半月而后归。归席未暖，又于富冈观制丝场，于甲斐观造酒所，于五子村观抄〔造〕纸部。

富冈制丝场是日本最早的近代化制丝企业，采用法国进口机器。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该厂和制丝生产的叙述，也显然和这

---

① 《黄遵宪光绪七年六月十三日致王韬函》。

次参观有关。

黄遵宪不以了解日本为满足，他希望在完成《日本国志》后，进一步了解全世界。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函云：

> 弟以不才滥膺今职，曾无片长可以告人。顷随何星使后共编《日本志》，而卷帙浩博，明年乃能卒业。俟此事毕，得游欧罗巴、美利坚诸洲，再与先生抵掌快谈，论五大洲事，岂不快哉！

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只要能够通古今，究天人，就可以称为了不起的人材，但是，到了近代，这就不够了，还必须明中外。黄遵宪是很懂得这一点的。

## 二

琉球问题是黄遵宪致王韬函中议论的重要内容。

琉球原是中国邻邦，先后称藩于明政府和清政府。日本明治维新后，即积极准备吞并琉球，进窥台湾。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政府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人杀害，发动侵台战争。次年，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贡”，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陈情。光绪三年(1877)六月，清政府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①。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批准了何如璋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中的下策，即“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向之评理”②。根据清政府的指示，何如璋开始与日本政府交涉，黄遵宪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致王韬函云：

> 琉球争端初起，由星使与外务卿议论数四，彼极拗执，乃始行文与辩。日本于此一节，自知理绌，无可解说，乃别

①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

生一波，谓此间初次照会措辞过激，不欲与议，彼原不过借此以延宕罗唣耳。

光绪四年八月七日，何如璋访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随后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九月十二日，何如璋照会寺岛，其中有“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等语①，寺岛认为是“暴言”，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1日）照会反驳，声称“贵国政府如果命贵大臣作此等语，是即贵国政府不欲以后两国和好”云云②。寺岛并要求何如璋道歉，撤销照会，否则不能商谈。黄遵宪致王韬函所言，即指上述各事。

黄遵宪同函又云：

> 嗣统领东来，本署将屡次彼此行文逐一详审译呈，统领以为无他。杨越翰将一切情节寄刊报馆，独于日本外务与我之文，一讥其骄傲过甚，再讥其愚而无礼。其是否出统领意虽不可知，然彼之为此，盖主持公道，谓我与彼文无甚不合，而彼与我文乃实为无理，所谓以矛陷盾者也。此报一出，闻纽约报馆卖出数万份，而欧洲诸国照刻者亦多，因是而五部洲人皆知日本之待我极为骄慢，皆群起而议其短，因美国系中间人，中间人之言皆信之也。

光绪五年三月，日本侵占琉球，废去国王，改设冲绳县。同年五月，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请援，中日两国间交涉因之再起。适值美国前任总统格兰忒（U. S. Grant）正在作环球旅行，准备在访问中国后转赴日本，清政府便委托格兰忒进行调停。本函所言“统领”，即指格兰忒；所言杨越翰（J. R. Young）乃是他的随员。五月二十五日（7月14日），黄遵宪曾将琉球事件的始末文卷英译件送交杨越翰，由杨越翰转呈格兰忒③。后来，杨越翰将黄遵宪送交的这批材料转交纽约《哈拉报》发表，并著文评论，

①② 《日本外交文书》卷11。

③ 《译美前总统幕友杨副将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

日本西文《横滨日报》、东京《邮便新闻》、《朝野新闻》等纷纷转载，"虽东人见之不悦，而语出他人，无所用其讳，故杨越翰讥诮日本之语，亦一一具载"①。黄遵宪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王韬函又云：

日本谓本署初次照会，失于无礼，议撤议缴，言者屡矣。自杨越翰新闻一出，反谓其行文无礼，乃缄口不复道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鲜也。

杨越翰一方面著文批评日本外务省"行文无礼"，一方面又致函李鸿章，批评何如璋的照会"过于直率，有失友邦敌体之礼"②。格兰忒也说："从前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③他们都要求清政府接受日方要求，撤销何如璋照会。随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从前所论，可概置勿论，一一依照美前大总统来书办理"，寺岛复照表示"欣慰"。因此，日本方面之所以"缄口不复道此"，并非由于"杨越翰新闻"的批评，而是因为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一切，黄遵宪显然不很了解，他对于杨越翰、格兰忒在"调停"中所采取的纵横捭阖的手法就更不了解了。

在琉球交涉中，何如璋的许多文书都出自黄遵宪之手。照会被撤销，黄遵宪不无郁郁，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王韬函再云：

此事本无关轻重，台湾一案亦定议后互撤照会，惟彼国必欲挑此，恐中土之迂腐无识者，反谓以文字启祸，则悠悠之口难与争辩耳。日本之处心积虑欲灭球久矣，使者之事，非争贡也，意欲藉争贡以存人国也。本系奉旨查办之件，将此议上达枢府，复经许可而后发端。此中曲折，局外未能深知，敬为先生略言之。

黄遵宪指出，和日本交涉的目的并非是"争贡"，而是为了保

① 《黄遵宪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函》。
② 《译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
③ 《译美前总统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

存琉球这个国家。黄遵宪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光绪六年二月，日方派人到中国会见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有旧好之谊，有辅车之势”，愿将琉球南部邻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二岛划给中国，但须修改《中日通商条约》，使日本商人能像西方商人一样进入中国内地贸易。同年六月，日本公使宍户玑到京与清政府谈判。九月十日黄遵宪致王韬函云：

> 此案近闻既由彼族授使臣全权在京会议。其若何结局，即使馆且不得参议，更无论局外……还君臣而复疆土，此事谈何容易，然终不能不于各执一说中，折衷以期一是，彼此退让则妥结矣。

这里所说的“使臣”，即指宍户玑。

次年六月十三日黄遵宪致王韬函再云：

> 南藩一事，悬而未了，以彼饷绌国虚，万不敢更生他衅，然欲求立国复君，则非撤使罢市，不足以持之也。

所谓“还君臣而复疆土”，所谓“立国复君”，都是要求保存琉球国。后来琉球交涉不了了之，黄遵宪也就无可如何了。

## 三

黄遵宪与王韬通信时，沙皇俄国正在积极向东方扩张。一小撮人大肆叫嚷：“俄国的历史使命是将东方加以融合，使之并入俄罗斯帝国。”① 黄遵宪的这些信也反映了他对沙俄侵略的态度及其外交策略。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函云：

> 日本比来屡见火灾，国会开设之议，倡一和百，几遍国中。政府顾尼之不得，行纸币日贱(数日中，每洋银百圆，值纸币百四十矣)，民心嚣然，盖几有不名一钱之苦。漏卮不塞，

---

①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Berkeley, 1958, pp. 40—42。

巨痛如此，可慨也夫！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虎狼之秦，眈眈逐逐，彼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哉！祸患之来，不知所届，同抱杞忧，吾辈未知何日乃得高枕而卧也！

函中所说“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的“虎狼之秦”，指沙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天皇政府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办法来攫取民间财富。本函所说“（政府）行纸币日贱”，指此。黄遵宪把日本看成“兄弟之国”，为了制止沙俄对远东的侵略，黄遵宪主张联日制俄，因此，颇为日本的政情不稳担忧。

还在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就借阿古柏在天山南北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之机，出兵侵占我国领土伊犁。光绪三年（1877年），阿古柏被驱逐，清政府要求沙俄归还伊犁，遭到拒绝。次年，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在沙俄的胁迫诱骗下，昏庸的崇厚擅自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入国内，朝野上下一致谴责崇厚卖国，清政府也拒绝承认该条约。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定为斩监候。关于此事，黄遵宪四月十日致王韬函云：

崇公之去，朝旨命之索伊犁，未尝令其结条约也。及将约稿寄回，又屡次驰书，告以万不可许，而崇公一概不听，擅自启程，此即泰西之头等公使亦万万无此事。彼徒以骄矜之气为桀黠所愚，遂使天下事败坏决裂至于如此，可胜叹哉！

在谴责崇厚这一点上，黄遵宪与广大爱国人士并无二致。但是，他不同意清政府急于定崇厚之罪的做法。同函云：

俄为劲敌，当路诸公素所深知，故虽明知万不可行，尚欲含濡隐忍以待他时，而台谏诸人，连章交劾，未经宣布之前，留中章疏既有七份，其后攘臂奋袂慷慨言事者，至于无日无之。朝廷以不得已始下之议，而崇厚之罪实不能为之讳，又有一二人据理以争，负气过甚，非枢廷诸君所能屈

服，于是拱手而听其议罪，而崇厚乃下狱矣，乃斩监候矣。

当时，沙俄为了保护崇厚这个卖国贼，率先向清政府抗议，英、法、德、美诸国也纷纷效尤；沙俄政府并调动军队，实行战争讹诈。黄遵宪认为，以只声明有罪而不立即"定案"为有利。同函又云：

> 中土士夫，其下者为制义，为试帖，其上者，动则称古昔，称先王，终未尝一披地图，不知天下之大几何，辄诋人以蛮夷，视之如禽兽。前车之覆既屡屡矣，犹不知儆戒，辄欲以国为孤注，视事如儿戏，又不幸以崇厚之愚谬妄诞，益以长浮气而滋浮论，至于有今日，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今事已至此，苟使声明崇厚之罪而不定案，告于天下曰：朝廷遣使只命索还伊犁，乃崇厚所结条约，举属伊犁一地之外之事，实为违训越权，条约云云，实难曲从。则内以作敌忾同仇之气，外以示我直彼曲之义，然后急脉缓受，虚与委蛇，徐徐再议，俄人虽横，彼亦无辞，犹为计之得者。

黄遵宪不了解，即使不定崇厚之罪，但是，只要你一宣布崇厚"违训越权，条约云云，实难曲从"，那末，帝国主义是仍然要抗议，要讹诈的。他说："通商以来既三十余年，无事之日失每在柔，有事之时失每在刚，此又其一也。"① 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害怕过于"激烈"的举动会惹怒帝国主义。这里，反映出黄遵宪作为改良派的软弱而矛盾的性格。

为了保住即将攫取到手的权益，沙俄政府除在伊犁地区集结军队外，又调动铁甲舰两艘、快船十三艘到日本长崎，准备封锁中国海面，摆出一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架势。但是，当时沙俄在国际上非常孤立，国内也危机重重，并不可能发动一场侵华战争，黄遵宪说：

> 西邻之责，自星使续往，递国书，谒君皇，一一如礼。

① 《黄遵宪光绪六年四月十日致王韬函》。

其外务既许改议，事机似乎稍缓。尊处传闻异辞，日月歧异，不尽得实。俄船东来，皆驶往珲春。现泊长崎者，只有一号耳。专派之大员乃彼国海军卿，亦往珲春。观其意，乃欲经画东面，设常备兵，编立营制，故携夫人俱来，且挈水雷艇，空其船，载茶而归。在新驾坡者，复截止不遣，皆可知其意不在战，特万万不可因此而弛备也。

光绪六年正月，清政府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交涉。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开始第一次谈判。初时，沙俄态度蛮横；经过一段时期，才表示可以重开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细节。同时，则派廖索夫斯基海军上将率舰队开赴远东威胁。黄遵宪函中所云“星使续往”、“其外务既许改议”、“专派之大员乃彼国海军卿”等事，指此。黄遵宪看出了，当时沙俄之意“不在战”，但认为万万不可“弛备”。随后，王韬曾将黄遵宪所述情况通报给清廷有关官吏，其《上郑玉轩观察》云：

俄国师船近多云集于珲春，其驻泊于日本长崎者仅一艘耳，俄军门亦已移节珲春，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为常行驻兵计，其志固不在小也。①

可以看出，王韬的情报完全来自黄遵宪。

为了防止沙俄对远东的侵略，光绪六年，黄遵宪还曾为朝鲜使者金宏集起草过一份《朝鲜策略》，“文凡万言，大意以防俄为主，而劝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它得到朝鲜部分人士的赞成，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光绪七年六月十三日黄遵宪致王韬函云：

今日世变终不能闭关而治，与其强敌环攻，威逼势劫而后听命，不如发奋图强，先择一较为公平之国与之立约。朝鲜之在亚细亚，实犹欧洲之土耳其，苟此国亡，则中东殆无安枕之日，故不惮为之借箸而筹也。金君携回此稿以奏其

① 《弢园尺牍》，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71页。

主，国王甚为感动，一时舆论亦如梦初觉。自去岁至今，改革官制，设有交邻、通商各司，又分派学生到北京，到津讨论兵事。此次所遣委员亦为探察一切。看其国势，不久殆将开关矣。至李万孙乃其国中之一老儒，其上疏皆不识时务之言，不足以为怪也。

当时，沙俄、日本对朝鲜都怀有领土野心，英、美等国也企图打开朝鲜门户，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具体意见未必正确，但他对朝鲜战略位置的认识是有见地的，期望朝鲜君臣“发奋图强”的愿望也是积极的。

## 四

函件也有助于王韬生平及其文学的研究。

王韬在日本时，不仅与黄遵宪友善，而且与不少日本人士相处得也很融洽。何如璋曾上书清政府有关方面，拟罗致王韬在驻日使馆工作，后因使馆人员名额有限，又因福建巡抚丁日昌也有延聘王韬入幕的打算，未果。此事颠末，具详黄遵宪光绪五年七月十一日致王韬函中。光绪六年，王韬准备再度东游，这使黄遵宪很高兴。他认为，王韬在日本人士中有影响，出任使馆工作必将“于两国和好收效甚大”。因此，计划再次推荐王韬。六月十九日函云：“若得有消息，旧日令尹必举先生之名以告。”即指此事。

对王韬的诗文，黄遵宪评价都很高。王韬游历日本时所写的《扶桑游记》，黄遵宪评之为：“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其天机清妙，读之使人神怡。”光绪六年八月，黄遵宪读了王韬的《蘅华馆诗录》后，于同月二十九日致函说：

窃以为才人之诗只千古而无对也。弟每读近人诗，求其无龌龊气，无羞涩态者，殊不可多得。先生之诗，尽洗而空之，凡意中之所欲言，笔皆随之，宛转屈曲，夭矫灵变而无不

达，古人中惟苏长公、袁子才有此快事，然其身世之所经，耳目之所见，奇奇怪怪，皆不及吾子远甚也。

这里的评价虽不无过誉之处，但对于我们研究王韬，仍有参考价值。

（原载《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

#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幾先，其事何堪设想！①

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

① 《德宗实录》第四二七卷。

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①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②《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③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④

康有为这封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

①②③《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76、466、347页。
④《戊戌变法》第2册，第518页。

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①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书后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②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之。③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④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

①② 《戊戌变法》第1册，550—551、555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麐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

③④ 《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333页。

王”。①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又说：

>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②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弟，刘说：“确曾有此一议”。③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④

---

① 《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3册，第562—564页。
③ 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5卷第4期第26页(1961年4月)。
④ 《戊戌变法》第4册，第52页。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①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②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

① 《戊戌变法》第4册，第331页。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图二 记录康有为"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一）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識略縱橫，及至做事時，乃ア拘泥帶水，仆曰：非拘泥
帶水也，先生欲用我，須與我言明辦法，我一命雖微，
然不能糊塗而死也。凡事貴審謀熟慮，先生既令我
同謀，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辭乎？且先生令我領百人，
此事尤不可冒昧。蓋我係南人，初至北軍，而領此彼
我不相識之兵，不過十數日中，我何能收為腹心，得
其死力乎？即起孫吳于九原，而將此百人，亦無十數
日即可用之理。況我八歲即隨吾父叔來往軍中，我
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愛之拔貢生專將此兵，不
獨兵不服，即同軍各將，皆詫為異事也。廣仁不悅，終
莫而出。夜七時，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只敗矣，未
知譚之消息如何。康曰：譚處自有交徐世昌者，與吾
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遊說處明言之，我敗在
此一舉。仆乃將日中與廣仁所言告康，康盛氣譴仆
曰：汝以一拔貢生而將兵，亦甚體面，何不可之有？且
此事尚未定，汝不用先慮也。仆知廣仁諸我，蓋疑
我為利祿之徒，以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見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紛紛奔走，意甚忙迫。
午膳時，錢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
何知之？錢曰：頃梁君謂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
時，只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
知畢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語。然則此事
顯然矣，將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為成濟
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譚、梁一夜未歸，蓋往袁處明商
之矣。

初四日，早膳後，譚君歸寓，仆往詢之，譚君正梳髮，氣概

图三 记录康有为“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二)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①

此件大约写作于1899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②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③,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

③ 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1]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附记］承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惠借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特此致谢。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9页。

#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戊戌政变前夜，康有为为了挽回局势，曾与谭嗣同、梁启超密谋，利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乘机派毕永年捕杀西太后。有关事实，我已专文作过阐述①。近读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一通，发现它不仅为戊戌密谋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而且说明了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和政治目的，因据之以作补证。

密札首尾均佚，中云：

> (上脱)唐已撤回矣。顷得诸要人为我斡旋，各事可称顺手。惟张、鹿两军机仍不慊于吾党，监国之待彼革，处处还其体面，故尚不无小小阻力。弟子已有书与张，通殷勤，释前嫌，若吾师别致一函更妙(函寄此间可也)。
>
> 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袁贼已败，故措词不能不稍变易，已僭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若此次再出岔，则中国真沉九渊矣。师谓何如？②

函中所言唐，指唐绍仪。张、鹿两军机，指张之洞与鹿传霖。监国，指摄政王载沣。袁贼，指袁世凯。德宗，指光绪。孝钦，指

① 见本书第37—45页。

② 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第860—861页。

西太后。函中提到"袁贼已败"，故知此函作于1909年1月2日，清政府罢斥袁世凯之后。函中所言"彼革"，亦指袁世凯。"处处还其体面"，指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开缺回籍养疴"为名革除了他的职务。所谓"戊戌密谋"，即指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的计划，因为"诛荣禄"等一类打算，早已由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等处公布，不必再"隐讳"了。

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海外，对袁世凯出面告密，以致"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多次策划倒袁。1908年11月，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由光绪的亲弟弟载沣摄政。这使康、梁大为兴奋，视为"讨贼复仇"的绝好机会。他们多方活动，联络满汉贵族、大臣，企图使清政府惩办袁世凯，其中重要的方式就是给载沣上书。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力辩"谋围颐和园"，说这是袁世凯捏造的"无根浮言"，"至狠极毒"，恶贯满盈，要求载沣像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杀肃顺一样处置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① 从梁札可以看出，《上摄政王书》是经由梁启超之手转递给载沣的，其间经过梁启超的"僭改"，而其"僭改"的最重要之处则是周到地掩盖"戊戌密谋"。

还在1990年，康有为在给英国人濮兰德的书信中就曾说："盖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② 当时，光绪是西太后的阶下囚，康有为泄露"围园"密谋必然会危及光绪。现在囚人者与被囚者都已经死去，康有为觉得时势不同了，因此在《上摄政王书》中作了某种透露，而这遭到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声言"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要求老师和他统一口径："以后发论，跟此一线，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521页。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

以免异同。”

确实，梁启超比他的老师精细。载沣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他的地位是西太后给予的。把“围园”这样的密谋提到载沣面前，就会使他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肯定密谋是正义之举吧？这就要证明西太后不义；而且，光绪与密谋的关系也无法交代。如果光绪知情，这就有悖于“孝道”；如果不知情，又难免失察之过，和改良派力图塑造的光绪形象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有一封给肃亲王善耆的书札，中云：“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又云：“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① 康有为的《上摄政王书》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当即梁启超的“僭改”之一。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梁启超的内心矛盾。他权衡再三，只有“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均由袁世凯“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这样，就可以撇开西太后的关系，“而事易办”，载沣下决心惩办袁世凯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另一考虑是“开放党禁”。载沣摄政后，康有为、梁启超除活动倒袁、惩袁外，同时还企图为戊戌一案平反，其内容包括：抚恤“六君子”，起用因参与变法而被罢斥的维新党人，允许康、梁等合法地从事政治活动等。如果包围颐和园一类密谋泄露，必将增强反对力量，惹起许多麻烦，不如矢口否认来得干净。所以，梁启超又告诫康有为，不能再“出岔”了：“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页。

对梁启超的考虑，康有为深以为然。所以他不仅同意梁启超的"僭改"，而且终其身一直守口如瓶。1926年，当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在《申报》上发表时，曾经有人认为"个中人物，只有南海"，希望他出面"证明是非"，但是，康有为却保持沉默，"始终未有只字相答"①。康有为的疏忽之处在于，他没有想到毕永年留下了一份日记，也没有将梁启超的密札销毁，使得我们在"确证"之后，还可以"补证"。

（原载《文汇报》，1986年4月8日）

① 张一麐：《致蔡元培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二），台北版，第1—2页。

#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 函称：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抉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下略）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太郎随行。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海。函中所言沈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员。同年7月，参加张园国会。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

在湖北新堤发难。林君述堂，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人。唐才常等创立的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鼓吹。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政变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1898年10月31日日记载：

>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①。

柏原，即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宗方的这一页日记提供了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计划轮廓和进军路线。当时，距西太后重新训政不过40天，康有为、唐才常就已经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旧说以为变法的失败就是改良派堕落的开始，这一划分未免过于机械。

---

①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原书房版，第673页。

北平先生大人执事：前日歸滬往寓，匆匆未及拜送，至以為歉。並有沈君愚溪來此處，擬由田野橘次君同往湖南，開辦學堂報館等事。此舉頗係東南大局，至為緊要。必須開創之時，極力衝破，以後等行諸事，自此順理成章。須立布若荒井宮城諸君。皆初晤，惠連妥商一切。務乞先生函致君子及沈君二人，公同會議，謀定後動。但求排一切行之志，毋多言議而稱加湖湘幸甚，大局幸甚。才頓

图四　唐才常手迹

（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的第二次见面在11月1日。当日宗方日记云：

> 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①

毕永年，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图谋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其中捕杀西太后的任务即交给了他。这时，他正和唐才常一起筹划起义。显然，唐才常对宗方愿为义军"增添力量"的表示极感兴趣，因此，第二天便偕毕永年登门拜访。

唐才常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他与康有为一起确定了起义计划后，即积极从事筹备与组织工作。1899年春，毕永年偕宗方的同学、日人平山周赴汉口，会见林圭，三人一起入湘，联络各地哥老会。同年5月，毕永年派长沙人张灿、谭祖培、李心荣赴日，会见宗方，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②此前，唐才常也回到国内，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这年秋，唐才常再次赴日，得见孙中山，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这一时期，唐才常还联络了在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的林圭、蔡锷等一批留学生，决定回国举事，11月，孙中山、梁启超为之饯行。不久，唐才常首途回沪，林圭及田野桔治也于同月中旬到达上海。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正是在此情况下写成，由林圭等亲手递交的。

湖南是康有为、唐才常起义计划中的发动点。唐才常派沈荩、林圭及田野桔治去武汉的目的是联络张之洞，通过张取得合法身份，以办学、办报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信中，唐才常要求宗方与沈荩、林圭及白岩、荒井、宫坂等人，"公同会议，谋

①② 《宗方小太郎文书》，第673.674页。

定后动”，显然指起义一类事情，如果只为了办学、办报，是不值得如此重视的。

在唐才常致函宗方的前18天，宗方曾在武昌访问张之洞，了解他的态度。谈话中，张之洞激烈地指责康有为一派欺君卖国，对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出境表示感谢，宗方则答以并非驱逐，而是有志之士劝告康有为自动离日的结果。张之洞便顺着宗方的话头，进一步要求“劝告”梁启超离日。宗方发现张之洞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有可能响应义举，失望而去。① 这可能是促使宗方改变对唐才常起义态度的原因之一。

沈荩、林圭、田野桔治的湖南计划也因未能打通张之洞的关节而无法进行。据田野桔治记述：“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② 这里所说的“日本愚物三人”，当即唐函所称“白岩、荒井、宫坂”。他们不愿充当沈荩等人和张之洞之间的中介。田野忿忿地表示：“倘彼愚物而为德、法人，予必赠以决斗书，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③ 田野的记述表明，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在策划起义的最初阶段，宗方表示支持，这使康有为等增强了起义的决心；但是，宗方后来却并不积极。他们和康有为等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因而其反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沈荩、林圭等还是积极筹备，不过计划中的起义中心却逐渐转移到了湖北。

（原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① 《宗方小太郎文书》，第676—677页。
② 《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7页。
③ 《自立会史料集》，第208页。

#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 一、引 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①。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①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兵发秘第407号，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38。

## 二、密札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 〕号，增补的字加〈 〉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　　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仿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①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以下各札均同，不一一注明。

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①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劬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② 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③。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④ 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⑤ 有关资料表

---

① 康有为:《粤两生集序》，《粤两生集》。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9页。
③ 同上，第451页。
④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86。
⑤ 《清国革命党领袖经历及行动调查》，明治文库藏《有松英义关系文书》；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05。

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①。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 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 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绥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奸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页。

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①。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　　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　　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

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浑

① 参阅《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71、475页。

兵庫縣知事 服部一三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壽太郎殿

通報先(日外相)

別 紙

(其二)

封書 北京西四牌樓南磚塔胡同內錢串胡同路北柵欄門 舊慶怡親別莊

外務部長、長大人(壽卿勛啓)

日本中國領署緘

文意、

新帝既立。醇邸根拔。以醇王之昭昊。薄海內外。

440840

图五　日本警察秘密抄录并上报的梁启超等密札（局部）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①。荷，指汤觉顿。②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

① 山，取岑字之头；仓主，因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出身，小站出稻，故由此取义。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8—519页。

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①。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②。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③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④。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速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① 岑春煊：《乐斋漫录》，台北文星书店，第18页。

②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89页。

③ 《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2日第2版。

④ 《大公报》，1908年11月21日；《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2日第1版；《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4日第2版。

文　　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皆麦孟华①；伟公，指何天柱(清逸)②。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③。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④。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

---

① 麦孟华曾于1907年春受岑春煊之聘入蜀。佚名《致梁启超书》：“乃者与对费九牛二虎之力，为入蜀之计。”(《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第46页)据此可知对公为麦孟华。

② 何名天柱，字擎一，故以伟公相称。

③ 《蜕庵致任公书》，《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2-44页。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

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①。”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不详何人，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亦不详何人。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看来是改良派寄以希望的一位人物。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 三、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作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清，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②。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③。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④。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

①③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原信残缺，从内容判断，知为麦函。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5页。

④ 《神州日报》，1908年11月21日。

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①。”此外，子箴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②。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③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④。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⑤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⑥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⑦。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⑧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

①②③④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⑤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7页。
⑥ 《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7页。
⑦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0页。
⑧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1—482页。

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

飛致若昧於[illegible]使館負處探悉北京密
電云袁世凱弃太后病危潜通內侍賊
弑皇上密召姜楊各軍入京自衛將又
戕新帝篡位革匪乘机起事云云
果此則皇上確係被弑凡我臣民當知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况革匪入京大亂
在即我四萬萬同胞將無召集國會
之望與其奄奄待斃於刀俎之下不如
各出死力大興義師直搗燕京聲罪致
討梟袁逆之首以慰皇上在天之靈生則
為義民死則為義鬼我四萬萬同胞其各
奮然而起毋失此時據使逆賊得志我
儕受禍中國幸甚四萬萬同胞幸甚

東京憲政分會會員公檄

图六 改良派怀疑袁世凯毒死了光绪皇帝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义。"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末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②。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诛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原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

① 《戊戌变法》第1册，第434页。
②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522页。

#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在戊戌维新以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冯自由辛勤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多年，著有《毕永年削发记》一文，是目前最完整的毕氏传记，但该文讹误甚多，关于毕氏的下落，竟认为“不知所终”①。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在涉及毕氏生平时，叙述也常有谬误。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毕氏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探索。

## 一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1870年（同治九年）生。八岁时随父叔往来军中，炼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还是不少湖南老乡的崇拜对象，毕永年却愤然表示：“吾乡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②”！1894年（光绪二十年），江标督学湖南，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试士的内容注重舆地、掌故、算学、物理及世界形势等内容，即使是制艺，也允许议论时事③。毕永年所作文即有“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之语，认为中国三代以下，天下嚣嚣的原因在于“陈陈相因，气颓于痳”，表明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思想④。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自此，

①② 《革命逸史》初集。

③ 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九。

④ 《沅湘通艺录》卷一，丛书集成本。

即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三个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等地。他体格魁伟，为人豪放不羁，轻财好义，很快就结识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及张尧卿、辜天佑、师襄等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讲演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当时，谭嗣同等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却独持异议，认为首先必须开通民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此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某次会上，他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①。

4月14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毕永年在《湘报》发表《存华篇》，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结合起来，认为权为人人共有之权，国为人人共有之国，只有发扬民权，才有可能上下一心，保存中华。文称：

> 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国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

① 《湘报》第29号，1898年4月8日。

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①。

文章痛切地陈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呼吁清朝统治者“殷忧启圣，恐惧致福，乘此伐毛洗髓，滌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当时，湖南学会林立，毕永年除与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外②，又和唐才常共同发起成立公法学会，研究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作为“将来自强之本”。毕永年手订章程十七条，规定会中集资订阅各报，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将研究心得按“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分类编记，定期传观讨论③。

为了使南学会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4月下旬，谭嗣同、熊希龄、毕永年分别致函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邀请他来会讲学。王虽是湖南名儒，但为人守旧顽固。5月，王先谦复函毕永年，指责南学会诸人“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所务在名，所图在私”。王要毕氏“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争逐”，否则，“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④，叶德辉并拟将此函刊刻张扬⑤。此后，湖南守旧派对南学会和《湘报》的攻击愈来愈厉害，皮锡瑞等曾公举毕永年去日本人办的报馆任主笔，以便在外人的保护下得以放言无忌⑥。由于学会一类的活动受阻，毕永年又曾受谭嗣同之命，和唐才常相偕去汉口联络哥老会⑦。

同年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9月5日（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预新政。为了追随谭嗣同，毕永年也于8月

① 《湘报》第34号，1898年4月14日。
② 《湖南不缠足会总会董事题名》，同上，第28号。
③ 《公法学会章程》，同上，第48号。
④ 《翼教丛编》卷六。
⑤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 》，1959年第1期，第89页。
⑥ 同上，第114页。
⑦ 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转引自邓潭洲：《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间离开湖南，经上海入京。途经烟台时，与日人平山周、井上雅二等相逢。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相偕抵京。毕永年住在广升店中。次日，会见康有为。当时，正是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康有为早已从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相助。当日，毕永年移居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住到一起，得以参预密谋。康有为计划命毕永年往袁世凯幕中为参谋，并计划命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胆小，又是李鸿章之党，恐怕靠不住，而且自己是南方人，初至北京，统领彼此不相识的士兵，不可能在短期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因此，对接受这一任务表示犹疑。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晨，当他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①。当日午后，毕永年即迁居于附近的宁乡馆。20日（八月初五日)，康广仁、梁启超准备推荐毕永年为李提摩太的秘书，为毕氏所拒。当夜，毕永年致书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不要白死。又致书梁启超作别。21日（八月初六日)，毕永年急驰出京。同日，西太后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毕永年行至上海之际，得到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即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②。不久，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③，在横滨会见孙中山，讨论国事，感到意气投合，于是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道路。

---

① 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

②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29页。

③ 《宫崎滔天氏之谈》，《宫崎滔天全集》，日本平凡社版，第4卷，第289页。

## 二

在毕永年离京之前一日，康有为即仓皇南下。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康离港赴日。到日本后，即与唐才常一起制定了一项湖南起义计划。其内容为，利用南学会的力量和影响，在长沙起兵，引军直进，攻取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南京，再移军北上，进取北京，推翻西太后的统治①。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支持这一计划。11月1日（九月十八日)，毕永年曾与唐才常一起访问宗方，再次说明该项计划，要求宗方相助②。宗方是个中国通，负有为日本军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任务，当年正在汉口经营《汉报》。他劝毕、唐二人沉潜待机，作好准备，待他到中国后妥商方略。其后，毕永年并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义计划。为此，当时正在日本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飞函通报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③。同月，唐才常首途回国。12月，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偕平山周回到上海。离日之前，他曾有一函致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函云：

>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日因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之④。

维新派由于自身没有多大力量，最初依靠光绪皇帝，戊戌政变后，企图依靠列强，本函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毕永年又有

①② 《对支回顾录》下册，第381、382页。

③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

④ 参见拙作《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留别诸君子诗》，答谢饯别的犬养毅诸人，诗云：

>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虐如虎豺。湖湘子弟激义愤，洞庭鼙鼓声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离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①。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政。"1898年5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诗中所称"大东合邦"即是指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但诗中又有"羯虏"、"汉家"之语，表明这一时期毕永年的思想已经越出了康有为的范畴。上函及诗稿的原件今均存日本冈山市木堂纪念馆。

毕永年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与平山周相偕赴汉口，会见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一起入湘，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②。毕等先后到过长沙、浏阳、衡州等地，遍访哥老会头目及康有为视为同党的人物，包括威字营统领黄忠浩、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等，发现情况和预料相反，不仅熊、黄不敢有轻动之心，而且整个湖南人心消沉③。南学会、公法学会已经消亡解体，《湘报》改为只录上谕的《汇报》，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恢复了老一套。半年前生龙活虎的气概丧失殆尽。只有在和哥老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人的接触中，才使毕永年和平山周感到鼓舞④。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2月初，二人回到上海。

此际，唐才常已因康有为的一再催促，离沪赴港，经由广西桂林入湘，毕永年读到了康有为的一封来信。信中，康有为指使

① 参见拙作《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② 民表(秦力山)：《林锡圭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

③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

④ 《湖南现状》(平山周回日谈话)，《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毕永年"制造事端"①。其内容，已无可查考，可能是康有为得悉湖南人心消沉后，要毕等制造排外事件以激动民气。毕永年对康有为的作法本来就已经不满，读信之后，大为愤激，因而便记述康有为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等情节，题为《诡谋直纪》，交给平山周，平山周交给日本驻上海代理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随即于2月8日抄呈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此后，毕永年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了。

为了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毕永年于1899年春再到日本。当时，王照和康、梁的关系已完全恶化。原来，王照虽然赞成维新，但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反对康有为拥帝斥后的做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通过杨锐带出密诏，要杨等"妥速筹商"，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得罪西太后，"有拂圣意"，但康有为却将它点窜改作，与光绪皇帝的原意有所背离。由于王照了解这一秘密，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的严密监视，王照不能忍受，在平山周的诱导下与犬养毅笔谈，说明"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笔谈中，王照曾引毕永年为证，声言"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②。笔谈之末，毕永年作跋说：

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人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愤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

①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 1.6.1.4.2—2，491312—491314。

②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据抄件印布。"今毕兄在此"之"毕"字，抄件隐去。

恨不令王君手戮之①。

此跋虽主要记述王照所言，但充分反映出毕永年对康、梁的敌视态度。

图七　毕永年留别犬养毅等人诗
（采自日本冈山犬养毅纪念馆）

## 三

毕永年、平山周的湖南之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立即起事的征兆，但却认为湖南是哥老会大本营，有会员约十二万人，组织严密，其头目沉毅可用，因此，孙中山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便决定

①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据抄件印布。抄件跋下有"湖南□□□录竟附识"数字，隐去之三字，当为毕永年。

在湖南、广东、湖北三省同时大举，并命毕永年再次回国运动。1899年夏，毕永年先到汉口，在宗方小太郎的汉报馆任主笔。不久，因不堪报馆中的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弃职①。他再度入湘，向会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为人，劝他们和兴中会携手反清。同年秋，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个会党头目赴港。行至上海时，路费不够，毕永年只好让杨、李等先行。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港的陈少白和日人宫崎寅藏，附有哥老会头目的小传。宫崎对这些小传称颂不已，认为文字不多，简明痛快，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如读«三国志»、«水浒传»一般②。李等向陈少白及宫崎表示："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③。一星期后，毕永年得到陈少白的资助到港。大家一致同意毕永年的意见，决定将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各事均在其指挥下行动。于是制定纲领三条，饮血盟誓，并且刻了一枚图章，由宫崎带回日本，交给孙中山。10月29日（九月二十五日），毕永年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④。

函中所言高桥，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当指兴汉会事。"不忘畴昔之言"，当指宗方小太郎支持湖南起义的诺言。

---

① «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560页。
②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152页、411页。
③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122页。
④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兴汉会组成后，毕永年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受到殷勤的款待。12月返港，经费发生困难。当时，康有为正在香港，他新从美洲归来，得到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给会党头目数百元。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愉快地接收了，再次倒向康有为一边①。毕永年受此刺激，在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的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易名悟玄。他遗书平山周作别云：

> 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救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②。

信中，毕永年表示，日内即将往浙江普陀山，第二年三月，将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干预人世间事。毕永年的削发使兴汉会和湘、鄂会党之间的联系大受影响。1900年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圭曾致函孙中山在香港的代表容星桥，对之惋惜不已，但林圭认为，毕永年是热血汉子，“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③。果然，毕永年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4月1日（三月十一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④。5月16日（四月十八日），毕永年介绍长沙人张灿等访问正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⑤。这一时期，毕永年在上海来往的人物除宗方外，有文廷式、汪康

---

①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②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6页。
③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悟庵先生成仁录》。
④ 《岳州镇咨呈匪情一案》，《俞廉三遗集》卷一〇一。
⑤ 《对支回顾录》下册，第383页。

年、唐才常、张通典、狄葆贤等，大体都是自立会的领导人。也就在这一时期，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发生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6月，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5日(六月十九日)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耶！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①？

服部，指服部二郎，陈少白的化名。当时，孙中山正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在广东、福建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起义。由本函可见毕永年在兴中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福建的广泛联系。"佳果五千枚"，当指起义所需的枪械，毕永年要求宗方提供帮助。同函又称：

>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孑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

毕永年反对"缓办之说"，急于灭亡"胡虏"之心汹涌澎湃而不能自制，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炽烈、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也不难窥知他和唐才常终于分手的原因。

7月16日(六月二十日)，孙中山自西贡抵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对孙中山有过驱逐令，因此，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

①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事。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平山周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此际，孙中山正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李鸿章在广东独立，毕永年赞成这一计划。他在广州密切注视李鸿章的举动，致书平山云：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

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

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

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然无资足用也。乞仁兄畀弟二百元，或百五十元亦可，否则百元必须允赐。兹乞紫林氏代到港，乞交彼携回至盼①！

李胡子，指李云彪；杨胡子，指杨鸿钧。他们这一年曾到上海，结交唐才常，发现唐夸张声势，所言不实，又转回广东，重新和毕永年合作②。紫林氏，指紫林和尚。他原为有志之士，因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遁入佛门，浪迹四方，但仍然和哥老会头目有联系，同情并支持毕永年的事业③。本函反映出毕永年惠州起义前夕的活动情况。毕永年写此函后不久，即离粤赴港，改名普航，仍以掌握哥老会为职责。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九月十六日），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卖掉西服，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有书致同志称："他日有

①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② 《清国之形势及秘密结社》，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490899。
③ 《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561页。

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①。"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②。

（原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①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0页。
② 《长沙毕永年先生追悼大会通告》，《民立报》，1912年1月4日。

# "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以及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阶层（也有人称为群体）。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世界观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同。这个阶层的第一代是洋务知识分子，以后依次出现的是维新知识分子（包括立宪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和共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近代中国一支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一浪一浪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所谓共和知识分子，也可以称为民主知识分子，指的是辛亥前后出现的一批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或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当然也受过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更多受到的是"声光化电"、"培（根）笛（卡尔）达（尔文）赫（胥黎）"，特别是卢梭的影响。近代有个革命家、诗人柳亚子，他原来有个名字叫亚卢，意思是"亚洲卢梭"，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第二，强烈的救亡要求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当他们张目四望时，看到的是列强瓜分、肢解中国的悲惨图景，感到的是中华民族行将灭亡的命运，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强烈，或者是不自觉的。第三，彻底的民主主义要求。他们反对君主立宪，反对局部改良，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维新知识分子只敢喊"民权"，承认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则进一步喊"民主"，要求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是彻底的民主派。同时，他们是学生或自由职业者，尚未进入资本主

义的生产过程，与封建势力联系也较少，因此没有包袱，不畏流血，敢于鼓吹暴力革命。第四，具有不同程度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20世纪初年，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批判西方社会，批判资本主义，要求为中国革命寻找新的道路。1903年，邹容曾表示他要写一本新书，名为《均平赋》，当时，所谓“均平”，就是社会主义的意思。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英文原意也就是社会主义。人们通常认为，民生主义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孙中山希望尽可能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他所要最大限度发展的乃是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

在辛亥前后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就是这样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其一，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及同盟会等主要革命团体，其成员绝大多数是这批知识分子。其二，他们是各项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主干。其三，他们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者，他们不仅出刊物，办报纸，作了大量的革命舆论准备工作，而且为革命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其四，他们是多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可以说，没有这一批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

和辛亥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比，资本家阶级不仅力量小，而且政治上软弱、动摇。据有人统计，1911年全国现代企业中的民族资本仅有521家，资本家大概不过数千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民族资本家阶级（不论是上层或中下层）长期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只是在四次国会请愿运动都遭到镇压，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后，他们才逐渐转到革命方面来，欢呼并支持了武昌起义。但是，很快他们又选择了袁世凯，抛弃了孙中山。因此，不应该过分夸大资本家阶级对于辛亥革命的作用。

相反，辛亥前十年间，新型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例如留学生，1903 年为 1300 人，1904 年为 2400 人，1905 年为 8500 人，1906 年为 13000 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 年为 101.3 万余人，1908 年为 128.4 万余人，1909 年为 162.6 万余人。正是他们，才有力量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

当然，知识分子最终必须和一定的阶级、集团结合，才有可能旋转乾坤。辛亥时期，它没有可能和农民结合。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要解决的是高度工业化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唤不起农民的热情。它和资本家阶级的结合也并不很好（何况这个阶级本身就不强大）。结果，革命知识分子孤掌难鸣，孙中山虽有意北伐，彻底推翻清王朝，但缺乏力量，还是回到了谭嗣同的悲剧主题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要正确地认识辛亥革命，就必须加强对辛亥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研究。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 5 期）

[附记]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 孙中山在1900年

##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札记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自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三天后，一份标明秘字的密报便送到了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面前。自此，日本情报人员即十分注意孙中山的动态，各种报告不断送向外务省。日积月累，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报告，和其他关于中国革命者的情报汇集在一起，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现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1。它们是研究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将其中少部分摄成缩微胶卷，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大部分遗漏未摄。1985年，我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之邀，赴日访问，有机会阅读了全部该项档案。现就其中1900年部分略作介绍。

1900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这年6月，中国北部土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大举入侵中国。这时，孙中山正居留于日本。他忧心如焚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地利用时机，筹备发动反清起义，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档案反映出，孙中山的意图是：在南方建立共和国，然后逐渐向北发展，推翻清朝政权。6月上旬，他与人密谈说："目前北京方面形势异常不稳"，"如清政府势力失坠，即我辈奋起之良机"。他表示："我等之最终目的是与南方人民共商大计，割取清帝国之一部另建一新共

和国。"①，8月，和孙中山一起行动的日本人内田良平也透露："孙逸仙及其一派党徒策划之目的为，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成一独立的共和政体，然后逐渐向华北方面伸展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政权，最后统一支那十八省，在亚洲建成一大共和国。"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纵横捭阖于香港英国当局和日本政府之间，同时积极争取李鸿章、康有为、容闳等人，力图建立广泛的合作。

当时，香港英国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孙中山对这一计划表示过兴趣。为此，他于6月11日离日南行。7月12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途经香港，曾与港督卜力(N.A.Blake)会谈。有关情况，孙中山于7月24日向日本"某访客"介绍说："太守（指卜力——笔者）向李氏说明形势，言称：按刻下清国时局，实为分割广东、广西两省之良机等等，并怂恿李鸿章以孙逸仙为顾问，出掌两省之主权。李氏答称，将观察今后时局之趋势，徐行处断。"孙中山并称："太守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③这段言论显示，孙中山虽然在华南"自主"问题上与香港英国当局发生密切关系，但对其侵略意图是洞若观火的。

关于孙中山南行的情况，档案称："目前孙逸仙潜赴香港之际，曾与香港太守进行密商。密商之事似已略见端倪，故又暂来我国。其后，香港太守已有通告前来，略谓：密商之事，当可接受。"④孙中山南行时，一直未能与卜力见面。这里所说的"密

① 《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212号，1900年6月11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48号，1900年8月26日发。

③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兵发秘字第410号，1900年7月25日发。

④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商”，可能发生在孙中山的代表与卜力之间。据卜力8月3日给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备忘录，他和孙中山的代表确曾有过一次会见。卜力要求孙中山等人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为难的行动。”① 卜力报告说，他的建议已送交孙中山的“革新派”。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述，当即此事。档案又称：“孙之同志已将其所谋事项草成一纸建议，拟请交香港太守。”② 档案并提供了该项建议的具体内容，共四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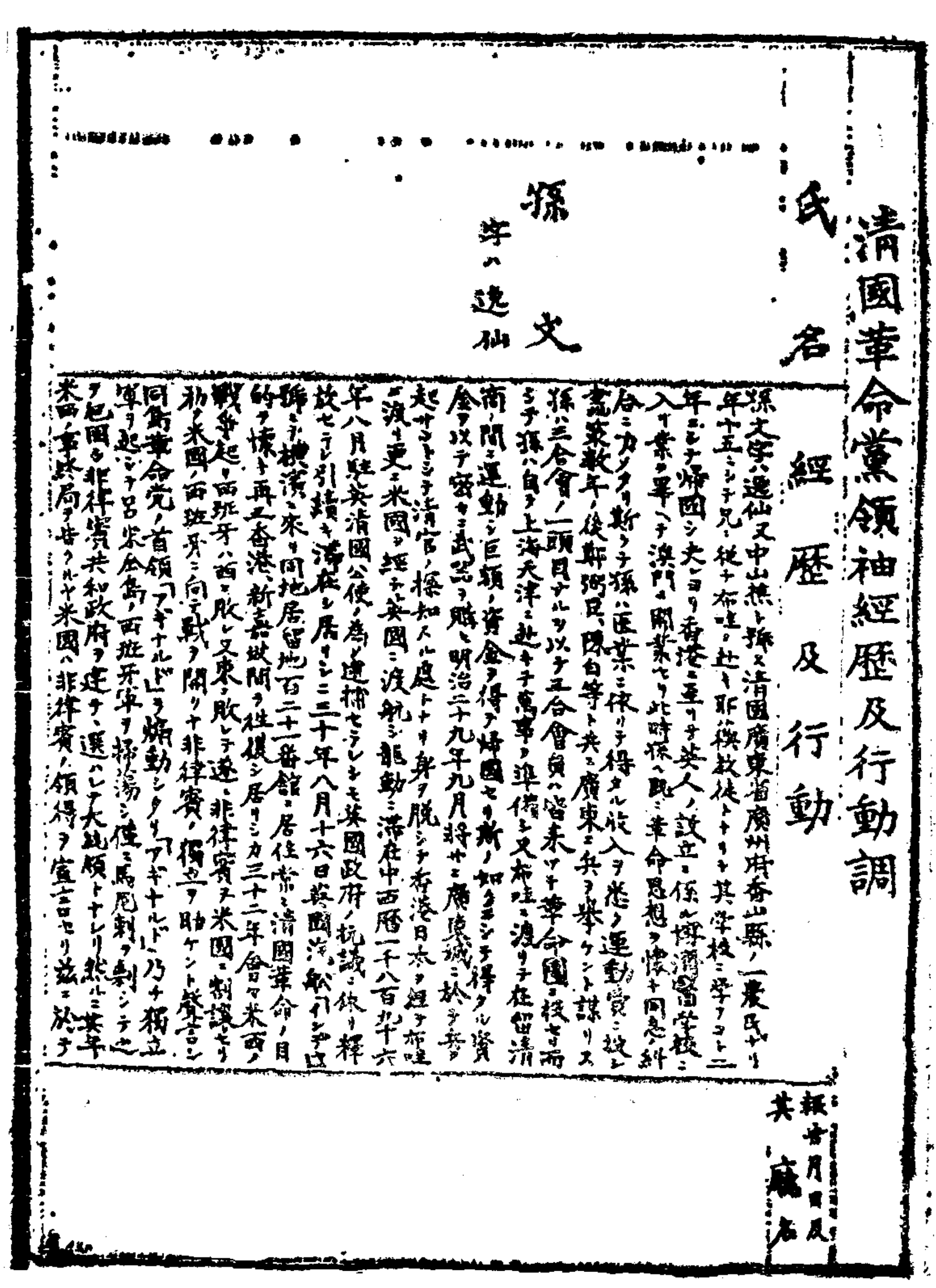
(1)移都中央（上海或汉口）；(2)颁行自治制（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地方政府将就自治制问题向各国领事征询意见）；(3)改革刑政，使其公平；(4)废科举，兴实学。

从这四条看来，它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致港督卜力书》中的《平治章程》。该函由孙中山领衔，有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兴中会骨干联合签名。所不同的是，《平治章程》为六条，较档案多出两条，文字亦有很大悬殊。这种情况说明，档案所收可能是最初的稿本，而今存《平治章程》则是后来修改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档案记载，平山周认为，上列第二项所谓“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等语，“将使国家之独立为之丧失”，特地于8月24日赶到门司，和正在登轮回国、秘密前往上海的孙中山商谈，建议削除此条。③ 这就说明，《平治章程》到这时还未定稿，今本《孙中山全集》将它定为当年6、7月之间的作品，看来须要修正。

---

① 《卜力致张伯伦》，1900年8月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第17组1718卷［46］，第364—367页，转引自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②③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清國革命黨領袖經歷及行動調

氏名　孫文　字ハ逸仙

經歷及行動

孫文字ハ逸仙又中山樵ト称ス清國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ノ一農民ナリ年十五ニシテ兄ニ從テ布哇ニ赴キ耶穌教徒トナリ其学校ニ学ブコト二年ニシテ帰國シ夫ヨリ香港ニ至リテ英人ノ設立ニ係ル博済醫学校ニ入リ業ヲ畢ヘテ澳門ニ開業セリ此時孫ハ既ニ革命思想ヲ懐キ同志ヲ糾合ニカゝリ斯クテ孫ハ医業ニ依リテ得タル收入ヲ挙ゲテ運動費ニ投シ盡家数年ノ後鄭弼臣陳白等ト共ニ廣東ニ兵ヲ挙ケント謀リ又孫ハ三合會ノ一頭目ナルヲ以テ三合會員ハ皆來リテ革命團ニ投セリ而シテ孫ハ自ラ上海天津ニ赴キテ萬事ヲ準備シ又布哇ニ渡リテ在留清商ノ間ニ運動シ巨額ノ資金ヲ得テ帰國セリ斯ノ如クニシテ得タル資金ヲ以テ密カニ武器ヲ購ヒ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将サニ廣東城ニ於テ兵ヲ起サントシテ清官ノ探知スル處トナリ身ヲ脱シテ香港日本ヲ経テ布哇ニ渡リ更ニ米國ヲ経テ英國ニ渡航シ龍動ニ滞在中西暦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駐英清國公使ノ為メ逮捕セラレシモ英國政府ノ抗議ニ依リ釈放セラレ引續キ滞在シ居リシニ三十年八月十六日英國汽船「インダス」號ニテ横濱ニ來リ同地居留地百二十一番館ニ居住常ニ清國革命ノ目的ヲ懐キ再ヒ香港新嘉坡間ヲ往復シ居リシカ三十二年曾テ米西ノ戰争起リ西班牙ハ西ニ敗レ又東ニ敗レテ遂ニ非律賓ヲ米國ニ割譲セリ初メ米國ノ西班牙ニ向テ戰ヲ開クヤ非律賓ノ獨立ヲ助ケント発言シ同島革命党ノ首領「アギナルド」ヲ煽動シタリ「アギナルド」乃チ獨立軍ヲ起シテ呂宋全島ノ西班牙軍ヲ掃蕩シ僅ニ馬尼剌ヲ剰シテ之ヲ包囲シ非律賓共和政府ヲ建テ選バレテ大統領トナレリ然ルニ其年米西ノ事局ヲ告クルヤ米國ハ非律賓ノ領得ヲ宣言セリ茲ニ於テ

報告月日及

其廳名

图八　日本警方对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的调查记录

（采自日本明治文库）

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跃，中国政局呈现出微妙多变的形势。老奸巨滑的李鸿章离开香港之后，到上海就逗留不前了。他要等一等，观察一下风向。孙中山此次前往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和李鸿章会谈。他认为，北京政府当时已全为“排外思想者”所占据，光绪皇帝随时有被害的可能。只要光绪皇帝一死，南方督抚们便会“另行动作”。早在8月上旬，他就声称：“清国南方各省督抚以及新进有识之士，在满清朝廷尚存在之期间，固将维持现状；但随时势之演变，迟早必与我等意见一致。基于此情况，身入故国固属危险，但就某些地区而论，作为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亦可通过无甚危险之和平途径与有上述思想的人士相会合，实属最为必要。基于此原因，只要无何危险，亦愿与李鸿章会谈。”① 后来，他又进一步声称，如果时机许可，愿与刘坤一、张之洞一见。②

孙中山此行的目之二是为了联络容闳。当时，容闳在唐才常等人的推戴下，已经出任上海中国国会会长，在其起草的英文宣言中声称：“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政治改革派中亦有不同派系之分。当今之局，彼此间绝不可纠缠于以往在发展当中所生之某些感情隔阂而互争短长，亟应消除成见，广为联合，团结一致，共同谋划。吾等仰为首领之人乃系容闳。此人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颇孚众望。据推测，此人正与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及康有为一派中之重要人物暗相联结，从事政治改革之策划，正在循序渐进之中；本人亦欲厕身其间，竭诚效力。”③ 孙中山并表示，如果时势合宜，他准备直入北京一行。

---

①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308号，1900年8月10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③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334号，1900年8月22日发。

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之三是为了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继续与香港当局谈判。档案称："又闻，孙抵上海后，将由英国领事串通，与香港太守秘议，并将通过此次国际谈判以遂其志"。①

孙中山启程之后，在轮船上曾经以笔答的形式对"访客"发表过一次书面谈话。中云："前略诚如君言，伊侯不过为政策之诡变，不得止〔已〕而为此反对保全之言，原无唱分割之论，仆闻之略安。"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瓜分中国，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即形式上保持中国的完整。两相比较，后者对中国人民略为有利。伊藤博文是日本政界名流，对日本政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孙中山极为关心他的主张，明确地表示"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② 这段话，虽是写给"访客"的，实际上是写给伊藤和日本政府的。笔答中，孙中山还倾诉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对民族独立、统一的渴望。他说："吾国自有史鉴以来，数十余朝，每当易朝，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③ 这段话，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襟怀。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时候，正是张之洞在武汉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终于决定支持张之洞。对唐才常等人的逮捕是经过英国代理领事傅磊斯同意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英国驻沪领事对孙中山的来访只给予了冷淡的接待。孙中山还在船上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进行了会谈，也没有什么结果。9月3日，孙中山与容闳、容星桥等人同船抵日。容闳对九州《日出新闻》社记者说："英国对清国之行动，其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②③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兵发秘字第593号，1900年9月22日发。

真意何在，实不可知，世间盖无心事难测之如英国人者。"[①] 这应该也反映了孙中山此时此际的心情吧！

上海之行失败使孙中山转而继续经营南方。9月25日，孙中山乘轮由神户驶赴台湾，经过马关的时候，曾与玄洋社头目、日人平冈浩太郎会谈。谈话中，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冷淡态度流露出不满之情，平冈解释说：日本政府之所以冷淡，"一是出于对英国外交策略上的考虑；但更主要者，乃因先生对日本尚无任何贡献。"平冈接着向孙中山提出："此次先生欲去基隆暂居，以观察华南方面形势。在此期间，亟应向儿玉总督提供援助，为平定台湾尽一臂之力。"平冈告诉孙中山："现今台湾土匪尚未剿平，儿玉总督为此颇费心机，且对我国之国力消耗亦实匪尠。且今日台湾匪徒已绝非台湾本地之土人，其主要动力实来自隔岸闽、粤两省人之煽动与资助。"平冈要孙中山协助儿玉，"根除匪患"，并称，这将是对日本的一项"厚贶"。此后，"我等即可以儿玉总督为中心，在日本为先生奔走效力，裨先生得遂大志"。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台湾各族人民即不断发动反抗斗争，给予侵略者以很大困扰。平冈的这一席话主要目的在于诱使孙中山为日本的侵台政策服务。孙中山当时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②] 后来的事实表明，孙中山的这种表示乃是虚与委蛇，他的真实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的力量，在华南发动起义。

9月28日，孙中山抵达基隆，随即与平山周同赴台北，与儿玉的代表台湾民政长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③] 其后，孙中山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一面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一面积极筹

① 《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336号，1900年9月7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1000号，1900年9月28日发。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8章。

备在厦门以南云霄县的铜山港登陆。但是，日本政府迅速改变了态度。10月2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电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等，告以孙中山的起义意图，有许多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同谋。电报称："台湾总督已经下令，打电报通知他们可能到达的港口的日本领事。他们或许已经到达中国，即使没有上述电报，万一他们中一些人到达你的地区，你要严密地监视他们的举动，并且作出最大的努力，防止他们的阴谋实行。"① 10月19日，山县有朋内阁辞职，继任的伊藤博文内阁采取同一态度。

日本政府态度的变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关。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和日本政府都曾蓄谋乘机侵略中国南方。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召集干事会。会长近卫笃磨主张"严密审时度势，如有一发可乘之机，自应奋勇前进，以谋帝国之利益。"但他同时又表示，必须"与列国保持协调"，"谛视俄国之动静，乃为明智"。因此干事会一致议决，暂不对中国出兵，以期"养精蓄锐，一旦时机成熟，自当一展鹏翼，占领南方之目的地"。② 内田良平原计划怂恿孙中山在南方起义，他自己则同时纠集土匪，在华北举事，占领朝鲜，引发日俄战争。但是，当他将这一计划向"幕后谋主"汇报时，"幕后谋主"认为，"日俄冲突不久必将发生，今日如在华北举事，难免引起列强干涉"。③ 正是这些顾虑，促使日本政府放弃了原定夺取厦门，占领福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相应地改变了对孙中山起义的态度。

11月10日，孙中山失望地离开基隆，再赴日本。他在与人谈话时说："本人对日本政府之行动极为关注。盖以日本在地理上较

---

①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等电》，1900年10月2日收，《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② 《关于清国亡命者孙逸仙等人动静之报告》，乙秘字第316号，1900年6月19日发。

③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48号，1900年8月26日发。

列国占有优势，并且出动军队最多（指八国联军中的日军——笔者），显示出极大的军事力量，使列国为之震骇。既如此，本人预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亦将采取同等步骤，在一切事务中俱居于主导地位。果如斯，则本人亦将奋然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相谐，以期大举谋事。讵料日本政府优柔寡断，此次又有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夺之势，为此状况，本人的事业又安得不受挫折！"又说："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① 孙中山当时将全部希望都倾注在日本政府身上，一旦落空，其沮丧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再赴日本之后，立即着手准备新的起义，11月下旬，他与人谈话称："本国目前形势，将是举事之大好时机，我同志等亦大有奋发之志，正在稳步前进。"他一面与日商签约，购买250万发弹药，一面努力摸清伊藤博文内阁的态度。他说："举事之前必须取得一二强国之支援，至少必须取得谅解。现今日本内阁更迭未久，外交方针尚未明确，看来依靠日本尚不如转倚已示谅解之英国为佳；但必须探明举事之际日本政府将取何种态度。"② 由于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只能摇摆于英、日两国政府之间。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段路对孙中山说来是漫长而又遥远的。

（原载《清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4期）

［附记］：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未刊档案，大部分为邹念之先生所译，谨此致谢。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报告》，高秘字第1131号，1900年11月15日发。

②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报告》，秘甲字第500号，1900年11月27日发。

# 1901 年至 1905 年的拒俄运动

在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沙皇俄国是贪婪而野心尤大的一个。

还在19世纪，沙俄帝国主义就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了我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00年，它在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的同时，又武装抢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一口吞下黑龙江以南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之，沙俄政府将一个又一个“密约”强加于中国当局，企图巩固其侵略成果，攫取更大的权益。

沙俄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得逞，不仅东北三省要沦为俄国的属地或附庸，势必还将激起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瓜分狂潮。“存亡呼吸争此刻！”在东北人民被迫实行武装抗俄，保家卫国的同时，一场以反对签订“密约”，要求收复东北为中心的拒俄运动，在我国广大人民中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

## 爱国救亡的热烈动员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前后持续四年。中间，因沙俄侵略形势的变化，斗争的焦点在不同时间里也有所变化，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01年反对沙俄迫订条约霸占奉天的斗争；1903年反对沙俄拖延撤兵的斗争；1903年至1905年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1900年10月，沙俄侵略军强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沙俄要在沈阳设立“总管”一员，奉天

将军所办各项"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还规定，奉天省城等处应留俄兵驻防，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武器收缴，营垒拆毁。[①]这样，沙俄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要将奉天省交还清朝政府，实际上却在力图把它变为自己武力控制之下的殖民地。1901年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规定沙俄有驻兵东北"保护"铁路权，有出兵帮助"剿抚"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兵器，不得自行造路，等等，全面剥夺了我国对东北的主权。此外,《约款》还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②]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

3月15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汪允中、汪康年、蒋观云等作了演说。与会者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民"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会议同时要求清朝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③]，并于会后向江、鄂两督呈递《公禀》，主张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得悉沙俄政府逼迫清王朝于25日、26日在俄方提出的约款上画押，第二次集会于张园，再度要求清朝政府"始终坚拒"，"勿受恫吓"[④]。

张园拒俄会议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以至东北的群众纷纷来函，捐款、捐物，表示支持。杭州城内贴满了声讨沙俄帝国主义的揭贴——《普天同愤》。3月28日，召开演说会，要求筹集"备俄民款"，对俄"公战"。[⑤]广东香山、澳门以及香港的绅商也举行集会，"聚议拒俄"[⑥]。在新加坡的华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四四卷。
② 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
③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④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⑤ 《中外日报》，1901年4月6日。
⑥ 《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侨则强烈表示，沙俄侵略者的要求“万不可许”。①

斗争很快取得初步胜利，清朝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是清朝政府终于不敢签约的重要原因。

1902年4月，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沙俄侵略军应分期从中国境内撤走。1903年4月，围绕着撤兵问题，拒俄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按条约，当时沙俄应撤退在我国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不仅没有撤出，沙俄政府反而乘机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

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18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与会者除谴责沙皇俄国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朝政府的“昏昧狂惑”。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七项新要求，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通电各国表示：即使清朝政府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②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4月30日，四民总会集会，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学生等1200余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演说。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③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

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激昂奋发，议决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拒俄义勇队以古希腊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扼险拒守”的事迹自励，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④

年轻的鲁迅当时正在东京留学，他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锦辉馆大会后，他迅速译作了《斯巴达之魂》，勉励中国青年“掷笔而起”，象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

① 《中外日报》，1901年4月4日。
② 《苏报》，1903年4月28日。
③ 《苏报》，1903年5月1日。国民总会在实际成立时，定名为国民公会。
④ 《致北洋大臣袁函》，《浙江潮》第4期。

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11日，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再次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吴永珊（玉章）、廖仲恺、陶成章、杨昌济等积极捐款支持。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女学生则组织赤十字社，准备随军出征。

运动迅速发展到了北京、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直隶、江苏、福建、湖南、河南各地。

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会后，向管学大臣和政务处呈递了《请代奏拒俄书》，又向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发出函电，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①

湖北学生接到京师大学堂学生的函件后，各学堂同时停课，吴禄贞等数百人在曾公祠、三佛阁等处集会。学生们表示，祖国的一草一木也不能让给侵略者。

安徽学生于5月17日集会于安庆，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准备在此基础上，联络上海爱国学社和东南各省志士，进一步成立国民同盟会。

大半个中国都在动员：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成立海滨公会，湖南学生申请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争，直隶四百余人上书，河南召开演说会……

较之第一阶段，运动的规模和参加的阶层都更为广阔了，爱国绅商、大中学生之外，少年儿童、基督教徒、八旗生员等也都积极投入斗争。为了激励同志舍身救国，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跳水、跳海，慷慨赴死。

1903年9月，沙俄政府将七项侵略要求合并为五条，重新向清王朝提出。10月20日，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城，升起沙俄旗帜，再次占领奉天，拒俄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12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② 对俄同志会发刊日报《俄事警闻》，专门报道沙

① 《苏报》，1903年5月20日。
②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5日。

俄侵华消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俄事警闻》也改名《警钟日报》。11月，因反对清朝政府联俄，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

与对俄同志会成立时期相近，上海还出现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妇女投入拒俄斗争。

由于沙俄侵华机构道胜银行在上海以重息借提钱庄现银，接济东北的俄国侵略军，1904年1月，上海钱业商人集议，决定共同查察勾结沙俄的奸商。同月，有人向上海商人发出传单，建议停止供应在上海的俄国兵船所需煤、菜等物。拒俄斗争从政治斗争进入经济领域了。

与上海相呼应，在赵声、章士钊等发动下，南京水师、陆师、高等师范等学堂的学生集会于北极阁，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习兵操，以备抗俄。

民族危机深深地激动着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沪、宁之外，新疆的回族人民表示愿一战强俄；东京中国留学生纷纷停课，集会聚议，筹组“义勇铁血团”；陈天华于感愤之中写血书寄回湖南，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远在美洲的华商则打电报回国，表示愿承担对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费用。

这一时期，各地拒俄组织不断涌现。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保会，锦州有仇俄会，湖北也有人发起组织拒俄会。其中，以丁开嶂的抗俄铁血会为最突出。

丁开嶂原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03年曾参加过上书要求拒俄的活动，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和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三人共同出关，组织抗俄武装。朱锡麟组织了东亚义勇队，张榕倡办“东三省保卫公所”，组织“关东保卫军”，丁开嶂则创立了抗俄铁血会。铁血会联络了活跃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的“绿林领袖”，“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① 决心

① 《大陆》，第2年第4号。

甲辰十一月二十日　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正月七號　木曜　第廿四號

# 俄事警聞

每張售大錢八文

外埠定閱本報價目每日寄遞郵費預付 七日大洋九分七厘 半月大洋一角八分半 一月大洋三角五分 郵便不通處及外國均不在此例

本報編輯所上海新馬路華安里

本報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告價目四號字一行二十一字七分五，五號一行二十八字五分，圖畫照字位核算，代刻價值照加，非本社同志介紹必先收價值而後代登

**本社廣告**

同人因俄佔東省關係至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社員見聞淺陋，不足爲全國耳目，閱報諸君如有要聞，迅請寄示，俾得刊入報端，普告全國。

**本社徵文廣告**

本社擬爲各種社會代撰其能盡之義務著之論說，以備采擇。同人不才，謀識狹陋，閱報諸君有熟悉此各社會情形者，請撰寄本社，當陸續選登。題目已見一號至十九號本報。此外如有崇論宏議詩歌小說凡關涉俄事者，不拘體裁，均請惠寄本社，刊登報端，幸甚。

**對俄同志會廣告**

**新書二種出板：**

**達爾文物種由來**

此書價值不待贅言，一冊價二元　發行所文明書局、開明書店　上海各書坊均有寄售

**美國獨立檄文**
**法國人權宣言書**
**瑪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
**噶蘇士戒國人書**
合刻

是爲政治思想之源泉，最爲我國人對病之藥，一冊價　發行所同上

**圖說**

图九　蔡元培创办的报纸《俄事警闻》（1904，上海）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

将沙俄侵略军从我国境内赶出去。

像丁开嶂等这样直接投入抗俄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但它是这一阶段拒俄运动的一个特色。沙皇俄国侵略行动的加剧起了警醒作用，迫使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不能再停留在集会、演说、通电等常用的抗议形式上。

这一阶段运动的另一特色，是工人阶级的活跃。

东北工人直接受沙俄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因此，对沙俄帝国主义最仇恨，“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其心恨俄人实深”。1904年2月，在旅顺沙俄海军工厂工作的2000余名中国工人全体罢工。3月，被沙俄霸占的东北各矿山中国工人也相率罢工。沙俄侵略者以增加工资为饵，诱骗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斗争，“势甚汹汹”。[①] 其中，武山煤矿工人更组织起来攻击沙俄侵略者。不少工人逃离工厂、矿山，投入东北人民抗俄武装。

1904年底，沙俄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溃逃上海的阿斯科舰水兵无故杀害上海工人周生友，沙俄帝国主义拒绝交出凶手，上海人民掀起了要求惩凶的斗争。第一商学会举行演说会，对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杀毙周生友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和《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群力，同盟罢工”。1905年1月14日，在上海的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周生友的宁波籍同乡工人则在全市散发传单，定于15日开四明公所会议，准备停工罢市。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前聚会。由于清朝政府的破坏和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妥协，这次斗争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清朝政府要人们“静候妥办”，[②] 资产阶级上层要人们“静候上宪商办”，[③] 但是，

---

① 《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

② 《外务部发商约大臣盛宣怀电》，《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③ 《时报》，1904年12月29日。

"众商明白者十之一二，工作则无一明白者。"① 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动摇了，而工人阶级则是不妥协的。周生友事件是拒俄运动的尾声。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事件中简短的表现，就显示了自己突出的性格。

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在东北侵占的权益因战败而逐渐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取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也由拒俄转入其它中心。

##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清朝政府中，慈禧太后、李鸿章等属于亲俄派。他们企图依靠沙俄帝国主义的帮助维持自己腐朽的统治。对于沙俄政府的侵略要求，他们是准备予以满足的。1907 年，当拉姆斯道夫将书面约款 12 条改头换面，压缩为 11 条时，李鸿章就明确表示，可以"照允",② 要杨儒"酌量画押，勿误"!③ 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属于亲英、日派。因为背景不同，他们和李鸿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反对在沙俄政府提出的约款上签字。但是，不管是亲俄派也好，亲英、日派也好，都反对人民自己发动的拒俄运动。

第一阶段，清王朝流亡西安，既自顾不暇，又鞭长莫及，直接出面干预的是在南方的张之洞等人。1901 年 4 月，张之洞电宁、沪当局，攻击张园拒俄会议"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藉端煽众"，嘱刘坤一下令"设法阻止，以消乱萌"。④ 同月，杭州地方当局以"惑人观听"、"有碍时局"为理由出示禁止张贴拒俄揭帖，已经贴出的几百张被撕得净光。⑤

①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电》，《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②③ 《李傅相来电》，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抄》。
④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四十五。
⑤ 《集成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上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亲政府的上海《申报》连续发表《密约解》等文，声称约款云云，“类皆传闻无据之词”，① 攻击拒俄运动的参加者“故为谣诼以骇民人”，“不俟朝旨，独断专行，勾结匪人，擅与友邦开衅”，“罪在必诛，法无可贷”。② 显然，这是官方准备大肆镇压的前奏。

第二阶段，清朝政府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召开拒俄大会的当晚，学堂当局就出示禁止，胡说拒俄不是“学生分内之事”。③ 此后，学堂当局开始在学生中查察“会党”。不久，奉旨会办京师大学堂事宜的张之洞又亲到学堂，警告学生，“学堂以外之事不可以作。”④

在安庆，安徽地方当局诬蔑爱国会的活动“摇惑人心”，“有违国家法律”，下令不准演说，不准结社，不准出售与阅读新书新报，违者“指名提究”。⑤ 安庆知府拘捕了爱国会发起人，封闭了西学堂，安徽大学堂开除了“议论拒俄”的学生十数名。⑥

在上海，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密告江苏巡抚恩寿，说是“有所谓热心少年，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抗俄，实则希图作乱”，要求密拿严办。⑦ 恩寿立即要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指名逮捕蔡元培等四人。

在湖北，武昌知府梁鼎芬居然召集停课聚会拒俄的学生，大放厥词，说是：“（尔等）只宜用功写字读书，以图上进。此等不干己之事管它则甚！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尔等亦不必干预！”⑧ 有的学生因为参加了拒俄会议就被梁以“性情浮动”为理由悬牌开除。

---

① 《申报》，1901年3月28日。
② 《申报》，1901年4月23日。
③④ 《大公报》，1903年5月4日、6月12日
⑤ 《大公报》，1903年6月13日。
⑥ 《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23日。
⑦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一），第372页。
⑧ 《苏报》，1903年5月19日。

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拒俄活动尤其使清王朝惶惶不安。驻日公使蔡钧密电外务部，说是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正“分派会党”，“纠合同志”，“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等地，准备起事，云云。① 于是，清朝贵族、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立即密电沿江沿海及直隶各地“一体严备”。② 5月底或6月初，清王朝发出了《严拿留学生密谕》，大骂留学生编立义勇队，要求与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行动“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各地方督抚查拿“行踪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③ 6月21日，清王朝外务部根据慈禧太后“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的指令，再次密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攻击爱国学生“肆行无忌”，“猖狂悖谬”，要他们务必将这些“败类”查拿到手。④

各地的拒俄运动几乎无例外地遭到了镇压。南京各学堂颁布条例：禁聚众演说国政时事，禁书信往来中有“编义勇队”、“拒俄”等“骇人听闻”之语。成都的“青年组织”、“学社”一律被通知闭歇。有些地方的学堂居然在黎明时搜查学生宿舍，将《苏报》等新书新报概付一炬。

清朝政府为什么如此仇视拒俄的爱国者呢？道理很简单。第一，运动打击了侵略者和卖国贼，这就是所谓“擅自与友邦开衅”，“有碍邦交”；第二，人民自己发动斗争，藐视了“神圣”的君主专制，这就是所谓“把持国家政事”⑤，“不俟朝旨，独断专行”。为着“免蹈各国民权之弊”⑥，清廷在对付“革命”的名义下，毫不留情地对拒俄运动予以镇压。

应当指出，拒俄运动确实一开始就有革命党人参加，清廷并

①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② 《中外日报》，1903年6月30日
③ 《苏报》，1903年6月5日。
④ 《外务部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旨》，端方档。
⑤ 《致刘制台、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四十五。
⑥ 《大公报》，1903年8月30日。

不完全是诬指。早在19世纪末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孙中山与兴中会在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国内进步群众中都有一定影响。革命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一面参加拒俄，一面也自觉地通过这个运动来扩大其影响[①]。但是，在运动开始时，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相比，革命派的力量还是微弱的，在国内就更加微弱了；只是在拒俄运动进行的年代里，它的力量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沙俄和清朝政府帮了革命派的大忙，使革命派对人们的启导收到了自己未曾料及的效果。

清朝政府对拒俄运动竭尽禁止、摧残、镇压之能事，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开展，但归根结蒂，反动统治者所收得的效果恰恰与其主观愿望相反。被空前的民族危机卷入拒俄运动的人们，绝大多数不是反清革命者，他们对救亡途径的认识很不一样，统治者的"新政"，改良派的"维新"，在他们中间都有市场，许多人甚至甘心情愿去为大清帝国效命疆场。可是，报国之门却被堵塞了。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迫使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政府拿中国权益去结欢"与国"那么大方，而对爱国"子民"倒视若仇敌呢？清朝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进一步暴露了其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这种反动面目的暴露，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有着重大意义。此前，清政府这种面目已经暴露得颇为充分，它伙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腥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事业缺乏正确理解，因而也就没有能引起他们的切肤之痛。这一次，在强敌入侵之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名流学者也因爱国遭受不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震动与愤慨明显地强烈起来。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很快信服了孙中山及其同志的结论：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

---

①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开端，八国联军战争和辛丑条约造成的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警醒了中国人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条件。拒俄运动就是人民觉悟的表现，它对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不信，请看运动中群众迅速革命化的进程。

拒俄运动的领袖之一蔡元培，原是清朝的翰林院编修，1901年以后逐渐趋向激进，1902年组织了中国教育会。但是，到参加拒俄，他至少还不是坚决的反清革命者。1903年底，他还曾希望团结清朝政府共同抵御沙俄侵略。在他主编的《俄事警闻》上，发表过《告革命党》等文，认为在"盗劫吾物"之际，不应该"不追盗而徒责吾仆通盗之罪"①，建议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满、汉"合起来"，"商议打退俄国的法子，免得我们旗人、汉人通通受罪"。②然而，清朝政府背叛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终于使他成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如黄宗仰，原是常熟清凉寺的和尚，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使他不能安于寺院生活。张园会上，他慷慨陈词；国民公会中，他热情谋划。然而，清朝政府却指名逮捕他，迫使他流亡日本。"要御外侮先革命"③，他得出了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结论，于是他"对佛誓发十大愿，大愿逐满不成佛"④，跟着孙中山干起革命来了。拒俄运动更把许多青年推向反清革命的前列。后来牺牲于广州"三·二九"之役的方声洞当时逢人便痛论国事，"谓非一刀两断，颠覆满清政府，以建共

①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30日。
②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31日。
③ 《书感》，《江苏》第6期。
④ 《抱憾歌》，《江苏》第6期。

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一日"。[①] 吴玉章在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②] 类似的情况很多，检阅清末革命志士的经历，许多人都是在拒俄运动中开始其政治生涯并投向反清革命的。

舆论界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1903年6月5日，《苏报》揭载了清朝政府的《严拿留学生密谕》。紧接着，发表了《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文，愤怒地谴责了清朝政府"以我土地江山"，"送人赠友"的卖国行径，指出："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号召"以排满为业"，[③] 明确地喊出了反清的革命口号。《苏报》原来是一张高唱"保皇立宪之说"的报纸，正是在拒俄运动中，它的主人陈范愤于人民的拒俄要求，"清廷均弗置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因而改倡排满之说"[④]，使之变成革命派的重要喉舌。

继《苏报》之后，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的态度也日益明朗。6月25日，《江苏》第4期发表《革命其可免乎》一文，痛斥清朝政府镇压拒俄运动，"目为悖逆，指为不轨"，"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的行为。9月21日，该刊第6期《〈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中更加鲜明地表示："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乃并欲出其代表者之权限以禁四万万主人翁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秣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

此外，邹容的《革命军》修改、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陈天华的《警世钟》也写作出版于这一时期。两书都是宣传反清革

① 《方声洞小史》，《神州日报》，1911年8月2日。"满清政府"四字，原报为"□□政府"。

② 《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版1978年版，第19页。

③ 《苏报》，1903年6月10日、11日。

④ 《陈梦坡事略》，《革命逸史》初集。

命的代表作，其作者也都是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陈天华曾针对清朝政府对留学生拒俄的攻击诬蔑，剖白过参加者的爱国之心。他在信里说，他对清朝政府一见留学生结社爱国，"则遂大惊小怪，屡索而不得其解，我政府之识见如此，……此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① 可以说，《警世钟》就是他"屡索"之后的结果，答案是必须打倒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两部书和其他许多同类作品集中地出现在这段时间，并且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正是形势急剧变化的反映。

舆论是先声。在《苏报》等明确地喊出反清口号后，一些拒俄组织陆续转变为革命组织。

还在5月份，军国民教育会就曾派出两名特派员到天津去见清朝政府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主战，表示愿为前驱。但是，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就接到上海地方当局的电报，说是："近来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②到了天津，连袁世凯的影子也见不着，每次都被阻于门外；所能见到的清朝官吏都要他们"从事学问"，不要干预国事。于是，两名特派员只能回到东京。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召集全体大会，由特派员汇报了归国之行，秦毓鎏等15人提出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卖国的满族贵族集团为革命对象。这一意见虽然遭到了湖北留学生、原拒俄义勇队成员王璟芳等的激烈反对，王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嚷："大清不可背负"，② 但是，《意见书》还是获得了军国民教育会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仅有十余人退会。

军国民教育会的变化是中国留日学生转向革命的重要标志，从这以后，"革命思潮遂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④ 这里，孙中山

① 《苏报》，1903年6月14日。
② 《苏报》，1903年6月28日。
③ 《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④ 《甲辰马福益长沙之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

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1901、1902两年，孙中山在日本，志同道合者寥寥；有人把他视为怪人，甚至把他想象为“江洋大盗”。1903年夏秋间，孙中山自河内抵达日本横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程家柽、杨笃生等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纷纷访问他，研究革命进行方针。孙中山极为兴奋，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很快，这个誓词就通过《警钟日报》和国内群众见了面。

转变后的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鼓吹（宣传）、暗杀、起义等三种进行方法，总部设在东京，上海、保定等地后来都设有支部。它还派出过12个“运动员”，分赴国内外“筹集经费”，“联络同志”①。

以杨笃生为首的一些人组成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4年，他们曾潜入北京，谋炸亲俄派头子慈禧。同年冬，清朝退职官僚王之春在上海勾结沙俄领事和军官，运动亲俄，拒俄同志会成员又曾策动万福华枪击王之春。

黄兴是12个“运动员”之一。1903年11月，他在长沙与章士钊、秦毓鎏等创立华兴会，确定了由湖南起义，直捣幽燕的策略。

武昌是拒俄运动的又一中心。1903年曾公祠拒俄大会上，吕大森曾直斥清朝政府“昏聩”②，会后，积极分子们自然形成了花园山秘密机关。次年5月，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科学补习所成立，吕大森被推为所长。

江浙地区的光复会也是在拒俄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对俄同志会会长蔡元培是该团的骨干。1904年，暗杀团改组，正式定名为光复会，对俄同志会并入光复会。

---

①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该会自印本。

② 《科学补习所始末》，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警秘第八二二號ノ内

曩ニ軍国民教育會ヲ組織シタル清国留學生ノ重立者ヲ警視廳ニ召喚シ将来學生タルノ態度ヲ失フカ如キ言行ヲ慎ムヘク諭シ再ヒ如斯企ヲ為サヽル様明ニ戒飭ヲ加ヘ候処別紙ノ通請書ヲ差出シ候ニ付右相添此段及通報候也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卅一日

内務省警保局長 安立綱之

外務省政務局長 山座圓次郎殿

今日諭告之件已知悉軍国民教育會刻既解散此後在貴國中不再組織斯之團體並此種類意旨亦不須布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廿八日

王家駒 秦毓鎏 董鴻禕 張肇桐 葉瀾

图十 军国民教育会遭到日本政府禁止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安徽武毅会（岳王会）、南京知耻学社、上海福建学生会、福建文明社、江西易知社等若干革命团体。其中一些团体或者与拒俄组织有着渊源关系，或者由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作为骨干。

一切都说明了，拒俄运动的高潮正在转变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

## 不可避免的政治分野

在拒俄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活动；到了第二阶段，运动发展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合行动，革命派对运动进程的影响日益显著。随着运动的深入，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愈益明显，斗争也日趋尖锐。

1903年4月27日的张园拒俄会，据改良派的报纸说："因有二人演说之词不合众意，众人有上前驳诘者。"① 又说："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肆意骚扰"。② 显然，这是指革命派对于改良派的斗争。不久，改良派的机关报《中外日报》连续发表论说，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派在拒俄运动中的主张"不合时势"，是什么"人方病寒而投之以治热之药"。③ 针对这种挑衅，激进的《苏报》指出：张园拒俄会是爱国集会，表现了中国人民"国家思想之萌芽"，应该"引而进之"，不应该消极指责。又指出：《中外日报》的态度是一种"保守"思想，其主笔是"素与康梁为缘者也"。④

戊戌变法后，革命派曾企图争取改良派共同反清，改良派中的某些人如梁启超等也曾虚与委蛇，装出一副要与革命派合作的

① 《中外日报》，1903年4月28日。
② 《大公报》，1903年5月5日。
③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2日、14日。
④ 《苏报》，1903年5月18日。

样子。他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公开论战，拒俄运动中的斗争是一个环节。冰炭不相容。当时曾有人投函《苏报》,要求双方“晤谈”或“函商”,遭到《苏报》的明确拒绝。① 在国民公会问题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就更加白热化了。最初，国民公会标榜“无所谓派别”,它的报名地点既设在爱国学社，又设在《新民丛报》上海支店，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盟。然而，在发展进程中，康有为的门徒龙积之和国民公会发起人之一冯镜如把它改名为国民议政会，力图纳入“立宪”运动的轨道。他们竭力宣扬：“皇上者中国之皇上”,计划以7月9日为陈请慈禧归政光绪的日子。龙积之等的企图受到了邹容的坚决抵制，邹容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学社学生纷纷脱会，迫使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②

感受到革命派的威胁，改良派的枪头就逐渐指向革命派了。这以后，他们也还谈沙俄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但主要是为了吓唬清朝政府，同时也吓唬革命派，为其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中外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政府当求消化乱党之法》的论说，说是革命党兴起的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任凭沙俄占据东三省，于是革命党就认为政府没有顾惜土地与悯恤人民之心，想造反了。为政府计，应该“锐意维新”,这样，革命党就会“消化”,“普天之下悉是甘雨和风”了。③ 在另一篇题为《革命驳议》的论说里，改良派扬言：一搞革命，就要发生内乱，外国人就会乘虚而入，沙俄以“平乱”为借口侵占东北就是前车之鉴。文章耸人听闻地批判革命派道：“奈何欲自启乱机，而勾引外人，使其瓜分吾宇耶？”④ 你想革命吗？一顶卖国主义的帽子就甩过来了。

与改良派针锋相对，革命派指出，小小变法只能起欺骗和装饰作用，解决不了挽救中国危亡的问题。至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也

① 《苏报》,1903年6月2日。
② 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10期。
③ 《中外日报》，1903年7月31日。
④ 《中外日报》,1903年6月7日。

并不可怕，只要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那就可以和侵略者相周旋。即使不幸被强敌所屈服，但黄河伏流，一泻千里，总有消灭帝国主义“殖民政略”的一天。①改良派惧怕帝国主义，不敢革命；革命派不那么怕帝国主义，所以敢于革命。但是，怕根未净，总觉得打起来不是帝国主义的对手，因而反帝不尖锐。

改良派宣扬光绪“圣明”，清朝政府可以依赖；革命派就以清朝政府丧地辱国、镇压拒俄运动、投降沙俄为例说明其不可依赖。1903年时章太炎指出：清王朝的“满洲故土”已经被沙俄抢走了，不能把丧失国土的罪魁捧出来当元首。② 1904年初，孙中山也指出：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这样的地方都丢了，发展下去，必然是“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必须“发奋为雄，大举革命”，“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针对改良派畏惧帝国主义干涉的懦夫心理，孙中山还指出：“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叩头、乞怜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以清朝政府为例说：“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暱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③

不同人从同一事件中常常会引出不同的结论。沙俄侵夺我国东北，改良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不能革命，革命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必须革命。

谁掌握真理，谁就将赢得群众。拒俄运动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还只是一次前哨战，但是，胜负却很快就有了分晓。

1904年底，日本《万朝报》译载了德国一家报纸的议论，提到一项世界商业统计表已经承认我国长城以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因此，引起了留学生中的极大骚动。改良派乘机活动，再度

① 《苏报》，1903年6月12日、13日。
②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卷二。
③ 檀香山《隆记报》，转引自《檀山华侨》。

企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的轨道。

先是由梁启超的一个门徒出面召集四川留学生开会，提出了一份《要求归政意见书》，共六条，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宣布立宪，召还康有为，并决定推张澜为“伏阙上书”的代表。

1905年初，中国留学生就《要求归政意见书》展开了大辩论。结果，大多数人反对。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批评其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江西同乡会批评其为“徒事喧嚣，毫无实际”，两广同乡会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了“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广西同乡会则明确宣告：“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①

改良派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辩论预示了《民报》时期革命派对改良派辩论时的大胜。

## 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

拒俄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中的亲俄派。同这伙凶恶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要使斗争超出发宣言、提抗议、集会、结社的范围，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

领导这场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们指出：对于沙俄侵略者，“非结合大群不足以御之”。②从何处聚集力量呢？他们向全国各阶层的各种人，上至政府、疆吏、领兵大员，下至术士、游民、乞丐、娼妓，无论男女老少，或者革命党、立宪党、保皇会、守旧派，乃至道学先生、厌世派，都发出或准备发出救亡的呼吁。但是，在这包容甚广的人群中，主要依仗哪种人的力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关

① 《大陆》，第3年第2号。

②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

系的错综复杂，又使他们对此踯躅彷徨。他们之所以同时向如此众多的、相互间格格不入以至敌对的人们发出呼吁，正说明他们心中无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自己。有人提出："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建议停止对俄的茶丝贸易，"无论如何重价，不准出售与彼"。① 主张用自身的力量而不依赖"官争于上"，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悟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毕竟太微弱了，这种呼吁如同投向大海的石子，没有激起多大波澜。

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中国社会的"主人"，为存亡之"关键"，"中国之兴，兴于学生"。② 邹容于1903年5月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最为激进，但是也有人怀疑莘莘学子们的作用，他们问道：以少数学生去和"如虎、如狼、如蛇、如蝎"的沙俄侵略者作战，行吗？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包括其知识分子在内，人数很少，经济力量有限，只靠本阶级的群众是做不出很多事来的。资产阶级要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就必须援引其他阶级的力量。

他们曾经企图依靠清朝的某些督抚。然而，事实证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们的"拒俄"，不过是因为自身的特殊利害发出的空喊，这流人在镇压拒俄的群众时却是实干的。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苏报》激烈地批评军国民教育会最初采取的请愿做法是"热昏"。"不识人头，吃煞苦头"。求助于袁世凯之流，不是要"吃煞苦头"吗？③

也曾有些人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20世纪初年，英、日、美等国在争夺我国东北问题上和沙俄有激烈的利害冲

①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8日。
② 《苏报》，1903年5月30日。
③ 《苏报》，1903年6月6日。

突，因此，有人主张联合英、日、美共同作战，有人建议请各国“公断”。这当然都是无法做到的。于一筹莫展之际，改良派居然附和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将东三省辟为各国公共通商口岸的主张，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排挤沙俄。日俄战争爆发了，不少人声援日方。郑观应等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疗治日本伤兵。在革命派中，也有人倡议“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由于对沙俄侵略的仇恨，很多人幼稚地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

这种情况也遭到了批评。鲁迅就认为此类人“太无远见”，曾专门写信给蔡元培，提请他办《俄事警闻》时注意。① 有人正确地指出，争夺着的双方都同样垂涎于我国的“膏腴绣壤”，②“中国不能自立，无论何国，均未可恃”，我们不能“自委弃其国民之责任”而一味求助于人。

不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清朝统治集团中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可以也应当利用，但是把获胜的希望寄托于此却是幻想。

尽管改良派不敢得罪清廷，康有为等甚至可笑地把局面的改观悬于光绪重新亲政的空想上，而那种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倾向更难于克服，但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上面这些看上去“强大”的力量并不可恃，开始向另外的方面去寻求助力。在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之后，他们曾经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1904年时，有人提出过“民战”的口号。他们指出：“民仇俄人，痛入骨髓”，只要能把人民动员起来，那末，掷瓦砾、施坑陷都会是斗争的办法。沙俄侵略军不过20万，东北居民则在千万以上，“以十民杀一俄兵，俄兵立尽矣！”③ 这个口号无疑是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反帝斗争力量。除了把人

① 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第10号。
②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
③ 《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

民动员起来，又靠谁来战胜俄国侵略者呢？不过，要实现“民战”，却非易事。

有人主张动员会党。他们认为：会党具有“刚肠侠骨”，“天不怕，地不怕”，只要“统统联络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便是十个也不可怕了”。①

当时，东北活跃着无数支抗俄武装。在最著名的“忠义军”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种队伍，由于多武装马队，被清王朝诬蔑为“马贼”。“马贼”的成分和政治态度虽然复杂，但参加抗俄的“马贼”，斗争却很英勇。他们毁铁道，割电线，焚烧粮库，劫夺枪支弹药，骚扰、袭击俄军，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一事实吸引了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1904年2月，《警钟日报》发表时评，赞扬“马贼”昭如日月，为“吾民族之代表”，宣称：“吾不能不爱马贼。”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不耐烦难，希望顺当地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由于对会党和“马贼”缺少实际了解，上述议论未免流于理想化，但那种急于获得下层群众响应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曾直接向工农群众发出呼吁。

我国拒俄运动发生、发展的时候，距巴黎公社成立已经30余年。此间，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不得不对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抱有热切的期望。《俄事警闻》宣称：工人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②由对俄同志会成员主编的《中国白话报》则热情介绍外国工党的斗争“能够制皇帝、官府的死命”。③他们要求中国工人能“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叫各国不来夺我们的地方”。④

①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9日。
② 《俄事警闻》，1904年1月10日。
③④ 《时事问答》，《中国白话报》第5期。

主张动员农民的人也有。《俄事警闻》在题为《告农》的社论中说：俄国夺了东三省，全国人都应该出力，农民"劳苦惯了"，"当兵是顶相宜的"，而且"人数本来多"，只要本领也好了，又明白"道理"，"肯拼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俄事警闻》并应许："那时候，你们就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①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主力，在东北，也是抗击沙俄入侵的主力。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弱点，却无疑是一种"民战"。对义和团，清王朝和改良派都诬之为拳匪"，一些革命派分子也不免受此影响。在拒俄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某些人却独能作出较为正确的评价。他们赞誉其"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②

在20世纪初年，出现这种赞扬工农，主张发动工农展开反帝斗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生气勃勃，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需要群众的力量，敢于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由于眼界比较宽，革命派感到自己比改良派有力量，他们满怀信心地批判了流行一时的"不战亡，战亦亡"的悲观主义论调。但是，应当指出，即使在这时，他们也并不真正认识劳动人民。如前所述，对工农的呼吁，乃是向社会上类型众多的人发出的呼吁中的一种，他们并没有认为工农才是拒俄反帝的最主要的动力。反之，那种对群众的蔑视却不时流露出来。《俄事警闻》有一篇文章就说："平民有血性而未知理义，绅士为教导之"；"绅士倡于前，平民和于后"。③他们推崇"平民"是要"平民"作他们的尾巴。资产阶级蔑视劳动人民的心理根深蒂固。安徽爱国会发起人陈仲甫就诬蔑农民为"草野愚民"。④这个陈仲甫就是陈独秀，他的这种谬误

① 《俄事警闻》，1904年12月22日。

② 《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2期。

③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2日。

④ 《苏报》，1903年5月26日。

观念始终难变，后来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搞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思想根源之一。

1903年，当上海成立"四民公会"时，《浙江潮》第5期发表过一篇时评，大意说，中国有一件最可悲痛的事便是，"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其他社会隔绝，所以，"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无效"。文章要求该会成为"国民之机关"，"自士社会以待合于其他种种各社会"。这段评论可谓"切中时弊"。然而，拒俄运动中，它始终是空谈，"士"们除了热衷在本阶级群众中活动外，并没有认真去做"合于"其他社会的工作，还是一个孤零零的自居的"首"。当上海工人为周生友案投入拒俄斗争时，《警钟日报》的"士"们可以在报上大谈其"工民革命"，指手划脚，但是却不跑到工人中去做点实际工作。丁开嶂、张榕跑到东北去了，但是，主要依靠的也还是地方上层人士和"马贼"中的上层头目。1903年的"四民公会"无工无农，是个"二民"公会，实际上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民"公会。此后的对俄同志会状况也是这样。该会极盛时不到200人，他们非常懊恼地感慨道："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现，所藉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① 没有人民大众参加，当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哪些阶级、阶层、人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谁又是其中的主要动力？这是一切反帝斗争都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触到这个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当给以恰当的估价，但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自身显然无力完成这个课题。

反帝而不依靠人民，不发动工农群众，必然无所成就，最终仍然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后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拒俄运动也已经预示了这一前景。

①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

# 反对沙皇奴役的世界人民斗争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① 我国的拒俄运动不是孤立的，它是20世纪初年世界人民反对老沙皇奴役的斗争的一部分。

世界人民热烈地同情和支持我国的拒俄斗争。还在1900年12月，列宁就在《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论述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正义性，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奋起斗争，"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响应列宁的号召，布尔什维克揭露了沙俄政府在中国的犯罪政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传单里写道："难道俄国人民需要满洲这一块外国的土地吗？"② 一些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例如1903年有德国友人在南京"见中国人即握手，告以中国前途之苦及改变之不可缓"，"语及东三省事，辄切齿怒目。"③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波兰友人曾联络中国劳工，准备起事抗俄。

我国人民也热烈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反对沙皇的斗争。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乌克兰、高加索等地爆发了总罢工斗争。对此，《江苏》杂志发表文章说："暴动！暴动！俄罗斯果不得不暴动，俄罗斯终不能不演革命之活剧。倒专制旧政体，建共和新政府，为日非远矣。"④ 1905年1月，彼得堡的工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② 《史学译丛》，1957年第5期，第100页。
③ 《朱臻仕》，《江苏》第7期。
④ 《江苏》第6期。

人由罢工斗争发展为准备武装起义。消息传到我国，«警钟日报»立即发表了《请看俄国之工人》一文，赞美俄国工人“立志之坚”。① 在当时，沙皇还是个庞然大物，但是，中国拒俄运动分子们相信俄国人民：“斯拉夫民族真好男儿，真不愧为伟大之人民。善于动！善于杀官吏！杀君主！”②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人民面前，沙皇政府是迟早要完蛋的。

列宁曾经指出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③ 在这个监狱里，犹太人所受的压迫极为严重。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尖锐地揭露了一小撮沙俄反动分子对犹太人的虐杀：“或挖其两眼，或断其四肢于板，以刀碎割。小儿则携往最高之处掷下，或则腰斩。”这是怎样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呀！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语重心长地警告人们：“吾悲犹太，吾不能不虑夫将为犹太者。”④

波兰曾长期为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所瓜分，沙皇政府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在《猛回头》、《新湖南》等小册子中，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谴责了这种统治。对于波兰人民的斗争，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尤其寄以殷切的期望。1904年3月，他们见到了一份波兰义勇军的讨俄檄文，情不自禁地欢呼：“伟哉！波兰之民族！壮哉！波兰之志士。”他们专门写了《波兰之志士》、《读〈波兰义勇军组织主意书〉》等文章，指出：“彼俄国者，裂波兰故土最多，压波兰遗民最酷。擒贼先王，首在覆俄”。文章建议波兰志士利用日俄战争的机会奋起抗俄，乘熊脚被扎的时候“突刃其腹”。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相信，经过斗争，“必有一波兰新国出现于波罗的海之滨”。⑤

① 《江苏》第6期。
② 《警钟日报》，1905年1月26日。
③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
④ 《经世文潮》，第4期。
⑤ 《警钟日报》，1904年3月9日。

此外，对于反对沙皇奴役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斯、土耳其等国人民的斗争，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也都表示了关切，并看成是对我国人民的支持，"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之"大机会也"。[①]

1904年2月5日，《俄事警闻》发表过《俄祸》一文，中云：

> 若夫俄，则尤虎狼之尤者也。自彼得大帝以来，以吞并与国，囊括全球为志，彼意非使史拉夫人种为全世界之主不止。此非我中国之祸，而全世界之祸。

这段话值得重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②]沙皇推行"囊括全球"的侵略政策，并不是为了使"史拉夫人种为全世界之主"，而是要使俄国的一小撮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为"全世界之主"。在这一点上，《俄事警闻》讲得不对。但是，沙俄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密切结合着，它把帝国主义的各种最坏因素都集中了起来，而且变本加厉了。因此，极富于侵略性，是当时世界的大祸害。《俄事警闻》发出的这一"警闻"又是正确的。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看清沙皇的侵略野心，明确自己斗争的意义，就更加鼓舞了自己的斗志。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是我国近代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打击了沙皇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便目，表现了我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内外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近代中国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略有修订）

---

① 《抗俄铁血会檄文》，《大陆》第2年，第4号。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7页。

#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

许多著作都提到陈天华有一份《要求救亡意见书》，但史学家们迄未见到。1985年，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将它找到了。原件为铅印传单，附于警视总监安立纲之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之后①。

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译载德国某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各国商业统计表关于中国领土已不列长城以北，承认其为俄国范围，"此实瓜分政策"云云。这一消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四川学生首先集会，有人提出《要求归政意见书》，主张西太后将"大政"归还光绪皇帝，"以一主权"，同时，要求清政府"宣布立宪以定国是"。该意见书提议于1905年2月4日（夏历元旦）致电清政府，陈述意见，并随撰详细呈文，公举代表二、三人到北京伏阙上书②。在这一情况下，陈天华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救亡意见书》，在留日学生中散发。

《意见书》全文约三千余字。开宗明义，首先说明当时形势和不得已拟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救亡的苦衷。《意见书》称：

> 近日以来，警电纷至，危迫情形，视前尤急，同人等焦心灼虑，苦无良策，乃于无可如〔何〕之中，作一死中求生之想，则惟有以救亡要求政府也。

《意见书》将清政府譬喻为"管屋者"，将国民譬喻为主人，说是："主人有屋，托人管理，不慎于火。管理者以非其屋也，将任其延烧，为主人者岂能不以屋如焚焰，必责其赔偿而急促之使救

---

① 《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13号，明治38年2月2日。

②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火乎?”

关于请愿的目的,《意见书》说明,在于劝止清政府及其大臣们出卖国家权益。它称:

目的惟何?但使朝廷誓死殉国,勿存为一印度王之思想,卖吾侪以救活;为大臣者实事求是,勿抱一为小朝廷大臣之主义,以吾侪之权利,为彼等富贵之媒。

当时,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国王则成为侵略者卵翼下的儿皇帝。陈天华要求清政府以印度为鉴,不要使中华民族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关于请愿的条件,《意见书》向清政府提出对外条件三项,对内条件四项。对外条件为:1.勿以土地割让于外人,竭死力保护矿山、铁路、航权;2.勿以人民委弃于外人,人民之生命、产业、利权,丝毫不容外人侵犯;3.勿以主权倒授于外人,力杜外人驻兵内地并掌握用人行政之权。对内条件为:1.实行变法;2.早定国是;3.予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权;4.许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意见书》同时提出国民义务四项:1.当兵;2.纳租税;3.募公债;4.为政府奔走开导。《意见书》要求清政府履行条件,国民履行义务,双方处于对等地位。它说:“吾侪之义务有一未尽者,不待政府诛之,吾侪必自诛之。吾侪对于政府尽义务矣,而政府之于吾侪所求者或不之许,或许而阳奉阴违,行之不力,或竟显违吾侪所订之条件,则吾侪必尽吾力之所能以对付于政府,诛一人而十人往,诛十人而百人往。吾侪不死尽,政府不得高枕而卧也。”

《意见书》的主要篇幅是设为问答,以二人辩难的形式,解释各种疑问,说明请愿活动的必要。最后,《意见书》表示,将以留学生全体名义,在两周内赴北京实行。“有志偕行者请至神田西小川町一之一东新社(陈天华住址——笔者),商订出发,反对者请即函告,否则作为默认。”

《意见书》表现了陈天华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认为,

国家由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组成，有一个要素不具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意见书》指出：当时帝国主义者纷纷向清政府索取土地和势力范围；在非洲、美洲的华侨和东三省的难民备受帝国主义虐待；主权无一不被外人掌握。因此，中国"早已等于瓜分，且更甚于瓜分"。《意见书》呼吁中国人民及时设法，拯救国家危亡。它说："救死者必于将死未死之时，不可待于已死；救亡者亦必于将亡未亡之时，不可待于已亡。"这些地方，和陈天华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原先，陈天华指斥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认为"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主张以暴力将其推翻。"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①；而现在则希望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政府豁然警醒，外拒强敌，内行变法。两相对比，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退步。在写作《意见书》之前，陈天华曾会见梁启超，二人多次通信，《意见书》反映出改良派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意见书》末段，陈天华设想有一个革命者出来质询："吾侪平日之所主张，非革命乎？今乃欲倚赖于政府，何其进退失据也？"对此，《意见书》回答道：

> 政府之将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与外人，一弹指间也；而吾子之革命，旦夕可举乎？吾恐议论未定，而条约上之效力发生，已尽中华之所有权移转于他人手矣，则何如要求政府，与之更始以围〔图〕存乎？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陈天华对自己改变主张的解释。在陈天华看来，革命不会很快发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危亡在即，只能以请愿的形式阻止清政府卖国，这样会便捷得多。

然而，陈天华毕竟不同于改良派。这就是，他对于和平请愿的作用并不十分夸大，对清政府能否改弦更张也并不抱很多幻

① 参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36、61、59页。

想。《意见书》说：

> 吾侪之要求，所以使政府应付外人之要求外，而亦留一二以应吾侪之要求也。盖使彼惟虞外人之一方面，而不虞国民之方面，则必至举吾侪尽售之于外人，以保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不止。今吾侪乃预先警告之，吾侪虽被售，而必不使安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是亦侥幸望其勿售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和平请愿的目的只是"侥幸望其勿售"。有些地方，《意见书》又说：

> 至于警告而不听，则吾侪自必有继续之行为，决非仅如公车上书之故事也。各国民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先提出要求之条件，要求而不纳，然后有示威之举动，无不如此者。吾侪躐等以为之，则政府不知吾等意向所在，而国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为何，纵掷数人之头颅亦不过等诸无意识之作为，而吾侪之主义，终难暴白于天下。惟先将主义标出，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政府之无可望则久已知之矣。

这里，陈天华明确宣布，清政府"无可望"，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斗争方式不能仅限于"公车上书"一类故事，而是要将"吾侪之主义"表白于天下，"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可见，陈天华并没有封死通向革命的道路。

在《意见书》中，陈天华还说："吾侪之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政府能与吾侪共致死于外人，则外人乃吾侪致死之所也；政府必欲以吾侪送之于外人，则政府乃吾侪致死之所也。"这里，陈天华那种不惜一切，敢于与内外敌人拼死战斗的精神又表现出来了。

《意见书》散发后，立即受到了湖南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05年1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

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①28日，宋教仁应彭希明之邀，至刘揆一处，与黄兴、章士钊等会商，决定召开同乡会干涉。当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又写道："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②29日，在湘西学会例会上，宋教仁演说"瓜分问题"，激烈地反对向清政府请愿，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当日到会者50余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0日，在锦辉馆召开湖南同乡会，与会200人，一致决议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政府之说"，赞成宋教仁的"全省独立自治"主张③。2月1日，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举行"特别谈判"，宋教仁批评陈天华"受保皇党之运动"，双方"辩难良久"，陈天华因受日本警署传唤离去④。在警署时，日本当局通知陈天华，禁止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⑤。2月2日，宋教仁得到黄兴的通知："陈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⑥。

与此同时，东京留日学生就向清政府请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广西同乡会认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⑦。

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公函称："此次提议上书政府一事，公认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请置勿议。"⑧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讨论结果，反对请愿者占十分之九⑨。

这种情况，显示出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日益成为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黄兴、宋教仁的帮助下，陈天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再度焕发革命精神，重新执笔为革命作鼓吹，写下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名篇。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②③④⑥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第512—514页。
⑤　《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13号，明治38年2月2日。
⑦⑧⑨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1905年，同盟会成立，实现了各派反满力量的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营垒出现了某种团结、兴旺的景象，革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思想上，和改良派的论战正在胜利进行，军事上，萍、浏、醴起义之后，各地革命党人跃跃欲动，一个武装起义的高潮正在酝酿。但是，好景不常，1907年夏，同盟会发生严重分裂。此后，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光复会的重建。

当革命正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统一的司令部时，同盟会却陷于分崩离析的涣散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曾经有人主要以地域、宗派观念来说明问题，以为是广东派与湖南派、江浙派之争；又有人以为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和光复会的“一民主义”，即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地主阶级反满派之争；这些解释，都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 一、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

革命进程中总难免有光明与阴暗两面。辛亥革命之后，当年献身于革命的先行者热衷于阐扬功烈，而对于这一进程中的不光采的方面，大都不愿涉及，或语焉不详。因此，在讨论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时，清理这一事件的过程是首要的工作。

1907年初，孙中山与黄兴曾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

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1]必须迅速毁弃。争论中，黄兴坚决毁弃青天白日旗的主张使孙中山很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2]这样，黄兴也因而激动起来，他发誓要退出同盟会。

情感冲动常常驱使人走向歧途。冷静下来之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3]

尽管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当他得知此事后，就更增加了不满，从而萌发了“早自为计”的念头。[4] 3月1日，他向孙中山辞去了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同月23日，偕白逾桓等离开东京赴奉天运动绿林武装。

对孙中山的不满使宋教仁以后一度参加了倒孙的行列，但在当时，还仅限于两人间；去奉天之后，宋教仁仍然使用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的名义进行活动。[5]因此，在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中，国旗图式问题只是一个小序曲。

对同盟会分裂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

清朝政府镇压了萍、浏、醴起义之后，感到对革命力量不可忽视，追寻“祸本”，认为出于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因此，通过驻日公使杨枢等出面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6]日本西园寺内阁对此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又力争不得罪中国革命党人。日本政

---

① 《雪生年录》卷一。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③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三).总394页。
④ 《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28日。
⑤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⑥ 《时报》，丁未一月二十七日。

府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对孙中山说：清朝要求日本把孙中山抓起来，日本政府考虑不抓，但孙中山必须迅速离日，否则不能保证安全。① 同时，日本政府并资助五千元，② 另一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的经费。当时，孙中山因急需一笔款子去中国南方发动，以便趁热打铁，适应萍、浏、醴起义所带动的革命高涨形势，便接受了这两笔资助。

除赠款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内田良平出面为孙中山饯行。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阪区三河屋设宴，应邀者有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刘师培、汪东、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③ 3月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及日人萱野长知等南下。事后数日，西园寺内阁才通知清朝政府，已经驱逐孙中山出境。清朝政府立即大肆宣扬，炫为外交上的胜利。

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是满意的。他觉得，"各国政策无论如何文明，其对于与国必重于对民党，但日本政府两方面皆存好意，庶几平等相待"，"殷勤备至"。④ 他完全没有想到，此事却在同盟会中激起了巨大的风波。

铃木久五郎资助一万元一事章太炎是知道的，孙中山曾从中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⑤ 章太炎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下，但对日本政府资助五千元一事，章太炎等则一无所知。孙中山离日后，这一情况为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探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接着，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田桐等也得知了这一情

① 樊光：《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② 日本政府资助款数，说法不一，此用刘揆一说，见《黄兴传记》。
③ 《宫崎滔天年谱》，《宫崎滔天全集》(五)，第687页。
④ 《致檀香山同志书》，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1914年版，第122—123页。
⑤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况，并传闻孙中山临行时的宴会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保证，① 云云。张继等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便闹了起来，张继破口大骂，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② 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去，以羞辱孙中山。③ 可能为此事他还写过声讨性的檄文。④ 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也同声附和。⑤ 他们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在这一事件中，北一辉起了挑动和扩大矛盾的作用。他原是日本新泻佐渡地方一个酿酒业主的儿子，因家庭破产而倾向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06年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同年11月加入宫崎寅藏、和田三郎等组成的《革命评论》社。不久，又经宫崎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孙中山是西欧主义者，因而，憎恶孙中山，接近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其所著《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他自述说："当时所发生之内讧，诸友皆以发生于不肖入党数月之后，因而归罪于不肖之行动。然而不肖方以彼等各自之色彩逐步趋向鲜明为快，深希彼等各自贯彻其思想之所向，因此敢于置不肖一身之毁誉于不顾也。"⑥ 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北一辉当时并不以同盟会的团结为重，而是强烈期望分歧加大。他又说："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

① 谭人凤：《牌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②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东京，昭和15年改订6版，第48页。
③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④ 参见刘师培：《上端方书》，《建国月刊》第12卷第4期。
⑤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48页。
⑥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第47页。

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孙君辞去总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① 《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写于1914年，虽然事隔已久，偏袒章太炎等人的感情仍然很强烈。

平心而论，双方都有其不当之处。

从孙中山一方看，他对西园寺内阁的两面政策缺乏认识，这是事实。但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活动基地，日本政府并未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因此，自然不应采取率领留学生"示威"一类轻率的做法。孙中山处理不当的地方是：在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上没有和大家商量，并说明有关情况。

从张继等一方看，他们反对孙中山接受西园寺内阁的赠款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南下起义，他们视此为"受贿"是错误的，由此大吵大闹，提出革孙中山的命，要求撤换其总理职务尤其错误。章太炎的做法更是一种人身侮辱，是只图一时痛快，不顾后果，严重伤害同志关系的行为。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东京的倒孙风潮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又传来了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这是孙中山离日后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它的失败使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等催逼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黄冈、七女湖起义急需，当时，孙黄二人正在筹划于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② 因此，力排众议。张继于盛怒之下，和刘揆一扭打起来。与此同时，刘师培则进一步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他自己想当同盟会领导人，并企图援引北一辉与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也遭到

① 《支那革命外史》，第48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刘揆一的拒绝，因此，北一辉也对刘动了武。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6月17日，为筹备在广东钦、廉二府同时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械。在宫崎寅藏协助下，共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计划运至白龙港起岸，供革命军使用。村田式在日本已经落后，在中国尚不失为先进武器。但章太炎却认为不能使用，吵吵嚷嚷地说："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它！"②当时，宋教仁已被张继从奉天叫回东京，③他支持章太炎，并联络了同盟会本部的一些人，以《民报》社名义用明码打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④因而，购械计划搁浅。

在倒孙风潮中，陶成章支持张继、章太炎等。据当时人回忆说："其时党人购买枪械靠日本浪人介绍代购"，"章太炎先生与陶公均主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黄二公但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陶于争论时坚持尤力，因与孙黄失和。我彼时耳闻其事，曾于日比谷昌口医院访陶时有'大家不要争夺领袖'的话，陶闻言即谓：'年轻人不要胡说'，但言词之中却嫌孙先生武断。"⑤这里所说的"争夺领袖"虽被陶成章斥为"胡说"，但证以上引其他史事，当是事实。

倒孙风潮中支持张继、章太炎等的还有谭人凤、田桐、白逾桓等，但他们的表现不那样突出，以后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钦廉起义由孙中山亲自策划。他联络了当地抗捐的民团，联络了在清军中任职的同盟会员赵声和郭人漳，并派黄兴和王和顺归国领导，原以为只要武器一到，立即可以组成一支"声势甚大"

① 陶冶公：《中国同盟会原始党报〈民报〉的历史和我在报社服务的一些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②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③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④ 冯自由：《吊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⑤ 许轶民：《从陶成章先生被害说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油印本。

的军队，然后收两广，出长江，汇合南京、武昌的新军，形成破竹之势，"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① 及至王和顺攻克防城，武器不到，孙中山自觉失信于起义同志和当地团绅，极为恼火，便由胡汉民出面致函同盟会本部，"力责之"，表示要执行党中纪律。不久，又派林文回东京，禁制章太炎和宋教仁，令其以后不得再干预军事问题。② 9月，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谴责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不顾公义"、"破坏团体"、"侵入内部，几致全局为之瓦解"。他将运动日本各方面的任务交给了宫崎一人，表示"不特平山、北、和田数子，不可使之闻知"，连同盟会本部及《民报》社中人，亦不必与之商议。③ 在同盟会的内部分歧中，北一辉等起了恶劣的作用，孙中山完全应该采取断然措施。但是，专任宫崎一人，却危险地表现了抛开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社的意向。

由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混乱状态日益严重，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对此，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④ 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承认不是之时。⑤ 刘揆一要孙中山"引咎"，意在以孙中山的高姿态来平息越来越盛的倒孙风潮，但这是一种息事宁人的糊涂做法，孙中山对此表示拒绝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分辨是非，增强团结，而是等待"事实"的解决，要求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承认不是"，这就不仅将分歧的种子保留了下来，而且以感情代替了理智。

---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8章，《总理全集·方略》，第68页。

②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9页。

③ 《为防城起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总理全集·函札》，第91页。

④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三)，第289页。

⑤ 《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吴稚晖原藏。

在孙中山复函刘揆一的同时，黄兴也复函称："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 孙中山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黄兴以其正确态度维护了孙中山的威信，也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但是，他也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消除矛盾。

由于黄兴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了，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②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后，徐锡麟始终拒绝加入同盟会，他与孙中山"宗旨不合"的情况早已存在，但是，"不配使我行刺"云云，显然由于倒孙风潮的影响，它反映了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远非一般的不满。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不乏借题发挥的例子，倒孙风潮可以说就是如此。它借助于几个具体问题爆发出来，其中隐藏的是深刻的思想分歧。

倒孙风潮的主力是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他们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在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 二、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

20世纪初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表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三)，第289页。
② 《徐锡麟供》，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辛亥革命》(三)，第81页。

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活跃阶段。1901年，在片山潜领导下，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组织平民社，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片山潜说：“尽管在我们中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尽管我们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之中，不善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跟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稀奇古怪的杂拌。”① 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除“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外，别无其他革命的途径。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日本社会党开始分裂后不久，张继、章太炎等便和硬派发生了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06年，张继根据幸德秋水的日译本，转译了马拉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1907年春，他和章太炎通过北一辉的关系结识了幸德秋水，深受影响。在幸德秋水的遗物中，保存有章太炎、张继一封求教的手札，中云：“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三月二十六日。”② 此后，双方来往日益密切。陶冶公回忆说：“（我们）参加了日本原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为首组织的座谈会”，“经常以旅行玩山游水为名，到东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开会。”③ 不仅如

① 片山潜：《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共产国际》7—8期，1933年俄文版，第84页。

② 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东京，1969年版，第193页。

③ 陶冶公：《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未刊稿。

# 時評

## 祝日本社會黨之分裂

扶弱

自社會黨分硬輭二派其別派之中復有傾向無政府主義者蓋聚多數之人同奉一主義其進者必進而益上保守者必退而益下如德國社會黨當二十餘年之前已分二部一持革命態度一持老成態度及八百八十八年老成派中遂有政府黨之發生與之立異者別成反對派英法二國亦然近日義大利社會黨亦有分裂之勢此均社會黨派由合而分之證也然各派既離本派而獨立則其所持主義必較舊派為進步如日本近日社會黨分裂之事是也自日本社會新聞發行於東京為社會主義中央機關片山潛氏西川光次郎氏經營之時大阪平民社亦刊發平民新聞森近運平氏經營之然兩派發刊之詞一主激烈一主溫和及別子暴動之事起復一主階級鬥爭一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調和兩派不同自此始及六月十六日堺利彥氏演說于社會新聞社陳述歐州社會黨之分派以社會新聞一派當輭派以已當硬派以幸德

時評

图十一　日本社会党分裂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
（1907年）
（采自《天义》第8、9、10合册）

此，幸德秋水等有时还深入中国留学生宿舍，大谈特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①这样，在中国留日学生和革命者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对于这一派别，幸德秋水描述说："亡命的革命党中多数青年，则已不满足于以往搞的驱逐鞑虏，复我中华，创立宪政，创立共和政体等运动，而进一步主张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中最进步的人则热心倡导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或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把几万册杂志、小册子陆续秘密输入其国内。""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另外要谋求人民幸福之途。"②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③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开始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筹组亚洲和亲会。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主张凡亚洲人，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可入会。④中国方面参加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参加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和亲会约章表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它规定"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在上之人"的传统主张。6月，刘师培通过他的妻子何震出面创办《天义报》，声称其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⑤同月，正当倒孙风潮大起的时候，张继和刘师培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其

①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47页。
② 《病中漫谈》，《高知新闻》，明治41年(1908)1月1日。
③ 《幸德传次郎遗文集》(三)，第121页。
④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未刊稿，陶冶公原藏。
⑤ 《天义》广告，《民报》第15号。

广告称："近日以来，社会主义盛于欧美，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因此，他们要研究"社会主义"。①这份广告实际上是另树一帜的宣言书，它应是刘师培改组同盟会本部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的产物。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社会主义讲习会"于8月31日召开成立会。会上，刘师培表明了和孙中山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他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据他说，如果"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那就"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其结果必将是"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②"建立民国"是孙中山为同盟会规定的重要任务，刘师培这里所指责的"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显然针对孙中山和同盟会而言。它表明，刘师培等决心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幸德秋水参加了成立会，在演说中，他声言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两派，"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又表示："中日两国，地域相近"，"两国国民，均可互相扶助"，"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③

最初，"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活动一次，后来改为每月活动两次。在讲习会上发表演说的，中国方面有张继、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何震、汪公权、景定成、乔义生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宫崎民藏等。

章太炎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曾先后作过《国家论》、《人之根性恶》等讲演。1907年12月，又曾提议派张继去青岛举办讲习会。当时，山东同盟会员邀请章太炎等派人去青岛办学，章回信

① 《天义》，第2卷。
②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
③ 《幸德秋水演说词》，《新世纪》第25号。

## 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

近世以來。社會主義盛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間倡民族主義。然僅辨民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於此。慨社會主義之不昌。擬搜集東西前哲諸學術。參互考驗。發揮光大。以餉我國民。又慮此學之不能普及也。爰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此諸。現已開會。留學界諸君如有與本會表同情者。仍可陸續入會。乞將名姓住址寄交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地本會通信所。俟逢開會之期。即行函達。張繼劉光漢今啓。

本社捐助及贊成芳名列左

唐棻英女士　貳元
功翠女士　伍元
方君英女士　貳元
楊慧毓女士　壹元
何香凝女士　六元
丘新葉女士　伍元
廖平女士　貳元

楊光君　貳元
鄧心榮君　壹元
方萌女士　貳元
王奇蜜君　拾元
郭君女士　伍元
胡漢子女士　三元

廣告價目

一　特別廣告凡中國人日本人所著書報與本社宗旨相合者若以所著書報及廣告寄交通信所本社按期登載不取分文

二　普通廣告凡中外書報及商店本社均代登廣告取價外從廉登一行者取價十二錢一行以上則依字數照加

图十二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1907年)
(采自《天义》第6卷)

说："鄙意学堂不当骤办，盖此事既须经费，讲师又不易求，不如专在学会讲社会主义为妙。溥泉可至青岛一游，与同人开讲社会主义一两礼拜。"① 张继所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无政府主义。同一时期，章太炎在为张继所译《无政府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也说："若能循齐物之眇义，任夔蚿之各适，一人百族，势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学，旷绝人间，老死自得，无宜强相陵逼，引入区中，庶几吹万不同，使其自已，斯盖马氏所未逮欤？"② 章太炎这里所说的"马氏"，就是意大利老无政府主义者马拉跌士达。在章太炎看来，无政府主义虽然赶不上庄子的《齐物论》，但它还是实现人类平等，救护贫民的好药方："然其批捣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埃，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复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岂弟首途，必自兹始。虽有大智，孰能异其说耶？谅知大载荛花，是时为帝者也"。③

章太炎之外，陶成章也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记载说："（丁未）冬，在清风亭，偕张继等演说，提倡社会主义。"④ 这里所说的清风亭，正是社会主义讲习会集会的常用地点。

社会主义讲习会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刘师培还为中译本写了个序。他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不易之说"，⑤"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⑥ 但是，刘师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又还远远不够。其一，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作为手段之一的议会斗争，这在他看来，就是导致第二国际"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的根由。⑦ 其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在推翻了旧制度之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

① 《致陈干书》，章太炎佚稿。

②③ 《民报》第20号。

④ 抄件。张篁溪曾将之篡改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

⑤⑦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天义》第16—19卷。

⑥ 齐民社同人：《〈社会主义经济论〉中译识语》，《天义》第16—19卷。

国家，这在他看来，就是使人还要成为国家的奴隶，“均背于平等之旨”。①

“社会主义讲习会”推崇蒲鲁东、巴枯宁、施蒂纳尔、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也推崇极端仇视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政治”的托尔斯泰主义。

在他们看来，巴枯宁堪称“近世之英杰”②，施蒂纳尔的学说“最为高尚”，③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最为圆满”，“悉以科学为根据”。④托尔斯泰主义被称为“消极无政府主义”，“足箴中国新党之迷”。⑤他们不要政府，不要国家，不要政治，不要军队，不要法律，幻想立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

章太炎的思想和刘师培等略有不同。他认为不能立即废除一切政府，而必须设新政府以为“无政府之阶”，同时，他又认为不能以“无政府”为最高理想，而应该“高蹈”尽善尽美的“太虚”，即除“无政府”之外，还要“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⑥在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思想里，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是密切结合着的。

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工业还很微弱，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阶段，“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拒绝接受，有其历史必然性。

如果连马克思主义都还被认为革命性不够，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当然就更不在话下。“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和孙中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

① 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天义»第6卷。
② «巴枯宁学术要旨»，«天义»第1卷。
③ 自由：«斯撒纳尔无政府主义述略»，«天义»第8—10卷。
④ 刘师培：«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天义»第11—12卷。
⑤ «俄杜尔斯托‹致支那人书›节译识语»，«天义»第11—12卷。
⑥ «五无论»，«民报»第16期。

1. 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矛头指向对外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它包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内容。但是，无可否认，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有某种幻想。他长年奔走世界各地，固然是为了发动华侨，但也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民报》六大主义即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① 对于日本政府，他尤其寄以希望。章太炎等人则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绝不可能赞助中国革命，也反对向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上述条文，章太炎解释道：“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② 他声言：“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③ 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之所以使章太炎等那样激动，其原因盖在此。

应该承认，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章太炎等优于孙中山，但是，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他们的对华政策（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在不丧失原则的条件下，革命党人并非不可以接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某种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2. 在对民主立宪的态度上。孙中山指责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主张通过“政治革命”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④。《同盟会宣言》规定：“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⑤ 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于中国“最为相宜”。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则不然。他们不仅反对君主立宪，而且也反对民主立宪。章太炎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

① 《民报》第1号封里。

②③ 《答祐民》，《民报》第22号。

④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上），第69页。

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①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大声疾呼：“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② 陶成章也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③ 在当时，他们尤为激烈地反对代议制度，章太炎指责议院为国家“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的工具，把“议士”和政府、官吏一起视为“天下之最下流者”，④ 刘师培则指责议会政策为万恶之源，认为“凡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⑤

20世纪初年，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制度弊端百出，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虚伪性，“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比之封建专制制度来，仍然是个大进步。

3. 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因此，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外，特别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核定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⑥，《民报》称之为“土地国有”。孙中山主观上企图以此来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弊端，而实际上，它只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买卖更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列宁曾称之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⑦

---

① 《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

②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第8—10卷。

③ 《龙华会章程》。该章程自署为甲辰(1904)年作，实系有意倒填，应为1907年冬至1908年春夏间之作。关于此，笔者另有考证，见本书第166页—174页。

④ 《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

⑤ 《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天义》第15卷。

⑥ 《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第69页。

⑦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

《民报》时期，孙中山还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但《同盟会宣言》中有“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①]一语，《民报》在和《新民丛报》辩论时，曾特别指出，国民经济命脉不能“归一二私人所垄断”[②]，要求将邮政、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诸事业收归国家所有。可见，孙中山等反对的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切资本主义。

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不同，章太炎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③]陶成章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④]刘师培则主张通过“农人革命”以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口均分，“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⑤]他尖锐地抨击同盟会的“土地财产国有之说”，指责其为“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⑥]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刘师培反对任何政权机构来干预土地问题，而主张诉诸农民群众完全自发的行动。

刘师培等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这自然较孙中山和同盟会为急进，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刘师培主张“杀尽资本家”，[⑦]称实业为“民生之蠹”。据他说：工业日进，机械日新，那末，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难。[⑧]章太炎认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轮舰；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么机械。[⑨]在“社会主

① 《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第69页。

②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③ 《五无论》，《民报》第16号。

④ 《龙华会章程》。

⑤ 《悲佃篇》，《民报》第15号，参见《怪汉译〈俄国第二议会提议之土地本法案及施行法案〉序》，《天义》第16—19卷。

⑥ 《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第5卷。

⑦ 畏公(刘师培)：《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卷。

⑧ 《异哉中国妇人会》，《天义》第2卷，参见志达：《政府奖励实业》，《天义》第5卷。

⑨ 《〈无政府主义〉序》，《民报》第20号。

义讲习会”上，他甚至公然主张人类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①

4. 在革命策略上，孙中山主张发动会党、新军以进行武装起义。1895年，孙中山即在广州举行了武装反清的最初尝试。1906年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边境发动起义。整个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这一点上，孙中山始终坚定如一。

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1907年，张继译出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该书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以“直接行动”——全社会的总同盟罢工作为“工人阶级反抗掠夺者的不二法门”。② 刘师培、章太炎均曾为之作序。刘序认为，如果罗列的策略能够在中国推行起来，就会出现“握政之人，丧其所依”的局面，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他批评孙中山发动会党以进行武装起义的策略为“罔恤民劳”。③ 章序的观点与刘序大体相近。他天真地设想：只要全体劳动者发动起来，“一市之间，闭门七日”，那末，不仅统治者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而且连军队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④ 这一时期，在东京的一些集会上，章太炎、刘师培、张继三人曾密切配合，多次宣扬过总同盟罢工。例如1907年11月，留日中国学生因收回苏杭甬路权事在东京集会，即首由章太炎建议运动省城罢市、罢工，次由刘师培声称“惟罢市、罢工尚为有益”，末由张继“申明无政府主义罢工之说”。⑤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中，陶成章这一时期是主张武装起义的，但和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不同，他主张在浙江、江

---

① 《朱希祖日记》，1908年3月20日，稿本。

② 《总同盟罢工》，见《工人宝鉴》。

③ 《天义》第8—10合卷。

④ 《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⑤ 《党人拒款之运动》，《神州日报》，1907年11月24日；参见《留学界拒款之运动》，《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苏、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发动。为此，他于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

双方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大体如上，它们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真正原因。关于此，日人竹内善朔说："到了明治40年(1907年)，张继、刘光汉①(当时都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换言之，不依靠外力而要自力更生的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也曾提到，这大概是明治40年孙逸仙从日本政府(？)某机关得到五千日元(当时我们听说是由犬养一派人从中斡旋的)后离开日本的原因。《民报》社的人们都指责这件事，说孙文被收买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孙文看来，对于当时留日青年中的这种思想变化情况，继续在日本呆下去也已无能为力了。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之间构成了发生内讧的原因。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话，这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别问题如出一辙。可以说，思想的成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而且其中又掺杂了感情活动。"② 竹内善朔是幸德派的金曜讲演会成员，同盟会分裂的目击者，他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的观点中除谬误的成分外，也有若干合理的成分，但是，极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把它们

---

① 刘光汉，即刘师培。

② 《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扭曲了。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这一阶级经常在“左”和右两极滚动。列宁指出道：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①]“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亲身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亲眼看见了或听到了日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罪恶，因此，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绝望。刘师培等认为，与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还不如保持封建主义。刘师培声称：“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代议之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②]章太炎也表示，如果没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财产相续、解散议员等四条作为保证，那末，“勿论君民立宪，皆不如专制之为愈”。[③]他说：“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④]，“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⑤]这就从“左”边滑到右边去了。

1907年冬，由于悲观失望，章大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他先是通过清朝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绋昌向张之洞谋求路费，未成，又连续给短期归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五封信，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⑥]他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到上海后，刘师培立即写信向端方自首。次年1月，张继因参加幸德派的第二十次金曜讲演会，被日本警察追捕，辗转逃往法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页。

②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8—10卷。

③ 《五无论》，《民报》第16号。

④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民报》第17号

⑤ 《与马良书》，《民报》第19号。

⑥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参见本书第175—189页。

国。① 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就失去了一员干将。其后。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继续高唱无政府主义，暗中则为清朝政府作侦探。4月，章太炎与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之间因事吵翻，章太炎从刘、何的住处搬回了《民报》社。6月，发表《排满平议》，明确表示和无政府主义决裂，宣称"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② 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此后，刘师培夫妇逐渐受到东京中国革命党人的冷落。在此期间，刘师培、陶成章之间也发生不和。这年11月，刘氏夫妇回到上海。为了制造混乱，挑拨关系，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的五封信影印寄给了黄兴等人。黄兴当时"一笑置之"，③ 但以后却从这五封信引发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本来就相当复杂，由于出现了刘师培一流内奸，它就更加复杂化了。

## 三、第二次倒孙风潮

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反映出革命派内部政治、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但是，除个别人与之稍有辩驳外，并没有形成一场是非明辨的论战。

从孙中山一面看，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认识不足。曾经有人提醒他：无政府主义"其性质与同盟会之民生主义迥殊"，但孙中山却回答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④

① 《金曜讲演的大迫害》，《熊本评论》，明治41年(1908)2月5日。
② 《民报》第21号。
③ 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辛亥革命》(二)，第447页。
④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

从“社会主义讲习会”一面看，由于张继出走，章太炎、陶成章和刘师培之间不睦，这个派别也已处于涣散状态，无法继续活动，更无力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同盟会进行新的攻击。除刘师培外，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也逐渐收了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

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自此，他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他不仅亲自为该报撰稿，过问编辑、财务、招股等事，而且多次表示，《中兴报》的文章议论“颇惬人心”，[1]“于大局甚为有关”[2]，维持《中兴报》乃“吾党在南洋之极急务”，[3]要求南洋各地同志积极支持。

在此同时，孙中山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并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4]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订立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以期互相联络，“协力相扶，同心共济”[5]。通讯办法规定：各团体间至少每两个月互相通讯一次，住址有移换时，须即时通知南洋支部，如有新团体成立，即由南洋支部发信通知。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形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

《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

① 《到暹罗前后致邓择如等函》，《国父全书》，台北版，第412页。
② 《赴欧洲前致邓择如等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50页。
③ 《致黄甲元嘱筹款维持〈中兴报〉函》，《国父全书》，第408页。
④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参见《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⑤ 《为规定南洋各处团体通信办法致邓择如函》，《总理全集·函札》，第46页。

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逐渐增多。1908年2月印行的第19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①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②窘迫得开不了伙。章太炎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③其后，章太炎曾写过五、六封信，打过三、四次电报，呼吁南洋方面接济，据说，"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④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资本家"，"必无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⑤陶成章没有听取这一意见，于1908年8月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⑥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⑦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函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⑧

"南洋经济恐慌"并非完全是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

① 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21号。
② 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③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41期。
④ 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⑤ 南洋归客：《驳诋毁孙中山者》，《民立报》，1912年11月6日。
⑥ 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见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
⑦ 《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比同志各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⑧ 《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20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云："党中财政日困，虽香港一隅，或得檀埠同志之接济，而他方则无法可设也。①"信中所言，应是事实。

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②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浙江同盟分会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又称：本会"以浙江为根基"，"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办事区域"。③这一章程突出地夸张了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并将"办事区域"扩大到浙江以外的东南各省，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洋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陶成章还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

① 《致檀香山同志请尽力筹款函》，《国父全书》，第411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
③ 《凭单》，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3节。

京总会及星洲分会”。① 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1月，陶成章去到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上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临行时募得千元。12月6日，到槟榔屿，该地办事人声称，按章程，必须孙中山之人来运动方可，仅邀集三四人，认捐三百元。1909年1月23日，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声言：“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因此，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② 至当年4月底，各地认捐总数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兑现。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设法播弄”，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致李燮和函中说：“弟自去岁南来，迄今已历九月，所希望之目的，全然未达。”又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③ 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④

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独自经营”，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这以后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离开坝罗后，陶成章活动于勿里洞、吧城、谏义里、文岛等地（均为今印度尼西亚属地），酝酿新的倒孙风潮。

还在1909年5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⑤ 8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

---

① 《凭单》，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

②③ 《致铁仙》，己酉三月九日，陶成章手札，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下同。

④ 《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⑤ 汪精卫：《致蓝瑞元、黄葵凤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三)，台北版，第591页。

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孙中山在“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及于南洋各埠矣”。《罪状》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并表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共提出要求九条，其主要者为：

1．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2．另订章程，发布南洋各机关，令其直接东京总会。嘱令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

3．公举办事二人，前往南洋各埠演说，收拾人心，揭破孙文诡谋，使其无立足之地。

4．再开《民报》机关。

5．兼于民报社内，附设旬报，凡《中兴报》之所至，亦踪寻之而往。

陶成章、李燮和等声称，只要开除了孙文，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无论将次者开办不至蒙害，即令既破败者，热心之人尚多，犹堪收效在桑榆也”。此外，《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丰汇银行贮款20万；其兄在九龙起造屋宇，用款不足，孙中山电汇款项助建云云。① 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诬陷。

---

① 《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

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二日

神州日报

来件

●孙文罪状

图十三 陶成章等为罢免孙中山职务上同盟会总会书（1912年重新发表者）
（采自北京图书馆）

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有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致胡国梁书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①]其后，便由陈威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陶成章等把孙中山视为敌人，不顾大局，不顾影响，恶意诬陷，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陶成章等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了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在林文等帮助下筹备恢复。因为对章太炎主持时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又因避免日本政府干涉，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

恢复《民报》本来是陶成章等在《孙文罪状》中提出来的"善后办法"，但是，他坚持不能替孙中山"虚张声势"，必须以革除其总理职务为先决条件。[②]自然，这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因此，他便支持章太炎出面反对。章太炎由于多年困苦维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说："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③]没有任何根据，一个想当然的"可知已"就定了孙中山

① 《致若愚》，1909年9月24日，陶成章手札。
②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
③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乾没”巨资的案！

对孙中山的公开诽谤为保皇派提供了炮弹。不久，南洋《总汇报》发表了《伪〈民报〉检举状》。其后，保皇派大规模地开展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各种秽词如水般泼来。他们辱骂孙中山为“马骗”、“棍骗”，诬蔑其“假借革命名目，以为衣食饭碗之计”，说是：“孙汶腔中，何尝有一滴爱国之血，眼中何尝有半点爱国之泪，心中何尝有分毫爱国之思，不过口头禅焉耳！”①

和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②

这样，就出现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敌人的辱骂、镇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营垒人的反诬和倒戈。长期以来，孙中山把实际领导起义的责任交给黄兴等人，而以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为己任。陶、章这两份材料的公布对孙中山工作所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破坏孙中山赴美募捐，陶成章等甚至冒名作信，将攻击材料寄发美州各华字日报，10月22日孙中山与王子匡函云：“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诋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③但他毫不灰心，一面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上撰写长文，“加以公道之评判”，④一面对张继严正指出：“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他并愤愤地说：“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⑤

经历种种挫折而革命之志不挠，这是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人

---

① 介民：《敬告捐助革命军饷者》，加拿大《日新报》，1911年4月26日。
② 转引自孙中山《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③ 《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比同志各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④ 《在欧将去美国时致伦敦吴敬恒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06页。
⑤ 《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物的突出优点，但是，因章太炎等少数人而迁怒及于同盟会，仍然是以感情代替了理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东京同盟会员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国内各地同盟会分会也无人领导，在这方面，孙中山不无责任。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在誓词中将同盟会会员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开始实现其酝蓄已久的打算。同年秋，抵达槟榔屿后，又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① 但由于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事实上难以执行，不久也就作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太炎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② 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函知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之成功。③

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④

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⑤，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实情公布，真相大白。⑥

多年来，同盟会在其内部分歧中，既无同志式的讨论，又无思想上的必要交锋。现在交锋了，这对于澄清真相，维护孙中山的

①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
②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
③ 《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黄克强先生全集》。
④ 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
⑤ 《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⑥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威望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交锋无助于填平双方感情上的巨大鸿沟。

在倒孙风潮的掀起者中间，刘师培的叛徒面目此时已经暴露。1908年冬，刘师培回上海后即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张恭，不久，又投入端方幕中。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调直隶，报上发表了随员名单，刘师培赫然在内。在此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思考，和刘师培一度关系极为密切的章太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对孙中山如此攻击不遗余力呢？在未经冷静分析的情况下，东京革命党人公布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五函，指责章太炎为端方侦探。11月30日，《中兴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等文。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太炎"破坏党事之心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五函的笔迹照片寄给他，"以证明太炎之所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①不久，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旧金山《美洲少年报》先后发表了这五封信，《中国日报》声称章太炎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新世纪》指责章太炎以"万金出卖一革命"。②

将章氏五函的问题一下子提到如此的高度，当然也严重伤害了章太炎的感情。刚愎自负而又极易冲动的章太炎对此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思想分歧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双方的关系则由彼此猜忌、怨憎发展为互相敌视和进行势不两立的攻击，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① 《致吴敬恒请于〈新世纪〉评论〈日华新报〉破坏党事谬论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10页。

②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

## 四、光复会的重建与倒退

陶成章到东京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山头。

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函，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① 必须"另行组织新机关"。② 他说："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晦气罢了！"③ 在此同时，又积极争取章太炎，以光复会成立在先来打动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④ 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任庶务员，沈家康任书记员。⑤ 不久，新加坡、文岛等地陆续建立分会。由于基本群众在南洋，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以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⑥

后期光复会收容了同盟会包括原华兴会内对孙中山不满的分子，以同盟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但是，比起同盟会，它在不少方面都倒退了。

章太炎是后期光复会中唯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他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成份进一步增加。3月10日，他和陶成章在东京一

① 《致若愚、铁仙》，陶成章手札。
② 《致若愚、柱中》，同上。
③ 《致亦逵、柱中》，同上。
④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⑤ 《致柱中、若愚、彝宗、福生、文庆、佐新》，陶成章手札。
⑥ 章太炎：《致临时大总统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8日。

起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缘起》中说：“恨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同人有忧之，爰设一报”，借以“明正道，辟邪词”。①中国是个封建古国，清王朝是个实行高度封建专制主义的王朝，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欧学”，即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化，仍然可以发挥其进步作用，但是，《教育今语杂志》却视为“邪词”，要“辟”。在此之前，续刊《民报》正在介绍卢梭的《民约论》，《教育今语杂志》的出版可以说唱的是对台戏。同年由章太炎编辑的《学林》也一样充满了国粹气。该刊《缘起》说：“世人多急〈利〉近功，以古学不足治，惟异化之务”，它号召“一二耆儒故老”们起来挽救即将“坠入粪壤”的“文武之道”。②这里所说的“异化”，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潮，所谓“文武之道”，指的是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精神枷锁的封建文化。在该刊第2期上，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秦政记》，歌颂“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的“天子”，说是“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同期发表的《非黄》则抨击“尚贤”、“任众”的民主政治，说是“诚听法，虽专任，与武断莫比；诚尚贤，虽任众，与武断奚分？”如果说，1908年章太炎发表《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时，还曾经特别提出了一个“恢廓民权”的方案，那么，这一时期，他已经更多地神往于“王者一人秉权于上”的法家封建专制主义了。

陶成章是后期光复会的组织者和实际领导人。这一时期，他的活动逐渐向改良主义方向靠近。

前文指出，当张继等迷信“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时，陶成章仍然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光复会重建后，他却抛弃了自己的主张。在《致石哥函》中，他说：“夫我辈之目的，在一举覆清，若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又说：

① 《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② 《学林》，第1期。

"如不用暗杀，则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①和人民群众缺乏充分的联系，实行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是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弱点，但是，这些起义毕竟打击了清朝统治，锻炼了革命者，教育了群众，不能称为"有害无益"，更不能称为"祸莫大焉"，至于所谓"必引外国人之干涉"云云，更是被革命派痛驳过的改良派谬论。

当时，国内各省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他们武装反清的总目标一致，只在策略上互有歧异："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②这本来并不难统一，对于上述各种力量，陶成章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他说："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求运动整顿，其将奈之何哉！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以给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本己之方针，且先乱矣。秦末之项羽，隋末之李密，甚失败皆因此也。"③在陶成章看来，多一些人革命反而会造成麻烦，唯此一家最好，因此，他给光复会规定了"必不汲汲扩张"的关门主义方针。④《浙案纪略》中，陶成章说："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这可以说是陶成章的夫子自道。

一不靠武装起义，二不靠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陶成章靠什么"一举覆清"呢？他靠的是暗杀活动。光复会重建后，他曾建议集款数千金或万金，专办此事，以振动华侨，扩大影响。⑤甚至，他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一个实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收罗一批美女，在北京开设妓院，诱惑满族亲贵，席间放毒，一网

① 陶成章手札。
②③④⑤ 《致石哥》，同上。

打尽。①

弱者和穷途窘促的人常常盼望奇迹，妓院方略的提出，说明了陶成章和同盟会分裂后，既软弱无力，又穷途窘促。

当然，生活中出现奇迹的可能并不大，这一点，陶成章完全明白。因此，他为后期光复会规定的方针是"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②据他说 如果能得到两三个有资本的学生的赞成，就于愿已足。光复会重建后，陶成章立即和章太炎编辑《教育今语杂志》，目的在此；随之，他在东京埋头编写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目的也在此。1911年初，他又曾计划到南洋找一个寺院住下，专力编撰教科书。《致柱哥》函云："盖弟近立定主意，不为虚耗金钱之事，更不为无益之举，而虚耗其精神，实事求是，以图渐进，不为躐等。"③

"虚耗金钱"、"无益之举"云云，指的都是武装起义，"渐进"云云，指的就是教育。"不为躐等"云云，完全是改良派的爬行哲学。和刘师培、章太炎一样，陶成章也经历了一个从"左"到右的转化。

反革命的暴力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是，历史证明了，使清朝皇帝滚下龙座的还是武昌新军手中的枪炮，而不是陶成章的"教育根本"论。

在经费问题上，后期光复会也逐渐效法改良派。

同盟会解决经费问题靠在华侨中募捐，这使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能联系群众。后期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主张靠经商，他说："历观万事，皆与财政相为因果，然财政之道，非自行筹划无由，此商业之所以不得不速为经营。"④为此，他和李燮和等积极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
②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③ 《致柱哥》，同上。
④ 陶成章函札残页，1910年。

筹办商业公司，计划经营教科书籍、图画、科学仪器、体操、音乐用具、学校用品、衣衫、牙粉、肥皂等；并计划把《教育今语杂志》改变为广告机关。① 这一套，都是流亡海外的改良派的做法。

由于分裂不得人心，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

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下来。本来，陶成章已经编印好了《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由于舆论，包括光复会内部的强烈反对，仅散发了九册，不得不宣布"余皆不寄了"。②

其次是陶成章视为"吾辈面目所存"的《教育今语杂志》停刊。陶成章原以为该刊发行后会"普及南方各地"，结果只售出了不到三百本，大部分搁置在代派所无人问津，③ 已销之款又迟迟收不到，因而"亏折甚巨"，④"真正困难万分"。⑤

再次是筹款门路均已断绝。据陶成章说：内地可筹之处，久已筹之一空；东京万无可筹；⑥ 南洋呢？所筹之款又不见寄来，气得他准备发表声明，将不再向南洋各地募捐。⑦

此外，商业活动也进行得极不顺利。陶成章《致柱中》函云："祈老哥善自珍重，勿以经商目的之不能遽遂，多生烦懑，致生理有碍也。"⑧

按照计划，陶成章还准备创办《光复报》与《光复杂志》，但都因找不到作文之人而告吹。据陶成章说：章太炎虽有几个弟

① 陶成章函札残页，1910年。
② 《致铁仙》，陶成章手札。
③ 《致福哥》，同上。
④ 《致彝宗、若愚、柱中、文庆》，同上。
⑤⑥ 《致铁仙、若愚》，同上。
⑦ 《致若愚、铁仙》，同上。
⑧ 《致柱中》，同上。

子，但多半是为了学成后往内地当教员，“非特不肯作文，且亦不能请其作文”，其中虽有一二稍有志者，但“皆欲独善其身”，不愿意介入。章太炎本人呢？“乃其不肯作文何”！章太炎反对创办《光复报》和《光复杂志》。[1]这一时期，陶、章之间可能也产生了某种矛盾。

革命需要团结，陶成章无忌惮的分裂行为使他陷入了四面楚歌中。在东京，他觉得“实在难以过日”；[2]回南洋吧，当地同盟会员反对分裂的呼声很高，“风潮方作，来反遭忌”。[3]一直踌躇到1911年4月，他才从东京回到南洋，已经是广州起义的前夜了。

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黄兴电邀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参加，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4]主动向光复会伸出了合作之手。李燮和等积极响应。1910年10月，李燮和受槟港同志委托，参加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随即回槟港传达，动员华侨捐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得一万七千余元，由李燮和、陈方度带给了黄兴。不久，胡国梁、柳聘农也带着募得的五千元赶到香港，向统筹部报到，一起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5]

与此同时，陶成章也应李燮和、王文庆电召，到达香港，表示出和同盟会合作的意向。这样，在经过了长期的分裂之后，同盟、光复矛盾重重的关系出现了转机。但不幸的是，这一转机很快就消失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极为悲愤。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赵声腹痛剧作，延医诊治，知为盲肠炎，经割治无效，于5月18日逝世。赵声先是光复会员，后加入同盟会，是在双方会员中都具有威望的革命者。对赵声之死，陶成章疑为胡汉民所毒，

① 《致福哥》，陶成章手札。
② 《致石哥》，同上。
③ 《致柱中、若愚》，同上。
④ 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2集。
⑤ 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

进一步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其后，陶成章回到上海，在嵩山路沈宅开会时与陈其美发生冲突，陈掏枪欲打陶成章。数日后，陶匆匆离开上海，再返南洋。于是，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矛盾，同盟、光复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它埋下了辛亥革命后两会继续摩擦、龃龉、对立的种子。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分歧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在欧美和日本，摆在日程上的已经是从资产阶级统治下面解放出来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满、怀疑以至绝望的情绪。同时，中国又是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抬头的情况下，同盟会中有人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中国同盟会的分裂发生于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之后，张继、刘师培诸人的行为不少是对后者的模仿。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问题上向同盟会提出了挑战。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和其由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特殊软弱性，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已经被证明了不是很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回答"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挑战上，当然更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自身同样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书面上，口头上，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发出极端革命的大言壮语，沉溺于"无政府革命"的狂热幻想，然而，却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中有些人很快向右转，倒向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或颓唐，或倒退，或动摇，或叛变投降。

同盟会的分裂渊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需要以大局为重的广阔胸襟和高度的组织观念，而这，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推翻这两个敌人，不仅需要强大的阶级力量，也需要号令一致、步伐一致的战斗。当领导这一革命的司令部——同盟会处于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态时，历史就已经决定了这次革命必然是一次巨大的小产。

（原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略有修订）

#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龙华会章程》①因为主张土地公有，很受史家注目。《章程》说："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不少论著都乐于引证和评论这段文字，但是，《章程》本身需要加以考订的若干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并从而得到正确解决。

认真读过《龙华会章程》的人，都会发觉其中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它的标题上大书着"龙华会"字样，而《会规十条》中的《命名》条却说："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龙华会是浙江哥老会的一个支派，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有它的始末；关于革命协会，该书也有记载，云："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鎔铸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协会"②。如果《章程》属革命协会，应为1908年事，但《檄文》之末却明白写着"甲辰正月朔日"，即1904年2月16日，恰当龙华会兴盛之时。那末，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到底是1908年革命协会的章程呢，还是1904年龙华会的章程？

最能说明现今之章程主属问题的证据，首先在《章程》自身。

第一，《章程》正文说明了会名叫"革命协会"。它说："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

---

① 《龙华会章程》共7个部分，即《檄文》、《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仪式》、《祭文》、《入会规矩之次序》和《附录》，全文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译本初版于1912年5月。1954年《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辑》增订本和195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注明)，都在《龙华会章程》的总题下，选收了《檄文》和《会规十条》两部分。

② 《浙案纪略》，全文见《辛亥革命》(三)。

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它还有"我们这个革命协会"、"我们这个协会"等语。特别是《檄文》部分，开宗明义就问："怎样叫做革命?"接着答："革命就是造反"，并详加诠释、发挥。它为何首先在"革命"一词上大做文章呢?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该团体系以"革命"二字命名的缘故。

第二，《章程》约束的对象是一批而不是某个会党团体。《会规十条》说："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入会规矩之次序》说："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各照各会各教各党的老规矩。"可见，它约束的对象包括着洪家(红帮)、潘家(青帮)这哥老会的两大派，包括着各教各会各党。这种情况，龙华会是无法办到的。

第三，《章程》变更了会党旧有的章制。《章程》虽称它的官职、制度与各会党是一样的，实际却有增损，名称都有所变更。这些变更当然是为着将各会党统一在协会内。其中最突出的变更是入会式。哥老会崇敬五祖、桃园结义、梁山泊和瓦岗寨，它的开山式与入会式是"场中正面坛上，设五祖、关圣等神"。龙华会是终南会的一支，终南会票布的中央即标明"关圣帝君之位"。《章程》则规定："凡进我们这个协会的规矩，最好是在岳庙里"，无论在何处，均须"设立公案，写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的神位一个"，配以杨再兴、牛皋、施全。以对岳飞的崇拜代替对关羽的崇拜，明显不同于包括龙华会在内的任何一个会党团体。

第四，《章程》规定的活动范围与《浙案纪略》所载革命协会活动范围相同。《附录》说，拟将各股力量分为五省十路，这五省恰好是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

以上四点表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正是"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鎔铸而一之"的"新章"，亦即革命协会的章程。

确认《章程》属革命协会，除它自身外，其他方面也并不乏明证。1910年，日本侦探山口升奉派来中国调查革命党、保皇党和会党等各方面情况，回国后写过一份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

社》①的报告书，其第三卷《中清地方》的第三章即为《江南的革命协会》。该章内分五节：《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式》、《新中国军政署职官表》、《五省十路》。《章程》被删节、合并或分割，纳入相应的节内。这一材料说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在当时确实是被称作革命协会章程的。

用山口报告书作证明也有其弱点，它没有著录《檄文》。好在《檄文》与《章程》其它部分的联系是紧密的。它开篇就阐发了会名的涵义，篇末还署明发布者为"新中国军政省"，即出自革命协会的中枢机关。仅此两点，就表明《檄文》不能与其它部分分割开来。山口引用《章程》是为充实情报，不是为保存文献，他不引《檄文》，并不能动摇《檄文》在全篇中的地位。

不过，《章程》的主属问题至此并未最终解决。会名"龙华"，发布于"甲辰"，都是《章程》自己标明的，多数论者对此深信不疑。既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为何又标上"龙华会"和"甲辰"年呢？个别企图解决《章程》主属问题的论者也在此踯躅不前②。因此，要彻底解决《章程》的主属问题，就不能绕过文件自身设置的难关。

其实，《章程》到底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每一种历史文件都必然留有它产生的那个时间的痕迹。《龙华会章程》也不会例外。关于这点，可以考察《檄文》的内容。

《檄文》说：

> 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列位要晓得"立

---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北京图书馆藏。

② 此前，魏建猷同志《龙华会和〈龙华会章程〉》一文曾指出关于《章程》主属问题的矛盾。他认为它"可能是革命协会的章程"，但又说其拟定"不迟于1903年"（《文汇报》，1961年10月5日）。赵金钰同志则根据山口报告书断言《章程》自《会规十条》以下为1908年革命协会章程，而《檄文》仍是1904年龙华会文件，它们是时间不同的"两个不同组织的两个不相关联的文件"（《关于〈龙华会章程〉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图十四 江南革命协会的入会祭文及誓词(1908年)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宪”二字怎么样解法。外面看看象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

这段谈立宪的话，既揭露了搞立宪骗局的清朝政府，也谴责了企望清廷的立宪派和某些外国人。立宪主张在国内抬头，始于

1904年日俄战争时。“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说曰：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及至日胜俄败，“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①。这年，有孙宝琦、张之洞、魏光焘、岑春煊奏请清廷立宪。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载泽等回国后即奏请宣布立宪。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所谓“仿行”，意即照外国样子办。《檄文》既涉及清廷的假立宪，它怎么可能写成于动议立宪之前的“甲辰正月朔日”呢？在预备立宪的名义下，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中央官制，更定了几个部的名称，并增设资政院及审计院，集权于满洲亲贵。次年，开始改变地方官制，7月，颁布外官制，收回了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一切，不正是《檄文》所谴责的“外面看看象是照外国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中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吗？因此，它的写作时间，只能在清朝政府开始实行内外官制改革之后。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等语，也是有事实可稽的。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拥护立宪，梁启超、蒋智由等邀犬养毅等八名日本人参加。犬养在会上说：“诸君如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而研究之，结果不认革命为必要，如立宪党之主张也，则不革命亦可。”②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平刚等冲击会场，打跑了梁启超，张继登台演说。这个犬养，起初表示同情革命派，现又食言自肥，因而，激起革命党人不满，张继曾严词诘问。事后，章太炎又作《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③记其事，并发长论批驳犬养。《檄文》所云，应是隐指其事。

《檄文》又说：

① 《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② 《立宪党与革命党》，《政论》第3号，1907年12月。
③ 《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虽然成功之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亦未可知。

这段话一般地反对立宪，无论其为君主为共和，而主张“定为无政府”，显系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它所说的共和立宪，亦即民主共和，这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政治主张。处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看到欧美各国“贫富不均”，“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但他认为在中国可以采用“平均地权”的办法加以预防；对共和立宪，则始终坚信。共和立宪作为救国之道，在同盟会成立前后，除受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攻击外，革命派内部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到了1907年，这个主张才开始在内部受到一些人的起劲反对，这些人拥护或倾向无政府主义，自成一个小派别。他们说：“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① 又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② 张继在锦辉馆持以批驳犬养毅的，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③。《檄文》所宣传的，也正是这个派别的观点。同盟会内这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是以1907年6月刘师培、何震发刊《天义》报和张继、刘师培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为标志的。《檄文》的草拟，当然也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檄文还说：

单只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份驻扎旗兵，

① 《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3期，1907年7月10日。
② 章太炎：《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8日。
③ 景定成：《罪案》。

监守着我们。还要我们辛苦地种出田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

这里提到的"狗屁上谕"何所指？稽之文献，甲辰正月之前没有内容相似的上谕，而在1907年秋，倒有一通《旗丁改筹生计谕》，中云：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庄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扩，世世执业，严禁典售。……旗丁归农之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①。

细究两者，该谕提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派旗兵"各地驻防"，"绥靖疆域"，《檄文》就指责清朝"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该谕要求各地方官为驻防旗丁授田购买土地，《檄文》就指责其"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各省田地"。该谕有"时价分购"，旗丁归农后"一切与齐民无异"，"化除畛域，共作国民"，"一视同仁"的说法，《檄文》就指责其"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两相比较，可见《檄文》所抨击的"狗屁上谕"，正是这通《旗丁改筹生计谕》。革命党人对这通上谕是很注意的，曾经在《民报》上揭露其反动实质②。

以上三处所涉及的时事，均集中于1907年的夏秋，这说明

① 《德宗实录》第五七八卷。

② 《预备立宪之满洲》，《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

了《檄文》不可能产生于1904年初，《章程》自署的“甲辰正月朔日”，纯系倒填。《旗丁改筹生计谕》颁布于1907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檄文》称之为“近来”之事，可见《檄文》应写于此后不久的1907年冬或1908年春。陶成章说，革命协会“新章”的制定在1908年春夏间，《檄文》自身显示的写作时间是与之相符的。这一点，也是《章程》即革命协会章程的有力证明。

至此，可以进而讨论《章程》标明的会名问题了。“龙华会”亦名“龙华山”，会主沈英(荣卿)、副会主张恭、周华昌，原是终南会骨干。后来终南会首领或死或走，他们便另立了龙华会，时间约在1902年。1904年夏秋间，在浙江联络会党的魏兰结识沈英、张恭，继又引陶成章前往，以发动龙华会响应夏历十月初十日的华兴会长沙起义。此后，龙华会成了光复会联系的一支重要的会党力量。秋瑾组织光复军，“恃以为大本营者，即此会也”。但是，龙华会在光复军失败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后再没有恢复过活动。龙华会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关系虽很密切，但从前文举出的例证看，现今的《章程》并不是它的章程，而是多个会党联合的章程。那末，这样一个章程为什么又标上龙华会的名称呢？不妨看两段材料。

山口报告书说：

> 于是，陶成章、沈英、张恭等首倡者即联合归国留日学生等，纠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在杭州召开大会，统一各会党结为一团，建立一个名为龙华山汉族同登普渡堂革命协会的组织。

《中国秘密社会史》说：

> 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

比较之下，两条材料，译笔虽异，内容文字却基本相同，这至

少可以估计它们是出自同一个原始资料。惟一较大差别，仅在于会名。但通过这一对比，就可以明确问题所在了。第一，平山所说的“龙华会”，虽有浙江龙华会首沈英、张恭介入，按其内容，却正是山口说的革命协会，而非浙江龙华会。《龙华会章程》系这段文字的附录，它理应是革命协会章程，当无疑义。第二，关于会名，山口报告书显然是照所据原始资料移录的，记载的是全名，而《中国秘密社会史》却由于作者方面的原因，不顾会党名称有会名、山名、堂名的区别，给变成了“龙华会”。误植的会名和倒填的时间，不经考察，被轻易地联系在一起，便酿成一件疑案。

附带还可以指出，山口、平山都没有说明革命协会倡议的时间，其原因可能在于无法解决《章程》自署时间和协会实际倡议时间的冲突，只好回避了事。山口不著录《檄文》，很可能也出于此因。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下一个结论：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实即 1908 年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章程。章程自署年月是有意倒填的。

（《〈龙华会章程〉探微》中的第一部分．
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 9 期）

#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 一

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公案，即章太炎与清朝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问题。

1909年冬到1910年初，在陶成章、李燮和、章太炎等发动对孙中山的攻击之后，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等报刊先后公布过章太炎给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五封信。据此，《新世纪》断言章太炎已经被端方收买："此即太炎先生得金之清单。玩'摊年过久'一语，指十年八年而言，又玩'岁不过千余元'一语，即可推其总数，大约万金。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①《中国日报》则进一步宣称："据最近布告，言章与直督（端方后由两江调直隶——笔者）幕员刘光汉和好如初，且受端方委托，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到清朝灭亡后的1912年，章太炎倒向袁世凯方面，同盟会会员主持的上海《民权报》便重新发表了这五封信中的四封，认为是"以万金出卖革命党之一篇大罪案"。② 该报说："本报攻击章者，在昔日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黄，排斥同盟会。"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搞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章太炎、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以至辛亥革命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

① 《党人》，《新世纪》第117号。

② 《章炳麟之丑史》，《民权报》，1912年5月4日。

③ 《正告神州报》，《民权报》，1912年5月7日。

为了便于考察并方便读者，现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及何震所加注解节录如下：

致何震函一（以下简称函一，余类推）云："近想安抵沪上"，"所托诸事，务望尽力"。末署："兄麟顿首"。

何震注解说："此信无甚关系，惟观'所托诸事，务望尽力'二言，则凡运动张之洞诸事，皆包括其中矣。"

致何震函二云："闻妹将赴金陵，想近日已在途也。……刘、卞二处消息如何？幸告。"末署："兄麟顿首，阳十一月二十五日。"

何震注解说："刘、卞二处。刘即□□□之姊，系章下狱后，刘允月贴二十金，至今未交者也。卞即前长崎领事卞绰昌，张之洞之女婿。彼于去岁八月致函张之洞，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若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书为申叔所见，始知彼与官场有往来。及我返国，彼知吾兄何誉生与前长崎领事卞绰昌亲善，彼为张婿，故嘱我往长崎访之，使再致书于之洞。"

革命黨の早替り

图十五 日本《万朝报》所登章太炎"背叛革命"的消息（1908年4月14日）（采自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函三云："四、六君鉴：二十九日接得手示，知四弟在船甚苦。……四弟既不往宁，在沪交涉亦善。前书言恐有枝节，愚意可密致杨仁山书，令其转圜。"末署"毛一顿首。十二月三十日。"

何震注："四君、四弟，

均刘申叔也。六君即何震也。毛一，章自称也。……杨仁山者，池州杨文会也，以通佛学闻，南京官场多敬之，故彼欲嘱何致书于彼，请其向江督为彼乞恩。”

函四云：“黄、叶亦无他语，惟已明知四弟到沪，在外喧传，黄更知兄欲出家。前数日有周尊者，自上海来信云：‘闻黄抱香语，公欲出家。’则此事已稍漏泄矣。运动之事，想二子无不周知。”

何震注：“黄者，湖北人黄抱香也；叶为黄友，浙江人，忘其名。黄见章不做《民报》，将疑彼无心革命，在东京对人宣言，故彼畏之甚，疑其尽知彼事。又叶为邻人，知申叔返沪，故信中言‘运动之事，想二子无不周知’也。”

函五云：“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赖，亦无如何，以留学官费证之可见。要之不以意气相期，尽力磋磨，亦无益也。弟若转圜，当要以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如或未能，当面回复。此则当令六弟任之。”末署“兄毛一白。阳三十日。”

何震注：“此信最有关系。何接彼第四信，复致书于彼，故为疑问之词，谓‘将付领巨款欤，抑至印后按月支款欤？请示明，以便开交涉。’彼乃以此函相答，反对按月支款之说。章甫者，端方也。”

要考察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首先要考察这五封信的真伪。

## 二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五封信是假的。笔者认为，何震的注解虽未可全信，但这些信却是真的。

不妨先就这五封信的本身作一番考察。

五函署有月日，未标年份，它们是哪一年写作的呢？何震注云：“黄见章不做《民报》”，《新世纪》也说：“彼时乃忽辞《民报》编辑之任，即在作此五书之时”。按，章太炎确曾一度辞去过《民报》编辑人的职务，《民报》第18期《启事》云：“本社总编辑人章君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今仍请张君继续接续主持。”该期印刷于1907年12月24日，显然，五信即作于这一日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

信的年份明确了，对它的考察就方便了。

首先，应该检查一下受信人的行止与信的时间、内容有无冲突。

刘师培夫妇是1907年2月去日本的，当年12月前后，他们是否离开过日本呢？这年12月4日，苏曼殊在上海致刘三书云：“顷须俟剑妹（何震号志剑——笔者）来，方能定日东行。剑妹十五日回乡，云一周可返，今逾半月未来，殊悒悒。”① 可见当时何震不仅已从日本回到上海，而且又从上海回了“乡”。同信又云：“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沪渎”。可见刘师培当时还在日本。不过，刘师培不是到次年才返沪的，据柳亚子回忆，1907年冬天，他就曾在沪与刘氏夫妇及其他友人聚饮，并留有当时作的诗和摄的相片。② 到1908年2月26日，苏曼殊在日本致刘三书云：“申叔伉俪西来。”③可见刘继何之后，于1907年冬也回国了，到次年2月，又一起再到日本。上述五函中，前二函单独写给何震，后三函写给刘、何二人，其所署月、日，均与何震、刘师培当时的行程、活动状况相吻合。

其次，应该考察一下五信的基本事实。

何震在注中说，“赠以巨金”，章太炎就到印度为僧。函四中，章太炎也有“黄更知兄（章氏自称——笔者）欲出家”之语。

---

① 《苏曼殊全集》第1集，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199页。
② 《南社纪略》，开华书局1940年版，第8页。
③ 《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202页。

这一时期，章太炎是否有过类似的念头呢？

1907年6月28日苏曼殊致刘三书云："衲今后决意与太炎先生同谒梵土，但行期尚不能定。"①

同年11月28日苏曼殊致刘三书又云："前太炎有信来，命曼随行，南入印度，现路费未足，未能预定行期。"②

同年章太炎赠苏曼殊照片题词云："当于戊申（1908年）孟夏，披剃入山。"③

1916年章太炎《致许寿裳书》回忆云："梵土旧多同志，自在江户，已有西游之约。"④

章氏弟子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云："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⑤

综上可见，章太炎在1907年确曾计划去印度做和尚，并为缺乏路费所苦。

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后，逐渐和孙中山发生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刻分歧。1907年上半年，这种分歧通过孙中山离日时接受日本政府赠款和钦、廉起义购买日械等问题尖锐地爆发了出来，黄侃所谓"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应指此。想去印度做和尚，也应在这个时候。这一时期，章太炎自称"震旦优婆塞"，⑥以示其归依佛门之意，也是一个旁证。

章太炎是否曾通过刘师培夫妇从端方那里取得去印度当和尚的费用呢？

在刘师培秘密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有关于章太炎的一段话，

---

① 《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335页。

② 《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197页。

③ 《越风》第18期。文中云，该相片是其"三十九岁所造影象"。章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十九岁生日应在一九〇七年一月中旬，故应作于是年。

④ 《制言》第25期。当时章太炎再次准备去印度学佛，"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

⑤ 《制言》第41期。

⑥ 《梵文典序》，《天义报》第6卷。优婆塞，梵语。《涅槃经》："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原文如下：

>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彼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惟此事宣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爱之者害之也。《论语》有言："君子成人之美"。尚祈明公之力践此言也。①

该信向端方表示"大恨往日革命之非"，并献"弭乱之策"，实际上是一封叛徒的自首书。通过这封信，刘师培和端方勾搭成功，成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内奸。

这封自首书与章氏五函有其相通之处：

第一，此信提及章氏"近且辞《民报》编辑"，可知写于1907年12月或稍后，正是刘师培从日本回到上海之际。章氏函三写于是年12月30日，中云："四弟（刘师培）既不往宁，在沪交涉亦善。"时、地、人、事均合。

第二，章氏五函系托刘氏夫妇向端方谋求在印度为僧款项，此信向端方明白地将此问题提出了。特殊之处，仅在于刘的"交涉"是以替端方画策并为章太炎乞怜的方式提出的。这样提出问题，很符合其叛变身份。他既替端方物色到一个理想的策反对象，也等于自己献上一份可观的觐礼，还替老朋友办了事。

第三，章在函四中警告刘、何："此事已稍漏泄矣"！此信也警告端方："此事宣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爱

① 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建国月刊》第12卷第4期。

之者害之也。”秘密进行以保全章太炎的态度是一致的。

第四，争执的付款方式是同一个。此信向端方提出的“按月支给”，正是章太炎在函五中极力予以反对的付款办法。据何震注，何接第四函后，先写信问章“将付领巨款欤，抑至印后按月支款欤？请示明，以便开交涉。”于是函五才反对按月支款，要求刘去“转圜”，争取先付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

此信与章氏五函为什么有这些重要相通之处呢？合理的解答应该是，它们是同一桩事在不同场合留下的文件。不然，就不容易解释此信中的这种情况：刘师培向端方比较真实地介绍了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却抹杀章当时的革命活动，所谓想“消弭种族革命”，文章“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讲演“亦系党人迫彼所为”等等，均非事实。这种曲笔，无非是要让端方相信对章太炎可以“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痛快地拿出钱来。如果刘师培心中无底，一旦端方给了钱，章拒不接受，甚至予以揭露，那末，内奸的面目不就要暴露了吗？显然，他敢于预支章“决不至有负明公”的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受章太炎的委托来“交涉”的。这封自首书的存在，证明了章太炎确曾通过刘师培向端方处活动，同时也证明了章氏五函是真的。

这封自首书是1934年偶然发现的，据有关线索判断，它是从端方家中流散出来的。事后不久公布的章氏五函容易招人怀疑，这封自首书的真实性却不好轻易否定。刘师培虽然号称“才子”，他也不可能在编造假信之前，就预先递一份与之呼应的信给端方，并使之留传下来，以便在后人讨论此段公案时继续作伪。

其他方面的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章氏确曾向端方谋款。

1909年10月，当东京的革命党人因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来往而指责其为“侦探”时，据陶成章说，章太炎“已有《辨书》一纸，将以付印”，这份《辨书》到底付印了没有，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其内容从陶成章稍后的《致柱中、若愚手札》却不难窥

知。陶成章说："太炎作和尚之意实有，至侦探，断断无之。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昭昭在人耳目，诬妄太炎先生无益也。"柱中就是李燮和，在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中和章太炎、陶成章是站在一起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连自己人都发生怀疑，说明对方提出的证据相当有份量，以致陶成章不得不出面保证："至侦探，断断无之"，而于"作和尚之意"，不能不承认"实有"；至于与之密切相联的通过刘师培夫妇向端方谋款一事呢？则未置一词，不加否定，实际上采取了承认的态度。陶成章当时在东京与章太炎朝夕相处，立场完全一致，他对李燮和的上述说明当然也反映了章太炎的态度。它表明，如果章太炎确有一份《辩书》的话，所"辩"者也只是并非"侦探"，而没有否定通过刘师培夫妇向端方谋款这一事实。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前文谈到，1912年上海《民权报》大骂章太炎时，曾重新发表章太炎致刘氏夫妇五函中的四函。事隔一日，5月5日，上海《民声日报》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说明情况称：

>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民报》，盛致讥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解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慧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氏归国而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

该文认为，《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罪在不赦者也"。该文明显地替章太炎辨护，但承认"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则诚有之"。《民声日报》是一家拥护袁世凯、吹捧章太炎的报馆。它的主笔黄侃1908年以后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处处以维护乃师尊严为己任。上海《天铎

报》发表过对章"不敬"的文字，黄侃便把该报主笔之一的柳亚子找去，"铁青面孔"责问，要柳脱离该报。[1]试想，如果章太炎根本没有通过刘师培和端方发生过关系，黄侃怎么能让本报"记者"作出这种答辩来呢？这个"记者"不是别人，应该就是极端熟悉章太炎东京生活的黄侃自己。

上海《神州日报》也是一家拥袁捧章的报馆。它的主笔之一汪允中和章太炎同为俞樾门生。对于《民权报》刊载的章氏函件，它同样不敢否认，5月6日该报社论说："其事之有无，姑不置辩。"又说什么"小德出入，尽人难免"，意思是这只是"小德"！5月8日，该报又发表文章说："夫章原书中有一字涉及党人事实否？如以设法取人金钱即指为卖党之证，盖党人流离奔走时，其设法自济者多矣，某报可谓其人皆卖党乎？"这篇文章进而承认了事实，但"小德"问题也没有了，而是"设法自济"。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致刘师培、何震五函是章太炎的亲笔。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说："刘申叔夫妇以居东备受党人冷淡，亦相偕遄还国门，投效于满吏端方。申叔抵沪时，且遗书黄廑午、林广尘、汤公介等，诋章枚叔曾致函端午桥，由刘妻何震转交，要挟巨款二万，即舍革命而不言，往印度为僧以终其身云云。内并附章氏关于此事之手书真迹照片，廑午等一笑置之。"[2]此文是根据汤增璧的回忆写成的，汤增璧即汤公介，他是民报社职员，章太炎的友人。这段回忆虽有其失真之处，但关于章氏手书照片的说法应是可信的。刘师培散发的这份真迹照片，正是日后《中国日报》等报刊揭露章太炎的依据。1909年12月，因为美洲华侨受了陶、章攻击孙中山的影响，对孙中山的感情"大不善"，为了廓清影响，顺利开展在美的筹饷活动，孙中山曾写信给吴稚晖，要他将"刘光汉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

---

[1] 《南社纪略》，第47页。

[2]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447页。

照片寄与弟用，以证明太炎之所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①]随后，这份真迹照片就影印刊登在美国《美洲少年报》上。

1912年，当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听说袁世凯要委任章太炎任“国史院长”时，曾发表通电说：

> 章炳麟前乞充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惑万世，誓不承认。[②]

可见，这份“笔迹照片”辛亥革命后还保存着。

章太炎不是谦谦君子，他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可是对于这件事，除了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份《辩书》外，他没有作过任何公开解释。这种异样的沉默只能说明其中有难以否认的事实。

基于以上种种理由，笔者肯定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是真的。

## 三

那么，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上述五函真伪问题的考证中实际上已可窥见其大概：章太炎确曾通过刘师培、何震夫妇跟端方联系，联系的中心问题是要端方给章太炎以去印度做和尚的经费，而章将从此脱离革命。刘师培在叛降端方时，向端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章、端之间联络交涉。章氏致刘氏夫妇的信，就是这种活动的记录。

在脱离革命去印度为僧的背后是否还有更隐秘的政治交易？作这种指责的人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笔者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从章太炎的思想和性格看，他也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但是，

① 《总理全集》第3册，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7月版，《函札》，第111页。
② 《民权报》，1912年5月11日。

没有这点，并不能否定章太炎向端方运动经费是一个难辞其咎的错误。端方是镇压革命最力的满州贵族之一，革命派恨之入骨。章太炎在和孙中山闹翻之后，去和这样一个人物发生关系，无怪乎事实公开后舆论大哗了。

这里，必须进一步考察的是章、端之间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1912年9月8日，北京《民主报》刊出该社职员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与章太炎很熟的革命党人，① 文中说：章"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运动，每月得其乾修二百两。"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前文提到，端方"资助"章太炎赴印度为僧的钱应怎样付给，刘师培提出的方案是"按月支给"，而章太炎不同意，认为按月支给不可靠，钱也太少，必须先在总数中"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这条材料所说的每月二百两银子，显然是一种折衷方案，它既维持了"按月支给"的付款原则，又将实数提高到章氏所不愿意的"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的一倍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章太炎曾否接收了这分"乾修"，按作者文意，章太炎是接收了的。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解决去印度的路费问题，章太炎并非谋衣谋食者流，显然不会接受。作者所述，当系出于传闻。

此后，这种关系有无进展？因为得不到直接材料，只能从别的方面考查。章、端之间以刘师培作中间人，章、刘关系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1908年2月，即章太炎写了第五函的次月，刘师培、何震即回到东京。刘师培返日后，一面继续以"革命"的高姿态大唱无政府主义"高调"，一面暗中做侦探，向端方密报革命党人动态。这时，章太炎与刘、何关系很好，与两人同住于麴田区饭田町，同在名为研究"社会主义"，而实为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作演说。但是，不过两个月，章就与两人

① 此人在东京曾亲见章太炎以脸盆"遥击"黄兴，又曾遇黄侃于途，"道太炎近事，为之咨嗟，太息不置"。

大吵特吵起来，只好搬回民报社，自此，刘、何与章反目成仇，何震表弟汪公权甚至宣布要和章太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们之间为什么突然决裂呢？双方事后都没说明其真实原因和细节，我们不能妄测这次冲突与章、端关系有关，但可以肯定，处于这种境况，由于失去中间人，章、端关系也就无法继续和发展下去了。

不过，事态并不到此为止。1908年4月27日，广州《国民报》刊出一则题为《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中云：

> （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
> （章炳麟中板唱）……因此上，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谷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这篇戏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它反映出章氏出家消息传播之广，及革命党人对此的态度。戏文批评章“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态度是善意的，诚恳的。对此，章太炎没有反应。紧接着，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又刊出了一则《炳麟启事》：

> 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章炳麟白。

这里，除了去印度一节外，脱离革命和出家似乎都将实行了。但是，章太炎却在6月9日出版的《民报》第21期刊登《特别广告》,予以否认：

> 仆于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赴云南独立大会，仆归后即不见

> 印章一方，篆书：章炳麟印。知是侦探乘间窃去，以后得仆书者，当审视笔迹，方可作准。
>
> 再，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伪造仆与锡良之电报，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报》登《炳麟启事》一则。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宁武县人。其冒名告白，尚待调查，合并声明。

这则《广告》戳穿了前述《启事》是伪造的。它的伪造者是谁呢？《广告》中提到了“散布匿名揭帖”的是“山西宁武县人”。当时，在东京的“山西宁武县人”中，确有人信奉无政府主义，与章太炎不睦，并与刘师培关系密切。章太炎声明已经“查得”，但没有点名。至于“冒名告白”的作者，章氏只表示“尚待调查”，没有公布结果。实际上，也只有刘师培一伙才会干这种勾当。

这是因为：章太炎找刘、何替他跟端方拉关系，使刘师培、端方都觉得有油水可捞，因而刘替章打了保票，狡猾的端方虽不肯将巨款轻易付人，也还是出了高价，可是，章太炎居然食言——虽然在那里醉心佛学，梦想“扶掖圣教”，请了一个名叫密尸逻的印度人在那里教梵文，[①]但是，并没有去印度，而且，仍然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倡导“排满”。这样，刘师培当然无法向他的主子交代了。情急无奈，只有不择手段，伪造一个启事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来，好让端方看到，说明他刘师培已经完成了任务。

总之，在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关系破裂以后，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也就无法存在了。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在封禁《民报》的同时，也封禁了刘师培的《天义报》和《衡报》。11月，刘师培回国，继续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上海招摇撞骗。此后不久，他即将章氏五函由何震加注说明后寄给黄兴等人。这一事实，说明端、刘的策反计划已经彻底破产，只能利用这五封信搞臭章太炎，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猜疑和矛盾。

---

① 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

章、端关系曾达到何种程度，如何结局，至此已比较瞭然了。前引《民声日报》的文章说："端方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这应该是可信的。

末了，附带谈一谈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情况的形成当然与章太炎此举本身的严重性分不开，同时，也和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加剧有关。

在刘师培回国后不久，民报社发生纵火案。紧接着，又发生毒茶案。纵火、放毒的主犯都是刘师培的同伙汪公权。1908年12月，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划起义，刘师培将这一情况密报端方，党人张恭被捕，刘师培一伙的叛徒身份因而逐渐暴露。此后，刘即投入端方幕中任"文案"。1909年8月，端方调赴直隶，上海报纸发表了随员名单，其中就有刘师培。这样，刘师培的叛徒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在此之后一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联络少数人，发布了一份所谓《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诬陷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藉革命肥家，陶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同年10月，《民报》秘密在日本筹备复刊，章太炎又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陶、章二人肆意破坏团结，声势咄咄逼人，迫使孙中山、黄兴等不得不回击，以挽回影响。尽管陶成章是组织和发动这场攻击的祸首，章太炎却因旧日声名及其同孙中山的长期矛盾而风头最健。于是，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被正式提出来了。

双方的激烈情绪是可以想见的。在抨击章太炎时，象吴稚晖那样断言章已经出卖革命，显然夹有个人恩怨；他人断言章背离革命，沦为侦探，不是意气用事，便是由于情况不明。章太炎和刘师培有过那样一段极为密切的关系，又有这样五封信，当时，人们无法弄清全部情况，把章、端关系估计得更复杂些并不奇怪。在我们考察这桩历史公案时，对于双方过头的话，都应根据可靠史实予以订正。

关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须要

提出的是，同盟会内部日常事务和人事上的冲突是由于在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而引起的。但是在斗争开展之时，这种分歧并没有被提出来展开应有的思想斗争，反而被个人的攻击所掩盖。这种现象也是当时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们在观察同盟会内部的斗争时，不应被一些热闹事件所迷惑，忽略了背后的主要分歧，也不能认为这些事件都不值一提，把它与背后的分歧看成截然两回事。这样，都无法掌握同盟会内部斗争的全貌。

（原载《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略有增补修订）

[附记]本文发表后，有人赞成，有人怀疑。1979年，曾业英同志发现了章太炎复浙江统一党支部的一封信，为本文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其争遂息。今录章函如下：

浙江统一党支部鉴：电悉。同盟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驰，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成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以[心]所不可。《天铎》、《民权》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辩哉！肃此敬复。章炳麟白。

（《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

#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

1909年10月，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筹备续刊《民报》，以汪精卫为总编辑人，将原《民报》社长章太炎排除在外，章太炎愤而作《伪〈民报〉检举状》，对孙中山等进行攻击，引起《中国日报》、《公益报》、《中兴报》、《星洲晨报》、《新世纪》等报刊的反击，从而形成为同盟会分裂过程中的一大事件。对此，笔者已作过分析[①]，本文拟在旧作的基础上，依据新近发现的资料，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探讨。

## 一、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加深和争夺《民报》的斗争

《民报》是在和改良派论战、宣传革命思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刊物。按其编辑方针和内容，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撰稿者主要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期撰稿者主要为章太炎、刘师培、汤增璧等。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第24号发行，《民报》出版中断。在东京中国革命党人讨论续刊时，章太炎由于为支撑《民报》而吃尽苦头，又由于和黄兴、宋教仁之间发生分歧等多方面的原因，愤而当众宣布，辞去社长职务，并声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②]。此后，革命党人虽有意将续刊问题付诸实施，但印刷发行地点、经费、编辑人选等都发生困难，章太炎的位置也不好安排，因此，迟迟不能获得进展。1909年夏，革命党人得到了"香港某君"的资助，决定以巴黎《新世纪》杂

①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见本书第126页。
② 《本报谨白》，《民报》第26号。

志社为掩护，仍在日本秘密印刷发行，黄兴等“共举”汪精卫为总编辑人。这样，有关困难逐一解决，停顿近一年的《民报》有了续刊希望。但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当时正在进一步加深，此事遭到了陶成章等的强烈反对。

1907年春，孙中山离日南下，准备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因缺乏经费，曾接受过日本政府的赠款。陶成章、章太炎等不明真相，在部分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发动第一次“倒孙风潮”，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由于黄兴、刘揆一等人的抵制，这一风潮逐渐平息。1909年春，陶成章因在南洋筹款收效不大，和孙中山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矛盾日深，酝酿发动第二次“倒孙风潮”。同年秋，他在陈威涛支持下①，联络李燮和等起草《孙文罪状》，大肆攻击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三种十二项。陶成章的目的仍然是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争夺同盟会的领导，包括《民报》的编辑、出版权。《罪状》指责孙中山为了个人目的，企图扼杀《民报》。它说：“《民报》名誉，为南洋各埠所顶礼，孙文之出名，亦即由此而来。今彼名既成立，复有《中兴报》之鼓吹，但《中兴报》不得目为南洋全体之机关，实系彼一人之机关而已。然使东京而有《民报》在也，是则加于《中兴报》及《中国日报》之上，南洋华侨人心，势必有所分驰，不得便其私图。故于去岁陶君《民报》收单寄交之后，彼即托言筹款困难，并不发布，至《中兴报》之股，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极言本报大有关系，我同志不可不出力协助、维持等之言。此去岁秋冬二季时之事也。”② 《罪状》又说：孙中山不仅要使得东京没有《民报》，而且要使得南洋各埠除《中国日报》及《中兴日报》之外，不再有中国的其他报章。“何

---

① 陈威涛，原名陈依陶，曾任《中兴日报》书记，因账目糊涂，滥支公款，被《中兴日报》登报革退。自此，即与陶成章结合，并改名“恶逸”，表示憎恶孙逸仙。有关情况，见德如：《呜呼跳梁之小丑》，《中兴报》，1910年1月3日。

② 《孙文罪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11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则？中国各报均零星载有内地革命之事，使华侨见之，知我革党非仅彼一人专有矣。”① 《罪状》以此作为孙中山“蒙蔽同志”的第一大罪。它附列善后办法九条，其第四条为：“再开《民报》机关，通信各埠，以系海内之望。”第五条为：“兼于《民报》社内，附设旬报，凡《中兴报》之所至，亦踪寻之而往，以为扩张势力之举，且以限止孙文谎骗之伎俩也。”② 这里，陶成章、李燮和把续刊《民报》的目的说得很清楚，除了所谓“系海内之望”外，一是为了和《中兴报》分庭抗礼，一是为了攻击孙中山，“限止孙文谎骗之伎俩”。

《中兴报》初名《中兴日报》，1907年8月20日创刊于新加坡，第一任主编为田桐，是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机关报。它创刊之后，继承前期《民报》的方针，和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新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原《民报》主力胡汉民、汪精卫及革命党人林文、居正等先后抵新，参加辩论。和章太炎主持的后期《民报》比起来，它显得泼辣、锐利得多。其间，孙中山曾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批驳保皇党谬论。1908年9月，陶成章也曾发表《规保皇党之欲为圣人英雄者》等四篇文章。章太炎的著作《新方言》、陶成章的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兴日报》均曾发表告白，积极鼓吹。因此，它既不是孙中山一派的派报，更不是孙中山一人的私报。陶成章等攻击《中兴报》，目的在另树一帜。后来，南洋华侨曾驳斥道：“夫《中兴报》为有限公司，全是华侨资本，虽为开通民智起见，仍含营业性质，吾同人亦有附股者，何硬指为孙君所办？试问《中兴报》之宗旨，果为何等？自负革命功首，而必踪

① 《孙文罪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11日。

② 《南洋总汇新报》刊登的《孙文罪状》没有“善后办法”，此据1912年11月2日上海《神州日报》所登《孙文罪状》补。

其迹而破败之?"[①] 这后一个问题提得是好的。革命的刊物之间本应互相配合，彼此支持，为什么要"踪其迹而破败之"呢?

1909年8月下旬，陶成章带着《孙文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不久，汪精卫也到达东京。陶成章敏锐地感到，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续刊《民报》。他致书李燮和等说："精卫此次之来，一为辩护孙中山，二则因南洋反对日多，欲再来东京窃此总会及《民报》之名，以牢笼南洋。盖东京总会无人过问，故彼欲图此以济其私。"他声明，《民报》的编辑权"不由众议而自窃取者，无论何人"，"决不承认"[②]。继而表示，《民报》专为孙中山一人"虚张声势"，非先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不能办报[③]。这样，陶成章争夺《民报》，另树一帜的企图就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陶成章的要求遭到了黄兴的坚决拒绝。在此期间，《民报》续刊的筹备工作开始，事为支持陶成章的章太炎得知，立即起草《伪〈民报〉检举状》，对孙中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攻击。由于它以"原《民报》社长章炳麟白"的名义并以传单形式散发，因而，迅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 二、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

《伪〈民报〉检举状》是章太炎盛怒状况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陶成章对章太炎的影响，也反映了章太炎长期积郁的对孙中山的不满，还反映了章太炎思想性格中的弱点：主观、武断、感情用事。

(一)指责续刊《民报》为伪。章太炎说："《民报》于去年阳历十月，出至二十四期，即被日本政府封禁。时鄙人实为社长，

① 庇朥华商同人:《复泗厘亚也再寄匿名谤书者》,《中兴报》,1909年12月8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② 《致若愚、柱中》,《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4—15页。

③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台湾，1973年增订版。

躬自对簿。延至今日，突有伪《民报》出现，主之者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①] 汪精卫是前期《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为什么他主编的《民报》就是"伪"呢？章太炎的理由是：《民报》被封禁时，自己是社长，曾在法庭上代表《民报》和日本政府打官司。

(二)指责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章太炎说："（鄙人）出狱之后，主任《民报》，几及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者也。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腹心，词锋所及，多涉标榜。"《民报》前期，汪精卫、胡汉民曾在他们的文章中，阐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章太炎对此看不惯。他以"主任《民报》"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自夸，正说明他和孙中山的思想之间有某些扞格难合之处。

(三)指责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的经济困难，"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章太炎说：《民报》经费多次支绌。第一次在1908年春天，由于萍、浏、醴起义后，《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因此不仅付不出印刷费和房租，而且《民报》社连伙食都开不出，人迹杳无。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南洋，要求孙中山接济，或派胡汉民、汪精卫东渡，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第二次在1908年秋，章太炎印制股票数百份，托陶成章带到南洋募捐，但孙中山"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第三次在《民报》被封后，准备迁地出版，同时，诉讼失败，日本政府判令交纳罚金一百五十元，章太炎交纳不出，亲身跑到警察署，准备坐牢，以苦役代罚金，幸得友人资助告免。章太炎愤愤地说："夫身当其事者，亲受诟辱则如此；从旁相助者，竭蹶营谋则如彼；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

①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下引《检举状》原文，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所不食，有北所不受。”《民报》经费困难是事实，章太炎辛苦支撑《民报》也是事实，但说孙中山“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则是主观臆想。

(四)指责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章太炎说：“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四五年中，名誉转大，一二奋激之士，过自谦挹，奖成威柄，推为盟长，同志又作《民报》以表意见……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南洋有党与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章太炎提出的主要事实有两项。一为1907年春，孙中山接收日本政府赠款事，章太炎斥之为“密受外贿”。一为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等地军费开支事。据章太炎统计，1907年孙中山南行，四处筹款，不下三四十万，但开销只有四万不到。他说：“镇南关、河口之役，军械至少，钦、廉亦未有大宗军火，先后所购之铳，仅二百余支，此外则机关铳四门，更无余器(此皆黄兴口说)。计其价值，不盈三万，所余款项，竟在何处？若云已悉散之会党，由今核实，则关仁甫之攻河口也，所领薪水，但及三千，许雪秋亦得三千，梁秀春二千而已。先后所散，略及万金。是则其说亦伪。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款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在所有指责里，这一条最有损于孙中山的形象，因而也最使孙中山感到恼火和委屈。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自述因投身革命而使家庭破产的事实：“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并说：“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

者，亦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①

(五)指责孙中山卖国卖友。章太炎说："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又说："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这一条指责很厉害，但由于过份无稽，因而人们并不大相信。

(六)劝阻华侨为续刊《民报》捐款。章太炎说："今告诸君，今之《民报》，非即昔之《民报》。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力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这一条是釜底抽薪，目的在断绝续刊《民报》的经费来源。

透过凹凸镜看世界，一切都改变了样子。在章太炎的笔下，孙中山这个伟大的革命家成了贪财黩货的江湖骗子，他的行为一无可取。章太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章太炎的这份《检举状》先在东京《日华新报》上发表。11月6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全文刊出，改题为《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同月11日、27日、29日，又分三天刊出了李燮和等的《孙文罪状》。编者以无限轻蔑的口吻在跋语中说："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钱财，如是焉而已。"② 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一直利用这两份"罪状"作为进攻革命党人的炮弹。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编印反动小册子《国贼孙文》，也从中撷取了不少材料。

① 《国父全书》，台北1963年3版，第418—419页。

②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29日。

代

图十六　保皇派报纸所登章太炎攻击孙中山的传单
（采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散发和流布对革命党人的威信是个巨大的打击，也给同盟会的募捐活动制造了巨大困难。最初，黄兴持克制态度，仅在《民报》第26号刊登告白，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并不准备展开辩论①。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决定拿出杀手锏来回击。

## 三、刘师培《致黄兴书》的公布

1907年夏历八月，章太炎因和孙中山矛盾日深，对同盟会也日益不满，准备去印度做和尚，但缺乏路费，曾通过刘师培之妻何震与长崎领事、张之洞的女婿卞綍昌联系，企图向张之洞谋款，没有接上关系。后又通过何震、刘师培与端方联系，企图从端方手中取得路费。1907年冬，何、刘二人先后返国，暗中向端方自首，章太炎为谋款事，曾给二人写过若干封信。次年春，刘、何二人返回日本后，与章太炎之间的关系破裂。章太炎曾在《日华新报》上揭露过何震。作为报复，刘、何拟延聘律师起诉，后又拟将章太炎的有关信件汇印公布，但都没有实行，仅去《民报》社将章太炎"痛殴"了一顿。同年冬，刘、何二人返国。到上海后，为了在革命党人中挑拨离间，刘师培即给黄兴写信，揭露章太炎要他们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经过。信中说：

彼于去秋（指1907年秋——笔者）之后，与仆同居，仆因平日所学，与彼相同，言奇析疑，遂成莫逆。然太炎当此之时，已无心于革命，欲往印度为僧；又以无款之故，欲向官场运动。乃作函于张之洞，辞多猥鄙，乃其稿藏于书中，猝为仆见。彼亦不复自讳，宣言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

① 《民报》第26号告白。

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且与仆相商，言今长崎领事卞綍昌，为张之婿，于何震为戚属，可将致张之函稿（此为第二函）托卞转致，向张索款三万，以二万助彼旅费，以一万归仆，为印书之资。时震适以事返国，并为彼向余杭家索款（得洋八百元），道经长崎，登岸访卞。适卞已于前数日卸职，乘轮返国，此事遂成画饼。然太炎心仍未已，复作函于震，使之向金陵刘姓索款，并向卞綍昌及池州杨仁山谋，使以此事干江督端方，复令仆返沪，共商此事。然仆等均知此事不易成，至沪以后，乃告以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冀寝其谋。而彼仍作函相促，并于《民报》登告白，言近罹脑疾，不克用心，并将此报寄至沪上，嘱仆等由卞、杨转示官场，仆等一笑置之。此报旋赠高某①。

信中所言章太炎情况，证以其他资料，大体属实。所言自身态度，例如“冀寝其谋”、“一笑置之”等，都在说谎。事实上，刘、何二人企图以策反章太炎作为向端方的见面礼，对“谋款”事是很积极的。由于刘师培这时还在伪装革命党，他不得不隐瞒了有关事实。信中，刘师培附寄章太炎的有关书信照片六纸，并说：“此六函外，尚有数函，因回国时，已在东京印照片，尚未完成，俟该照相馆将此片寄沪后，再为寄上，今印成者仅六片，故先寄上。”

黄兴等接到刘师培此信后，曾开会研究过，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宗旨不定，稍涅即淄”，决议此后凡有关秘密事情，不与商量，同时，为了给章太炎的回头留有余地，决定“讳莫如深，不予公布”②。《伪〈民报〉检举状》发布后，东京部分中国革命党

① 原载《日华新报》，转引自《星洲晨报》，1910年1月15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

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原载香港《公益报》，此据《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转载该文引。

## 事　件

### 蒋贼背叛革命党之铁证

[illegible]

图十七　同盟会攻击汪大燮"背叛革命党"的文字（采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人决定公布有关资料，作为对章太炎的回击。《日华新报》的编者原来是支持章太炎的，在获睹有关资料后，立即转变态度，以《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为题发表了刘师培致黄兴书。按语说："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光汉（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①刘师培致黄兴书及章太炎六函的发表成为革命党人向章太炎反攻的有力炮弹，笔战日益激烈。

11月下旬，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详细地叙述了二人之间的离合关系。该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②按此文的说法，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出卖革命了。同日，《中国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布章炳麟已经"叛党"，成了"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该文说："夫《民报》社长一职，乃由革党本部委任，岂章可据为子孙万世之事业乎？端方之赏金黄光耀目，章或可牺牲同志之生命以图之耳，若《民报》原有之名字，则不容汉奸辈盗窃之也。"③这样，革命党人就找到了排除章太炎于《民报》之外的

① 《星洲晨报》，1910年1月18日。
②③ 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充足理由。

此后，同盟会系统的报纸在反击章太炎时，大都采用《中国日报》的调子，指斥章太炎为端方侦探，有的并提出章太炎和清陆军部尚书铁良也有暧昧关系。这些反击，抵销了章太炎散发《检举状》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却中了刘师培的反间计，扩大了同盟会内部的裂痕，也给章太炎加上了诬妄不实之词。章太炎和铁良的关系，完全出于刘师培一流内奸的捏造①；他和端方的关系，也仅止于谋款。"侦探"云云，均属子虚。

## 四、全盘否定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

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离日后，《民报》在大部分时间内由章太炎主持。《中国日报》等除在政治上指责章太炎"叛党"外，也对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进行了指责。这些指责，反映了《检举状》公布后孙中山一派人的愤激情绪，也反映了他们对章太炎长期积郁的不满。

(一)指责章太炎不参加对《新民丛报》的论战。《中国日报》说："章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以来，与保皇党之关系未尝断绝，《新民丛报》之《儒术真论》即章手笔。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之时，战斗皆精卫、汉民、悬解(朱执信)、寄生（汪东）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② 在革命派中，章太炎是最早批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人，但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时，章太炎确实不大积极，他觉得胡汉民、汪精卫的文章"辞近诟谇"③，当梁启超通过徐佛苏出面建议停止辩驳的时

① 参见拙作：《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见本书第175页。铁良，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21号的告白作锡良。

②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下引《中国日报》文章，除注明者外，篇名、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③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候，章太炎主张“许其调和”①。

（二）指责章太炎提倡佛学，背离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和《民报》的“六大主义”。《中国日报》说：“章炳麟以其一知半解、干燥无味之佛学论，占据《民报》全册之大部，一若以《民报》为其私有佛学之机关报也者。……由是各地阅者以《民报》主张佛学甚于本来之六大主义，多辞退不阅。”《公益报》也说：“足下弗悟，甫执文权、即叛《民报》本来宗旨之六大主义……所主张阐发民族、民权，民生之大问题者，足下偏摭拾一二佛经，为佛氏传教。”②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发表过不少推崇佛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既表现了章太炎改造佛学，寻求一种新的世界观，使之为民主革命服务的积极企图，也表现了他所承受的佛学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而从根本上说，佛学是精神鸦片烟，它虽有某些精华，但却包裹在艰深烦琐的教义中。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武器。章太炎撇开卢梭《民约论》等一类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也撇开业已为革命党人所接受的孙中山三大主义，在《民报》上大肆推崇佛学，这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也脱离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当时，四川革命党人铁铮就曾指出，佛学是“迂缓之学”，“上智之士犹穷年累月而不得，而况欲使普通之一般国民皆能明之以振起其气概！”③日人梦庵也针对章太炎的《大乘佛教缘起说》指出：“此《缘起说》足以济度恶劣政府乎？足以建设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载之上，曷得抱亡骸为维持新世界、新真正之平和之具？”“《民报》之作此佛报者，抑出于何意乎？《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也。”④应该承认，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但章太炎性格执拗，对于佛学的嗜好也太深，先后发表《答铁铮》、《答梦庵》二文，继续

① 《宋教仁日记》，1907年1月11日，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323页。
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2月3日。
③ 《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鹃声》季刊第1号。
④ 《呓语》，《东亚月报》第2号。

坚持必须大力宣扬佛学，这就使革命党人很失望。应该说，孙中山等之所以热情扶助《中兴报》，而对《民报》态度消极，这是一条重要原因；续刊《民报》时之所以排除章太炎，这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关于后者，《公益报》曾明白宣示："顾同人之光复《民报》，志在发挥公理，非求泄发私怨也；志在宣扬民意，非求传播佛声也。故《民报》光复，不能使足下与闻，亦不欲以狂妄之夫再尸要地，以碍同志团体之进行也。"①

（三）指责章太炎提倡无神论，攻击基督教。《中国日报》说："基督教素重人权自由主义，故内外同胞之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者，以基督教徒为多，乃章炳麟创为无神论，以排斥耶苏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苏之机关报，摇惑人心，莫此为甚。"② 革命派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在当时，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近代，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内巩固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章太炎批判基督教，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国日报》注意了团结基督教徒投入民主革命，但是却看不到章太炎批判基督教的积极意义，也看不到章太炎提倡无神论的积极意义（虽然章太炎的无神论并不彻底），这在理论上是短视浅见的。

（四）指责章太炎批判《新世纪》，伤害同志感情。《中国日报》说："法国《新世纪》与《民报》同属革命党之机关报，原应同心戮力，以谋国事，乃章炳麟以个人私怨，竟借《民报》为攻城之具，日向《新世纪》宣战，第24号有《规新世纪》之文，占全册之半，伤害同志之感情，徒贻外人之笑柄。"③ 辛亥革命前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有两个：一为东京的《天义报》，创办人为刘师培、何震；一为巴黎的《新世纪》，创办人为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

②③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两个杂志各有特点。前者和国粹主义纠结难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后者则对国粹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封建文化的色彩较浓。章太炎受过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对《新世纪》则始终深恶痛绝；在和刘师培决裂之后，即以《新世纪》为靶子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他先后发表过《排满平议》、《四惑论》、《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这些文章，并没有抓住要害，但他公开宣布"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①，总反映了思想上一个方面的进步。

章太炎对《新世纪》的批判也有缺点。还在中国教育会时期，章太炎和吴稚晖之间就因事不和，章太炎到日本后，又听人说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曾向清吏俞明震告密，因此，多次在《民报》上发表指责吴稚晖的公开信。这些指责，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某些地方却给人以骂大街的印象。其次，《新世纪》当时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翼，他们公开声明："种族革命党与社会革命党今日之作用同，而其主义不同，然此不同者，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②因此，对《新世纪》可以批判，但必须掌握一定的火候，有所节制。在《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一文中，章太炎说："《新世纪》记者阳托名于无政府而阴羡西方琛丽"，"此曹无耻，复倍蓰于立宪党人"，"犹槟榔屿之少女，聚歌沙丘以求新牡，昨者方为甲者所掠，而有今日，复愿为乙者、丙者所掠。"③这些地方，从内容到语言都显得过火了。

(五)指责章太炎"挑动日人之恶感情"，导致《民报》停刊。《中国日报》说："《民报》出版以来，日政府绝不干涉，乃章炳麟倡言恢复台湾、朝鲜之议，又鼓吹暗杀，以挑动日人之恶感情，遂致有停止发行之命令。使章当日立论如第12号以前，则《民报》至今犹存也。"④《公益报》也说："所主张中日国民联合者，足下明知社

① 《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

② 真：《与友人论种族革命党及社会革命党》，《新世纪》第8号。

③ 《民报》第22号。

④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

会党为当时日本内阁所忌，乃必发挥社会主义，撄其忌以种封禁之祸因。"① 日本政府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的原因很复杂，既和清政府的多次交涉有关，也和日本内阁更递、政策改变相连。西园寺内阁时代，采取一种"法兰西宽大政策"，结社、言论、出版都相对自由，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迅速。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被撤换，更替上台的桂太郎内阁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镇压政策。《民报》虽因鼓吹暗杀的部分言论和日本社会党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接行动"派相呼应，为桂太郎内阁所忌，但是，把《民报》出版中断的原因归结为章太炎的过激言论所致，仍然是简单的、片面的。

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有功绩，也有严重的过失。《中国日报》等完全抹煞前者，而将后者夸大，把章太炎说成《民报》罪人，这是极不恰当的。在双方都感情冲动而充满敌意的时候，对于彼此的是非功过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革命党人在评论中还接触到了章太炎的性格问题。《公益报》说："足下复骄恣溢盈，竟成跋扈，托有神经病，为鱼肉侪辈，蛮气一发，动肆用武，致与无赖伍。年来若张继、黄兴二君，皆于谈次间，足下无头无脑即以老拳相向。自余东京同志，无故受足下之野蛮意气者，大不乏人。"②以学识渊博长于弄文的书生，却经常"无头无脑"对同志"以老拳相向"，《公益报》的指责似乎和人们印象中的章太炎不类，但这是有旁证的。1912年，有人回忆说："迨后清廷肆虐，委托日本政府停止《民报》出版，于是太炎搁笔，饭碗为碎。当时克强先生拟运动日廷取消停止出版，卒以经费匮乏，亦罔效。太炎则贫如乞儿，夜不得食，乃日迫克强先生，一言不合，辄以盥器遥击，克强先生额为之破，卒含笑谢之。"③ 一方是盛怒而以脸盆"遥击"，一方是"额为之破"而"含笑"

---

①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③ 快：《参看17号〈新纪元报〉》，北京《民主报》，1912年9月18日。

道歉，两人的性格鲜明如见。

章太炎的这种性格特点使他很难与别人共事。《公益报》说："同志宽洪包容，均付之一笑……然因是而冷同志之心，何止千百。昔日东京同志，皆节提所费，踊跃资助《民报》者，感情既淡，而《民报》经济界之情形，亦受其影响。"① 这里说章太炎的粗暴举动冷了"千百"同志之心，固有夸大，但是，它对革命党人之间的团结不利则是显然的。

历史是通过人的活动体现的，创造历史的是具有各色各样鲜明性格的人们，因此，对历史发生作用的就不仅有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有时，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虽然，它并不起决定作用。

## 五、同盟会系统各报对《检举状》的辩驳

《伪〈民报〉检举状》大多是不实无根之词，为了廓清影响，说明真相，同盟会系统的各报不得不逐条地进行辩驳。

(一)关于续刊《民报》的真伪问题。革命党人指出：《民报》为革命党人所创立，并非个人私产；当《民报》肇始时，章太炎还在狱中；要判断续刊《民报》的真伪，关键要看它的主持者是否革命党人，宗旨有无改变，而不在于章太炎是否出任社长。《中兴报》说："若谓章为社长则真，非章为社长则伪，是则章为《民报》之商标矣！"② 《公益报》表示：章太炎主持编辑的《民报》如果还存在，依旧"发私怨，砌佛言"的话，那末，称之为"真佛报"、"伪《民报》"也是可以的；相反，续刊《民报》如能"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奉申宣扬，以饷我同胞"，那末，即使主持者不是汪精卫，也是真《民报》③ 。黄兴则特别说明了章太炎"当众辞职"的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②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中兴报》，1909年12月6日。
③ 意公：《与章炳麟书》。

经过，并叙述了汪精卫和《民报》的关系："自第一期以来，至第十三期，每期皆有汪君之文字，久为读者所同知。自第十四期以后，汪君因事不能兼任撰述。今被举为总编辑人，当必有以副读者诸君之望也。"① 革命党人的这些言论，比较有力地阐述了续刊《民报》的合法性，驳斥了所谓"伪《民报》"的说法。

（二）关于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问题。由于章太炎在《检举状》中说过："辛丑、壬寅之间，孙文寄寓横滨，漂泊无聊，始与握手而加之奖励者，即鄙人与长沙秦力山耳。"因此，革命党人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兴报》反问章太炎道：你这不也是"眼光如豆"，"愿与孙君为腹心"吗？为什么要嘲笑汪、胡二人呢？该报声明："中国之革命，孙君为首发难，历尽艰险，其才识学问，及办事资格，同志中未有能出孙君之右者，故为同志推戴，举为盟长，而革命事业之发达，未始非孙君抱持之坚，毅力之长，有以致之也。"② 这一段话，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作用，说明了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推戴"并非出于盲目。

（三）关于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经费困难问题。革命党人主要强调军情紧急，经费同样困难，首先要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公益报》答复章太炎说："河口、南关、钦廉之役相继迭兴，军队中人，匪遑啇局，足下乃于此匆遽时间，假《民报》待需之名，为书乞援，求以三、四千金相济。自足下视之，或以为平情，然当夫军书旁午之间，饷需浩繁之际，撑持未暇，焉能兼顾其他！"③《中兴报》则表示：近年革命党人创办的报馆日渐增多，含辛茹苦、任怨任劳，如章太炎所说"朝治文章，暮营经费"的编辑人并不在少数，解决报馆的经济困难，要靠主任的运动，如果大家都向孙中山要求接济，那末，"吾恐孙君虽有点金之术，亦不能供给各报之要求"④。

① 《本报谨白》，《民报》第 26 号。
②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③ 肃公：《与章炳麟书》。
④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同盟会创立初期，所需要支持的只有一个《民报》，经费上自然不感到十分拮据。1907年孙中山南行，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连续发动多次起义，开支突然浩大起来。镇南关起义期间，孙中山曾向法国一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债。钦、廉、上思起义期间，清军黎天才部曾准备归顺革命军，但孙中山却付不出奖赏的花红。这以后，由于张永福、陈楚楠等几个富有的华侨同盟会员濒临破产，孙中山更经常为经费不足所窘。1908年11月20日，他在致邓泽如等函中说："时局可为，惜财力不足赴之于目前，想同人等亦为扼腕而叹。"① 不仅《中兴报》经常有停刊危险，孙中山自己也有"绝粮"之忧②。因此，革命党人所作的辩解是事实。但是，他们忽略了双方思想分歧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盛称赞《中兴报》"文章议论，颇惬人心"③，如果《民报》办得符合孙中山的理想，显然，他在解决其经济困难上是会积极得多的。

(四)关于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问题。革命党人主要采取反质法，要求章太炎交代出情况来源和具体数字、存贮地点。《公益报》说："足下又言孙氏丁未南行，集资三四十万。试问某埠得收若干，某人捐助若干，足下能述其故否耶？""所谓身拥厚资者，此金钱究存贮于何处？足下又能述其故否？"④ 这些问题，章太炎当然答不出。革命党人就此进一步指出：章太炎并非同盟会"实行部"人员，不了解军事进行和组织的实际情况。《公益报》说："足下且未知军事组织之实情，从何知军事组织之真状，不意足下欲欺饰人心，遂敢妄谈军事也。"⑤ 革命党人的这些辩解由于对经费收支缺乏必要的说明，因此说服力并不大。只有当南洋革命党人具体调查了孙家因革命而破产的状况后，章太炎的指责才得到了有力的驳斥和澄清。

---

① 《国父全书》，第412页。

② 《为〈中兴报〉集股等事致邓泽如函》云："现在本坡百务交迫，各同志皆陷于绝境，多有自顾不暇之势，故弟处已绝粮矣。"见《国父全书》，第415页，

③ 《国父全书》，第413页。

④⑤ 意公：《与章炳麟书》。

(五)关于孙中山卖国卖友问题。《公益报》指出："若云以云南赠送法人，则尤令人窃笑。无论孙氏无此事，亦无此权。"该报问道：河口起义失败后，大批义军战士被解送出境，不少"破弃身家事业"资助起义的华侨同盟会员被勒令出境，如果孙中山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私盟"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①？黄兴发表声明，指责章太炎挑拨他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是"造孽"②；《中兴报》主编何德如则撰文说明：关仁甫在河口起义后到达新加坡，曾在《中兴报》居住数月，在返回香港时，同盟会员纷纷资助；关仁甫感念同志情谊，曾到何德如寓所辞行。章太炎所说孙中山密告英吏，诬指关仁甫为大盗一事大谬特谬，完全是"以耳代目"，把流言当作事实的结果③。革命党人指出：立言贵在"有据"，章太炎如果继任《民报》编辑人，"遇事不察，言出不择，贸贸然而宣之于报纸"④，必然要损害《民报》的信誉。革命党人的这些批评，接触到了章太炎性格和思想方法上的弱点。

在逐条辩驳之外，革命党人也对章太炎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影响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中国革命距成功之日尚远，"此正吾人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时"，"稍知自爱而能为大局计者，必不出此"⑤。革命党人的上述辩驳和批评所持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就发挥了澄清视听，维护同盟会和孙中山威信的有益作用。

在续刊《民报》所引起的争论中，章太炎轻率地散发《伪〈民报〉检举状》，促使矛盾尖锐化，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它也反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如果同盟会能有一种制度，使它的领导人之间能够经常就重大的问题交流思想，统一看法，那末，分歧也许不至于愈来愈大。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② 《本报告白》：《新世纪》第116号。
③④⑤ 《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如果同盟会的经费收支能在高级领导人之间公开，那末，章太炎显然不会怀疑孙中山“乾没”巨款。

如果在《民报》经费困难时，同盟会领导人能给予更多一点的关怀和温暖，那末，章太炎胸中就必然不会有那样多的不满和牢骚。

如果在续刊《民报》时不对章太炎完全封锁消息，那末，他也许不至于突然爆发出那样巨大的愤怒。

这些地方，说明了同盟会缺乏正确的组织原则，也缺乏统一思想、克服分歧的正确方针。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期)

# 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天铎报》连载过一篇译文，题为《真革命始祖》，称誉孙中山多年来苦心孤诣，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① 该文原载美国《纽约泰晤士报》，说明系伦敦通讯员来函。其中引录了孙中山致纽约财团的两封信，迄今为止，各本孙中山集均失收，现介绍如下，并略加考订。

第一函的受信人是纽约某银行的一位职员，孙中山在伦敦的一家著名的俱乐部里认识了他，企图通过他向纽约资本家借款50万英镑，作为在中国发动起义的经费。二人原已约定了在纽约会面商谈的具体日期，因孙中山延迟行程失约。过了一段时候，孙中山到达纽约，便发函致歉，重申前议。全文为：

> 前在英京某俱乐部，与阁下订期，在纽约会面，惜为事延阻，不克践约，无任歉仄。所议借款兴办中国政治事业一节，今有盘谷华商银行一家、米厂三家、星加坡殷商数人，及巫来由矿商三人，均允担保。计以上各华商之产业，共值美金二十兆，现在只需英金五十万镑，便敷接济。一经起事，即可占据两富省，便当组织临时政府，至时当可向外国再借巨款，以竟全功。今请鼎力斡旋，运动资本家，商借债款，以济军用。事如可图，请示知办法。资本家需如何章程，方肯借款，当不难磋商也。企候复示。孙逸仙上。

据《真革命始祖》一文介绍，纽约各银行读到孙中山的上述信件后，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状况，通过纽约某华人商店复函，要求孙中山将信中所称"愿担保借款"的南洋华商店号、姓名详细

① 见该报1911年11月15日至23日。

开列，以便调查。据称："一经查实，如所云不虚，五十万镑之款，不难凑集"，云云。当时，孙中山已因事离开纽约。两个月后重返，读到纽约财团的复函，便写了第二封信，说明革命党人的力量分布，同时附了一份通告世界各国的文件。该函全文为：

启复者：承问各件，今请详复如下。首先请言海陆两军。中国近日所组织之新军，查江南各省新兵，无论将校士卒，均为吾党同志。一经起义，扬子一带，计有新军四镇、必投吾党麾下。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至于京师所有之七镇新军，俱系袁世凯经手操练，自袁氏革职之后，此种新军已渐渐消减其忠爱清廷之心矣。吾党虽未尝与此项新兵联络，但彼等断不允为满清政府牺牲其生命，此吾敢必也。此外东三省又有新军一镇，亦为吾党所统带，一旦起事，彼必率其兵士，合攻北京。综前而论，中国共有新军十二镇，入吾党掌握者已有五镇，余七镇均守中立。至若海军，仅有巡洋舰四艘，其中最重者仅重九百吨，或一千吨而已。今与吾党虽尚未连合，然而海军将校水兵，多为吾党同志。

次请言各行省之志愿。中国南部各省随时皆愿起事。试观对于澳门划界事件，南省之舆论可见一斑矣！且吾党中人，多为两粤及湖南兵士，该三省之兵素以强劲称于中国者也。

兹将吾党布告天下各国之通告书述录于下，以供青鉴焉。

以上二函均未注明年月，但据信中所述时事及孙中山的行踪，可以较为准确地考订它的时间。

第二函提到的时事有两件。一为袁世凯被清政府革职，其时在1909年1月。一为"澳门划界事件"，其时在1909年下半年。澳门一向是我国领土，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殖民者强租，清朝

光绪年间又被强占。但葡萄牙殖民者仍不满足，不断扩张界址，向外蚕食，经常发生纠纷。从1909年7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中葡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九次"勘界"谈判，均无结果。葡萄牙殖民者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舆论哗然。"在国内则有各种勘界维持会与界务委员会，国外则有华侨公会、商会，函电交驰，请清政府力争失地，且责政府对于会议情形，秘而不宣，为祸国殃民之举。"① 孙中山从这一事件里又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要纽约财团的资本家们注意这一情况，函中称："中国南部各省随时皆愿起事。试观对于澳门划界事件，南省之舆论可见一斑矣！"可知此函必作于澳门划界谈判期间或失败以后不久。

从1907年起，孙中山先后在中国南方组织了黄冈、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等六次起义，其经费主要依靠南洋华侨的支援，不时感到拮据。1908年冬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孙中山企图乘机组织起义，更感到财力困难。次年春，他接到欧洲一位"名商"来函，决计西行筹款。4月20日，他致函缅甸侨商、同盟分会会长庄银安等称："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时机，殊堪痛惜！此方暂时既无法可设，弟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② 6月下旬，孙中山抵达巴黎。8月7日，抵达伦敦。10月29日有一函致南洋同盟会员云：

在英京亦找得一路，惟现尚未有眉目，故未敢详报。此路之条件甚属便宜，利息亦照通常算法，并不要求特别之利权，惟须吾党各埠同志出名担保一事耳。英路之介绍人现往美国，弟到美时当与他再商，如得实音，当另行详报。但关于出名担保一节，弟已思得一法，想当可行，俟得实音，则

① 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稿本。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11页。

并奉闻，以请大教。①

本函所述："在英京找得一路"，"须吾党各埠同志出名担保"，"英路之介绍人现往美国，弟到美时当与他再商"等，均与前引第一函相合。孙中山1909年由伦敦抵达纽约的时间是11月8日，由此可进一步确定，第一函当即作于此后的一段时期内。12月16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波士顿宣传革命和募捐，24日返回，第二函当即作于此时。《真革命始祖》一文称，此函为两月后孙中山返回纽约时所复，这一点可能是该文作者搞错了。

第二函附有一份《民国军政府告各友邦书》，内称："我中华民族之与满洲政府开战，欲逃离胡虏毒轭，推翻无道之专制，组织共和政体以代之。今者为益固各友道〔邦〕交谊，保世界和平，增人群幸福起见，特将宗旨明白宣布。"这显然就是1906年集体制订的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只是由于经过转译，文字上有所不同。将两个文本对校，可以发现，原来所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七项条件已经有所变动。例如原第一条为：

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现第一条为：

各国与满政府今日以前所订之约仍然有效，至期满为止。

除将"中国"改为"满政府"外，增加了"至期满为止"等几个字。又如原第三条为：

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现第三条为：

满政府以前租与各国之租界，皆以礼相待。

原条件全部承认侵略者的"既得权利"，现条件则大为缩小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既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又祈求其援助，不可能采取强硬的反帝立场。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力图挽回失去的权利。两个文本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

---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4页。

1910年3月，孙中山曾在洛杉矶与美国人荷马李、布思会谈，企图向纽约财团贷款350万美元。此事的中介人是容闳。上述贷款50万英镑的中介人是纽约某银行的职员。看来，孙中山曾通过两个渠道和纽约财团联系。后来，孙中山选择了荷马李、布思的渠道，前一个渠道就放弃了。《真革命始祖》一文说："该银行自接孙氏之信后，孙氏未再向该银行商议借款，或谓孙氏已在中国或美国筹足军饷，或谓孙氏或有不测之事，盖清政府悬赏英金一万镑捕拿孙氏也。"作者显然不了解后来事情发展的状况。

《真革命始祖》一文还披露过孙中山的其他言论，反映了他振兴中华的热切愿望，如：

> 孙氏又常对人自明其宗旨，谓一生目的，不外推翻满洲篡位之民贼，使中国重发奇光，注重自由、平权、人道主义，拟组织军政府，以为先导。其言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应改为共和国，选总统以自治，其人同享人道、幸福、平权、自由，不背社会主义。畜奴仆、吸鸦片等害，一一除去之，则不出三年，中国之气象自焕然一新矣！

关于对外关系，该文说：

> 孙又言：革军宗旨，不过欲光复中华，并无仇外之意，凡我友邦，万勿误会云。

不笼统地排外，这是正确的，但是，将侵略中国的列强一律视为"友邦"，这又是他思想中软弱和模糊的地方。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

1911年初，我国边疆地区警报频传：1月3日，英国派兵侵占我国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同月，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所属《改订陆路通商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在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于是，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了一场以拒英、拒法、拒俄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前奏，在舆论、组织、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关于这一运动，日本学者小岛淑男以留日学生与国民会为中心进行过多年研究，其成果已结集为专书。① 但是国内迄今还没有专著讨论这一问题，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对此也很少涉及。本文将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这一运动，并着重考察同盟会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 一、云南谘议局的“保界”呼吁与各地立宪派的响应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端于云南谘议局的呼吁。

1月28日，云南谘议局致电全国报馆：“英人派兵据我片马，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窥长江流域，大局危甚。拟先文

① 《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日本东京青木书店1989年版。

明对待，不卖英货，请转各商协力进行。"① 同时，又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他一面与政府协力争议，一面在腾越、思茅等地编练重兵，以备不时之用。② 2月7日，云南绅商在谘议局开会，议决成立中国保界会。该会决定：第一，联合全国各报馆、各宣讲所，分别著论演说，号召人民起而斗争；联合各省志士仁人，上书外务部，请与英人严正交涉，并以此案发交海牙和平会裁判。第二，在买卖货物、乘载轮船、雇作佣工等方面对英国进行限制，同时奖励并补助自设工厂和轮船公司。宣言要求全国及海外华人在各自驻地普遍设立保界会，并特别声明："我国现值积弱，只宜用文明之抵制，不可为野蛮之举动。"③ 2月11日，商会集会，决定抵制英货，以当月23日为"不卖英货日期"，"过期如有再买卖英货者，即公同议罚"④。

云南谘议局的呼吁迅速得到各省谘议局的响应。贵州谘议局复电称："英据片马，先以不卖英货抵制，各界协议，表同情，并电政府力拒。"陕西谘议局复电称："非人自为兵，无以救亡"，建议以3月9日为期，联络各省谘议局，同时致电资政院，奏请就地开办团练。⑤当时，俄国政府企图借修订《伊犁条约》扩大侵略权益的阴谋已经暴露，因此，各谘议局除通电拒英外，又大力呼吁拒俄。江宁谘议局议长张謇致电全国各谘议局，提议联合各局议长，上书清政府，表示"俄旧约万不可徇"⑥。3月11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长篇文章，指责"俄人之阴险狡诈"和清政府的"畏葸无能"⑦，要求各方人士联电政府力争。20日，福建谘议局在得到山西、江西等省谘议局的支持后，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大会，以民气为外交后盾。

---

① 《民立报》，1911年2月4日。
② 《申报》，1911年3月2日。
③ 《云南保界会之宣言书》，《帝国日报》，1911年3月7日、8日。
④ 《千钧一发之云南》，《帝国日报》，1911年3月13日。
⑤ 以上引文均见1911年3月13日《帝国日报》。
⑥ 《议长之救亡电》，《民立报》，1911年3月2日。
⑦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

在各省立宪派的鼓噪声中，资政院在京议员联名上书总裁溥伦，认为“修订中俄商约一事，实关系西北大局”，要求溥伦根据院章，奏请召开临时会议，但溥伦置之不答。① 议员们赴溥伦住宅求见，溥伦又闭门不纳。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认为溥伦等压制议员不力，于3月22日下令撤去溥伦、沈家本的资政院正副总裁职务。其间，议员们不肯死心，再次上书，说明各省谘议局纷纷申请开会，不可置之不理。② 书上后，清政府的内阁大员们连看也不想看，“温谕阻拒”③。

新的民族危机也使海外的立宪派不能安坐，企图借此发动第五次国会请愿运动。2月下旬，在美国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致电国内各团体，声称：“敌迫，国会迟必亡，速五请。”④但是，国内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镇压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记忆犹新，不愿再行自找没趣，帝国宪政会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当时，立宪派的兴趣在于提前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按规定，该会会期应在夏历六月（7月），现因召开资政院临时会无望，遂由福建谘议局提议提前召开联合会。5月12日，该会在北京开幕，到会的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及资政院议员共63人，以谭延闿为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上，代表们普遍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反映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懑、绝望，以及忧患意识的加深和自保要求的增强。据该会整理的资料，在全部27个议题中，与编练民兵或救亡相关的议题即达14件。⑤ 讨论中，代表们一致同意，编练民兵，主要用于对外，宗旨在于救亡；在定名上，代表们上书都察院，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均采“国民皆兵”主义，要求各省、厅、州、县会同自治团体，选择土著而有职业者编练“备补兵”，“取民兵之意，而变通练军之法”，同时，号召

① 《资政临时会小产》，《民立报》，1911年3月21日。
② 《还说什么临时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27日。
③ 《民立报》，1911年5月17日。
④ 《申报》，1911年2月24日。
⑤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6—7页。

各省谘议局议员协同各团体，组织体育社，召选学生学习步兵操法、射击教范等科目，以“提倡尚武精神，补助军事教育”。[1]

联合会开会期间，云南籍资政院议员顾视高、张之霖提出片马一案，汤化龙认为：“上奏亦无效，不如作为我辈攻击政府之资料。”[2]此后，片马问题即成为立宪派射向皇族内阁的有力子弹。6月13日，联合会致电各省谘议局等称：“片马交涉，政府主延宕、退让两说，丧权误国，请径电内阁，力争重勘。”[3]6月18日，云南谘议局议长段宇清及资政院议员李增到京出席联合会。段称：“仍恳诸公念片马非云南之片马，乃全国之片马，片马失，则云南失，云南失，则中国不保。”[4]24日，联合会通过由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的内外政策。当时，清政府曾准备同意英国前驻腾越领事烈敦的要求，“永远租借片马”。对此，通告书评论说：“夫永远租借实割让土地之变名词。”[5]26日，联合会又上书外务部，要求将片马问题提交内阁，请另派大臣重行勘界，以固国防。

皇族内阁准备租让片马的消息激起了云南各界的强烈愤怒。8月，云南谘议局再次致电各省谘议局，呼吁采取联合行动：“片马案，阁议永租，请协力电争，力争重勘。”[6] 9月又电内阁称：“片马让租，民情愤激，恳勿退让，中国幸甚！并请从速解决，再迟恐为祸愈烈。”[7]当时，保界会一类组织遍布云南各地，“会员之泣血断指，誓以死争者前后相继。”[8]据时在云南的清军第38协统领曲同丰报告，“每接见绅耆，彼无不谆谆以片马为词”，

---

①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71、95页。
②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50页。
③ 《片马事往来电》，《民立报》，1911年7月15日。
④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第58页。
⑤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101—102页。
⑥ 《片马之争》，《民立报》，1911年8月15日。
⑦ 《民立报》，1911年9月29日。
⑧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84页。

"中心愤懑，词意遂多不平"①。这种种迹象表明，与立宪派的愿望相反，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 二、留日中国国民会的成立及其与使馆的冲突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1911年2月25日，豫晋秦陇协会于中国留学生会馆集会，筹议行动办法。次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遍发传单，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1200余人。会上同盟会员邹资州、刘揆一、陈策三人提议："对于中俄条约，俄国殊属无理，此事万一政府含糊答应，于吾国北省殊有损害。吾辈当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且须运动各省谘议局成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②会议决议在一星期内成立救亡机关，向内地及欧美、南洋华侨发送警告书及电报，同时成立国民军，请驻日公使汪大燮代电政府，要求拒俄。会后，河南留学生、同盟会员刘基炎提议到使署要求赞助经费，得到热烈赞同。于是，他被推为总队长，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向使馆进发。

汪大燮慑于学生的浩大声势，表示赞助国民军，并认捐日币1000元。当时参加游行的自费生及官费生纷纷认捐，谈妥官费生每人认捐10元，由使署预支，以后月扣2元，并由汪大燮签字为信。

27日，留学生总会召开临时各省职员会。会后，以留东全体学生名义向上海《民立报》及21省谘议局发电："俄侵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退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国机关。"电报要求各省谘议局，"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曲同丰上陆军部呈》，秘字第258号。
② 《东京留学生大会》，《时报》，1911年3月11日。

临时会，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1]同时，又致电爪哇中国会馆，要求南洋各埠华侨"协力进行"[2]。

3月5日，留日各省同乡会约80名代表集会，在熊越山主持下达成了"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3]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员李肇甫、傅梦豪、陈策、袁麟阁四人为章程起草员。8月，国民会全体职员集会，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该会宗旨为"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4]同时决定各省于12日前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共为五团，分往21省演说，宣传救亡。13日，又以留日全体学生名义公布《中国危亡警告书》，陈述俄、英、法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说明治标之法是"要求政府严拒俄人之请"，治本之法是"联合各省速创国民军"，本中之本是"革政治、励教育、兴实业"。[5]

当中国国民会组建之际，留日女学生也建立了专门的爱国组织。3月5日，同盟会员林演存、刘其超、唐群英及朱光凤四人发起召开了留日女界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选举唐群英为会长。

驻日使馆虽然答应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并不准备兑现。3月13日，留日学生代表赴使馆领取官费生捐款，并要求会见汪大燮，但汪大燮拒而不见。会计课长吴某还称：如欲领款，非各人签名捺印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办到的条件，因为留日学生分散在100多个学校里，南到长崎，北至北海道，不可能人人办理这一手续。学生代表据理力争也没有结果。15日，留学生召开评议会，报告13日交涉结果，并决定再次向使馆交涉，但汪大燮已

① 《民立报》，1911年3月1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明治44年(1911)3月5日。

③ 《留学生爱国大会补记》，《民立报》，1911年3月12日。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6141。

先期避走横滨。参赞吴兆麟称：原允垫付的经费由公使作主，已不能付给。于是，48名代表即决定模仿北京国会请愿团在庆亲王门前长立一夜的例子，在公使馆静坐，直至天明。

3月16日，各校留学生闻讯赶来的已达五六百人，当即在使馆内集会，群情激愤，有人主张昼夜死守，"不得款勿归"，有人主张"自由行动"，但始终没有扰乱行为。① 汪大燮不得已，委托横滨总领事传言，要求学生推举少数代表次日在横滨相见。学生们对此表示同意，并于晚8时撤离使馆。

3月17日下午，国民会理事长李肇甫、干事熊越山、职员马伯援（同盟会会员）、颜振兹四人赴横滨领事馆见汪大燮。汪称："此次举动非尔等所应为。"学生答以"留东全体，同此忠忾，非某等一二人私意。"汪继称："派代表回国一事，须查明所派之人及演说内容，始能决定。"他还建议将国民会改为爱国会，并再次强调，官费捐必须每人盖印，要求李肇甫等将国民会办法详细录呈，次日至使馆相见。②

李肇甫等向汪大燮告退后即即得悉，当日下午三点，使馆指责熊越山等"挟众要求，彻夜不散，殊属无理取闹"，要求学生们"笃志劬修，确循绳尺"③。使馆态度的变化根源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日，学部致电使馆，声称"学生干预政治，例禁綦严"，"倘有抗拒情事，仍应从严究办"④。外务部也致电汪大燮，严词指责其处理不当，声称倘再听任学生等"轻佻跋扈"，将予以革职处分⑤。18日，汪大燮接见李肇甫、熊越山、马伯援三人，出示外务部及学部电报，要求解散国民会。同日，留学生监督处发表禁止国民会布告，声称"此中情形，必系贪人败类，借题生事"。⑥

① 《留日中国国民会临时敬告内外同胞意见书》，《神州日报》见1911年4月8日—14日。
② 《留东国民会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③ 《留日中国国民会近况》，《神州日报》1911年3月30月。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ノ行动》，明治44年(1911) 3月21日。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国国民会总会ノ件》，明治44年(1911) 3月23日。
⑥ 《留日中国国民会近况》，《神州日报》，1911年3月31日。

3月19日，中国国民会全体职员开会。有人提议开大会与使馆宣战，熊越山力主以慎重态度处理各事，李肇甫称：公使既不接受我等要求，强迫亦迥非本会宗旨，今后除依赖各人出资，讲究活动方法外，别无他法。①最后决议：(1)募集自由捐；(2)根据金额数量，组织演说团赴各省演讲；(3)派代表赴东三省、云南、上海三处；(4)在上海创办日报，作为总机关，联络各省谘议局及公共团体，力图救亡。散会时到会诸人重签姓名，相互勉励说："凡我中国男儿，当有决心，无论前途有如何危险障碍，吾辈必毅然行之。"②

4月6日，发布《留日中国国民会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详述成立经过及与使署交涉情形，批驳对该会的种种谣诼和误解。《意见书》放弃了组织"国民军"的提法，声称国民会的宗旨在于"兴团练，办体育"，"人以武力来，我不可不以武力应"，要求清政府"许民间以讲武之路"。③同日，又发布了经过修订的《中国国民会章程》，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④。18日，归国代表、同盟会员黄嘉梁（云南）、萧德明（四川）、蒋洗凡(山东)、金树汾(东三省)、王葆真（直隶)、傅梦豪（浙江）等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第一批代表归国之后，留日学界只平静了几天，一个新的高潮又出现了。

4月上旬，上海《时报》、《民立报》陆续刊载了一项惊人的消息，列强派大员在巴黎集会，商议瓜分中国。这则消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革命党人为鼓舞民气而有意编造的。果然，留日学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由拒英、拒法、拒俄发展为全面反对瓜分的爱国运动。23日，留日学生总会、留日学生国民会再次召开大

① 《中国国民会总会文件》。
② 《留东国民会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③ 《神州日报》，1911年4月6日—14日。
④ 《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

会。在会上，云南留学生赵某指责清政府为“外人之走狗”。直隶学生王某说：“有一言告满族兄弟，今日中国处此瓜分时代，满人也要亡了，汉人也要亡了，满汉皆亡，争持什么呀！”他表示，“今日要救国，第一是泯除满汉。”①会议作出11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清政府禁止国民会，当以不纳税相抗；（2）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政府；（3）不言满汉二字，以免侵犯满汉一致之权利；（4）再次派遣代表归国，联络各省谘议局，协力工作；（5）向世界各国华商团体募集国民会之基本金。②显然，与会者正确地认识到，在瓜分危机面前，满汉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而能将“满族兄弟”和清政府加以区分，对“满族兄弟”，强调“一致之权利”；对清政府，强调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这是正确的决策。

会议前后，各省同乡会陆续选出归国代表约57人。他们归国后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运动。

除留日学生外，留德、留美学生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2月21日，留德学会致电京沪各报，声称：“俄以兵要约，掠地、侵权，时势危急，各国亦不直俄，望速筹救亡，并迫求政府力抗。”③3月3日，再电上海《神州日报》等，指责“当局昏庸误国”④。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也摆脱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于4月初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各省谘议局称：“俄约败，瓜分著，速鼓民气，倡民捐，练民兵，为国效死。”⑤从而表明他们和留日学界以及国内运动发展相一致了。5月，由依利诺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起，成立军国民期成会，提倡尚武。29日，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议决改名为爱国会，以“保全主权，联络友国”为主旨。⑥

---

① 《民立报》，1911年5月4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大会》，明治44年(1911)4月23日。
③ 《柏林华学生公电》，《时报》，1911年2月22日。
④ 《留德学会电》，《神州日报》，1911年4月2日。
⑤ 《留美学生公电》，《民立报》，1911年4月4日。
⑥ 《美洲通信》，《民立报》，1911年8月23日、9月2日。

特出 ○ 告

敬啓者英兵太猖獗偏方長賊政監督之局已成瀛寰心靈之態日急近駐英法兩俄德電告政府各國在巴黎大開會議商定瓜分範圍嗚呼我可激可發之海外同胞人非木石孰能不睹山河而驚心即有花戒亦當聞風雷而變色爰訂三十一日(日曜)自午前八時至十二時開全體大會於神樂坂門等與藝館凡我留東同學邦人諸友同舟大難何各舉趾之勞半日春陰藉圖揮戈之計特此警佈務希一惠臨不勝公盼

留日學生總會 國民會 公佈

图十八 留日学生召开救亡大会公启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清末时，云南有一批学生在越南求学，当他们得悉法军陈兵滇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清政府，要求迅速调拨北洋新军迎敌。其后，又刊发小册子，报告法国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云南的情况，作者沉痛地问道："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夷，被人掠夺"，"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建议就地征兵，编练新军，以便保卫乡邦。①

三大洲的中国留学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少见过的事例。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奋起与国民总会的成立

继留日学生之后，上海各界奋起响应。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尤为活跃。

2月26日留日学生全体大会召开后，云南留学生、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即束装归国。3月5日，到达上海，至《民立报》社会晤宋教仁。旋即发布《通告书》，力陈保卫片马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不欲为亡国民，则必预备死战"，"我国人欲死战，则必先练民兵"②。9日，马良、王河屏等人响应云南谘议局的号召，发起组织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并称此举欲"联四百兆有用之身"，"以为政府后盾"③。11日，分会在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同盟会员朱少屏、王九龄、沈缦云和女医生张竹君等相继发表演说。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沈缦云称："前保矿会、保路会等都无实力，以致未能收效。此次应准备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云南警告》。
② 《滇代表通告书》，《帝国日报》，1911年8月14日、15日。
③ 《时报》，1911年8月10日。

实力，庶几收获巨效。"[1]会后，马良再次发表公告，宣布改名为国界调查会。

3月12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沈缦云、王一亭(银行家、工业家、同盟会员)、虞洽卿（轮船公司创办人、银行家、工业家)、胡寄梅（钱商)、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银行、面粉业投资者)、袁恒之(布商)等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声言"西北风云迫在眉睫，同人等现拟组织义勇队，以筹对付之策"[2]。当日召开大会，到会者千数百人。沈缦云提议，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俟各处商团成立，再行组织义勇队，以达"人自为兵"之目的。宋教仁在会上阐述了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修约诸问题的由来，认为"小至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3]会后，即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为全国商团事务所，一面分函各省商团，一面接受工商各界报名。至3月19日，工商、学、绅各界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商余学会是上海商界最早响应的团体。3月17日，它通告招收16岁以上青年进行兵学、徒手、器械、枪操等各种训练。培养"商战人材"，"建立商团基础"。[4]

与组织商团同时，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敢死团，并于3月3日发表公启，宣称："外患日迫，强邻胁我以兵，处此危急之秋，非有死士起而捐躯，毁家纾难，断难救祖国危亡。"[5]至4月20日前后，报名男女共150人。该团以朱家骅为团长，团址设于张静江的通义银行内。它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等人的积极支持。

为资助商团，夏月珊、潘月樵等艺人在新舞台演出《国民爱国》新剧，将所得戏资均作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经费。演出中，观

① 《中国保界大会记事》，《时报》，1911年3月12日。
② 《上海南北商团均鉴》，《神州日报》，1911年3月12日。
③ 《记全国商团联合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
④ 《神州日报》，1911年3月17日。
⑤ 《全国同胞公鉴》，《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

众感泣，争先向台上掷捐。沈缦云即席发表演说称："今日并不愿来观新舞台之《国民爱国》，实愿来观诸君之爱国。"① 4月9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名誉正会长暂缺。张瑞兰在会上发表演说："四民之中，士农工三者均无团，惟吾商团发起联合会，可知商在民中，最为热心有志者。"②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③

商团最初只是商民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家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

受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的影响，4月23日，朱伯为等在西园开会，组织中国学界联合会。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词，他说："当今时代，当固结团体，一手保守自己，一手抵御外侮，则列强不能侵入。"刚刚归国的留东国民会代表傅梦豪、黄嘉梁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④

傅梦豪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月26日，他们举行招待会，上海知识界及商界头面人物沈敦和、王一亭、沈缦云、杨千里、陈其美、包天笑、朱少屏等二十余人出席。傅梦豪在答词中表示："愿联合各界组成一大团体，作总机关，以激发全国。"⑤

5月7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

① 《丽丽所观剧记》，《民立报》，1911年3月21—22日。
② 《商团之风云大会》，《民立报》，1911年4月10日。
③ 《全国商团联合会缘起》，《民立报》，1911年4月12—17日。
④ 《全国学界联合会事》，《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
⑤ 《国民会代表记事》，《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

武体操会、云贵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等十团体发起召开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会上，傅梦豪再次提出："全国团体总机关之设，为我人不可刻缓之任务。"①11日，傅梦豪及山东归国代表蒋洗凡邀请上海各团体及报馆记者集会，讨论成立事务所。6月11日，上海各界4千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总会成立，以沈缦云为正会长，马相伯为副会长，叶惠钧为坐办。15日发布宣言，声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②次日，又布告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设立分会。为了支持国民总会，留日中国国民会并派同盟会员章梓到上海工作。

自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上海商团发展迅速。书业、参药业、豆米业、珠玉业、水果业及闸北、沪南、回教等商团纷纷成立并开操。根据7月26日叶惠钧在沪南商团体育研究社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上海商团已发展到2000人之多，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了。③

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后，福建、南昌、营口等地陆续建立商团，通州商团还派人到上海联络。《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为通商之大埠，上海商学界之举动，国人恒取为模范。今沪商既有义勇队之组织，全国商学界必竞相效法，将来我国民兵之基础，或因是以立，未可知也。"④作者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如果引导得法，商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发展并非没有可能。

## 四、清政府的禁阻与运动向各省的扩展

运动首先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安。

① 《欢迎国民会代表》，《民立报》1911年5月9日。
② 《民立报》1911年6月15日。
③ 《商团体育开幕记》，《光华日报》，1911年8月19日。
④ 宣（林白水）：《论上海华商组织义勇队事》，《时报》，1911年3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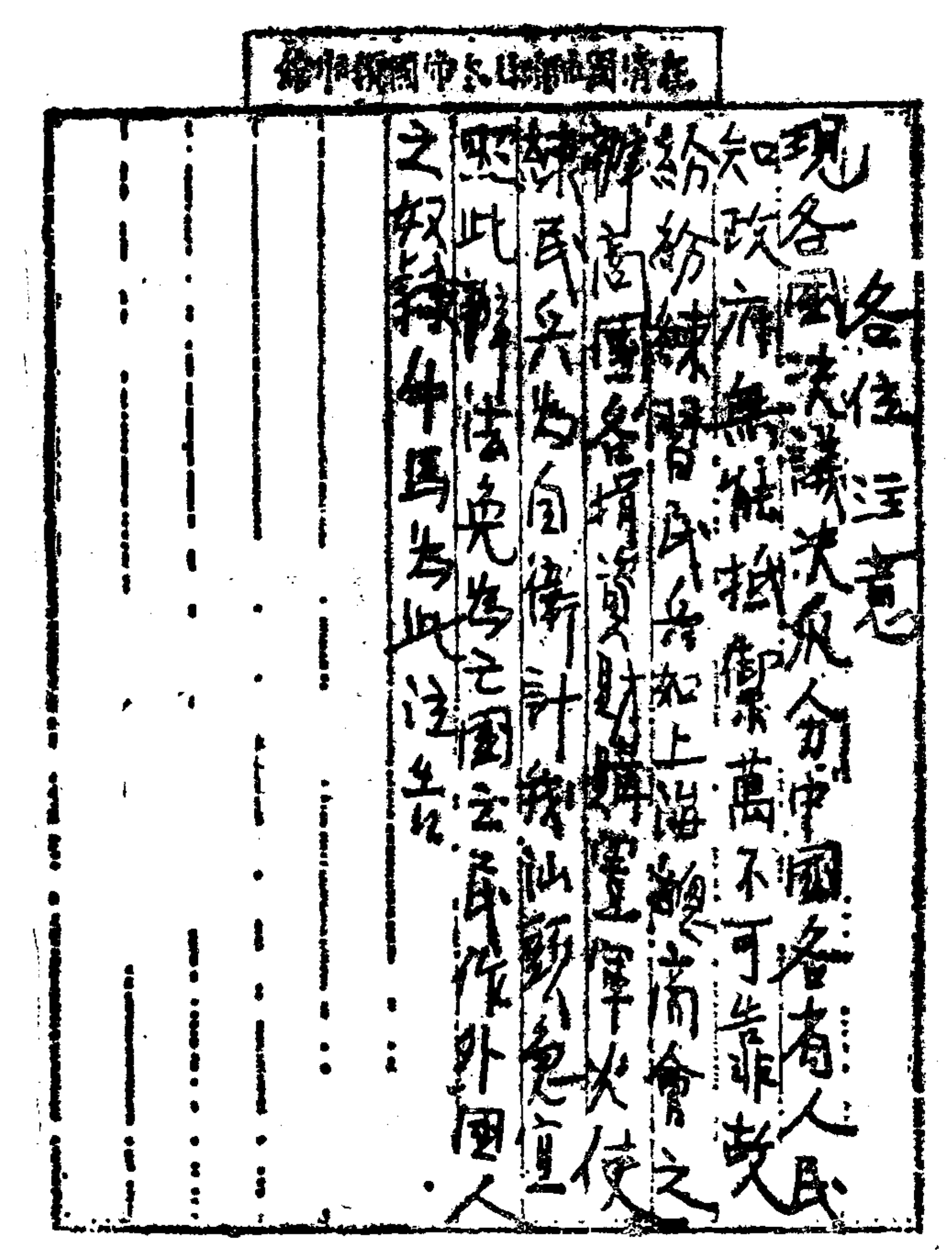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声称京外各报，登载中俄交涉事，“肆意诋毁，摇惑人心，请设法抑止”[①]。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也照会外务部，反对中国人民普练民团。照会说：“近来奉吉各处商民，啸聚日多，日夜操练，名为防匪，实系排外，若不即时查禁，恐又肇拳匪之祸，务请设法解散，以遏乱萌。”[②]

清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3月1日，外务部致电各省督抚，指责外间报纸关于片马、伊犁的交涉“言多失实”，又指责留日学生的举动“摇惑人心，牵动全局”，要求各省督抚“解释谣言，严密防范，勿任酿成事端”。[③]同时，汪大燮也密电外务部，声称东京留学生“其势汹汹，不可复遏，诚恐激成暴动，关系大局，请转致学部、陆军部设法预防。”[④]其后，清政府学部、陆军部、政务处纷纷致电各省督抚，要求“切实查禁”，“严加防范”，甚至声色俱厉地表示：“嗣后倘有前项情事，惟各该主管是问。”[⑤]在清政府的严词督责下，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吏纷纷照办。

首先是控制舆论。早在2月下旬，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根据清政府新近公布的报律，出示禁止各报登载中英、中俄、蒙藏交涉各事，违者罚款，或将记者监禁六个月。[⑥]3月初，汉口某报登载留日学生来电，湖广总督瑞澂立命巡警道传谕各报馆，不准刊登有关函件，违者按律究罚。[⑦]

其次是禁止开会集议。瑞澂称：“边务交涉，朝廷自有主持，岂容无知学生开会干预。”[⑧]陆军部要求各省陆军学堂严禁学生预闻。保定陆军学堂有几个学生试图开会，竟被诬以“将据火药库

① 《呜呼中国人之言论自由权》，《帝国日报》，1911年3月16日。
② 《国民军乎拳匪乎》，《神州日报》，1911年3月18日。
③ 《外务部致各督抚英人进兵片马事报传失实请解释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九。
④ 《汪大燮电告外务部》，《时报》，1911年3月13日。
⑤ 《电报中之国民军》，《民立报》，1911年4月13日。
⑥ 《时报》，1911年2月23日。
⑦⑧ 《瑞督饬禁组织国民军》，《时报》，1911年3月10日。



各位注意
現各國決議決瓜分中國各省人民
知政府無能抵御萬不可靠非故
紛紛練習民兵加上海總商會之
辦商團各捐資財購置軍火使
練民兵為自衛計我汕頭人急宜
照此辦法免為亡國之民作外國人
之奴隸牛馬為此注告

图十九　汕头各界号召练习民兵，举办商团的传单（1911 年）
（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作乱"①而遭逮捕。

清政府尤为恐惧的是结社。当时，清政府虽已颁布结社律，但那不过是一种装饰。保界会向清政府申请立案时，清政府即以"国家政事不准干预"为理由，通电各省禁止。②对于敢死团，清

① 《保定消息》，《神州日报》，1911年3月22日。
② 《保界会又将查禁》，《民立报》，1911年3月22日。

政府更为惶恐，密电江督，“严查团内主名，速行驱散”[1]。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后，驻日使馆向清政府报告，“广东革党起事，确系国民会主谋”，要求拿办归国代表，于是，皇族内阁立即电令各省严防国民会员至内地“煽惑”，并查禁国民军。[2]但是，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运动还是在一些省份内得到了发展。

东北　留日中国国民会派赴东三省的代表王葆真(卓山)、金树芬（鼎勋）于4月下旬抵达奉天后，即从事公开和秘密两方面的活动。公开活动有：会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联络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组织体育会及国民会奉天总会，同时又注意团结满族、蒙古族爱国人士。他们还在旗籍人士广铁生、关天生的积极支持下，创办《国民报》。秘密活动有：会见陈干、商震、刘艺舟等同盟会骨干，决定分头联络同志，促进革命运动。[3] 9月14日，国民会吉林分会成立，以蒙古族人士庆山、杨梦龄为会长，满族人士松毓为副会长，金树芬为干事长。[4]

福建　3月中旬，福州城乡大量出现速办团练的传单，陈述英、法、俄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声称“在今日欲求自保之道，莫如筹办乡团”。传单还要求“乡乡有团，人人能兵”，“由一乡而一县，由一县而一府，由一府而一省”，形成乡团的大联合。22日，福建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仿照上海办法，筹办福州商团公会，规定每一商号至少须出一人入会操练[5]。26日，闽县城镇自治联合会提议市区组织商团，近郊组织体操会，乡村组织农团[6]。4月7日，上海福建学生会急电福州《建言报》，声称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要求故乡父老“速办民团，图死抗”。

① 《敢死团消息》，《神州日报》，1911年3月26日。

② 《民立报》；1911年5月12日，《光华日报》1911年7月4日。

③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98--401页。

④ 《吉林通讯》，《民立报》，1911年9月18日、29日。

⑤ 以上引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时局ニ関スル福州民间运动模样报告ノ件》，明治44年(1911)3月31日。

⑥ 《闽人报告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3月31日。

此后，《建言报》连续发表《呜呼福建》、《再告我福建同胞》等文章，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拯救福建①。5月上旬，留日国民会代表孙容居等30人及福建旅沪同乡会、学生会代表等结伴归闽，访问谘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22日，谘议局、教育总会、商会、实业协会等团体集会，议决用个人名义签禀呈递闽督，请求速办民团。

在各方倡议下，厦门体育会、建宁府体育会、福州商团、霞浦团练筹备会、福建团练期成会等先后成立。

浙江 6月上旬，留日学生代表俞景朗、詹麟来、吴玉、李砥、李复真及旅沪同乡代表许开甫等回浙，访问谘议局议长沈钧儒。15日，在法学协会集会，决定组织全浙国民尚武分会，推沈钧儒起草章程。该会发起人除沈钧儒外，还有同盟会员陈训正（布雷）、许炳堃、褚辅成及地方知名人士经亨颐等②。30日，该会召开成立大会，以徐班侯为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上海国民总会代表章梓、陈其美自沪莅会，以示支持。

全浙国民尚武分会要求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团、商团、工团、农团。成立会后，俞景朗、李砥、吴玉、陈训正等分赴绍兴、台州、湖州、衢州、宁波、嘉兴、严州、金华、嘉善、石门等地活动，陆续建起了一部分国民尚武分会和民团。

运动发展得较为顺利的还有山东、江苏等省。留日山东国民分会所派代表丁惟汾、颜仲文于6月1日抵达济南，遍访绅学各界，先后在谘议局、教育总会等处召开谈话会，决定成立山东国民分会。江苏由于工商业、教育业较为发达，因此，无锡、南通、苏州、宜兴、江都、丹徒、丹阳等地普遍建立了国民分会、商业体操会、体育会、商团体育会一类组织。此外，运动在云南、广西、广东、湖北、直隶等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内反帝运动的发展。3月份，秘鲁侨商

---

① 《建言报》剪报，见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677—688。
② 《浙江国民会又盛》，《民立报》，1911年6月11日。

何贺民等致电粤商自治会称，秘报盛传瓜分中国，侨民震悼，迄速电复，并分呈各界。① 同月，横滨华侨致电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声称"列强无理要求，南北进兵据扰"，要求"筹策对待救亡"②。5月28日，横滨富商张泽广、缪菊辰、邓浩辉等人发起召开在日华侨大会，邀请李肇甫、马伯援、夏重民等参加，呼吁创设国民军，并募集经费。侨商们表示："能救中国者，吾辈愿生死供养之。"③ 同月下旬，泗水华侨散发传单，主张"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联合各省民团，倾覆恶劣政府"④。6月初，泗水书报社发起筹集救亡捐，以之作为国民军的后盾⑤。不少华侨表示："区区军费，当竭力相助。"

上述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存在，只要清政府坚持媚外卖国政策，那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不可阻遏的。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之后不久，保路运动又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并且迅速演变为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武装起义。

## 五、同盟会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同盟会领导层在1907年春夏之后，即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长期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灰心失望，并一度产生过抛弃同盟会，另建新党的打算⑥。这种情况到1910年冬才有所改变。当年6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日本后，陆续会见了同盟会骨干。11月，又命刘揆一复兴同盟会本部。自刘揆一被推为庶务，一批新人进入本部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专注于发动武装起义，就其主要方面来

① 《秘鲁华侨来电》，《时报》，1911年8月6日。
② 《横滨公电》，《时报》，1911年8月5日。
③ 《华侨创设国民军》，《光华日报》，1911年6月27日。
④ 《民族思想之发达》，《光华日报》，1911年5月26日。
⑤ 《光华日报》，1911年6月7日、7月8日。
⑥ 参阅拙作《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的重建》，见本书第126页。

说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合法斗争，忽视群众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当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生、发展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心一意为筹备中的武装起义募集经费。他既对国内情形隔膜，又怀疑群众热情的持久性。曾经有人向他汇报上海敢死团的情况，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声称："上海之发生团体向无能坚持长久者，料此团亦不能免蹈此弊。"① 当然，不能认为孙中山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必须指出，孙中山不懂得将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使之坚持下去，正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军事起义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波起浪涌，相互促进。和孙中山一样，黄兴也未能对运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曾经有人建议，革命党应利用人们反对英军占领片马的爱国情绪，在云南发动起义，但黄兴由于顾虑会引起国际纠纷，决意将起义改在广州发动。② 起义失败后，他为复仇主义情绪所支配，力主以个人之力进行暗杀，仍然忽视对运动的领导或指导。

尽管如此，熊越山、李肇甫、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叶惠钧、刘基炎、陈策、夏重民、孙竹丹、傅梦豪、黄嘉梁、杨大铸、蒋洗凡、萧德明、王葆真、袁麟阁、陈训正、褚辅成等一批同盟会员仍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运动。他们不仅在各类组织、各类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盟友，表现出一定的斗争艺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虽然衰朽不堪，但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仍然十分坚决。2月26日的留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军，其后改名国民会，废弃组织国民军的提法，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因为既名之为"军"，则不仅在日本无法活动，在清政府统治下也无法活动。运动中，同盟会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国民会这一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部分激进分子曾经主张抛弃国民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1页。
② 《黄毓英传》，《南社》第10集。

会，“以破竹之势与满洲政府肉搏”①。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力争不提出激烈的口号，不超出合法斗争所许可的范围，一切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以“留日全体学生公启”名义发出的《中国危亡警告书》特意加上“圣上御极”、“两朝圣后，忧国爱民”一类的保护性字眼，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还力图说明：“国民会唯一之目的在救国，国为大家共有，则救之之道须大家努力。”②此外，《哀告同胞书》声明国民会不提倡革命，归国代表的活动也规定为不得鼓吹革命。所有这些，都便于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并使清政府的镇压失去有力的借口。归国代表们之所以能在国内开展某些活动，这是原因之一。

同盟会的本部设于海外，其活动方式一般为在海外策划，在边疆或沿海地区发动起义。这种“输入式”的革命便于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军饷，其缺点是难于和国内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缺少立足生根之地。留日国民会决定将中国国民总会设于上海，在各地设立分会，这就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国外转入国内，从边疆转入腹地，从而有利于国内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后来，同盟会中部总会将本部设于上海，在各地设分会，显然也出于同一考虑。

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政府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

② 《国民会代表记事》，《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

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谘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谘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谘议局进行工作。2月2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参加抗争。3月3日，云南谘议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①。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谘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谘议局联系，在谘议局的赞同下，或以谘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谘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政府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运动中，同盟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决不足以成事。4月23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政府，会议并就此作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贯彻这一决议，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在运动中，某些同盟会员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例如刘揆一于3月上旬发表的《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主

① 《云南公电》，《时报》，1911年3月5日。

张“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意见书克服了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各民族人民在反对瓜分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书说：“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意见书提出了在各族人民之间“通气谊”、“通业学”等计划，认为这样“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权。”① 这是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宋教仁、于右任、范光启等人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宣扬爱国主义，为运动推波助澜，其中，以宋教仁的作品为最突出。他先后发表《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承化寺说》、《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俄人何足畏哉》、《讨俄横议》等文，从世界大势、边疆地理、对外交涉等方面立论，说明“对英划界”、“对俄改约”，是“近日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他指责清政府“聋聩成性”、“冥顽不灵”，不知“国际政局推移变化之理”，号召国民“急起直追，以自为计”②。他和陈其美等一起，在联络上海资产阶级、推动商团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鼓吹和实行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07年以后，它的弱点、缺点也已充分暴露，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的上述做法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稍后，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进行这种转变。但是，形势不等人，在同盟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的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响起来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6141，512—513。

② 《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民立报》，1911年3月16日。按，《宋教仁集》对此文及《俄人何足畏哉》均失收。

# 汤化龙密电辨讹

## 一

汤化龙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曾任湖北谘议局长、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总参议、秘书、政事部长等职。多年来，不少史学著作都把他定为两面派，是一项重大反革命密谋的参与者①。其根据是：他一面参加湖北军政府，表示拥护革命，另一面又串连多人，秘密打电报给清政府，表示尽忠，阴谋推翻革命政权。由于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汤化龙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关系到对清末立宪派的认识，也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分析湖北军政府的内部斗争，因而，不得不作一番认真的考察。

汤化龙等密电清廷一事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开始流传，但见之于文字记载则较晚，胡祖舜《六十谈往》一书说：

据其文案之同乡人林某，于民国二十八年，在四川北碚东阳镇语余及李翊东曰："当日逢时、连甲，曾密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武昌谦记土庄经理李国镛(号玉珊，沔阳人，人咸呼为李老板者)，并自称黎元洪代表之蔡登高（自称南洋某中学投效者)、张振标（张彪弁目)等(时此数人已附革命军，出入于军政府)，开会数次，意图剿灭革命军，曾联电清廷请兵，谓元洪系胁迫而出，其电文即由化龙起草。"此其密谋，世人

① 见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命革运动》，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8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8页；章开沅:《武昌起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页；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43页。

鲜有知者。①

这一段记载很具体，涉及者除汤化龙外，有清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湖北布政使连甲、鸦片商李国镛、黎元洪代表蔡登高、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弁目张振标等，共六人。情况的提供者则是柯逢时文案的同乡林某，是他亲自对胡祖舜和李翊东讲的。胡祖舜并说：蔡登高、张振标利用在黎元洪身边伺候的机会，暗中勾结原工程第八营后队排长、军政府卫队司令方定国，阴谋叛乱。10月14日傍晚，有大汉持灯来，以纸条匆匆交给方定国，方阅后立即撕碎咽下。事为当时任军政府叙赏长的李翊东发觉，即时逮捕方定国。经审问，供出与蔡登高、张振标同谋。结果，三人被枪决。连甲因事败，央求林某带领，于10月16日夜自武昌汉阳门缒城逃出。②

李翊东是和胡祖舜同时听林某谈话的人。他回忆说：

> 柯逢时（膏捐局督办大臣）与黎元洪暗通消息，阴谋反动，如果事情成功，由柯代黎向清政府讲情；如果事情失败，由黎庇护柯逢时。当时汤化龙(谘议局议长)、连甲(藩台)、马吉樟（臬台）几个人在柯家聚会，由汤代连甲拟电稿，大意是："鄂军变，总督不知去向，请速派大军南下，并另委总督。"此电由林敬之（此人现尚在重庆行医）发出，又由连甲乘夜越城到河南请兵。③

这一段回忆与胡祖舜的记述大体相同，不少地方进一步具体化了。如：有了聚议地点——柯逢时家；参与密谋的又多了一个人——提法使马吉樟；汤化龙起草的电报有了具体内容；文案的同乡林某名叫敬之，电报就是他发出的。李翊东还有另一段回忆，又进一步补充了若干细节：电报是打给清政府军机处的，"化龙主稿，逢时领衔"，电文为："鄂军变，督抚、统制不知下落，黎元洪

---

①② 《六十谈往》，1944年版，第29页。

③ 《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一)，1957年版，第10—11页。

暂带鄂军，请速派大军南下，以平此变。"除电报外，还有一个条陈，要求清政府大赦党人，以汉人为总督，请以陈夔龙复任，总督湖广，黎元洪升统制等。李翊东并指出，连甲躲在柯逢时家，是半夜改装易服，由林静〔敬〕之引导，自平湖门缒城而出的。①

在胡祖舜、李翊东之外，章裕昆也谈及此事。他说：

> 湖北省谘局议长汤化龙，当起义之夕，匿不敢出；至二十日知瑞澂、张彪已逃，革命军抢占武昌并拥出黎元洪，遂乘机而与革命党周旋。又虑其不稳，乃于军事未定之际潜往六省烟膏督办署，向督办柯逢时借用密电码，电告清廷，谓湖北全军兵变，化龙决不从逆云云。首鼠两端，可耻孰甚！②

章裕昆的这段记载较为简略，只补充了一个细节，密电码是向柯逢时借用的。

上述记载，虽有相互龃龉之处，有些情节也有明显的破绽，例如：李国镛，作为一个鸦片商人，有什么必要邀请他到会？张振标，只是张彪的弁目，又有什么资格能和"大人物"们并列？但有关人士言之凿凿，因此，不少研究辛亥革命的史家均深信不疑，视为可靠的史料。但是，笔者经过考察，觉得有关说法纯系讹传，并不可信。

## 二

胡祖舜、李翊东的回忆都涉及连甲。在传说中，他是柯宅反革命密谋的核心人物，密电的联名者，又是越城请兵的使者。他

---

① 《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39页。

②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5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第45页。该书1952年第1次印刷本没有这一段记载。1964年，章裕昆在《有关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史料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中放弃了这一简略的记载，改用胡祖舜说。但他故弄玄虚，声称是根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材料写的。笔者查阅过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全部实录馆材料，发现章裕昆实际上是根据居正《梅川日记》写的，而居正又是听胡祖舜说的。

在武昌起义之后的活动日程是怎样的呢？

连甲10月21日《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云：

> 窃连甲自八月初一日到湖北藩司任，至十九日（10月10日——笔者）即遭兵变，守库护勇，仅念八名，督率竭力守御。匪用大炮轰毁头二门，幸大堂先备有土袋垛积，得以隐身抵御，枪毙悍匪多人。奈子弹告罄，电话又断，相持至晓，藩署攻破，不得已避至署后土膏大臣柯逢时宅。探得瑞督院（指湖广总督瑞澂——笔者）已登兵轮，当恐印信有失，交与柯逢时敬谨收存，追出城外，奔赴兵轮，协图恢复。蒙瑞督院饬委，督办粮台。①

这封电报告诉我们，10月10日夜革命党人起义之后，连甲曾督率士兵守护布政使衙门和仓库，一直打到11日早晨，衙门被攻破，随即躲到近旁的柯逢时家。在那里，打听到总督瑞澂已经逃到长江兵轮上，连甲即将布政使的大印交给柯逢时保存，然后追出城外，奔赴瑞澂乘坐的兵轮，被委任为“粮台”，督办粮草军需。电报没有说清逃离武昌的具体时间，但这是可以查考的。《欧阳萼致袁世凯书》云：

> 方伯困在危城，二十日之夕，始由柯绅逢时令其乔装，遣人护送潜出。②

方伯，明、清时代对布政使的美称，这里即指连甲。二十日，即阳历10月11日。信中说，连甲是听了柯逢时的话，“乔装”打扮，被人护送偷偷地出城的。这与胡祖舜、李翊东所说，连甲半夜改装易服，由林敬之带领，缒城而出是一致的。

又，《瑞澂等报告武昌失守请派援兵电》云：

> 湖北布政使连甲、提学司王寿彭、交涉使施炳燮、巡警道王履康，均已微服出城。③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8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70页。

微服，也就是“乔装”的意思。本电发于10月12日。两相印照，可证连甲在10月11日夜已经逃离武昌。胡祖舜定为10月16日是错误的。如果汤化龙、柯逢时、连甲、李国镛、马吉樟、蔡登高、张振标等确有一次聚会，那末，只能在11日晨至当夜连甲缒城而出之前。这一天上午，汤化龙先是在家中接待来邀的革命党人代表，后是应邀至谘议局讨论推举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的问题，下午，仍在谘议局讨论各项进行策略，[1]根本没有时间到柯逢时家参与密谋。如果是在当夜，汤化龙是有时间了，但一下子串连六、七个人也很不容易。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柯逢时们要摸清彼此的政治态度需要时间，当天晚上就召集这样的反革命黑会，怎么可能呢？而且，军政府刚刚成立半天，黎元洪就能与柯逢时“暗通消息”，并有一“代表”蔡登高参加会议，这也是很难想象的。

在10月11日至12日之间，连甲确有一封电报打给清朝政府，全文云：

> 内阁王爷中堂钧鉴：鄂垣内外兵士倒戈，甲只身困守，命悬须臾。盼救。火速。连甲。[2]

文内说：“只身困守，命悬须臾”，既不是在布政使衙门督率士兵拒守时的口气，也不可能是逃离武昌之后的产物。连甲在布政使衙门被攻破后就逃到了柯逢时家，显然，这是在柯宅惶急无措时草拟的。本电未署发报日期，清政府的收报日期是10月12日。护送连甲出城的林敬之曾自述发过一封密电，那末，本电的发出者应该就是他。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只有一个连甲，足证所谓六、七人密谋并联电，“化龙主稿，逢时领衔”之说，完全不可靠。而且，这样小小的一份电报，连甲又有什么必要借手

---

① 向讦谟：《治国日记》云：“(10月11日) 午后，偕同学等在谘议局院内齐集休息，蒋同傅、李二人至局，与汤议长济武（即汤化龙——笔者）、胡议员子笏、李君玉山、蔡同学国桢会议我军进行策略。”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于他人呢？

上引《瑞澂等报告武昌失守请派援兵电》又云：

> 刻由匪党与湖北谘议局公推原派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首，并由议员为之主谋，安民告示即用鄂省大都督称，并悬白旗，上书兴汉灭满，悬赏拿官字样。①

此电特别说明，黎元洪系"匪党与湖北谘议局公推"，"并由议员为之主谋"。瑞澂发这封电报时，连甲已经"微服出城"，并且显然已经到了瑞澂身边，他当然会向瑞澂报告自己在武昌的活动情况。如果作为谘议局议长，又参加了"公推"黎元洪的军政府成立会的汤化龙确曾和连甲之间有过密谋，并联名发电，那末，瑞澂这里怎么会狠咬"谘议局"及其"议员"们一口？

连甲后来还有一份呈文递给受清廷之命，主持湖北军务的袁世凯，内容、文字与前引《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大体相同，自述在柯宅的一段则较为详细，中云：

> 相持至黎明，藩署始被攻破。复拟赴督署，为乱兵所阻。绕至统捐大臣柯逢时宅，正在悬赏募人通信。适探瑞督已登兵轮，柯大臣即嘱趋赴舟次，同谋恢复。又恐印信有失，交由柯大臣敬谨收存。连甲间道出城，奔赴兵轮，禀商一切。②

这份材料说明了，在连甲逃到柯宅之后，柯逢时先是"悬赏募人通信"，后又探得"瑞督已登兵轮"，再又嘱连甲"趋赴舟次，同谋恢复"，二人之间确有密谋。但是，这份呈文连同前引《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都绝口未提召集汤化龙、李国镛、马吉樟、蔡登高、张振标密谋并联名发电事，这当然不会是疏忽。第一，有汤化龙这样身份的人物打入湖北军政府，这是最重要的军事情报；第二，连甲是管理湖北财政、民政的大吏，"库储失陷，究

---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69页。部分文字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校正。

② 转引自《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属罪有应得"。[①] 如果确有其事，他当然会向清政府和袁世凯报告，借以邀功抵罪。试看他在电文中如何自述"竭力守御"，"抢毙悍匪多人"即可以明白其心理。但是，在柯宅的经历，却只提了柯逢时一人。这就说明，在10月11日上午至当夜，根本不曾有过传说中的那样一次反革命密谋会。至于所谓"开会数次"，更加不可能。以后，连甲即受瑞澂委托，"督办粮台"，也不曾潜入武昌，和柯逢时、汤化龙等有过什么串连。

## 三

至此，连甲、汤化龙之间不曾有过什么密谋，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还存在着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汤化龙、柯逢时、李国镛等人之间有过密谋，而误传为连甲在内呢？这就必须进一步考察汤化龙等人在革命前后的情况和政治态度了。

作为君主立宪派，汤化龙不赞成革命。但是，人是会变化的。汤化龙原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在维护川、粤、汉路权上和清政府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09年11月，他在汉口联络绅、商、军、学各界组织商办铁路协会，和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当时人回忆说：在湖北铁路协会成立大会上，汤化龙曾历数时政的腐败，特别严厉抨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邮传部把张之洞费了很大力气收回来的川、粤、汉铁路建筑权重又送给外人，无非是想在借款时攫取巨额回扣，是媚外肥私，丧权卖国。他号召湖北全体同胞踊跃筹集筑路款项，抵制外债，争回路权，以救亡图存。[②] 1910年11月，立宪派所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清政府发布上谕称："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③] 这样，国会请

① 连甲：《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

② 李建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80页。

③ 《宣统政纪》，卷四五，第4—5页。

愿代表团便被迫解散，立宪派分子对清政府的愤懑增加了。汤化龙与四川立宪派头子蒲殿俊等在北京密议："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① 此后，汤化龙开始向革命派靠拢。1911年春，文学社革命党人刘尧澂通过李廉方介绍，曾经和汤化龙有过一次晤谈。其间，刘、李二人谈起，有人去武胜关"察看"，缺乏路费。汤化龙听说，立即资助二十元。② 刘尧澂的身份，汤化龙不会不清楚；去军事要地武胜关"察看"什么，汤化龙也不会不明白。他拿出的钱数虽不多，但却表现了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同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汤化龙于入京前，在汉口车站发表了慷慨激烈的演说。此后，联合会曾两次上书清政府，反对皇族内阁，都遭到清政府呵斥。这样，汤化龙等和清朝贵族分享政权的幻梦最后破灭。在此同时，保路运动发生，蒲殿俊一度表示："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他派出代表与湖南、湖北、广东各省谘议局联系，声言："四川准备已甚充足，以袍哥、棒客为基础，人数众多，遍布全川。将来举事时，尚求各省协助，以祈早日成功。"③ 9月7日，蒲殿俊等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汤化龙等对清政府的愤懑就更为强烈。有人回忆说：

> 川汉铁路问题发生……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因与其平日最亲信的胡瑞霖、阮毓崧等在时象晋家商议（都是谘议局议员）数次，时受其子功玖（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该参加，不应该

① 参见《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台北版，第314—315页；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香港版，第16页。

② 参见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5页；《前文学社同人公启》，《辛亥革命》（五），第4页。

③ 梁勘时：《湘路案》，《辛亥革命》（四），第551—552页。

避开。汤计乃决。[①]

这里所反映的情况完全符合汤化龙的思想发展逻辑，说明在武昌起义前，汤化龙已经有了附和或参加革命的准备。10月11日，他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会上说："对于革命，鄙人素表赞成。"[②]这里固然有对自己的美化，但也不完全是违心之言。

武昌起义之后，汤化龙主要做了下述工作：

1． 参与创立和支持湖北军政府。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邀汤化龙到谘议局开会，建议他出任都督。汤化龙考虑到时局未定，犹豫过，也心动过，"未有绝对拒绝意"[③]，但他考虑到清政府必定迅速派兵来鄂，进攻起义军，因而建议首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同时表示："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画，兄弟无不尽力帮忙。"[④]这些意见，应该说是认真的、积极的。下午会议结束前，胡瑞霖发言对起义军的严明纪律表示钦佩，自动声言："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⑤]当晚，胡瑞霖即送来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小银锭十五个。[⑥]胡瑞霖与汤化龙是儿女亲家，多年来政治活动的老搭档。他的这一举动自然是征得汤化龙同意的结果。此外，汤化龙还控制着汉口各团体联合会，该会拥有一支商团性质的武装，配备着两千条毛瑟枪。在光复和保卫汉口的战斗中，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出钱、出粮、出人，发挥了很大作用。[⑦]这显然也与汤化龙的态度有关。

2． 以谘议局名义通电全国。电文说："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连合诸公奔赴京都，吁请立宪。乃伪

① 彭伯勋：《我所知道的汤化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②④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③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

⑤ 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69页。

⑥ 向讦谟：《治国日记》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⑦ 朱正斋、李猿公：《清末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竖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又说：“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势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汉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① 该电主要谴责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皇族内阁，确系请愿运动失败之后立宪派心理的表现。应该承认，这份电报在动员各省谘议局人士附和革命上是起了作用的。

3. 演说鼓动、除10月11日下午军政府成立会外，汤化龙还在谘议局台阶上发表过一次演说，略云：“本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既经诸君推举，事已成局，自当尽死报命，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② 当时，有一个在武昌的清朝官僚记载说：“汤化龙等到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第六镇（指吴禄贞所率队伍——笔者）来，已备欢迎’等语，借维众心。”③可见，汤化龙发表演说还不止一两次，他对鼓舞和安定人心是重视的。

4. 对外宣布政策。10月13日，美国领事访问湖北军政府，汤化龙随同黎元洪接见。美国领事问及拟采何种政体，汤化龙明确答复：“共和。”④

5. 动员海军起义。10月12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抵鄂。萨是黎元洪的老师，汤化龙曾建议以黎的名义致书萨镇

---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01页；参见《李国镛起义日记》，第3页。

② 《时报》，辛亥年八月二十八日；部分文字据《各省独立史别裁》（1912年4月版）校正。

③ 王孝绳：《辛亥武昌兵变旅行记》，《辛亥前后》（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04页。

④ 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冰，动员海军起义。[1] 11月，萨镇冰率舰队东下，汤化龙的弟弟、海军高级参谋汤芗铭等在九江起义。九江军政府向武昌请示，湖北军政府即派革命党人李作栋带着汤化龙的私函前去联系。[2] 不久，汤芗铭即率舰队航返武昌，参加对清军的作战。

6．反对谭延闿任湖南都督。10月31日，湖南发生兵变，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立宪派头子、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任都督。11月1日，湖北军政府接得湖南另举都督的来电，当时，还不知道焦、陈已经被杀，黄兴、宋教仁都反对舍焦达峰而另举他人。汤化龙虽和谭延闿是国会请愿运动中的老伙伴，但他也不以谭出任都督为然。他说："军事紧急之秋，一省都督，不宜文士，当用武人。"当黎元洪表示"吾辈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时，汤化龙和黄兴、宋教仁一起离开了会场。[3]

7．参与制订《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是按照共和国理想制订的第一个地方法律。它的执笔者是宋教仁，但汤化龙曾参加讨论，"相与赞赏"。[4]

汤化龙在湖北军政府任职期间也有严重错误。其一为排斥革命党人。参加军政府工作的革命党人大多为新军士兵和青年学生，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因此，军政府一度出现过较严重的忙乱现象。汤化龙借机对军政府进行改组，大量任用原立宪派，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击。其二，在和袁世凯议和过程中态度有某种动摇。汉口被清军冯国璋部攻陷后，袁世凯派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到武昌议和。汤化龙曾为黎元洪起草过一份给袁世凯的复函，中称："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

---

① 《李钦事略》："请黎都督以师生之谊劝其投诚，都督然之，请化龙议书一件，钦持书偕胡鄂公往投。"见湖北省博物馆藏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三）110号；朱峙三：《历变记》稿本同此说。胡鄂公：《武昌起义三十五日记》则云："化龙请黎公致函萨镇冰及各舰舰长，黎公允之，予遂推荐秘书草拟信稿。"见《辛亥武昌首义史编》，台北版，第996页。

② 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206页。

③ 《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25—226页。

④ 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①这里，在是否必须实行共和政体上语意模棱，但在反对清政府这一点上，态度仍是坚决明确的。

综上所述，在武昌起义前夕，汤化龙已经对清政府绝望，有了参加或附和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义之后，他有过犹豫，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场革命的到来是欢迎的、支持的。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密电清廷，参与反革命的串连。

"密电"案还牵涉到李国镛。在有些史学家的著作中，他也是个坏人。但事实是，他虽属立宪派，但却早与吴禄贞等革命党人有来往，曾受到地方绅士控告，称他"借办学之名，内部宗旨恐不纯正"。②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开办时，他都曾捐款支持。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1965年章裕昆发函向张难先调查，其子张彻生答复说：

> 四月二十一日信已念给家父听了，说所询李国镛之捐财资援革命事，因渠个性慷慨，出财资助日知会与科学补习所是事实。在我出狱时，他还送我一点钱的。③

1907年初，清政府封禁日知会，张难先是和刘静庵等一起被捕的九个革命党人之一，后被保释出狱。李国镛对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他在张难先出狱后，仍然肯于资助，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人，而不是一个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狂热分子。李国镛曾经写过一本《起义日记》，叙述他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以后赞成革命的情况，虽不无自我夸耀之处，但和其他史料对勘，不少事情还是可信的。这样的人，当然也不

① 《黎元洪等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3页。所据原件，据字迹判断，认为是汤化龙所写。

② 《李国镛起义日记》，第2页。

③ 湖北省博物馆藏，(三)555号。

会参与推翻湖北军政府的串连。

有些回忆还提到马吉樟。他是清朝官吏，但其人昏庸愚怯。武昌起义后，他先是穿好服装顶戴，坐在提法使大堂上，说是等革命党人来杀，"庶得殉节。"①随即又派人打听向民军的"投降手续"②。显然，也不会参与密谋。

至于蔡登高和张振标，根据现有资料看，他们确实和清方有勾结，也有阴谋，但既与汤化龙、黎元洪无关，也与柯逢时、连甲没有牵连，他们是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派来的。关于此，李翊东回忆说：

> 廿一晚（10月12日），有一大汉手持灯笼，仓皇奔至方定国前处，递一纸条。方阅后即撕，咽口内，该大汉转身欲逃……翊东乃令将该汉抓住，讯知其为旗兵，并供出同谋者有江〔张〕振标、蔡登高等十余人……翊东以方定国通敌证实，遂将方之徽章、军刀及手枪摘下，押入邢伯谦同志军装处办公室。当场又下令将江〔张〕振标、蔡登高及某（姓名忘之）等三人拿获。比即讯知，江〔张〕系张彪马弁，蔡登高皆张派来之侦探。③

李翊东是破案人和主审人，此文写于1930年，是他关于这件事的最早回忆，还没有受到"密电"说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

前引材料已经证明，柯逢时是反对革命的。但他原来是个连办洋务也反对的顽固分子。④后来出任江西、广西巡抚、八省膏捐局督办大臣等职。"性刻薄，善聚敛"，名声不好。⑤他和汤化龙政治上并不是一派，平时交往也不多。武昌起义后不久，他们就

①② 黄中恺：《辛壬回忆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③ 《书吴醒汉武昌三日记后》，手稿，上海图书馆藏。

④ 1899年，西太后召见柯逢时，问他："洋务该如何办？"柯逢时答道："洋务可不必办。近来办洋务之人未必有心国家，总要取心术纯正者办理为是。"见《柯逢时日记》，湖北省博物馆藏稿本。

⑤ 胡祖舜：《六十谈往》，第28页。

能推心置腹，冒险作反革命的串连，这是与情理不合的。①附带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柯逢时的态度也有了某些变化。10月21日，他出任“守中立”的武昌保安社社长，只求“保安”身家了。

综合上述各点考察，笔者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一案不足凭信。

## 四

现在，须要进一步考察“密电”说的由来。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完全荒诞的谣言是不会有市场的。某些讹传之所以能扩散，常常是因为它有某些真实或似乎合理的成分，有特定的背景，结果，以讹传讹，加进去的想像、猜测愈来愈多，距离事实真相也就愈来愈远了。

笔者认为，汤化龙“密电”案就是这样一种讹传。

如前所述，连甲在11日躲到柯逢时家中，二人之间确有密谋，连甲给清政府发有密电，是在改装之后由柯逢时派林敬之送出武昌的。这是事实。

武昌起义之后，柯逢时也给清政府发过电报。《时报》记载说：“闻柯逢时有电至京，纠参鄂督瑞澂辜恩溺职，非明正典刑，不足以折服人心。”②

汤化龙也确实起草过给清政府的电报。湖北军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李作栋回忆说：“(汤化龙)为了表示心无别意，说柯逢时家中有与清廷军机处通电的‘辰密’电码，建议我们利用这个密码，借瑞澂名义向各省打电求援，在电文中夸大革命军声势，以造成清方的混乱。我们赞成这个意见，就由我与陈雨苍两人到柯家取出密码，由汤化龙拟电稿，由夏维崧送往汉口俄领事馆发出，

---

① 居正：《梅川日记》提到的“密电”案参与者还有陈夔龙，其实，陈于1909年已自湖广调任直隶总督，一直未离任。

② 《时报》，辛亥年九月四日。

对俄领事只说这是民军方面的密电。"[1] 当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李钦则说："当获武昌电局送皖抚朱家宝询鄂中革命情形致瑞澂密电一通，钦率人向柯逢时索取密码，当即据来电以瑞澂名义复去，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请即派兵助剿。"[2] 李钦的这段叙述比较简略，但他补充了一个细节，即是由安徽巡抚朱家宝询问鄂中情形的来电引起的。除李作栋、李钦外，李廉方也从汤化龙、胡瑞霖处听说过这件事。他又补充了几个细节：电文内容大意为，瑞澂声言"退驻兵舰，死守待援"；夏维崧向俄领事商洽发报，是冒充瑞澂委托等。[3]

武昌起义初期，各省还处在清方控制下，要扩散武昌起义的影响，对清朝统治者和各省官吏进行攻心战，汤化龙所提建议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于此亦可见汤化龙倾向革命的苦心。据当时在清军谘府任副使的哈汉章说：清廷从俄国公使馆接得转来的电报后，大为惊慌，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竟商量如何退往热河的问题。[4]

李作栋、李钦、李廉方都是当事的革命党人，所述自亦可信。此外，现存文献材料也可以提供一点证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未刊档案中，有河南巡抚宝棻10月14日的一封电报，中云：

> 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各省制台、抚台鉴：辰。武昌失陷，督署密码电本恐已为贼所得，昨晚敝处接汉口车站发来辰密电一件，既未标明辰密字样，下署瑞澂又无印字，种种均与京外通行电式不合，且有借款购粮，运送刘家庙，备大军之用等语，词意支离，尤为可疑。此事关系甚巨，格外留意为幸。棻。漾。

① 《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一），第14页。

② 《李钦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三）110号。

③ 《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5—106页。

④ 《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一），第14-15页。

宝棻接得的汉口瑞澂来电为"辰密"，李作栋从柯逢时处借得，由汤化龙拟稿发出的也是"辰密"，二者相合。"种种均与京外通行电式不合"，"词意支离，尤为可疑"，这些地方，说明宝棻接得的可能就是汤化龙所作的赝品。

笔者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案即系上述几件事的讹传。它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又有若干猜测和想像。

汤化龙原来是立宪派。武昌起义之后，他虽然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的信任，但也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的猜忌。湖北军政府成立不久，军政府中就发生了卫队司令方定国等人的谋叛案，湖南发生了谭延闿谋杀焦达峰、陈作新案，汤化龙本人又确有向革命党人夺权的举动。这些地方，都会加强革命党人对汤化龙的警惕。10月下旬，在清陆军部任代司长的革命党人蒋作宾南下武昌，由汤化龙单独迎接。一部份革命党人不了解蒋作宾的身份，怀疑他的来意，也怀疑汤、蒋之间的关系。①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由某些片断事实和蛛丝马迹而敷演出"密电"说，是很自然的；而护送连甲出城的林敬之，由于他了解某些事实，而又不了解全部事实，则很容易参加"密电"说的创作并成为它的证明者。

## 五

笔者无意于全面为汤化龙辩护。在武昌起义前后，汤化龙的活动有功也有过，这是需要另作分析的，本文只想指出，所传"密电"案不足凭信，汤化龙并未与柯逢时、连甲、黎元洪等串连，阴谋推翻湖北军政府，据此判定他为两面派是不符合事实的。

[附记] 本文收集材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历史档案》编辑部方裕谨同志等的热情支持，谨致谢意。

（原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① 胡祖舜：《六十谈往》，第35页。

#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

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① 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预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

① 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253页。

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遏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复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

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①。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②。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③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唊动军队”有关。④12月20日，马君武

---

①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②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③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3—124页。

④ 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9页。

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①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扇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② 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 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

---

①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参见前引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

允"①。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②

2. 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③。

3. 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④。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⑤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⑥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⑦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⑧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⑨。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

---

① 《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二)，第163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6页。
③ 《陶成章集》，中华书局版，第444页。
④ 《光复义勇军纪闻》，《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秦先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8页。
⑤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2年。
⑥ 《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⑦⑧ 《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⑨ 《越铎日报》，1912年1月12日。

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①]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②]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③]。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

---

① 《陶成章集》，第436页。

②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③ 《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

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①。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事略》又说：

>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②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

(原题《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增补重写)

① 《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第438—439页。
② 《却与黄、陈同宴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9日。

#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不少日文资料都提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对于此事的真伪，日本学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昇三等人已作过很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藤井昇三，多年来孜孜兀兀，发现了不少重要资料①。本文将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本人发现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 1912年森恪与孙中山的会谈

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时致益田孝特急电云：

>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当系指旧历年关而言——笔者）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行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

① 参见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の动向》，《史林》，1966年第1期；久保田文次：《孙文の"满蒙让与论"について》，《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1981年)；藤井昇三：《孙文の对日态度》，《石川忠雄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1982年)。

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①

森恪（1882—1932），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实习生，不久升职员，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动，成为三井财阀的中国事务专家。益田孝（1848—1938），日本新潟人，三井财阀的总头目。明治维新时期在横滨经商。1872年由井上馨推荐，进入大藏省任职。1872年以后任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对三井财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等原因，中国革命党人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笔巨款以支持浩大的军费开支，并筹划北伐。1912年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②。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井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为日本所有③。益田孝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恪，森恪即开始为此奔走。1月下旬，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规定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元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2月2日，森恪又亲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此前，黄兴正在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伊东米次郎及美国人司戴德、德国捷成洋行等磋商，拟以招商局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④，尚未成功。森恪获悉后，即在3日和孙中山会谈时，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本电即发于会谈之后。据森恪记述，本电初稿由他用中文起草，曾经孙中山及胡汉民修改⑤。根据本电，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

---

① 井上馨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三井文库亦藏有此件，文字稍有不同。

②③ 《原敬日记》第5卷，明治45年（1912年）1月9日，昭和26年版，第17—18页。

④ 伊东米次郎：《关于招商局借款的电报》，1912年2月1日、2日，井上馨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⑤ 《森恪致益田孝函》，1912年2月8日，三井文库藏。此函由藤井昇三首次发现。

和需款北伐的情况，它说明孙中山、黄兴等人并不是一个心眼地想和袁世凯议和，只要财政上有办法，议和即可中止。

森恪2月3日的电报比较简略。2月8日，他有一封致益田孝的长函，详细汇报了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据该函，当时在场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日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会谈中，森恪转达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见：

> 如阁下所知，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满洲之必要。为此，日本已不惜以国运为赌注，牺牲多数人之生命与财产。当俄国仍图南下、德人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以今日之大势论，仅赖中国政府单独之力保全满洲，虽阁下恐亦难以确信；而以日本之立场观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国政府独自维持之危险至极。事实已很明白，满洲仅赖中国政府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为贵我双方之所共认，故可断言：满洲之命运业已定矣。可以预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诸多困难，基于地理上、历史上之特殊立场，如无日本之特殊援助，则其成功之可能实甚渺茫。
>
> 倘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发展，以此换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则日本必将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满足其要求。为保全满洲，日本已不惜进行第二次战争。当今之际，阁下如能默默合作，则（日本）国家悬系已久之大问题可得解决，避免第二次战争，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与鄙人一致，望速裁断。①

森恪表示，这是桂太郎透露给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实行，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

---

① 《森恪致益田孝函》，1912年2月8日。

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表示：

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何如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当余发难之时，曾申请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宪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并无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离日转依美国。然由于地理上、人种上之关系，中国如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攸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其结果，日本有志人士为革命政府尽力者日渐增多，而日本政府迄今仍无转变表示，是以余等为日本政府之态度如何而日夜心忧。

孙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如今各省赞同余等主张者，自动举起革命之旗，加入余等行列，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匮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在此严重时刻，倘余等数日间不能露面，恐将产生余等穷极逃走之流言。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

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一面，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来已频频与北方就和议进行交涉，谈判已渐趋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只要南方决心一下，南北休战言和，合为一体，随时均可实现。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但据迄今为止之经过看来，获得财源，仍无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九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而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逆料，而与日本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

谈话最后，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声称"时机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①

这次谈话具体地透露了孙中山的困窘处境。当时，南京附近集中了数万军队，庞大的军费和军队哗变的担忧已经压得孙中山等喘不过气来。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所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将士，犹时有哗溃之势"②。二者所述，完全吻合。这段谈话也告诉我们，孙中山与

① 《森恪致益田孝函》，1912年2月8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5－86页。

袁世凯的和谈实非得已，租让满洲主要是为了获得“排袁”必需的经费，孙中山的理想还是“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因与安徽铜官山矿业代表会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关于一千万元贷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时，森恪致电益田孝：“满洲。焦急等待对我等3日南京特急电之回答。”① 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复电称：“绝密。满洲使彼等极为满意。正经由正确之渠道解决财政问题。彼等将于今日会晤总理大臣。”②森恪接电后，于当夜致电孙中山：“满洲事，尊意当可满足。东京来电云，款事正在极力筹措中。与袁世凯之和议，在东京表明某种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电复。”③在森恪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又于6日下午5时致电森恪：“与袁世凯之和议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给予确切答复。”④ 8日，益田孝再次复电森恪：“与袁世凯议和事，不容他人置喙；但可明告孙、黄：予等怀有深切同情。予等祈愿孙、黄能在有利地位上进行妥协。”⑤ 电报声称：关于汉冶萍借款，当争取于明日汇款二百五十万元；铜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当努力敦促尽快汇款。关于满洲问题，电报指示森恪劝告孙、黄，来一人到日本签订密约。并说，果能实现，“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同情”⑥。2月11日凌晨1时55分，森恪再次致电益田孝：

> 顷据孙、黄所见，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难关尚多，颇费时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在旧历年关以前，除汉阳铁厂之五百万元借款外，尚须另行筹措一千万元，是乃绝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项款额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离开南京。彼等业已答应租借满洲，要求在十天以内提供一千万元。如能承诺，则黄兴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签订秘

①②③④ 《森恪致益田孝函》，1912年2月8日。
⑤⑥ 《益田孝致上海森恪电》，井上馨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密合同。究应如何办理，希火速给予明确回答。兹事干系甚大，万望全力以赴。①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电所述邮船会社借款，这一借款，本已于6日签订草约，但由于英国的介入，突生障碍②，以租让满洲获取借款便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希望所在。

此电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据南京会谈的参加者山田纯三郎回忆，在于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

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③。同日，隆裕认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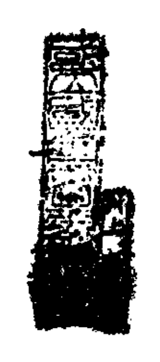
还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即已开始。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归国后，和议继续进行，但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北伐。1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黄兴曾在《复张謇书》中表示：“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又称：“派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以海军以烟台为根据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惟刻苦无款耳。”④由此可见，北伐计划受制于经费的状况。北伐既无从进行，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又寄希望于和谈，但是和谈也并不顺利。1月19日，袁世凯提出，由清廷授与他组织临时政府的全权，临时政府设在天津。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对此，袁拒不接受。孙中山再次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

① 井上馨文书。

② 参见《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华公使电》，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60－361、366－367页。

③ 山田纯三郎：《シナ革命と孙文の中日联盟》，见嘉治隆一编：《第一人者の言叶》，亚东俱乐部1961年版，第268页。

④ 《黄兴集》，中华书局版，第99－100页。



图二十　森恪致益田孝电
（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由于谈判未成，孙中山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①。山田的有关回忆，由于事隔多年，情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

① 《シナ革命と孙文の中日联盟》，见嘉治隆一编：《第一人者の言叶》，第268页。

一段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 孙中山在不同年代发表过的有关言论

将满洲租让给日本并不是孙中山一时的考虑，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见解。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即使俄国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之领土，亦不足深忧。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将奔逃满洲，以俄国为后援，以维持其国命。为此，新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结成同盟，攘击俄国，与俄国之冲突终不可免。由此可以认为，革命愈早发生愈为有利。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① 内田的这段回忆写于1932年，和他在1923年完成的《硬石五拾年谱》有明显不同。据《年谱》，孙中山当时只是表示："中国革命倘成功，恢复俄国侵地乃容易之事，不足忧虑，何况日中提携耶！"② 完全没有涉及满洲问题。因此有些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该书又记载：1906年，孙中山曾游说日本朝野人士，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③ 1907年，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他向伊藤建议说："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日本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④ 内田的这一段记载和《硬石五拾年谱》的相应记载是一

---

① 《日本の亚细亚》，黑龙会出版部，昭和7年12月，第321页。

② 《孙逸仙之支那革命与余之日露开战论》，《硬石五拾年谱》(内田良平自传)，昭和53年版，第52页。

③④ 《日本の亚细亚》，第340页。

致的①。此外，小川平吉也有一段回忆，可与内田的记载相印证。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一文中，小川说：

> 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与我辈亦有长期交往，我辈亦曾给予相当援助。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上述主张，孙逸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此在有志人士之间殆为众所周知之事实。②

小川并埋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实行汉、满、蒙、回、藏统一，创制五色旗，完全忘记了当年说过的话。不仅如此，《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还说：1900年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通过清藤幸七郎之姐，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请她协助尽力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③综合这几条材料，可以确认，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已经有了以让与满洲换取日本援助的想法。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仍然如此。除上述1912年与森恪的会谈外，日本资料中还有下列记载：

1. 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桂公与孙文的密约——满洲赠与日本》，其中谈到1913年春，孙中山访问日本时，曾对桂太郎说："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④山田纯三郎也回忆，当时，桂太郎曾向孙中山说起日本人口增加的趋势，表示将来日本人除向满洲发展外别无他法，询问孙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中山表示同意。⑤

---

① 参见《硬石五拾年谱》，第151页。
② 见《满洲はどうなるか》，1931年版。
③ 昭和11年版，第673页。
④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页。
⑤ 山浦贯一：《森恪》，高山书店，1943年版，第408页。

2. 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再次表示："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确立全体国民所支持的革命新政府，收到中日结合的实际效果，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在这一条件下，"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①。据记载，孙中山当时说：

>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土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②

孙中山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③，和以往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④。

3.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运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中山又曾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他说："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他声称，一旦完成任务，为了中国和她的邻国的完全解放，将与日本结盟，并且宣布"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原则。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对此，孙中山解释道：

> 当然，我们乐意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需要它，我们认识到你们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人口

---

① 山中峰太郎：《アジアの曙》，1963年版，第235页。
② 山中峰太郎：《アジアの曙》，第234页。
③ 山中峰太郎：《アジアの曙》，第236页。
④ 山中峰太郎：《アジアの曙》，第234页。

> 迫切需要活动场地，中国在南方有丰富的发展余地，千万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去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岛、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等地，成为富裕者，并且每年寄回家乡几百万美元。这样广阔的区域合法地属于亚洲，它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比满洲更能给人以指望。①

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从"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说明了乐于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的原因。其中所谈日本人口问题可以和1913年与桂太郎的谈话互为印证。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923年左右。据日本陆军参谋佐佐木到一的记载，当年，孙中山还曾对访问广东的日本人说，"将来国民党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时候，必定将满洲委托给日本"②。只是在国共合作并实行联俄政策之后，孙中山才不再发表类似的言论。

上述资料，除个别属于记者采访外，大多数是当事人的回忆。由于并非一人，也并非出于一时，自然排除了无中生有的可能。当然，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回忆录不可能像文献一样准确，它们既可能包含作者记忆的讹误，甚至还可能包含作者由于种种原因而对历史作出的增饰、隐讳或歪曲。上述资料的价值自然比不上森恪遗留下来的函电，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基本史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 怎样认识这一现象

一切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它的根据。要理解孙中山上述关于

① K·K·Kawakami（河上清）：*Sun Yat-Sen's Great AsianDoctirne*，见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

② 《ある军人の自传》，劲草书房1967年增补版，第92—93页。

"满洲"问题的主张，就必须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分析。

第一，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又是一场披着民族斗争外衣的革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曾经蒙蔽了当时大多数革命家的眼睛，并使他们在满族、满洲地区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如所周知，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满洲地区是我国神圣领土中的一部分。但是，辛亥革命时期，不少革命家却错误地称满族为"异族"或"异种"，从而将满洲地区视为"化外之地"。创建兴中会时，孙中山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为目标。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① 这里，显然将满族和满洲地区都排斥于"中国"之外。不久，这一问题即成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重要内容，《民报》作者们反复说明，"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民"，"满洲建国以前为中国之羁縻州，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②。孙中山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显然与这一错误认识有关。

第二，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反帝斗争，目的是振兴中华，挽救国家危亡。但是，这一斗争又披着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亚洲人与欧洲人斗争的外衣。日本与中国同为黄色人种，在历史上和中国文化渊源较深，素有"同文同种"之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在当时中国不少革命家中，有着强烈的亲日本的倾向。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利害相关"，幻想和日本团结起来，抵御西方侵略，振兴亚洲。孙中山长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② 《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民报》第12号；参见韦裔：《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民报》第14--15号。

期有着“大亚洲主义”思想。19世纪末，日本废除了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认为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1904年的日俄战争，孙中山认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的几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把它看作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大喜事①。1911年，孙中山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成立亚洲各国同盟②。1913年2月，孙中山在东京演说，认为“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之光荣历史”③。3月，在大阪演说又称：“惟冀自今而后，益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④为了振兴亚洲，孙中山甚至有过撤废中日两国国界的念头。1915年底或1916年初，他在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⑤从前引孙中山与森恪、河上清的谈话可以看出，孙中山然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显然与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有关。

第三，孙中山长期处于孤立无助状态，有其特殊的软弱性。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后不久，就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援助上。1897年，他在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曾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⑥。1900年，他托日人菅原传向日本政府要求，“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⑦。当年10月，他并曾计划由台湾引日本兵在厦门南方的云霄县铜山港登陆⑧。1903年，他又致函平山周，询以在日俄发生战争时，“能否运动政府兼图南局，一助吾人之事”⑨。在孙中山留下的全部文献中，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页。
②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
⑤ 山中峰太郎：《アジアの曙》，第234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7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页。
⑧⑨ 《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这种要求日本和列强援助的资料很多。为了争取这种援助，孙中山曾特别宣布，“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认权”①。同意租让满洲，也正是为了争取这种援助。孙中山不了解，如果真这样做了，将不仅不能换取他所期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本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制造“满洲国”，内田良平、小川平吉等人积极为之鼓吹，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孙中山关于“满洲”问题的言论。

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伟人也应该如此。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藤井昇三、狭间直树、石田米子教授惠寄资料多种，又承邹念之先生热心细致地校订译文，谨此致谢。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校后记] 高崇民《上半生简述》云：“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当时也反对。”（《高崇民诗文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黄兴于1914年6月离日赴美，1916年5月自美抵日，高崇民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误，但它却为本文提供了中文方面的佐证。据高崇民夫人称，当时曾有人建议高将此段回忆删去，但高坚持是历史事实，不肯删去。

① 《孙中山年谱》，第124页。

#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海关和盐税，经济始终处于极度困窘中。为了渡过难关，临时政府曾先后向美、日、俄等国借款，均告失败。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是比较重要的一桩，它使本已波澜翻覆的政局更加动荡。陈其美曾在《致黄兴书》中说："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①。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国内外学术著作迄今尚少论及，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较详细的考察。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1895年12月，总行设于彼得堡，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分行。成立后，即积极履行沙皇俄国的侵华计划。它表面上是一家银行，实际上是"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②。1912年2月，它利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诱使其签订了15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草约。草约提出，自正式合同签字之日起，以一年为期，年利五厘，华俄道胜银行按九七扣付款。其第五条规定："此款为民国之直接负欠，当以其赋税之所入，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③。从成立之日起，华俄道胜银行一直谋求充当中国的国家银行，为清政府"办理租税、赋课的缴纳"等项事务。草约虽然没有像当时的其他借款一样，指明以某项路权或矿权作为担保，但本条却为沙俄控制中国的赋税提供了口实和条件。其第七条规定："民国以后如第一次拟借大批外债，

---

① 《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1977年版，第41页。

② R·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1, London, 1922, P. 198.

③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9日。

若该银行所约条款与他银行仿佛者，该银行有首先应借之权”。清朝末年，列强争相对华输出资本，竞争剧烈，本条使沙俄轻易地取得了优先权。这是一项贪婪而阴险的包藏祸心的草约，但南京临时政府正处于饥不择食的境地，居然接受了。草约于当月21日在上海签字，南京临时政府代表为财政总长陈锦涛，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为经理人凯里约。

根据草约，合同应在3月1日以前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投票公决。因此，孙中山于2月25日向参议院提出咨文，要求召开临时会，“提前决议”①。26日上午，由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到院，宣称根据陈锦涛电报，不用抵押，借到华俄道胜银行巨款。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讨论结果，议长林森用起立表决法，多数通过政府交议案诸要点②。27日，参议院继续开会，讨论草约，谷钟秀提议，先付特别审查。经林森指定，由刘彦、钱树芬、张耀曾、谷钟秀、汤漪等五人为特别审查员。结果，只提出了细节性的修改意见③。在讨论时，湖北参议员张伯烈、奉天参议员吴景濂激烈反对第五条，发言后即离座它去。在此情况下，林森提议省去三读，交付表决。结果，到场14人，8票赞成。林森宣布通过。但湖北参议员刘成禺等当即提出：“此案系违法少数之表决，不得作为有效”④。

28日上午的会议上，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等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须有半数以上之议员到会方可开议”及“关于法律、财政及重大议案，必须三读始得议决”的规定，指责林森“违背细则，变更院规”⑤。四川参议员熊成章批评刘成禺等：“诸君于此前并不提议，今政府已将借债之事办成，乃起而反对，是何居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版，第149页。
② 《参议院议事录》，1912年2月26日。
③ 《参议院议事录》，1912年2月27日。
④⑤ 《鄂省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辞职之公布》，《民声日报》，1912年3月2日。

心!"①时功玖则答以:"某等居心爱中国,不袒政府;愿为国民之公仆,不为政府之走狗"②。双方愈益感情用事,林森"拍案大呵",指责刘成禺等"阻挠他人言论"。在这一情况下,刘成禺等三人宣布辞职。他们致电黎元洪及湖北省临时议会,指责借款案"既启监督财政之渐,复挑拨列强猜忌之心",声言:"自问能力薄弱,难膺巨任,深恐陨越,有负乡人之托,谨此电辞"③。其后,吴景濂及陕西参议员康宝忠也相率辞职。

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月28日开院,17省共到参议员31人。此后即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参议员请假或无故缺席,到院人数日益减少。不久,又因汉冶萍借款、发行军用钞票、议决临时政府地点等问题,部分参议员与临时政府之间发生对立。2月25日,江苏参议员陈陶遗、杨廷栋致函参议院,指责临时政府"对于参议院,蹂躏侮蔑,亦云至矣",是"民国开创史上一大污点",宣布辞去参议员职务④。至此,由于刘成禺等再次辞职,参议院就出现了危机。当日下午,出席参议员仅12人,不过半数,林森宣布散会。29日,也因人数不足,未能开会。3月1日,不得不作出决议,如议员一月以内缺席七天,即应除名。同时宣布不承认刘成禺等人的辞职,决定致函江苏、湖北参议员,请于一星期以内函复,过期当即除名。但是,会议也承认27日的讨论"手续尚未完备",决定重新讨论借款草约,补行二读、三读手续⑤。讨论结果,议决将第五条后半改为"当以民国政府所征赋税之收入内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⑥,第七条改为"民国以后如第一次拟借大批外债,若该银行所约条款与他银行较轻时,该银行有首先应借之权",这些修改较原条约严密,对沙俄的借款优先权加了

①② 《时君功玖之正论》,《民声日报》,1912年3月1日。

③ 《南京电报》,同上,1912年3月1日。

④ 《来函》,同上,1912年2月29日。

⑤ 《参议院议事录》,1912年3月1日。

⑥ "内"字为三读后讨论所加,与上下文连读时欠通顺,此处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限制，投票时，以22票可决全文①。

南京参议院的争论迅速激起了政海风波。2月29日，民社上海机关报《民声日报》报道了有关消息，并发表社论，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倒行逆施，竟以全国所得赋税抵押外人。吾不知政府诸公以何理由而为此毫无心肝之举动？"又称："以满清政府所不敢为者，而君等悍然为之，恐吾国民将谓君等之不满清若矣！"社论号召上海各团体、各政党共同行动，抗议并取消借款②。3月1日，又利用刘成禺等辞职一事发表社论，批评南京临时政府"用威吓手段，嗾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此种野蛮专制之行为，前清时代所不敢出。"甚至说："议会为行政机关之奴隶，供总统及各部大臣之颐指，所谓代表舆论者安在？所谓征取民意者安在？民意不足征，舆论不足重，所谓共和之精神安在？"它鼓动湖北、江苏两省的参议员重返参议院，"张我舌剑，斩彼蟊贼"③！

在《民声日报》大张挞伐的同时，民社等则发起电报攻势。29日，民社致电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批评草约"词旨笼统，既种祸根，必致酿成外侮"，要求袁、孙等"竭力挽回，免滋后祸"④。随后，由张嘉璈领衔发起的国民协会也致电孙中山，要求"顾全舆论"，"设法挽回"⑤。3月5日，共和宪政会李倬云、郑允恭、徐企文等发布传单，继续指责参议院"灭绝公论，违法独断，亡清覆辙，甘蹈不顾"，订于6日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特别大会，推派代表赴宁，向政府要求取消借款⑥。会后，共和建设会、公民急进党、工商勇进党、社会党、工党、

---

① 《参议院议事录》，1912年3月1日。
② 慰依：《外债愤言》，《民声日报》，1912年2月29日。
③ 《对参议院议员辞职之感言》，《民声日报》，1912年3月1日。
④ 《民声日报》，1912年3月1日。
⑤ 《民立报》，1912年3月4日。
⑥ 《拒款会之传单》，《民声日报》，1912年3月5日。

华侨联合会、民社、民国统一党、民生国计会、大同民党、公济总会、宣导会、共和宪政会等13个政团联合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陈述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一事“实为违法，国民死不承认”①。

上海的抗议风潮迅速向各地扩散。黎元洪致电刘成禺、时功玖等人，表示对参议院“擅以国税作抵”的行为“殊深骇异”，声称除已将详情交鄂省临时议会公议外，并望刘成禺等人“尅日返宁，隐忍维持，毋庸辞职，并极力阻止，以挽大局”②。又于9日致电袁世凯及参议院，把自己打扮为一个爱国者，说什么“前清借债之失，我辈呼吁力争，言犹在耳”，“元洪绝不敢私订借债抵税，以误国民”③。扬州军政分府徐宝山也于6日通电，指责借款一案“失人心，丧主权，与清政府之干路国有、四国借款，殆过之无不及”，他并由此进一步攻击“同盟会人”，“在内之把持政柄，在外之声势煊赫，虽满洲之亲贵，无此多也”。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是一桩损害国家主权的事件，受到批评是应该的。借款的反对者中，大部分基于爱国义愤，但是，也有人意气用事，甚至别有用心。

武昌起义后，迅速形成了湖北、江苏两大实力集团。前者以黎元洪、孙武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民社，后者以程德全、张謇、章太炎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它们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旧官僚、立宪派和失意的革命党人。两派形成后，即反对同盟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护袁世凯。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发生后，它们迅速行动起来，以之作为砸向对手的一块石头。

湖北省临时议会早在2月21日就通电各省临时议会与谘议局，提议在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这种作法，旨在否认南京

① 《上海去电》，《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
② 《湖北来电》，《民声日报》，1912年3月8日。
③ 《武昌电报》，《民声日报》，1912年3月10日。

临时参议院的合法性，取而代之。这时，借款案更成了反对临时参议院的强有力的借口。3月1日，共和建设会致电孙中山，指责临时参议院"阿谀政府，少数擅决"，"请将参议院立时解散①。3日、湖北省临时议会以万急电报，将参议院"违法情状"遍告各省议会和谘议局，要求在3月底之前在汉口召集中央议会。5日，高元藩、张祥麟等与章太炎及江苏省议会议员会商，宣布不承认临时参议院2月28日以后所议各案。他们提议由苏鄂两省政府联名通告各省及新旧总统，取消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时请袁世凯通告各省议会，组织国民议会，再由国民议会组织参议院。江苏省临时议会随即致函都督庄蕴宽，要求联合各省宣布，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各种赋税俱归各省迳收，不得由现政府"随意指抵"②。6日，共和建设会、公民急进会等政团又致电孙中山等人，声称"今参议院议员寥若晨星，已失议事资格"，要求袁世凯出面"执行"，"以收统一"③。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立即驰电表示"群情欢忭"。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受职办法》规定，袁世凯任命国务总理及国务员时，必须取得临时参议院同意，这本是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一条重要措施，但是，他们却向袁世凯献媚说：自从借款案发生，参议院议员人数不及原有人数之半，"按之法律，决难发生效力"，要求袁大总统"独力主持"，赋予这个野心家以组织政府的全权④。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推翻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说是"此种约法，人民绝不承认"⑤。这就说明，他们所反对的不只是借款案，而是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一面。

在各方强力反对下，孙中山于2月底致电陈锦涛，告以参议

① 《共和建设会电》，《民声日报》，1912年3月2日。
② 《苏都督指陈借债事件电》，《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③ 《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
④ 《武昌电报》，《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日。
⑤ 《通告不承认参议院临时约法电》，《申报》，1912年3月21日。

院“手续未清”，“借款案暂缓签字”①。华俄道胜银行方面也因未能取得在同等条件下对华借款的优先权，表示“不能照办”，草约作废②。3月3日，孙中山复电民社成员胡培德宣称：“日前商借华俄款，成立即救济鄂省百万，乃因参议员误认担保性质为抵押，又削草约中同等借债优先权，此议不成，遂令束手为难，今日已电商黎副总统矣。”③他自感已无力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准备将临时大总统一职交由黎元洪代理。5日，他在和胡培德谈话时表示：“临时政府地点未定，袁公不能南来，鄙人又不克久任，急欲离开金陵，已电武昌，请黎公来宁，以副总统名义代行大总统之职。”又称：“近日为借款问题，国民不能信任政府，不能信任鄙人，鄙人拟卸职后即从事实业，已与外人筹商借款，以办铁路为前提，将使铁路贯通全国，此则为真文明事业。”④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起，孙中山的卸任本已指日可待，但是，连有限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希望卸任愈早愈好。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草约是一杯毒酒，这一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未尝不清楚，这种情况，反映出南京临时政府已经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其结果是不仅未能对现状有任何一点改善，却引来了更多的攻击和反对，陷入更大的困境中。这一切表明，即使没有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力量的进攻，南京临时政府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原题《论民初的华俄通胜银行借款案》，
载《浙江学刊》，1988年第4期）

① 《南京特电》，《民声日报》，1912年3月1日。

② 《大总统复电》，《黎副总统政书》卷8。

③ 《孙文电》，《民声日报》，1912年3月4日。按，此为孙中山佚文，各本孙中山集均失收。

④ 《孙大总统之谈片》，《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

#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

五十多年前，我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取得了什么成果？革命派提出过什么样的文化改革的要求呢？我们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一些考察，就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虽然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建树比之政治方面却还要贫弱。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确曾一度表现出革命的锐气和蓬勃的进取精神。他们批判尊古贱今的退化史观，批判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要求革新和创造。这种情况，在1905年前表现得特别显著；但愈接近革命前夜，却反而渐趋沉寂。例如，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包括改良派在内，曾经提出过道德革命、风俗革命、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一系列口号，他们在其中的一些方面，确也做过一些改革的探索，一时风起云涌，颇为热闹；但是，曾几何时，这种现象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甚嚣尘上的复古思潮。"革命"的口号不喊了，要喊"光复"，喊"保存"了。

这一切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它对于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历史教训呢？这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 一

在辛亥革命前，有三种人都宣传过一种名为国粹主义的思想：一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一是日益退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是革命派阵线中的某些分子，如章炳麟和《国粹学报》、南社中的部分成员。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一向自视为“诗书上国”和“礼义之邦”的，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封建文化，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仍然拒绝作任何改革，拒绝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学习任何一点进步的东西；这一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可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之学，借以加强镇压人民起义的手段，但同时认为必须保持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于是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就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逐渐开展，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宣传封建文化的努力也愈为加强。19世纪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主、民权思想，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于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便刊刻了《劝学篇》，标榜“教忠”、“明纲”、“宗经”、“正权”、“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企图巩固封建文化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革命派大力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想，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并在论战中击败了改良派。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革命派不仅从事理论宣传活动，也在加速政治组织工作和武装起义，清王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因而，它也就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和复古思想。1906年，清王朝规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纲为教育宗旨，同年，从刑部主事姚大荣请，以孔子为万世师表，诏升大祀。这一时期，它宣传封建文化，更提出了一个漂亮的名目，这就是保存国粹。在1903年清王朝颁布的《学务纲要》中即规定各级学堂必须“重国文(指文言文及古代典籍——引者)以存国粹”。1907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成立存古学堂，并给清王朝上了一个奏疏，大意是，当时正是“道微文敝，世变愈危”之际，他经过经年的筹

计，殚心竭虑，商榷数十次，发现只有“存国粹”才是“息乱源”的最好办法。什么是“国粹”呢？这就是“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文字经史”、“历古相传之书籍”。对于这些，均应“专以保存为主”。他说：

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能睹闻，至有议请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课者。……此如籍谈自忘其祖，司城自贱其宗。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①

可以看出，所谓保存国粹，其目的是抵御当时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新思潮、新文化，抵御资产阶级对封建文化所作的批判，从而挽救清王朝的垂死命运。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统治者的赞赏。“上谕嘉勉”，于是全国各地遍设存古学堂，尊孔复古之风大盛，保存国粹的调子高唱入云。

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逐渐加入到清王朝保存国粹的合唱队里。原先，改良派曾经对封建文化作过一点批判，但那是极其有限的。他们都无例外地美化中国古代文明，主张采西学而不否定中学，孔孟之道、六经之学仍须发扬。这时，由于他们的立场已从批判封建制度转为维护封建制度，因而，也就转而从封建文化中找寻救命灵丹。1902年，梁启超曾筹创《国学报》，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②。1910年，在办《国风报》期间，更对“举国不悦学”，“动弃吾之所固有以为不足齿录，而数千年来所赖以立国之道遂不复能维系人心”的情况表示忧心忡忡，而致力于中

① 张之洞：《保存国粹疏》，光绪三十三年江苏活字印本。

② 转引自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北京图书馆藏稿。

国美好的"国性"和"国民性"的宣扬。康有为"八年于外，周游列国"，考察了西方的许多国家后，突然发现中国的历史简直好到无以复加："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所以他认为应大呼"孔子万岁"①。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比西方所差的只是"工艺兵炮"。辛亥革命后，更发表了所谓《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论》。严复于1906年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发表演说，斥责西学少年"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他提倡中国的天理人伦和教化风俗，认为应"一切守其旧者"，"五伦之中，无一可背"。②

在行将被人民革命浪潮淹没之前，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抓住封建文化这根救命草，来挽救自己，这就是他们高喊保存"国粹"的实质。

## 二

1902年初，广东顺德人邓实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朔望出版，月出二册。邓实主张会通古今中外，探求国家治乱强弱的根由。《通报》表现了一定的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但同时也宣传国粹主义。1904年冬，邓实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展会员，发表宣言，致力于号召保存国学。在他所网罗的会员中，有许多都是当时革命派思想学术界中的活跃人物，后来也大都成了南社的社员。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至辛亥革命后改名《古学汇刊》止，共发行82期。

《国粹学报》是当时革命派刊物中专门谈学术的一种，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学报》编者们表示要师法《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的精神，探讨学术

① 《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期。
② 《东方》3年3期。

源流，历叙诸家得失，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批判乾嘉学派末流的烦琐考据和陆王心学的禅寂清谈，号召人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在当时，尤为突出地宣传了"夷夏大防"的民族主义思想，猛烈地抨击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但是《学报》所宣传的国粹主义思想却包含着一系列的根本错误，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事业、革命事业起了消极的影响。

在编辑《学报》以外，国学保存会还曾大规模地从事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先后编辑出版过《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国学讲义》等著作，又在上海设藏书楼一所，并曾拟设国粹学堂。

1906年，章炳麟自上海出狱赴日本，在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对革命党人提出了两大任务，其一即为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其后，东京留学生中成立了国学讲习会，由章炳麟任主讲。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章炳麟任社长。这以后，在章炳麟主编的《民报》上出现了许多宣传保存国粹的文字。不少革命党人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专意整理宋、明遗民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国学著作。《民报》自第20期起，也改变了编辑方针，似乎觉得过去宣传的革命理论太"空漠"了，自此以后，要"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同时，又征集"宋季、明季杂史下及诗歌、小说之属"，几乎要把《民报》办成《国粹学报》的样子。风气所开，不少革命派刊物莫不以"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一类词句作为发刊目的。它们大量介绍古代思想和人物，校刻古代典籍，于是，保存国学在革命派内部也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

《国粹学报》诸人在当时宣扬了一些什么思想呢？

一、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曾经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首先，周公之学，上承百王，集黄帝、尧、舜、文、武之大成。至战国，更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时期，在诸子的著作

里，“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①。西方之所以强盛，那还是学习了我们，“偶得先王遗意”的结果。西方政术，虽然尽善尽美，但“证之《周礼》一书，无不相合”。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乃是“秦人灭学，畴人子弟，抱器西奔”的结果。一句话，凡是西方现在所有的，都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发达最早，“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版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②，是西洋所远不能比拟的。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此吾国国文之当尊，又足翘之以自雄者也”③。

二、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孔子。它们构成了神州二千年学术的基干。儒家学派最适合于中国国情。周末，赖有孔子删《诗》，序《书》，赞《易》，定礼乐，作《春秋》，因而不亡者二百年。此后，据说，东汉、唐之所以兴，都是崇儒学的结果，而秦焚诗书，宋禁道学，明崇心学，就都国势不振，导致社稷倾复。所以，“由孔子之教，罔不兴；违孔子之教，罔不亡”④。

三、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后，海内沸腾，人们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以为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因而《论语》当薪，《三传》束阁，以《六经》为糟粕，“群以吾国文学之旧而欲痛绝废弃之”。同时，一般人又都醉心欧化。扬西抑中，不尚有旧，人人都在诵习“蟹行文字”，举一事，革一弊都以西方学说为准，把西方典籍视同神圣，这样，中国文化就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浩劫，“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之文”，“黄帝、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学”，不及十年，都将尽归烟灭，“国学之厄，未有甚

①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
②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序》，《乙巳政艺丛书·湖海青灯集》。
③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艺通报》癸卯(1903)第24号。
④ 邓实：《鸡鸣风雨楼著议第二·学强》；《政艺通报》壬寅(1902)第8号。

于今日者矣"!①

四、他们认为，学术、文化是立国之本，是礼俗政教产生的基础。学亡，文化亡，则国亡，民族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②；要挽救中国的灭亡危机，必须首先修述故业，挽救民族文化，保存国学，人民的爱国心将因此得到发扬。当然，也可以吸收一点西方的东西，但必须是借西学证明中学，彼为客观，我为主观，折衷至当。

基于以上论点，《国粹学报》诸人痛心疾首地指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辱骂他们"鬻道于夷"，放弃道德，掊击仁义，其罪等于卖国，结果是"快意一时，流祸百世，数典而忘其祖，出门不知其乡"。③在排斥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们则大力提倡中国的精神文明，宣扬神州历史、文化的光荣。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转移世风，使人们重见先正典型、前贤风徽，使中国的古文化能得到恢复："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④

当然，革命阵线中的国粹派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章炳麟的文化思想。

章炳麟的思想包含着复杂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西方可以学习，问题是不应委心事人，自轻自贱。在《国故论衡·原学》中，他说："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颡画以自轻薄。"但同时他又对向西方学习的人采取鄙夷态度，称之为"新学鄙生"和"浮华之士"。他认为这种"新学"的传播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必将"灭我圣文"，"非一隅之忧也"⑤。在《原学》中，他列举了大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精粹"，然后和西方作比较，

①② 《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26期。
③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词，《国粹学报》第8期。
④ 《国粹学报》发刊词。
⑤ 《俞先生传》，《太炎文录》卷二。

证明自家的好东西远较西方为多，接着得出了结论，“赡于已者无轻效人”，当时革命派的任务是“恢彉”民族传统，而不是“仪型”西方。他说：“世人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

章炳麟也说过一些不应复古的话。他认为古今政俗变迁各有一时之宜，古代的东西并非都是尽善尽美的，因而不可尽行于今，更不可定一尊于先圣。他激烈地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批评孔子胆小，不敢联合平民以覬覦帝位，甚至说孔子哗众取宠，污邪诈伪，湛心利禄。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又称颂孔子是中国保民开化之宗，极力把孔子推崇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他相信中国的古文化可以用来振兴20世纪条件下的中国，国学兴，则“种性可复”，只要使“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则“国有与立”。他甚至认为只要他的朴学老师孙诒让能活得长一点，有人能继承他的学术，“令民志无携贰”，中国就可以兴盛了。①他以阐扬中国古文化——“支那閎壮硕美之学”的任务自责，反对对这种文化的批判，说：“抨弹国粹者，正使人为异种役耳。”他号召革命党人爱惜自己的历史，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要选出几个功业学问上的“中国旧人”，学步他们；要利用古事古迹来动人爱国心思。②他甚至设想，革命军所到之处，应该首先保护那些能够宣扬国学、传播旧学的人，即使如大劣绅王先谦之流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要比“新学鄙生”更有用于中国。革命胜利后，对于“黎仪旧德”，更应予以特别之“保护”。③

可以看出，章炳麟的文化思想虽然与《国粹学报》诸人有些差异，但基本上仍然是一致的。

① 《瑞安孙先生哀辞》，《民报》第20号。
② 《演说录》，《民报》第6号。
③ 《主客语》，《民报》第22号。

## 三

在章炳麟以及《国粹学报》诸人的思想中，是包含着若干合理内核的，即：中国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热爱这份遗产，继承并发扬它。要有民族自尊心，不应该盲目迷洋，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应该懂得自己祖国的历史，"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对自己的祖先完全无知是可耻的，等等。他们中的个别人并且认识到西洋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一面，"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①，例如章炳麟。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考察，章炳麟等人的思想又仍然是错误的。

精神生产是需要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一定的文化永远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反映，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革命，不仅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必须改变由这些关系所产生出来的观念。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斗争的需要，必须建立反映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必须与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上的旧文化作坚决斗争。这样，他就必然会面临两个问题：一、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二、如何对待本国的文化遗产，主要是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文化。这就是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问题。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②因而，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赞成西学、新学还是赞成中学、旧学，就反映着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两种不同的利益和立场。

在近代，传播西方文化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的传教

---

① 《五无论》，《民报》第16号。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690页。

士李提摩太之流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他们认为中国要全盘西化，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这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其中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不仅不反对中国旧学，相反，倒是支持封建地主阶级的复古论的。另一种人，也是占大多数的，介绍的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化。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者把《民约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平等、自由、博爱等学说作为福音，以之作为批判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武器，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新学"。这种"新学"，反映着资产阶级的狭隘私利，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的，但在当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它"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① 而章炳麟及《国粹学报》诸人却不区别这两种情况，对西方文化采取鄙夷和排斥的态度，他们不了解革命思想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错误地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称为"异域之学"、"皙种之学"，中国人学习这种文化就是"末学纷驰，乐不操土"，就会导致民族文化的毁灭。他们这样说，就阻碍和打击了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这是一。

第二，旧传统、旧观念往往是一种巨大的束缚力量。要建立新文化，就必须彻底地批判旧文化。没有这个批判，就不可能从封建阶级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新文化。恩格斯曾经指出过："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所举行的反叛。"② 他热情洋溢地赞颂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称誉他们对封建的思想和文化所作的战斗和"最无情的批判"③。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正是企图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查并作出估价的。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79—3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17—118页。

是，正当他们对这种文化的神圣性有了一点怀疑，作了一点批判的时候，国粹派就气冲冲地大叫大嚷起来了。他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好得很呀！应当宝之为国粹呀！你们这样做，就是"骛外忘祖"呀！就是"刍狗群籍，粪土典坟"呀！他们这样说，实际上就维护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神圣地位。

民族文化从来都不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所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包含着两种对立的成分。毛泽东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确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而章炳麟及《国粹学报》诸人恰恰是承认有一种超阶级的统一的全民文化，并把它视之为立国精神，从而笼统地号召保存国粹，其结果必然是保存了那些封建的腐朽的陈旧的东西。

当然，一个革命的阶级不是绝对不可以利用前代的文化。事实上，思想史、文化史的规律总是这样，新兴文化是要利用前代文化的某些材料的。但是，不能"拿来主义"，不能照搬。因为前代文化总是产生在前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完全适应、甚至根本不可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这就需要对前代文化，即使是其精华部分，予以革命的扬弃、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之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并从而有利于新兴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而国粹派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民族文化已经好到无以复加了，可以永垂万代；不管社会条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种文化都是使中国强盛的万灵药方，不必批判，也不必创新，任务只是保存。这实际上就是使民族文化长期停滞，使封建文化万古长存。

历史证明，奢谈"恢擴"民族传统，拒绝对外国革命进步文化的借鉴；奢谈继承，不谈革新，其实质都是在宣扬和维护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旧的文化；其结果都必然走上复古主义，堕落成为抱残守缺的孤臣孽子，成为时代前进的反对者。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章炳麟的例子。

章炳麟在东京的那次演说中号召革命党人爱惜祖国的历史。

他的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同志为之叫好。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爱惜”二字。章炳麟不区别什么是人民斗争史，什么是封建压迫史，什么是历史中的民主精华，什么是历史中的封建糟粕。他表面上虽然承认古制不可尽行于今，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在具体评述时却总是把中国历史说得好到不能再好，说什么中国的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例证之一是中国实行了均田，所以贫富不甚悬绝；之二是刑名法律的大公无私，犯了罪，“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都〕得受刑”；之三是科场选举，这原是“最恶劣的了，但做工营农的贫民也就有了“参预政权”的希望。章炳麟说：“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①]然而，既然连刑名法律、科场选举这“本来极不好的”，“尚且带有几分社会主义性质”，那末，还有什么应该改良的呢？岂不是一切都应该“顶礼膜拜”吗？实际上，章炳麟正是这样，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理想就是“光复旧物”，神往于贞观、开元之治，觉得专制制度比资产阶级“立宪代议”政体好，科举比学校好、旧学比新学好，旧党比新党好。在辛亥革命后，他就提议“循常守法”[②]，认为清王朝的错误只在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两桩，其他旧法则“多应遵循”[③]，连婚姻、家族等制度都“宜仍旧”了。

章炳麟认为中国古文化中有许多精粹，特别是“言文歌诗”，更是西方各国所万万不及。他说：“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④]，也是好得毫无缺点，应在“爱惜”之

① 《演说录》，《民报》第6号。
② 《菿汉微言》。
③ 《自述学术次第》。
④ 《演说录》，《民报》第6号。

列的。于是，他起劲地反对当时一部分人关于汉语拼音和减少汉字常用字数的意见，反对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变革。他对革命党人大讲小学，提倡扬雄、司马相如的"奇字"；他的文章充斥了大量早已死亡了的古字，即使有通用字，也非用古字不可。在散文的体裁风格上，他提倡中国散文最初阶段的那种朴拙状态，鄙视唐宋文，反对白话文，企图使语言"一返皇古"。为了反对近代出现的日益与口语接近的新体散文，他甚至在辛亥革命后支持桐城派，说什么"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致堕入下流"①。对于诗歌，他也认为愈古愈好，汉魏六朝以前的都是好的，此后则"代益凌迟，今遂涂地"，主张"宜取近体一切断之"。他自己的诗也大都古奥诘屈，确乎是汉、魏以上的作品。

在所谓"保存国学"的口号下，《国粹学报》诸人就走得比章炳麟更远了。他们明确地倡言复古，说什么20世纪将是中国古学复兴的时代，一切学术文章都将"寝复乎古"。有人给他们写了篇文章，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孔子为国魂，把《六经》提到如印度的《四韦驮》、基督教的《旧约》的地位，他们加了按语说："陈义确当，同人无任佩服。"他们认为一切都应该以古代为典范，编辑中有个叫黄节的，当时孜孜于华夷之辨，以光复旧学自任。他做了一部《黄史》，其中《礼俗书》一节，对革命后人民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作了设计。他建议，婚姻，不必如西方的婚姻自由，而应采用《周官》旧礼；丧礼，依明太祖制，为父母斩衰三年；祭祀，返乎三代；住房，远法商代的"四阿屋"。据黄节考证，古代还有所谓"通天屋"，比现代的摩天楼还好。冠服，古代有"留幕"，又有"窄衣"，可以仿制；音乐，国乐已亡，幸而尚存《诗经》中的《鹿鸣》之谱，可以"庶几仿佛皇汉"；舞蹈，《周官》有干舞，跳起来也可以"不失陶唐氏之遗"②。

① 《菿汉微言》。
② 《国粹学报》第3、4期。

在章炳麟式的“学步中国旧人”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认为“前贤学派，各有师承；懿言嘉行，在在可法”。在刘师培编写的《编辑乡土志序例》中，不仅包括名臣传、绅耆传、孝义传、一行传（忠臣、孝子、义仆），甚至也包括列女传，目的在于“表扬名德，阐扬幽光”。

在文学方面，《国粹学报》诸人和章炳麟一样反对白话文、新体散文，称之为粗淺鄙俗，不雅驯；称新体诗歌是“新曲俚词”，拼音简字是“愚诬之说”；提高小说地位是“尊稗官为正史”。他们自己的作品则标榜“纯用古人体裁”，“文辞务求古”，“择言求雅”，甚至说什么“群经多有韵之文，旧典尽排偶之作”，提倡形式主义的骈体文。他们又腾出大量篇幅来发表陈三立、郑孝胥、朱古微、王闿运等同光体、常州词派作家的作品，拉拢严复、林纾等参加国学保存会，和旧文化合流。

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文中指出过，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这种情况，是同国粹主义思潮在革命派内部得到广泛传播的事实互为表里的。

## 四

在文学团体南社身上，最清楚地说明了国粹主义思潮怎样窒息了近代中国革命文化人的创造活力，使之在后期逐渐蜕变为文化复古组织。

南社成员在其初期有许多人都属于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在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上采取着激烈的态度。例如宁调元曾经痛骂孔子是“民贼”，“致胎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柳亚子则是卢梭的崇拜者，认为中国的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

第一义。"他热烈地呼喊"民权"、"自由"，特别积极提倡女权，批判"三从七出"等封建纲常。高旭，以"鼓吹欧潮"自责，宣称"我爱自由如爱命"。他根据进化论的原理批判保守复古倾向，要求发展变革，声言"我说为父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愈演而愈上，今必胜于古"，"物种能变易，即为天所佑……一成而不变，斯义实大谬"。在文学上，他是新体诗的积极提倡者。周实，认为对中国的古文化，即使是圣贤的"大义微言"，也应该"餍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认为儒家"甚不广大"，反对在各地遍设存古学堂。林獬，积极提倡"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当兵的弟兄们"都能读得懂的白话文。在南社成立前，他们办的刊物也大都富于开创精神和改革勇气。例如1904年陈去病、柳亚子等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新曲新理"，发表过一些表现当时现实的"时事剧"，以"开通下等社会"、"收普及之效"为目的。语言则"或尚文采，或演白话，不拘一例"。又如1906年出版的《复报》首期，发刊词即标名"通俗体"。此后每期均发表新体诗及歌词。但是，在南社成立后，这些成果并不曾鲜明地反映到它的纲领和文学活动中去，其原因就在于国粹派的影响。

南社的酝酿过程正是保存国学的呼声在革命派内部愈来愈高的时期。上文已经谈过，南社的主要成员大都参加过国学保存社；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陈去病更曾一度担任过《国粹学报》的编辑，因而国粹派的观点反映到南社内部去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南社成立前，一部分社员曾经对社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高旭后来回忆说，陈去病为什么要发起南社呢，是因为觉得"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①。何谓"思想"？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何谓"学问"？显然就是"国学"了。高旭请宁调元为《南社集》作序，宁调元在回信中说，《南社》应该"囿杂志

① 《周实丹烈士遗集序》，《南社》第7集。

之藩篱”，以“保神州之国粹”为目标。① 正是在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本来具有革新勇气的人认识模糊了，妥协了。例如高旭，这时就表现了一种摇摆的倾向。在《愿无尽庐诗话》中，他一方面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南社启》，就接受了国粹派的观点：

> 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之尤可贵者，端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化者，乃奴此而主彼。……嗟呼！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忧，正不知伊于胡底矣。②

这份文件代表了南社中相当多成员的看法，对南社的文学活动起了一定的影响。于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线断了，新派诗，新体散文不被提倡了，发表在《南社丛刻》上的仍然是传统的“诗古文词”，甚至还有骈文。此外，传播革命新思想的文章少见了，而代之以宋明遗民、乡贤事迹的宣扬。《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的戏剧改良，《中国白话报》的通俗文传统被扔开了，许多社员一心一意以明代的幾社、复社文人为榜样。南社的这一倾向迅速得到了国粹派的欢呼。

辛亥革命后，国粹派立刻成立国学商兑会，发行自己的刊物，号召抱残守缺，保卫先圣之传，宗邦之旧，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且最后把柳亚子赶下了台，取得了南社的领导权。“五四”时期，这一部分人激烈地反对白话文，白话诗，说：“方今沧海横流，国学废坠，新进鄙文言为迂腐，士夫竞白话为神奇，直使吾

① 《与高天梅书》，《太一遗书·太一笺启》。
② 《南社通讯录》，辛亥正月版。

国数千年文学渊源日就沦胥之域。”① 这就使得南社这一革命的文学团体终于沦为复古派的组织。在南社解体以后，南社中的国粹派又汇合而为南社湘集，和接受了“五四”运动影响的新南社相对立。

## 五

国粹主义思潮是一种复古思潮。它的特点是抵制外来进步文化，反对变革发展，在保存民族遗产的幌子下保存封建文化，或用以抵制革命，或用以抵制革命的新文化。提倡国粹的人当然也有不同：张之洞等代表着清王朝的利益，孔教会诸人则依附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而章炳麟等国粹派则代表革命党内一部分对旧文化濡染甚深而又深情脉脉的人。象章炳麟等人，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他们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最霉烂、腐朽的部分有所唾弃，有接受新思想的要求，但是，这种唾弃和接受都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他们认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但另一方面，“‘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②。一到了学“西哲”而有碍于“子曰诗云”的“昌明”的时候，一到了反封建的革命愈益深入的时候，他们便舍弃西哲、舍弃革命，而只要“子曰诗云”了。如果说，章炳麟等一类国粹派在辛亥革命前还带有若干新色彩，他们也发表过若干正确的对当时革命有利的言论的话，那末，在辛亥革命后，特别在新文化运动后，他们的新色彩就日益消失，而只剩下封建复古的一面了。“五四”前夜，在北京大学内部与新文化派对垒、创办《国故》月刊的，正是被称为“章太炎学派”的《国粹学报》编辑刘师培等人。1918年，正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高呼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黄节在上海重新遇见了《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曾经写了一首诗给他：

① 马士杰：《与高吹万书》，《国粹丛选》第13、14集合刊。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409页。

国事如斯岂可期，当年与子辨华夷。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廿载心力，孜孜于华夷之辨，不料人心仍如江河日下，国粹将亡，自然感慨系之，其声凄以厉了。后来邓实在上海以书画古玩自娱，郁郁以终，章炳麟"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和时代隔绝了，其原因都在这里。

对国粹主义思潮的复古实质，辛亥革命时曾有少数人有所认识，他们提出过"尊今贱古"、"餍其精华，弃其糟粕"等进步的命题来与之对抗，但是并未形成强有力的思潮，大多数人则听任国粹主义在革命派内部传播，不少人还随声应和，这就使得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未能高举彻底反封建的大旗，使得一度出现过的蓬蓬勃勃的现象逐渐消失，并使历史发生了某种倒退。

彻底地展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彻底地展开对国粹派的斗争，这一任务是"五四"时期才提出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使它称得起是中国历史上以前不曾有过的伟大的文化革命。但是，这一运动也有它的缺点，这就是"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所以有些人又盲目崇拜西洋，完全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出现了许多洋八股、洋教条。

正确地解决了近代文化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革除""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

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他反对盲目排外自尊的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又强调不应该生吞活剥，盲目搬用，而应当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他反对割断历史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又反对盲目迷信古人的复古主义。他说：

>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

当我们了解了近代文化史的发展及其有关论战后，我们就会认识到毛泽东这段话包含着的深刻而丰富的内容。

批判是发展的必要环节，没有批判，就谈不上真正的继承。这种批判，是一种分析、分解和扬弃，并不是一概骂倒，全盘否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批判，才能真正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保证新兴的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保证思想革命的彻底胜利。在这方面，辛亥革命前国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历史教训。

(原载《新建设》，1965年第2期，略有修订)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700—701页。

#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至1907年，出现东京《天义报》和巴黎《新世纪》两个传播中心。它们人数虽不多，却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发生了影响。

《天义报》创刊于1907年6月10日，共发行19期。1908年4月28日，东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另出《衡报》，它实际上是《天义报》的继续。二者的创办人、编辑人和大部分文章的执笔人都是刘师培。他是这一派的理论代表。本文将以考察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兼及他的妻子何震和有关人物。

## 绝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西欧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上半叶，盛行于下半叶，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时期，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这一革命的绝望。

20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各种固有矛盾日益尖锐。启蒙思想家应许过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实现，相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却是这个制度的遍身脓疮。1900年至1905年间，法国罢工人数达到110余万，德国每年发生罢工1400余次。刘师培等人生活在日本，他们较易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也充分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恶果。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矿工罢工，并迅速

发展为暴动，成为震动全日本的重大事件。这一年，日本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 57 起。这些事件，对于去国离乡，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革命党人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日本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和影响下，他们迅速感到，资本主义决不是一条美好的出路。

《天义报》诸人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刘师培指责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役使并剥削工人，镇压工人罢工，道德最为腐败。他说："呜呼！富民之财悉出于佣工之所赐，使无佣工之劳力，则富民无由殖其财。今乃忘彼大德，妄肆暴威，既夺其财，兼役其身，非惟夺其财产权也，并且夺其生命之权，此非不道德之极端耶！"① 他看出了资本家的剥削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大盗与政府》一文说："资本家用攫财之术，以一人之身而兼有百千万人之财，盗百千万人之财而归于一人，下民安得不贫！"②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朘削贫民计耳！"③

刘师培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般是从伦理学角度，但是，也有个别文章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概念。《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一文说："通州纱布各厂所获之利尤巨，其剩余价格均为各股东所吸收。例如工人于一日间织布六丈，每丈售价五角，则六丈可售三元。然原料约一元五角，机器损耗约三角，房屋费约摊一角，是所余尚一元一角，然工人作工一日不过得三角，是股东竟得剩余价格八角也。"④ 发现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一项划时代的功绩，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本文将剩余价值译为"剩余价格"，失去了它应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但是，它把

---

①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 5 卷。
② 《天义》第 1 卷。
③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 7 卷。
④ 《衡报》第 5 号。

No/0 第十號

EQUITY

The Chinese Anarchist News.

# 衡報

每月發行三次

ISSUED THREE TIMES A MONTH.

編輯者 劉申叔

EDITOR LIEU SUN SOH.

價目表

每張售 日金二錢
全年三十六張 日金一圓 （郵費在內

中曆戊申年七月十二日
西曆1908年8月8日 出版

General objects

衡報大旨

1. Anarchist communism

顛覆人治實行共產

2. Antimilitarism and General strike

提倡非軍備主義及總同盟罷工

3. Peoples worry jotting

記錄民生疾苦

4.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and laborer Association.

聯絡世界勞動團體及直接行動派之民黨

凡寄稿通函及定報者
均寄東京通信所
編輯所 澳門平民社
發行所 同上
通信所
日本東京麴町區飯田町六ノ廿一

Correspondent do pa rtment.
No. 21, 6chome
Iidamachi,
Kojimachiku.
Tokyo,
Japan.

图二十一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份报纸
（采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

这一概念引进中国来，有助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刘师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他说："试考帝国主义发达之原因，盖政府、资本家，欲攫取异国之金钱，利其愚弱，制以威力，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资本家之实。"① 又说："资本家欲扩充商业，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遂成戕杀之世界"②。这些看法，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刘师培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和本国人民的压迫，称帝国主义为"现今世界之蟊贼"。他说："今日欧美各国，政府及富民势力日增，而人民日趋于贫苦，则帝国主义盛行之故也。"③ 刘师培的上述认识，虽然还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但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来说，仍然有其新颖感和启发性。

戊戌维新前后的一段时期，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师曾经是先进中国人的理想。他们认为，那一套相当美妙。刘师培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帖清凉剂。但是，刘师培既是缺乏辩证观念的形而上学者，又是生吞活剥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他不了解，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曾经是革命的、进步的；当它在西方已经弊端丛出的时候，在落后的中国，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他错误地得出了应该和年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结论。《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一文说："中国自今而往，资本阶级之势力必步欧、美、日本之后尘，则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而吾党所当从事者也。"④ 这样，他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的认识上，就远远偏离了实际。刘师培在有的文章中并进一步声称，要"杀尽资本家"⑤。无政府主义思想常常具有狂热的特征，表现在这里的就是一种极端的狂热。

在当时，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

①③ 《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
②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5卷。
④ 《衡报》第5号。
⑤ 《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卷。

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一一受到指责。

民族主义，刘师培讥之为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在他的笔下，孙中山等人提出这一主义完全出于不光彩的目的，"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①，"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②。他们说：革命派的"排满"和改良派的"保满"没有什么区别，"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结论是："民族主义，乃不合于公理之最甚者也。"③

民族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缺乏阶级观点，部分革命党人的思想内则还包含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成分，指出这些局限是可以的。《衡报》的一篇文章就曾试图说明："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自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④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应该肯定和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等丑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混淆革命和保皇的界限，这只能打击革命派，"适以保护满政府"⑤。

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大缺陷。和孙中山不同，刘师培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说："非亚洲弱种实行独立，不能颠覆强族之政府"，"亚洲弱种非与强国诸民党相联，不能实行独立"⑥。但是，他的实际主张又严重地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渴望祖国的富强，然而，刘师培却攻击"富强"二字为"公理之大敌"，是什么"大盗之术"。⑦他不去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之间的本质

---

①③ 《保满与排满》，《天义》第3卷。
②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
④ 《社会革命与排满》，《衡报》第3号。
⑤ 铁铮：《政府论》，《民报》第17期。
⑥ 《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
⑦ 《废兵废财论》，《天义》第2卷。

区别，却跟在欧洲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屁股后面，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废兵”，要求解散军队。按照这些主张做去，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就只能永远被帝国主义剥削，军事上则永远挨打。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对此，刘师培强烈反对。他尖锐地揭露资产阶级选举制、代议制的欺骗性，认为在这种制度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破坏社会论》一文说：“今法美各国，号为民主之国矣，然主治者与被治者阶级未能尽除也，贫富之界非惟不能破，抑且变本加厉。富者收佣工以增己富，因富而攫权；佣工为贫而仰给于人，因以自失其权。由是贫者之命悬于富者之手，名曰普通选举，实则贫者并无生命权，其选举之时，势不得不举富人以仰其鼻息，则所谓选举者，与专制何异？乃号其名曰共和，吾不知其何者为共，何者为和也，则共和政体非公明矣！”①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也只能是富民得益，贫民受病。

应该承认，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上，刘师培等人的思想有其深刻性。但是，他们不了解，和封建专制主义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对历史发展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有利；在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制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农奴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②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主要决定于它的阶级内容，而不在于共和制等形式。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核心。对此，刘师培讥之为

① 《天义》第1卷。

② 《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2页。

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改制。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① 历史上，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和王莽改制都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在刘师培看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也不过尔尔。

刘师培等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以暴易暴，"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所谓法律、租税、官吏、警察、资本家之弊，无一不足以病民，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为尤甚"②。因此，他们表示要"别筹革命之方"③——提倡"无政府革命"。刘师培说："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④

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和不可避免性，以为这一革命的结果反而不如不革命，这一观点自然是荒谬的，但是，剥去它的荒谬部分，我们却又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反映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旧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并不十分美好，中国人民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筹革命之方"的提法并不错，问题是所"筹"之"方"错了。

##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攻击马克思主义

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刘师培等人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天义》第8、9、10卷合册的《新刊预告》中，曾列入《共产党宣言》一书，宣布已请同志编译，不日出版。后来，它发表

① 《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第5卷。
②④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
③ 《〈俄国革命之旨趣〉译者识语》，《天义》第16—19卷合册。

了恩格斯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此外，它还发表过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个别段落。在为《宣言》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刘师培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工人运动、研究历史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意义。他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细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①又说:"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②《天义报》还译载过英国社会党领袖海德门的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完全同意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高度评价，按语说:"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③译者批评中国学者不懂得研究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④，这就接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浙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刊物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介绍，比较起来，以《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水平为最高。

但是，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刘师培又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一是斗争策略。刘师培完全反对议会斗争，并把导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责任推到马克思身上。他说:"夫马氏暮年宗旨，虽与巴枯宁离析，致现今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⑤其二是国家学说。刘师培反对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说:"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

①②③④ 《天义》第16—19卷合册。

⑤ 《<共产党宣言>序》,《天义》第16—19卷合册。

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①在刘师培等看来，建立了国家，有了管理和发展社会生产的“中心”，其结果必然是：“多数劳动者昔为个人奴隶，今一易而为国家之奴隶，其监督之严，或增一层之惨酷。”②他们把任何国家形态都看成坏东西，视政府为

共產黨宣言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馬爾克斯 Marx 因格爾斯 Engels 合著　民鳴譯

歐州諸國。有異物流行于其間。即共產主義是也。昔歐州之有權力者。欲施禁止之策。乃加入神聖同盟。若羅馬法皇。若俄皇。若梅特涅。（奧相）Metternich 若額佐。Guizot 若法國急進黨。若德國偵探。

試觀在野之政黨。有不受在朝政黨之毀傷。而目爲共產主義者乎。又試觀于在野之政黨。對于急進各黨及保守諸政敵。有不詬爲共產主義者乎。

即此事實。足知如左之二事。

一共產主義者。致使歐州權力各階級。認爲有勢力之一派。

二共產黨員。克公布其意見目的及趨向。促世界人民之注目。並以黨員自爲發表之宣言。與關于共產主義各論議。互相對峙。今其機已熟。

因此目的。故各國共產黨員。集會倫敦。而草如左之宣言。以英法德意 Flemish 荷

共產黨宣言

图二十二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译（190 8年）
（采自《天义》第16、17、18、19四册合刊）

① 《〈共产党宣言〉序》，《天义》第16—19卷合册。
② 《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天义》第13、14卷合册。

万恶之源，总结了两条公式：一条叫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反比例，国家愈盛，则人民愈苦，一条叫政府与公理成反比例，政府存在，则公理不昌。①《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文宣布："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政权者，决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②

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思想，这一点，刘师培等和蒲鲁东以来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有区别，但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又表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特点。

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是一盏可以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明灯。刘师培等绝望于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本来是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机，但是，他们却失之交臂。中国人民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走过一段曲折的途程。

## "完全平等"的无政府乌托邦

无政府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几个不同的流派，如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等。刘师培对上述各派都作过考察，他选择了共产无政府主义。

斯谛纳尔是所谓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我"是万事万物的主体，人类的进化之途是由集合之体分化为个体，由国家、社会分化为个人，达到不受任何制限，"各遂我性"的境界。刘师培接受过斯谛纳尔的影响。《戒学政法歌》以"国家"为"第一邪说"，以"团体"为"第二邪说"，歌云："第二邪说即团体，侈说合群真

① 《论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一相反之比例》，《衡报》第1号；《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8卷。

② 《天义》第15卷。

放屁。高张团体升九天，压制个人沉九渊。天网恢张众莫避，譬如兽罟与鱼筌。团体公意众人守，空立规条垂永久。有人欲遂自由性，便骂野蛮相掣肘。互相束缚互箝制，活泼精神更何有！试看群花大放时，众瓣各与苞蕊离。人类进化无止境，当使人人呈个性，人非团体不能生，毕竟野蛮风未尽。"① 要求"人人呈个性"，把"团体"视为束缚自由的"兽罟鱼筌"，这正是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但是，刘师培认为，当时的人民还达不到这种程度："盖近今之民，决不能舍群而独立。"他把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异日物质文明倍为进步，或一切事物可以自为自用，则斯氏之说，或有实行之一日。"②然而，刘师培有时又感到，"自为自用"不仅永远做不到，而且流弊很大。他举例说：建筑一座房子，决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人人都"自为自用"，必将"人人各私其所有，彼此不复相顾，一遇天灾，死伤必众。"③ 这就实际上否定了个人无政府主义。比起斯谛纳尔来，刘师培要清醒一些，他的理论多了一点集体主义的色彩。

托尔斯泰是所谓"消极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日本报刊先后发表了他的《答日本报知新闻社书》、《致中国人书》和《俄国革命之旨趣》等文，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刘师培高度肯定托尔斯泰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指责，尤其欣赏他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赞美，认为"欲改革中国重农之俗而以工商立国者"，不可不读托尔斯泰的著作④。但是，他不同意托尔斯泰对近代物质文明的完全否定，认为在有政府有阶级的社会里，物质文明是掠夺平民的工具，而在无政府、无阶级的社会里，"物质文明日进，则人民愈便利"⑤。比起托尔斯泰来，刘师培也似乎要开通一些。

在当时，刘师培主要信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这

① 《天义》第8—10卷合册。
②⑤ 《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天义》第13、14合卷。
③ 《人类均力说》，《天义》第8卷。
④ 《天义》第5卷。

种主义主张，发扬人类天赋的互助精神，“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现今财产私有之制”。① 刘师培认为它“最为适宜”②，准备在破坏现存社会后立即付诸实施。他的无政府乌托邦主要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臆想的。但是，刘师培的思想并不是对前人学说的简单重复，它有着自己的创造，这就是以“完全平等”作为最高原则。

刘师培认为，人类有三大权：一是平等权，“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二是独立权，“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三是自由权，“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于人之谓也”。这三大权都属于天赋人权，其中，尤以平等权最为重要。他说：“无政府主义虽为吾等所确认，然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共产、社会二主义均有所采。惟彼等所言无政府，在于恢复人类完全之自由；而吾之言无政府，则兼重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③ 刘师培的这段话道出了自己的理论特色，下面的一段话就更清楚了。他说：“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独立权者，所以维持平等权者也。惟过用其自由之权，则与他人之自由发生冲突，与人类平等之旨或相背驰，故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可限制个人自由权。”④ 历来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以个人的“完全自由”或“绝对自由”作为最高原则，而刘师培却独张异帜，表示为了“人类平等”，可以限制“个人自由”，从而形成一种变态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臆想的无政府乌托邦特点有三：

一、无中心、无畛域。刘师培说：“无政府主义非无稽之说也，蔽以一言，则无中心、无畛域已耳。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

①② 《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天义》第13、14卷合册。

③④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4卷。

故可无国家。"① 他设想，在破坏固有之社会，破除国界、种界后，"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画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另设阅书和会食之地，作为人民共集之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在上"之人，连管理生产和分配的人员也不需要。②

近代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它需要广泛的合作、联系和高度的组织性。拘限于"千人之乡"，没有具有一定权威的管理"中心"，任何社会化的大生产都无法进行，所谓"无畛域"也就是一句空话。

二、实行共产。刘师培认为，在无政府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共产"，那末，富民横暴、盗贼劫掠等现象都将不可避免，只有实行"共产"，"使人人不以财物自私，则相侵相害之事将绝迹于世界"③。这里所说的"共产"，不仅指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而且也指一切产品和财富。《废兵废财论》说："于民生日用之物，合众人之力以为之，即为众人所公用。"④《人类均力说》称："凡所制之器，置于公共市场，为人民所共有。"⑤ 刘师培等设想：由于社会产品无限丰富，可以听任人们"各取所需"，不需要任何分配者和分配制度："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哪样就有哪样，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样。"⑥

刘师培认为，由于实行"共产"，因此根本不需要贸易、交换，因而也就不需要货币。他说："使人人不以财产自私，则贸易之法废，贸易之法废，则财币为易中之品者，亦失其行使之权。

①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7卷。
② 《人类均力说》，《天义》第8卷；参见《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第8—10卷合册。
③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
④ 《天义》第2卷。
⑤ 《天义》第3卷。
⑥ 《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第8—10卷合册。

虽财币丰盈，于己身曾无丝毫之利，则人人将以刍狗视之矣！”①

刘师培曾经注意到生产力问题。他认为，“中国欲行此制，必先行之于一乡一邑中，将田主所有之田，官吏所存之产，富商所蓄之财，均取为共有，以为共产之滥觞。若各境之民互相效法，则此制可立见施行。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足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② 这就是说，可以先“共产”，后发展生产力。在有些文章中，他甚至认为，闹灾荒的时候实行“共产”最容易。《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一文说：“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府了。”③

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也不可能消灭商品和货币。刘师培这种超前发展生产关系，先“共产”，后发展生产力的设想，在实践上只能破坏生产力，并在分配上通向绝对平均主义。关于后一点，他们的言论已现端倪，如要求“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④，“所筑之室，其长短广狭均一律，人各一室”等⑤。

三、实行均力。刘师培认为，人人作工，人人劳动，固然是平等的，但是，同一作工，苦乐难易大不相同，还是不平等，例如造钉制针，所费劳力甚少，而筑路筑室，则所费劳力甚多。因此，他又提出，要消灭“分业社会”，实行“均力主义”。其方案是：每个社会成员20岁之前在上述的“栖息所”受教育，20岁后即须出而劳动，按年龄依次轮换工种，即21岁至36岁一律从事农业劳动，同时兼做其他工作（21岁筑路，22岁开矿、伐木，23岁至26岁盖房，27岁至30岁制造陶器，31岁至36岁纺织及制衣），37岁至40岁烹饪，41岁至45岁运输货物，46岁至50岁为工技师及医师，50岁以后养育幼童并任教师。刘师培把这种情

① 《废兵废财论》，《天义》第2卷。
② 《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衡报》第2号。
③ 《衡报》第8号。
④ 《破坏社会论》，《天义》第1卷。
⑤ 《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

况叫做“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又叫做“人人不倚他人，人人不受役于人”。据他说，这样做就“权利相等，义务相均”，苦乐相齐，完全平等，达到“大道为公”的境界了。①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分工造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说包含着对上述情况的不满和抗议。但是，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高度的分工和专门化。不考虑劳动者的专长、知识水平、技艺熟练程度和个人志趣，一律机械地按年龄轮换，要求“一人而兼众艺”，遍历所有劳动部门，这种做法，感情上是痛快的，理论上是彻底的，但是，它只能造成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破坏、大倒退。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曾经批评过一些“左派”糊涂虫的“平均主义儿戏”，认为它给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② 刘师培等也是一些“左派”糊涂虫，“均力”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儿戏！

刘师培的“均力”说在某些地方很类似于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以“法郎吉”(协作社)为基层组织，每个“法郎吉”拥有1620人，分成若干“谢利叶”(生产队)。劳动者可以经常地调换工种。刘师培在构思他的乌托邦时可能受过傅立叶的影响③，不同的是：傅立叶的工种调换完全以劳动者的个人兴趣为依据，刘师培的职业轮换则以年龄为标准，劳动者本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它典型地体现了刘师培的理论原则——“欲维持人类平等权，宁可限制个人自由权”。

可以看出，刘师培的“完全平等”说的核心是绝对平均。在中国古代，农民有过“均贫富”、“均田”的要求，到了刘师培的“均力”说，平均主义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张有着明显的矛盾。

---

① 《人类均力说》，《天义》第8卷。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③ 《天义报》曾在16—19卷合册介绍过傅立叶的学说。

要使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都准确无误地列入“均力”说的时间表中去，要人们都住一样大小的房子，穿一个式样的衣服，吃一律的饭，就必须建立严密而有力的管理机构，还必须伴以无情的强制。当时，曾有人致书《天义报》,认为刘师培等“标无政府之名”，“终难逃有政府之实”①，这是击中了刘师培的要害的。刘师培要使他的乌托邦化为现实，就必须建立政府，而且必须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府。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有时是对立面，有时则是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

正像没有什么“完全自由”或“绝对自由”一样，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刘师培幻想的“完全平等”或“绝对平等”。恩格斯说：在各个国家、省份、地区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② 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灭，但是，不可能消灭一切差别。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只能限于消灭阶级，超出这个范围，就必然要流于荒谬。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出现的口号，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师培看出了，不能以“自由”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这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某种不满；但是，他又标榜“完全平等”，这就说明，小资产阶级最终跳不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

刘师培宣称，他并不摒弃近代物质文明，相反，主张机器生产。这一点，他和蒲鲁东主义不同，也和托尔斯泰主义不同，但是，他实际上并不熟悉近代文明。不论是“无中心”的“千人之乡”也好，“杀官、抢富户”的“共产主义”也好，以农为主、半农半工的“均力主义”也好，处处都镌刻着小生产者狭隘经验的印记。

② 铲平王：《世界平等政府谈》，《天义》第13、14卷合册。

③ 《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页。

刘师培又说："原人之初，人人肆意为生，无所谓邦国，无所谓法律，人人均独立，人人均不为人所制，故人人俱平等。"又说："上古之初，人人自食其力，未尝仰给于人，亦未尝受役于人，虽所治之业至为简单，然分业而治则固上古所未有也。"①20世纪初年，人们对原始社会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刘师培在构思他的无政府乌托邦时，除了依据小生产者的狭隘经验外，也吸取了关于原始共产制的某些知识。显然，它不是对未来社会的天才猜测，而是一种倒退的臆想。

## 以"劳民"为革命动力

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家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笼统地提出要依靠"国民"，有的认为要靠"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有的认为要靠会党和新军；与上述各种认识迥然不同，刘师培等人明确指出，必须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劳民"，即农民和工人。

刘师培看出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狭隘性质，也看出了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活动范围的窄小。他认为：法国革命，只是巴黎市民的革命，美国独立，只是商人的革命，因此革命成功之后，平民依然吃苦；只有像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一样，使"革命之思想普及于农工各社会并普及于全国之中"，"革命出于多数平民"，才能叫"根本之革命"②。张继说："无论行何种革命，均当以劳民为基础。"③《衡报》说："现今中国，欲兴真正大革命，必以劳民革命为根本。"④他们并且指出，在这种革命中，"劳民"不仅是参加者，而且应是"主动者"。《衡报》说"中国革命非由劳民为主动，

①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4卷。
②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
③ 《张继君由伦敦来函》，《衡报》第4号。
④ 《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衡报》第5号。

则革命不成。”①

刘师培等认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②，首先从事“劳民结合”。为此，《衡报》曾发表长文《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说明组织劳民协会“乃当今之急务”③。张继当时流亡在欧洲，他建议仿照法国劳民协会的办法，在中国各地设立“工党”。这些地方，说明他们和19世纪末年以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致，张继并建议革命党人甩掉绅士气派，“脱卸长衣，或入工场，或为农人，或往服兵”，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基础。④在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建议制订“工会组织法”，编写白话小册子，以便运动工人⑤。

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次较为彻底的革命都必须有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否则就要夭折，或者浮皮潦草地结束。辛亥时期大多数革命家们严重忽略了的地方，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却看出来了。应该承认，这一点，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也有贡献。

刘师培重视农民问题。他曾发起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章程云：“中国幅员广大，以农民为最众，亦以农民为最苦，惜困厄之状，鲜有宣于口、笔于书者。迄今所出各报纸，于各省政治、实业虽多记载，然于民事则弗详，民事之中，又以农事为最略。嗟我农人，诚古代所谓无告之民矣。仆等有鉴于此，爰设农民疾苦调查会，举官吏，富民之虐，据事直陈，以筹救济之方，兼为申儆平民之助。”⑥其后，《天义》报、《衡报》陆续发表了一批调查记，如《贵州农民疾苦调查》、《川省农民疾苦谈》、《山西佃民之疾苦》、《山东沂州佃民之苦》、《皖北佃民之苦》、《江苏松江农民之

① 《汉口暴动论》，《衡报》第4号。
②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之革命得失》，《天义》第6卷。
③ 《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衡报》第5、6号。
④ 《张继君由伦敦来函》，《衡报》第4号。
⑤ 《平原断侵君来函》，《衡报》第10号。
⑥ 《天义 第8— 0卷合册。

疾苦》等，也发表了一些反映中国早期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记，如《四川工人之悲苦》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村调查和社会调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热心于陈述满洲贵族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时，农民疾苦调查会的活动显然别具一格。

刘师培等人没有停留在表象上，而是揭示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地主阶级。在《悲佃篇》一文中，刘师培指责"田主"为"大盗"，"始也操蕴利之术，以殖其财，财盈则用以市田，田多则恃以攘利，民受其厄，与暴君同"①。《衡报》并发表专文《论中国田主之罪恶》，分析中国地主制度的特点和演变。该文认为："重农之国，民间以田多为富，欲垄断多数之土地，不能不使役多数之农民，而田主、佃民之阶级遂一成而不可易。""佃民者，其生命财产之权均操于田主，谓之佃民，不若谓之农奴。"文章的结论是："为今日农民之大害者，田主而已。"②资产阶级革命派专注于"排满"，因而放过了地主阶级，刘师培等人却把它揪住了，虽然，他们还认识不到地主阶级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

刘师培号召实行"农民革命"。《悲佃篇》提出："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③《衡报》曾专门出版"农民号"，其中《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一文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无政府革命，必须从"农民革命"开始。文章充分估计了农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仍以农民占多数，农民革命者，即全国大多数人民之革命也。以多数抵抗少数，收效至速。"文章驳斥了中国农民没有"革命之资格"等说法，针锋相对地表示，农民有团结之性，有抵抗之能力，"革命党出于农民"。它说："试观之中国历史，则陈涉起于佣耕，刘秀起于力农，而唐初之时，刘黑闼起于漳南，其所率均农民，此固彰彰可考者矣。自此以外，则西晋之

① 《民报》第15期。
② 《衡报》第7号。
③ 《民报》第15期。

时，流民扰乱亦均无食之农民。明代之时，则邓茂七以佃民之微，起兵闽省。明末之乱，亦以无食农民占多数。近世捻匪之众蔓延北方各省，然观曾国藩诸人所奏疏，均谓聚则为匪，散则为农，

專件

農民疾苦查會章程

中國幅員廣大。以農民爲最衆。亦以農民爲最苦。惜困厄之狀。鮮有宣於口筆於書者。近今所出各報紙。於各省政治實業。雖多記載。然於民事則弗詳。民事之中。又以農事爲最略。嗟我農人。誠古代所謂無告之民矣。僕等有鑒於此。爰設農民疾苦調查會。舉官吏富民之虐待。直陳無隱。於農民救濟之方。兼爲申儆。平民之助。海內志士。如有熱心平民主義者。均乞代任調查。或各舉所知。函達本會。則多數農民之幸也。今將調查簡章列於後。

一 我國有言曰。聞不如一見。農民疾苦。有此省與彼省不同者。有此府與他府不同者。即一府一縣之中。所稱之苦。亦或殊異。惟以本境之人。述本境人民之況。斯與傳聞之說不同。故擔任調查諸君。無論留學日本及身居祖國。所陳之事。均乞以本邑爲限。或以他鄉所目睹之事爲限。

專件

图二十三　农民疾苦调查会章程（1907年）

（采自《天义》第8、9、10册合刊）

则革命党出于农民，益有征矣！”[1]从陈胜开始绵延中国历史近两千年的农民起义，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评价。

在土地问题上，《衡报》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当革命初起之时，农民摆脱田主和国家的羁绊，实行“完全之个人私有制”；第二步，当革命成功之后，扩充农民固有的共产制，“使人人不自有其田，推为共有，以公同之劳力从事于公同之生产，而均享其利”。[2]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都主张土地共有，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推行起来，必将脱离渴望得到土地的佃农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贫农。《衡报》两步走的设想是一个创造。

必须指出，刘师培号召的“农民革命”并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一种停留于自发斗争阶段的骚动。《衡报》列举的“革命”方式有二。一为抗税，即各境农民互相结合，誓不纳税、纳租；佃民自有其田，不再承认土地为田主所私有。当田主讼于官署，差役捕人或索租时，合群力相敌，或加以殴击，同时驱逐为官效力的保正、庄头等出境。二为劫谷，即破坏各村大地主的粮仓，分其谷米；劫掠富民所开的典当，分其货物；各债主有贷财取息，强迫农民以田地作抵者，以强力相加，收为己有。文章认为，在发生上述斗争后，官府必然派兵镇压，但农村广大，政府兵力不够分配；农民不售谷，不纳税，政府军必然饥而自溃。[3]文章中虽然有“相敌”、“殴击”、“强力”一类字眼，但完全是自卫性质，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非军备主义”使他们不允许有组织农民武装，进行农民战争的思想。他们虽然充分肯定陈胜等旧式农民起义，但在实际斗争的要求上，他们还赶不上陈胜等人。

刘师培等提倡的另一种斗争形式是总同盟罢工。

总同盟罢工是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多年的号召，德国人罗列以此为题，专门写过一本小册子，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该书认为，总同盟罢工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流的革命方法”，可以

①② 《衡报》第7号。

③ 《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衡报》第7号。

在一旦之间把社会搅成乱泥，从而迅速摧毁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张继、刘师培、章炳麟等人都非常欣赏这种斗争形式。刘师培说："倘罗氏之策推行禹域，闾阎驿骚，纭若羹沸，则握政之人，丧其所依。即以甲兵相耀，其资粮履扉之供，亦匮竭莫复继。"①在他看来，这种斗争形式完全可以战胜统治者的"甲兵"，建立"泯等威而均民乐"的太平世界。1908年5月，汉口发生摊贩骚动，汉口警局强迫各处摊贩一律迁往指定地区，激起公愤。摊贩们聚众万余，拆毁警棚，焚毁警局，威胁商民罢市。《衡报》把这看作总同盟罢工的中国模式，立即作了报道，按语说："此实中国劳民之最大示威运动也。前岁上海罢市，其主动由于绅商、新党，其目的在于对外；此次汉口罢市，其主动出于小商，其目的在于对内。语云：'冤有头，债有主'，汉口此举，殆中国社会革命之先声矣！惟望中国劳民踵此而兴，反抗官吏、资本家，以实行劳民大革命，则共产无政府之社会施行未远矣！吾党谨为中国劳民贺，并愿以西历五月十四日为中国劳民革命纪念日。"②随即发表长文，提出了在汉口实行总同盟罢工的方案。该文认为，汉口为适中之地，工业发达，拥有数万工人，一旦罢工，武昌、汉阳、大冶等处的工人和湖北各地的农民必然纷起响应，"以多数之劳民，抗敌少数之兵警，夫复何难之有！"③

总同盟罢工具有一定的威力，但是，夸大这种斗争形式的作用，以之作为"唯一"的革命方法，同样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主张以"劳民"为革命的动力，重视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革命性格，呼吁革命党人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去做发动工作，这些地方，刘师培等人高于孙中山，但是，在坚持武装斗争上，却又远远落后于孙中山。

---

① 《天义》第8－10卷合册。

② 《衡报》第8号。

③ 《汉口暴动论》，《衡报》第4号。

# 被吹胀了的“男女革命”论

妇女问题受到刘师培等人的特别注意。

《天义报》曾用大量篇幅揭露过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而特别集矢于儒家。何震说：“儒家之学术，以重男轻女标其宗。”她认为，自孔丘开始，經过汉、宋儒者，形成了以“夫为妻纲”为核心的一整套压迫妇女的学说。她愤愤地喊道：“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又说：“前儒所言之礼，不啻残杀女子之具。”① 这是戴震以来对儒家思想最强烈的控诉。

何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结婚、离婚自由，有和男子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等权利，这些地方，较中国封建社会为胜。但是，妇女只获得了肉体上的解放，而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举例说，资本主义的婚姻取决于金钱、门第等因素，“男子以多财相耀而诱女子，或女子挟家资之富而引男子爱慕之心”，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存在的是多妻制和多夫制。因此，“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② 应该承认，何震的这些看法有一定见地。

何震呼吁人们实行“男女革命”，破除中国几千年来的重男轻女之风。她的具体主张一部分是合理的。如：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并重，做父母的要“视女犹子，视女之所出如孙”；男女养育同等，教育同等，有担任同等职务的权利，社会上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有妇女参加；夫妇感情不合，可以分离；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娼女等。③ 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妇女摆脱男权和夫权压迫的愿望。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与绝对化，她的“男女革命”论又是极大地吹胀了的。

---

① 《女子复仇论》，《天义》第 3 卷。

② 《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 7 卷。

③ 《女子宣布书》，《天义》第 1 卷。

何震声称:“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① 这样,“男女革命”就提到了一切革命的首位。与何震的观点类似，另有人则提倡毁家，认为有家而后有私，家为万恶之首，只有毁家，才能拉开社会革命的大幕②。她们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不懂得妇女的解放决不能先于社会的解放，把主次完全颠倒了。

由于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并揭示革命的对象。何震宣布所有的男子都是“大敌”，说是:“今男子之于女子也，既无一而非虐；而女子之于男子也，亦无一而非仇。”③ 她鼓吹“女子复仇论”,声言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不仅如此，她还表示，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④ 例如，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她们要“共起而诛之”!未婚之女嫁再婚之男者，她们也要“共起而诛之”。⑤ 这样，何震就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人们都列入了打击计划。按照她的理论做去，必将出现一个乱诛乱斗的局面。

参加公共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大批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这对于提高妇女的地位是有作用的。但是，刘师培等却对此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由“玩物”发展为“用物”,“既屈其身,兼竭其力”,地位更加低下⑥。同样，他们也不能正确地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认为只能造成一批“助上级男子之恶”⑦ 的女子贵族，徒然增加一重压迫。

稍后，在个别问题上，刘师培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从

① 《天义报启》，《复报》第10期。
② 汉一:《毁家论》,《天义》第4卷。
③ 《女子复仇论》,《天义》第2卷。
④ 《破坏社会论》,《天义》第1卷。
⑤ 《女子宣布书》,《天义》第1卷。
⑥ 《论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卷。
⑦ 《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

《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二书中得到启示。《女子问题研究》一文说："以上所言，均因氏（指恩格斯——笔者）所论财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① 从"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到"必自经济革命始"，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找到一条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何震说："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② 把妇女解放和"无政府革命"联系在一起，当然只能是一条死胡同。

## 歌颂中国封建社会

历史现象竟是这样地有意思，当刘师培等批判资本主义，宣扬最彻底、最圆满的"无政府革命"时，他们表现出狂热的"左"派姿态，然而同时，他们却又在深情脉脉地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赞歌，表现出货真价实的右派本色。

据刘师培说，中国社会具有和西方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因此，西方各国实行无政府很难，而中国则和无政府主义理想很接近，实行起来比较容易。理由有三：

第一，中国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刘师培说："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出于儒、道二家之学说。儒道二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专制，实则上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上之于下，视若草木禽兽，任其自生自灭；下之于上，视若狞鬼恶神，可近而不可亲。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

① 《天义》第16—19卷合册。
② 《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

异。"①

中国的封建统治建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散、闭塞、割据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因循、苟且、疲惰等作风，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则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②资产阶级以现代化的手段建立了庞大的、强有力的、高效能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这是封建统治者所望尘莫及的。关于此，刘师培有一个对比。他认为，中国自两汉迄今，虽然是专制政体，但距国都较远的地方，政府干涉力就不能达到；而欧洲今日，交通机关，日益发达，杀人之器，日益发明，加上巡警侦探，分布都市，人民稍有反抗，立即遭到镇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野蛮之国，人民之自由权尚克维持；文明之国，人民决无自由权。"③

资产阶级的统治远较封建统治严密、强化，资产阶级直接的、露骨的压迫也有别于用儒、道思想包裹起来的中国式的封建压迫。如果指出上述两点，自然是正确的；如果竟据此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不主干涉"的"自由"社会，那当然是一种美化。

第二，中国社会早就消灭了贵族，法律平等。刘师培说："若中国去封建时代已数千年，为之民者，习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贵族之制既除，富民之威未振，舍君主官吏专制外，贵

①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56页。

③ 《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5卷。

贱贫富，治以同一之法律，其制本属差公。"①

欧洲封建社会长期处于领主制经济形态，自国王至诸侯、家臣、骑士，构成了一系列贵族等级。他们在分封的领地内既是土地占有者，又是政治统治者，握有行政、司法、征税、铸币等特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地主制经济形态。秦王朝废分封，改郡县，勋臣、贵戚、地主们虽然占有土地，但行政、司法、征税、铸币等权则概归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官吏掌握。汉以后，历代大体相沿秦制。

正确地分析并指出欧洲和中国两种封建经济形态及其政治结构的不同是必要的，但据此而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已消灭了贵族，法律平等，同样是一种美化。

第三，中国社会贱兵贱商，以农为本。刘师培说："中国自三代以来，以迄秦汉，其学术思想，均以弭兵抑商为宗，观老子言佳兵不祥，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推之宋牼言罢兵，许行倡并耕，董仲舒言限田，一以利民为主，而杂霸之谈，商贾之行，则为学士所羞称，故以德为本，以兵为末，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其制迥胜于今。"②

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矗立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建立在近代工业和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上，为了保护和促进商品流通，开拓市场，必然贵兵贵商；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为了保持这个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固性，自然贱兵贱商，它是中国长期落后、软弱、停滞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什么"迥胜于今"的宝贝。

刘师培等既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上述种种优点，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封建主义远胜于资本主义，一切改革都没有必要。他曾举学堂、代议政体、实业为例，说明"新政"只能"病民"："若即社会之近况言之，则科举废而士人失业，汽车行而担夫嗟生，

①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第8—10卷合册。

② 《废兵废财论》，《天义》第2卷。

轮舟行而舟人失所，加以迷信既破，而术数之业，不克恃以谋身，电信既通，而邮驿之夫不克恃以谋食，平民疾苦，为往昔所未闻。且近日商埠之地，恃御车为业者以数万计，均属昔日之农民，今上海之地，改试电车，则御车者又失业。援是以推，则所谓新政者，果为利民之具耶？抑为害民之具耶？毋亦所利者在于少数人民，而所害则在于多数人民乎？"① 因此，他的结论是：学堂不如科举，立宪不如专制，维新不如守旧。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常常来自不同方面：一是地主阶级顽固派，一是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威胁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一是工人阶级。辛亥革命前夜，东南一带由于外资输入和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手工业遭到冲击，担夫，舟人等传统行业受到挑战，不少农民弃农作工，沦为雇佣奴隶。这些人，在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还可以生存，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却成了没落者，因此，不是沉溺于幻想，就是缅怀往古。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正代表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②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和国粹主义气息，这固然和他的出身、教养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三代治《春秋左氏传》的书香门第，极为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和他企图依附的小生产者这一社会阶层有关。小生产者和封建地主阶级既有其对立的方面，又有其一致的方面，这就是都具有狭隘、保守的阶级性格，都恐惧并反对资本主义，都企图保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的无政府主

①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第8—10卷合册。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义和右的国粹主义合流并不奇怪，刘师培从提倡“无政府革命”到投降端方，后来又依附袁世凯，高唱“君政复古”也并不奇怪。

## 结　　语

刘师培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以蒲鲁东、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经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毁灭性的批判。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为鼓吹议会道路的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作为它的对立面，“左”的无政府主义便死灰复燃了。在某些资本主义虽发展，而小生产仍占优势的国家里，它就更为活跃。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正表现了这种情况。中国是个小生产者极为广大的国家，刘师培等人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吸引是很自然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师培等较早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揭露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强调以农工为革命的动力，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看不到的方面，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提不出的问题，有一定贡献，不应该完全抹煞。

但是，刘师培等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有时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左”面，有时又站在右面，搅乱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同盟会上层在1907年的分裂和刘师培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师培等人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源头，它的短暂的表现给我们提供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革命的彻底程度永远不能超出历史进程的需要和可能，必须善于识别并抛弃各种高调。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某些

思想、纲领、政策可能是不彻底的，然而，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它却是现实的、合理的。人们不应该把那些只能在明天做的事情勉强搬到今天来做。刘师培提倡的“无政府革命”貌似彻底，然而，它超越历史进程，脱离社会实际，调子愈高，对革命也愈有害。

第二，反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立场，也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的威胁，因而，有着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憎恨。这种憎恨可能向“左”发展，成为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也可能向右发展，退向封建主义。刘师培等人的政治历程正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必须善于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经验和目光。小生产者，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其社会改造方案不可能不是空想的，也不可能不是倒退的。只有熟悉社会化的大生产，了解它的特点和要求，才可能提出科学的、切实的、进步的社会改造方案。

第四，中国革命必须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刘师培等完全否定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固然错误，但是，它却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革命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刘师培等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个任务才解决了。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并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原载《近代中国人物》，《近代史研究》专刊，
重庆出版社 1983年8月版）

#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20世纪初年开始，中国人便思考并辩论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孙中山很早就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因而也很早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前途论者的批评。在辩论中，孙中山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也不断前进。尽管他一生都没有超出主观社会主义的水平，但他的有关思想中包含着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党所珍视的积极的、合理的内核。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且正确解决了他提出而未能解决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今天，当我们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时，应该承认，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驱宣传家和思想家。

### 一

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在1903年。他在复友人函中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①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处于不同的思想层次中。一种人，热衷"排满革命"，渴望"光复旧物"，"重见汉官威仪"；另一种人，以亚洲卢梭自命，沉醉于华盛顿、拿破仑的功业。孙中山超越上述两种人，宣布以社会主义为理想，显示出他在中国革命前途这一重大问题上，具有远大的目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05年，孙中山在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下同，不一一注明），第228页。

比利时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申请，接纳他的党，同时宣布，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国际大会。这一举动，在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堪称并世无二。它表明，孙中山企图将中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此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和«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民生主义这一概念开始震动中国的政治界和思想界。1912年，民国建立，孙中山错误地认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两项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以无比的热情进行“社会革命”的宣传。他以“极端社会党”自居，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太原、杭州等地多次发表演说。不仅对社会各界和同盟会讲，也对社会党、统一党、共和党讲，甚至还对黎元洪、袁世凯讲。[①] 据报道，他还曾准备经营东沙岛，“试行社会主义”。[②] 这是他一生中宣传社会主义的高潮时期。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热情再次爆发，社会主义又一次成为他演讲中的鲜明主题。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他的有关宣传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和新特色。

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它的各种固有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孙中山长期居留于欧美、日本等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多次指出，欧美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不平等的世界。1903年，他在复友人函中就指出：“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③] 后来又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④] 孙中山看出了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必定会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

① 对统一党演讲见于«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7日，各本孙中山集均失收；对黎元洪谈话见于«申报»1912年4月14日报道；对袁世凯谈话见于«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23页。

② «神州日报»，1912年6月19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328页。

革命必不可免。他说："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因此，他坚决主张，中国不应该走欧美老路。在《〈民报〉发刊词》中，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2]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受列强欺负，媲迹欧美，曾经是许多爱国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孙中山却从欧美强大的外表下看出了"其民实困"的内相，毅然宣布不能追逐别人"已然之末轨"，这在当时，是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宣言。

孙中山看不起欧美事后所实行的改良政策，并由此上溯，批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疏陋"。他说："倘欧美早百年注意社会问题，而今日补苴罅陋之政策可不发生。甚矣，其疏陋也！"[3]孙中山要求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还未出生。但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必将加强劳工阶级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野。他甚至估计，十年以后，中国的大资本家总数将超过十万人，其中有些人的财产，将超过美国的煤油和钢铁大王。孙中山不希望出现这种状况，主张在坚决发展近代工业的同时，预为防范。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4]对于这段名言，人们通常批评其为空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孙中山深刻地感到旧的一般民主主义革命（政治革命）的不足，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解决社会革命的问题，防止资本主义"祸害"，使中国不仅成为"国民的国家"，而且成为"社会的国家"，创造出一种使欧美瞠乎其后，真正造福人民的社会制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度，显然，这一思想不仅对近代中国人民富于启发性，而且包含着积极的、合理的内核。列宁所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倾向，“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①，指的就是他思想中这种超出“民主主义”的成分。

对于资产阶级，孙中山多次进行批判，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垄断财富，压制平民，流毒世界。他说：“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②“彼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且及于外国。”③在孙中山看来，资本家的专制与专制政府并无二致，他说：“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④有时，他甚至认为资本家的压制比封建君主还要厉害。他说：“若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然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⑤基于此，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民生主义称为”排斥少数资本家”的主义。⑥1912年，他并作过一个勇敢的预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⑦

孙中山不懂得剩余价值理论，因而，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只能借助两种方式：一、在资本家和封建君主之间进行历史类比；二、像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诉诸于抽象的“理性”和道德观念。这种批判显示了孙中山对资本家的憎恶之情，它是震撼人心的，却远不是科学的、深刻的，无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

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孙中山也持批判态度。他指责亚

---

①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页。
③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0页。

当·斯密的分配理论不合理，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旧经济学”。他说：“按斯密亚丹经济学，生产之分配，地主占一部分，资本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谓其深合经济学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额之生产，皆为工人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与多数之工人，则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①长期以来，亚当·斯密的理论一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圣经明训”，孙中山的批判虽然缺乏理论深度，但它毕竟刺去锐利的一枪，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抗议，也表示了对一种“新经济学”的期待。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把工人阶级看作受苦受难、无所作为的阶级。孙中山与之不同，他热情赞誉工人阶级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他说：“当知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②在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中，他真挚地同情工人阶级，表示愿为改善其处境而斗争。他说：“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岂得谓之平等乎？”③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肯定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认为“资本家所获甚丰，皆由工人之劳动而来，工人争其所应得之权利，亦理所当然”。④由此，他进一步肯定“社会革命”，认为“不平则鸣，大多数人不能长为极少数人之牺牲者，公理之自然也”。⑤但是，孙中山也还不能认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懂得只有它才能为资本主义掘墓，并创造未来社会。在这一根本点上，孙中山并未能超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水平。

对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也热情赞誉。早在1912年，他就充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1页。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下同)，第138页。

分肯定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①1924年，他发表《民生主义》演讲时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研究“全凭事实，不尚理想”，使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空想发展为科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人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② 但是，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各国垄断资本正在采用所谓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措施，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发明的“福特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一些人起劲地鼓吹：“不是马克思，而是福特”给工人指出了幸福之路；“新资本主义”将消灭贫穷和危机。对于这些情况，孙中山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思想上发生迷惘。他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③ 甚至说：“在马克思的眼光，以为资本家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是到今日，各国的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便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学理了。”④ 尽管如此，孙中山仍然主张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好朋友，在中国，虽不可用“马克思之法”，却可以“师马克思之意”⑤，态度是友好的。

思想家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纲领之间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思想家驰骋于想象的领域时，他可以无所顾忌，恣情任意，但是，当他脚踏实地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各种现实的条件和因素，据此而制订的实践纲领就不能不受到制约，和理论原则之间的差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807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822页。
④ 《孙中山选集》，第820页。
⑤ 《孙中山选集》，第842页。

距也就拉开了。在理论原则上，孙中山赞赏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认为二者"得社会主义之真髓"①，但是，在实践纲领上，孙中山却只主张以实行地价税为中心的平均地权和大资本国有。孙中山认为，实行了这两项，也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

孙中山期望在实行了他的社会主义后，中国不仅富强，而且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成为"至完美"的国家。他天真地设想，那时将不是"患贫"，而是"患富"的问题。他说："数年后民生主义大行，地价、铁路、矿产各种实业俱能发达，彼时将忧财无用处，又何患穷哉！所谓教育费、养老费皆可由政府代为人民谋之，夫然后吾党革命主义始为圆满达到，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将成为一安乐国，岂非大快事哉！"② 孙中山设想，在这个"安乐国"里，政治民主，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劳工将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不仅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而且将"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③

为了补偿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支付管理费用，因此，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也不可能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但是，在孙中山的这一提法中，显然弥足珍贵地包含了反对人剥削人的思想。

孙中山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在国家政权中掌握领导地位的必要，赞赏公有制而又不明确提出以之为主体，也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样，他所构思的"安乐国"当然远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也显然越出了资产阶级一己私利的狭隘樊篱。列宁说过："'靠牺牲别人来经营'这一事实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④ 孙中山一类怀着救亡热诚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自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2页。
④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

身不占有生产资料，经常以“平民”的代言人自居，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充分暴露，工人运动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很自然的。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个性。就其批判资产阶级，抗议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同情工人阶级，赞赏公有制等理论原则看，它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就其实践纲领看，则是一个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方案(下文详论)。

当孙中山构思他的“安乐国”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以极大的兴趣注视并研究俄国的情况。1920年11月，他在广东省署演说：“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好风气。”① 此后，他对俄国社会制度的赞美日益增多。1924年2月，他对驻广州湘军演说，声称“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大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象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② 这样，孙中山长期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有了一个具体形象，从而具备了突破主观社会主义的可能。遗憾的是，孙中山逝世得太早，未能踏入这个飞跃过程。

## 二

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怪影”曾使资产阶级长期惊悸骚动；在中国，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使许多人不安。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前途论者对他的民生主义进行过两次批评。第一次在1906—1907年，代表人物为梁启超，范围限于《新民丛报》。第二次在1912—1913年，代表人物为章太炎、孙武、张振武、金天羽、蓝公武，涉及的报刊有上海《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神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0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887页。

州日报》、《独立周报》、武昌《大汉报》、北京《亚细亚报》、《国民公报》、《燕京时报》、天津《大公报》等。两次批评提出的问题都较多，而其核心则在于中国的前途。由于梁启超的第一次批评已为人们所熟悉，本文将着重阐述第二次批评的情况。

1.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遥远的、不能实行的理想。梁启超称：对于"社会改良主义"，他绝对表示同情；对于"麦喀、比比尔辈"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主义"，他认为"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批评者们持论大体与此相同。1912年1月，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说："近来对于民生问题，颇有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者，在欧洲程度已高之国尚不适用，何况中国？"② 稍后，金天羽也在《大共和日报》上撰文称："此华严之世界，能否涌现于短期之世纪中，虽起瞿昙、基督而揲蓍以求，犹不能以预测，则谓之哲人之理想而已。"③ 孙中山所倡导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纯粹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可谓庸人自扰，不过，这倒暴露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态度。

2. 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于人类心理。梁启超称："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④ 金天羽继称："人类之生，固挟利己之心以俱来。"章士钊等创办的《独立周报》也称："所谓兴公产地，所谓废私人之资本也，其果合乎人类之心理乎？"⑤ 地主阶级是讳言利己的，他们习惯于把本阶级的狭隘利益包裹在光华四射的礼义外衣中，赤裸裸地宣布利己主义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方式和资产阶级语言。

3. 认为社会主义将产生新的专制。梁启超提出，社会主义必以全国为"独一无二之公司"，"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结果必然滥用职权，"专制以

①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48页。
②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③ 《社会主义之商榷》，同上，1912年4月13日。
④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1号，第5页。
⑤ 梦渔：《论社会主义》，《独立周报》第27号。

为民病”。[①]金天羽发挥了这一思想，他称资本主义为“黄金专制之局”，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是“破一专制而复产一专制，且其所专者又更甚焉”。其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掌握生产机关，因而也掌握利益的分配，必将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和特权者的产生。他说：“然而所谓分配之者，顾谁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权者乎？国家之权干涉将无限域而至于筐箧，试问专制君主曾有是乎？”[②]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但是，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民主形式，在它的实践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权力过分集中、管得过死、包得过多、一言堂以至个人专断等违反民主的现象，这是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加以解决的。但以为社会主义必然会产生新的专制局面，不过反映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恐惧心理而已。

4. 认为中国贫富悬殊不大，不必实行社会主义。《大共和日报》称：“中山先生之提倡社会主义者，乃见美国贫富至不平均，铁道大王、石油大王之权力较专制君主为尤甚，唯恐中国人民遭此荼毒。此仁人之用心，记者敢不敬佩，但此乃美国之社会现象，中国今日无有也。”文章要求孙中山“详察中国之人情时势而后规画中国前途，幸毋拘泥习见，无理效颦。”[③]原属同盟会的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也激昂地提出：“诸君试思，今日我国程度若何，有美国之托拿斯等弊否？”[④]这一批评貌似有理，然而孙中山有自己的解释：与其临渴掘井，何如未雨绸缪？等到铁道大王、石油大王出现再革命，就晚了。

5. 认为从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看，不适合进行社会革命。孙武称：“中国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社会秩序尚未恢复”，只能“兴教育，砺知识”，才能挽救国家危亡。[⑤]又称：“武昌起义系政治

---

①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23—24页。
② 《社会主义之商榷》，《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③ 相如：《敬告孙中山先生》，《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5日。
④ 《共和党成立会记事》，《大公报》，1912年6月3日。
⑤ 《汉口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4月14日

革命，现在各党互生意见，万不可再说社会革命，贫富亦万难均等。现在外人尚未承认，各省纷争日甚，吾辈实社会之罪人也。”①清朝统治的推翻不等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一意义上，孙武的“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把革命党人的任务限于“兴教育，砺知识”等方面，同样也不能使“政治革命”趋于完成。

6. 认为中国的急务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蓝公武称：“今欲救济现社会之苦痛，须改良现社会之组织，使人各得以知识能力，自由竞争，而享其劳力之结果。”②显然，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乃是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曾提出，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批评家们也都异口同声。《大共和日报》和《大公报》断言：“救贫疗饥之上药，道在奖富民殖产之野心，使人人胥有猗顿、陶朱之希望，取前朝束缚商工之苛例，扫荡而廓清之。”它们批评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思想是“无病呻吟”，“徒以灰国民进取之雄心，而拥有厚资者，人人胥怀自危之念。”③武昌《大汉报》论证世界各国的富强之道在于“以拓殖为经”，以农、工、商、工艺为主体。它说：“我中国现今之最要政策，不惟惧贫民之多，且甚惧富民之少；不惟惧贫民之不能富，且甚惧富民之日即于贫；不惧因奖励企业而令托拉斯之发生，而惧因社会主义而令专制之复活。”④《民声日报》也称：“今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⑤他们步武梁启超的故辙，力图从和外资竞争的角度论证中国大资本家出现的必要。金天羽说：“吾国素无煤油、钢铁、电器、铁道诸大王，奋焦侥之臂以搏巨灵，其胜败虽愚者知之

① 《武汉与孙中山》，《民声日报》，1912年4月16日。

② 《论均贫富之社会主义》，《国民公报》，1912年4月28日。

③ 《社会主义平议》，《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8日；《大公报》，1912年4月15日。

④ 觐棠：《论天与圣皆主张均产而犹有憾》，《大汉报》，1912年4月29日。

⑤ 一羽：《与〈民立报〉商榷》，《民声日报》，1912年4月17日。

矣。然则吾国之于资本家焉，方存乎见少，又安可张均一分配之学说，乘豪富之未萌而预摧其柎哉！”①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微弱，孙中山的批评者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他们以民族资本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也不无道理。但是，他们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考虑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长远后果，既是狭隘的，又是短视浅见的。

7. 反对土地国有和单一税政策，认为只着眼于土地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梁启超称：“夫欧美现社会所以杌陧不可终日者，曰惟资本家专横故。使徒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解决资本问题，则其有以愈于今日几何也！”②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一直忽视资本问题，应该承认，梁启超的批评颇中肯綮。但是，梁启超却既反对解决资本问题，也反对解决土地问题，他认为私有制度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土地国有是一种“掠夺政策”。③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曾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④，辛亥革命后却和张謇等沆瀣一气，认为“土地国有，夺富民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收买，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⑤又说：“其专主地税者，尤失称物平施之意。此土本无大地主，工商之利，厚于农夫，掊多益寡，自有权度，何乃专求之耕稼人乎？”⑥章太炎这里所说的“耕稼人”，实际上是地主。关于这一点，金天羽表述得更清楚，他说：“以全国之政费而累累于地主之肩，天下专制不平等，宁有过于此者哉！”⑦尽管土地国有一类主张是资产阶级激进思想家提出来的，

---

① 《社会主义之商榷》，《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3日。“方存乎见少”，此处当有误植。

②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34页。

③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0号，第22页；91号，第5页。

④ 《五无论》，《民报》第16号。

⑤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

⑥ 《复张季直先生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6日。

⑦ 同①。

但是，由于资本家们害怕因此牵动资本的所有权，因此，从来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全面实行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和封建主义关系密切，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保护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在他们的言论中出现为地主阶级呼吁的声音，并不奇怪。

8. 认为社会革命会导致秩序混乱，甚至国亡民死。孙武称："社会主义须从学理上研究，武汉人民恐尚无此程度，倘人民误解，视夺人财产，扰乱社会秩序为社会革命，则极为危险。"① 《民声日报》称："若必以贫富均等为言，则富者无企业之心，贫者有依赖之势。极其流弊，则社会相陵，众暴寡，小加大，是率天下于劫夺之途，社会秩序必将破裂而不可收拾。"② 几乎所有的孙中山的批评者都认为，中国此后的"暴动风潮"将日盛一日，其结果将不堪收拾。③ 张振武称："如提倡社会主义，将使游手好闲之辈，人人胸中有一均财思想，诚恐中国不亡于专制政治，而将亡于社会主义也。"④ 北京的《燕京时报》更危言耸听地说："今中山先生乃欲举天下人民，悉均其贫富焉，揆诸天演公例，既与优胜劣败之旨相违；征诸人道公平，复与安分循理之情不合。演成第二革命之惨剧，同室操戈，燃其煮豆，元气已经剥丧，毒剂又复进行，举四万万同胞，无富无贫，同归于尽，则中山先生所谓均贫富一言，非以利民生实以促民死也。"⑤ 孙中山主张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但并不提倡平均主义。上述言论，既有对孙中山思想的误解，也有对下层人民的恐惧，但更多反映的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一个安定局面的要求。

可以看出，两次批评在理论上是一贯的。批评者们强烈地反

① 《专电》，《中华民报》，1912 年 4 月 14 日。
② 一羽：《与〈民立报〉商榷》，《民声日报》，1912 年 4 月 17 日。
③ 《社会主义之商榷》，《大共和日报》，1912年 4 月13日；参见《论兵变与生计学之关系》，《大公报》，1912年 6 月26 日。
④ 《共和党成立纪事》，《大公报》，1912 年 6 月 8 日。
⑤ 焚笔：《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燕京时报》，1912 年 4 月 27 日。

对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前途，以典型的资产阶级心理和语言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批评声势较小，仅限于一人一刊；第二次则涉及四、五个主要城市的十余种出版物，孙中山在武汉和广州演说时，都有人当面反对。[①] 其次，第一次批评的主角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而第二次批评的主角除原属于改良派的蓝公武外，几乎都是孙中山当年的战友。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就对清政府的态度而言，有革命与改良之分；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言，则有肯定与批判之分。辛亥革命胜利了，原来革命、改良的界限不再存在，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重新分化组合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民国建元之初，资产阶级喁喁望治。他们向往着自此可以摆脱各种拘牵，大展鸿图，真正出现“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局面。在这一情况下，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思想自然不会受到欢迎。尽管孙中山小心翼翼地在上海资本家面前声明：“资本家当维持，如何反对？特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②] 但是，这种低调的“维持”论抵销不了高调批判的影响，所谓“防弊”之说也不合资本家的胃口。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成了新时期“暴烈”派的象征。不仅众多的舆论反对他，当年的反满战友也纷纷和旧日的改良派、立宪派分子合作，树帜立党，与同盟会抗衡。章太炎参加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力辨“社会主义”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区别，以“采用稳健社会政策”，“维持现行私有制财产制”相号召。[③] 孙武等人组成的民社则挑战式地向孙中山提出：“现时中

---

① 在武汉，孙武当面反对，见《神州日报》及《民声日报》1912年4月14日《汉口专电》；在广州，一个叫区敦梦的记者当面反对，见《神州日报》1912年5月11日报道：《民生主义大讨论》。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③ 《特别启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3日；《联合会政党纪事》，《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4日。

华民国适用国家主义乎？抑适用社会主义乎？”他们的结论是适用“国家主义”。①1912年5月，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组成共和党，也继续以此为“党义”。这种新的抗衡反映到舆论上就是前述«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大汉报»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一种理论，必须反映现实的需要，而又和一定的阶级力量相联系，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民生主义，由于既脱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脱离农民，因此，支持者始终寥寥。这种状况，直到发展为新民生主义之后，才有所改变。

## 三

尽管孙中山一生都没有超出主观社会主义的水平，但是，他的不倦的追求，却使他在晚年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并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这就为中国革命最终通向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

如所周知，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主要渊源于亨利·乔治。亨利·乔治激烈地攻击土地私有制，提倡土地国有，但是，在具体措施上，他却认为没有必要没收土地，只有必要没收地租，以征收单一税的办法事实上实行土地国有。这就从原来的理论原则上后退了。同样，孙中山也主张土地国有或公有。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私人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主张摧毁封建土地关系，“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②同盟会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土地就等于空气一样，应该为大家公共享受，所以土地不能归诸私人，而应归之国家所有才对。”③他的战友们并设想，在此基础上，消灭“地主强权”，使“劳动者有田可耕”，“国内人人皆

① «民声日报»，1912年4月19、20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③ 马君武：«孙总理»，«逸史»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

为租地者"。① 但是，基于减少阻力的现实考虑，孙中山也从这一原则上后退了。综合孙中山的全部言论，他的平均地权的主要内容是：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按值百抽一的比例课取地税；原价归地主所有，因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增价则归国家所有，作为社会公益之用；国家并可根据需要随时按原价收买之。这一主张有触动地主所有权的部分，也有保留地主所有权的部分。地主只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微薄的地价税后，仍然可以占有原来的土地并收取地租。因而，它是一个折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较之亨利·乔治显然又有所后退。至于按价收买，孙中山于1912年明确表示："土地国有之法，不必尽收归国家也。若修道路，若辟市场，其所必经之田园庐墓，或所必需之地亩，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之价格，国家给价而收用之。"② 由于孙中山所要买取的土地主要是为了解决工商业的建筑、经营和交通用地，因此，必然集中在城市繁盛之地及交通线上，对广大农村的地主阶级并不构成严重威胁，也不反映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晚年，孙中山公开提出蕴蓄多年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才使"平均地权"这一主张具有了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内容。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不管是早年或是晚年，孙中山的土地纲领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它的实施只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会是社会主义。至于以"涨价归公"所得经营社会福利，只是一项社会政策，也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和后来的国民党人甘乃光都曾指出过。③

在资本问题上，孙中山同样也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最初，孙中山主张听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认为"工商废居

①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第10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页。
③ 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第6号；甘乃光：《孙中山平均地权论述评》，《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7年第4版。

有巧拙，而欲均贫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① 《民报》时期，冯自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的文章中已经有了鲜明的大资本国有思想，孙中山对此却无所表述。直到1911年之后，孙中山的有关言论才突然增多。当年7月15日，他在美国旧金山演说，声称革命之后，要将“矿务、铁路归为国有”。②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提出：“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③ 4月4日，他向上海《文汇报》记者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④ 其后，孙中山陆续宣布应归国有的范围还有森林、矿产、制铁、炼钢、海港、邮政、自来水、瓦斯及“一切公共事业”等。孙中山设想，国有企业的利润将完全归社会公有，由大家共享，这样，“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⑤ 孙中山将这一政策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民报》时期，梁启超曾讥笑孙中山只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解决资本问题，如同一个人朝衣朝冠却不鞋不袜。现在，孙中山的视野进入了资本领域，捕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表明，孙中山和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亨利·乔治不同，是在真诚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主张大资本国有，但并不反对私人兴办有关事业。他曾提出，在最初阶段，铁路可以允许民办，以利竞争速成，而在40年之后，则以法律无偿收归国有。⑥ 关于矿业，他也有类似设想。⑦ 孙中山把这种办法称之为“民办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② 《少年中国晨报》，1911年7月15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页。
⑤ 《孙中山选集》，第843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5页。
⑦ 《孙中山选集》，第364页。

有主义”。同样，他也不反对对外资输入，相反，却积极主张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实行开放主义，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允许外人开办矿山、铁路等事业，但是，都必须立定期限，届期收赎，甚至提前收赎。孙中山把这种办法称之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①

很长时期内，孙中山的言论重点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祸害，未能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明确方针。直至1918年，在《实业计划》中，他才表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② 孙中山的言论中，终于也出现了“奖励”、“保护”私营经济一类字眼，表明孙中山又一次考虑了他的批评者的意见，对中国经济发展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中国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禁止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错误的。

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孙中山承认了他应该承认的东西，但是，他仍然力图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1921年12月，他在桂林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学俄国将资本家悉数扫除。”③ 这一段话，和毛泽东1949年所讲的一段话很类似。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④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上，两位不同阶级的革命家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孙中山的理想和热情贯注之处始终在国有经济。他说：“盖国家之设施，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非如少数人之垄断，徒增长私人之经济，而贫民之苦日甚也”。⑤ 因此，他给私人经济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而且时时有戒心，害怕由此生出“大富”阶级

① 《孙中山选集》，369页。
② 《孙中山选集》，21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28页。“俄国”，原作“各国”，误。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83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338页。

来。所以，就在《实业计划》中，他又同时宣布，他的工业革命计划是："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① 这里，不许私人资本主义分尝一杯羹的态度是很清楚的。

孙中山这种左袒国有经济的立场很坚定。1922年12月，一个名叫约翰·白莱斯福特的记者和孙中山谈话，认为国有企业"耗费而乏效能"，有许多弊病，孙中山则表示，"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但主要原因在于"经验尚浅"，数十年后，问题自可解决。他说："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又说："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②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国有化，但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历史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采取过若干国有化措施。这种国有化，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的国有化，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一范畴。人们习惯于指出，孙中山经济纲领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我以为这一概括未能准确地反映孙中山的思想特色。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形态中，孙中山并非无所轩轾，他所设想的国有化的规模和程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因而，最大限度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才是他的经济纲领的实质。这一实质，不仅体现在他的"大资本国有"的思想中，而且也体现在平均地权的实施办法中，所谓"值百抽一"、"涨价归公"，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所谓"照价收买"，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土地。

指出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分析又不能只停留在这里。这不仅因为，在孙中山的思想中，这种国有企业是遏制、防止私人资本主

① 《孙中山选集》，第214、36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34—637页。

义祸害的力量，它的利润是属于人民的，因而是充满民主主义色彩的，而且因为，在国家问题上，孙中山也在进行“破天荒”的探索。①

并不是任何一种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这一点孙中山懂得，因为满清政府就曾企图实行铁道国有。孙中山说：“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② 因此，他主张政治斗争优先于经济斗争，“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③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思想。在孙中山看来，只有国家为人民之公产，政府符合“国民公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即民有，才是社会主义。

对资本主义，孙中山最先发现的是经济制度的巨大祸害，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政治制度的缺陷，并且不断深化，由政体而触及国体。1912 年 5 月，他在广州演说时指出，美、法两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④ 6 月，又指出：“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⑤因此，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主观愿望上说，孙中山也不希望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正像他在经济上企图突破旧的民主革命的局限一样，孙中山在政治上也企图有所突破，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十月革命后，1922 年 1 月，他在桂林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⑥ 这是他在国家问题上向旧世界告别的一个重要宣言。讲话中，他甚至对工人管理国家持肯定态度。他说：“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行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⑦ 对太平天国的分析是不伦不类的，但一种新思想显然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331 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338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354 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371 页。
⑥⑦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56 页。

在孕育中。

孙中山多年的探求和新思想的影响在"一大"宣言中得到总结。"一大"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① 这一宣言明确无误地显示，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乃是与欧美不同的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一大"宣言又将孙中山"大资本国有"及其有关思想概括为"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原则。它声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② 前浪后浪，波波相连。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是质的飞跃，同时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一大"以后，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演说时，又以赞许的口气说："俄国工人在几年以前结成大团体，推倒专制的沙皇，弄成工人的独裁政治，无论什么资本家都不许执政权，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国事。"③ 虽然这时候，孙中山还弄不清楚苏维埃政权和英国工党内阁之间的实质区别，但显然又在向新的思想高度迈进了。

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④ 除了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外，孙中山晚年所设想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共和国与共产党人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相同，因而这一共和国所实施的国有化也就不同于旧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存在着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节制资本"这一思想，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⑤ 因为它既可以发挥资本主义

①② 《孙中山选集》，第592—593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910页。
④⑤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8月版，第649页。

有利于社会的一面，又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便于防止其祸害，并转入社会主义。

## 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中国革命特殊矛盾的产物。

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病和矛盾。当孙中山面对这一现实时，不可能不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是，中国革命又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资本主义还是新生事物，因而，这一革命的性质必然也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当孙中山面对这一现实时，他提出的不可能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形成的民生主义正是这两者——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空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结合体。

人们可以批评孙中山未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矛盾，可以指出他的理想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明他的“毕其功于一役”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在20世纪初年，当中国革命还在起步的时候，孙中山就勇敢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认为中国不能再走欧美老路，革命应有新的特点，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祸害，它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观点。提出这一观点是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之一。

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特殊矛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① 又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①]人们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上述观点既扬弃了孙中山思想中的主观空想成分，而又吸收了他思想中积极、合理的内核。中国革命正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一特殊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②]，走向了社会主义。孙中山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

(原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略有修订)

---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② 同上第2卷，第621页。

#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 ——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到了近代化的黎明。自此，人类社会即以一天等于几十年的速度向前迈进。但是，正象章炳麟所指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①，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例如，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因此，一切有远见的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对待这善恶并进、美丑共存的资本主义文明。本世纪初年，当中国国门洞开，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四方求索，殚精竭虑地为国家、民族设计未来的蓝图时，自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部分人，例如梁启超，政治上取法英、日，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他强烈地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声称为了和外资竞争，中国的垄断资本家愈多愈好。为此，即使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善果、恶果一概接受下来。

另一部分人，例如章炳麟、刘师培，他们受了日本社会党左派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比较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果，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章炳麟一度陷入退化论，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也就愈减。为了减少恶，人类不如退到原始社会。但是，章炳麟又觉得，原始社会生番的道德品质也还不十分理想，"犹具淫杀性"，因此，人类不如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②。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

① 《俱分进化论》，《民报》第7号。

② 《朱希祖日记》(稿本)，1908年8月20日。

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恶与丑了。章炳麟的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基于和章炳麟同样的立场，刘师培提出："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①] 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完全平等"为原则，每个成员必须轮流为工、为农、为士，按年龄流转于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以实现"均力"。刘师培所要建立的社会，实际上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空想乌托邦，依然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章炳麟、刘师培等宁可不要资本主义的善果，走倒退、复古的路。

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1906 年 12 月，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②] 孙中山的这段话，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对于资本主义，人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全盘肯定，而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创造出更高级、更灿烂的现代文明来。

孙中山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 年左右，他曾经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言论。例如，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③] 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

① 《衡报》第 5 号。

②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版，第327—32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333页。

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1] 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2] 这就充分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同时孙中山又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以限制，他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3] 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奖励又限制的政策，就形成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因此，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拒绝心理，但是，孙中山却以超乎寻常的气魄宣布："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4]他仔细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能在几十年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相信，中国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只要顺应潮流，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在开放条件下建设，一定可以比日本富强十倍。他欢迎外资输入，认为中国财力不足，要建设庞大的现代工业，必须募集外资。他以铁路为例说："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5] 他多次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未造铁路以前，其贫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8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1页。

穷和中国相同，后来向外国借债筑路，才收到富强之效。在近代中国，外债和鸩毒常常是同义语，借外债办工业被认为是引鸩止渴。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外债可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对于借外债，中国人民有着痛苦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结果。孙中山主张，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又要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系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① 同年12月，他在《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中更明确规定："不论华洋股款，均应遵照中国现行法律办理。"② 孙中山相信，只要中国保有主权，则不论何国之债，都可以借，即使外人直接投资，也不应该禁止。他说："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③ 他曾经设想过，以40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人修筑；又曾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当然，孙中山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④ 他并特别提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

除了提倡引进外资，孙中山还提倡借助"外才"、"外技"、"外法"。他既主张派遣十万人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主张聘请外国的专门家、发明家和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9页。

管理人才。他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① 孙中山特别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② 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至永远受制于外人。孙中山还曾设想过一项中德合作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开发中国富源，改良中国行政。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一套老方法。对此，孙中山表示："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③ 有时，他并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④ 为了引进"外法"，孙中山提出，必须杜绝官场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否则，中国决无法借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而获得改变。

以上孙中山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外才、外技、外法的论述，同样是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⑤1924年，他又说："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⑥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出伟大的气魄，而且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历史必将证明，它对中国以至世界的伟大作用。

［附记］1992年6月10日至12日，大陆、台湾、海外华人学者在北京举行孙逸仙思想和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本文是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

---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1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3页。

# 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

## ——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国周围的邻国大多落后于中国，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受到过强劲的挑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再惨败，走到了亡国的边缘；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样，中国人就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如何抵御列强侵略，振兴中华；一是如何对付西方文化挑战，振兴中国文化。这两个难题互相关连，近百年来一直困扰并激动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至今未已。本文企图研究钱玄同在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曲折文化寻求，从而展现这一阶段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总结历史经验。

## 一

钱玄同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家书香门第。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后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长兄钱恂，曾任清政府驻日、英、法、德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二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素。钱玄同自幼即熟读《五经》、《说文》、《尔雅》及《史记》、《汉书》等著作，也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1902年时拥护康、梁的保皇主张，1903年转而赞成“排满革命”。1905年12月，钱玄同随其兄赴日，开始学习日文和“蟹行书”。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一群，各种主义、思潮都有它的提倡者和追随者。钱玄同最初崇信国粹主义。1906年3月他读到了刚在上海创办不久的《国

粹学报》,极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之有味也。”①后来，他又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自1907年秋起，他多次参加张继、刘师培二人召集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那里，听过关于克鲁泡特金学说的演讲，也听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前者引起了钱玄同的共鸣，而后者则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其证据就是，他曾经给人写过一封信，认为“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阶段。②其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举办世界语讲习班，章太炎举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两者都想参加，由于时间冲突，最终选择了后者。自1908年4月起，至1910年5月归国止，钱玄同和鲁迅弟兄等一起，听章太炎讲《庄子》、《说文》、《汉书》、《文心雕龙》等著作，达两年之久。在钱玄同文化观形成的过程中，章太炎起了重要作用。他发愿自此“一志国学，以保持种性，拥护民德”。③

中西文化由于社会条件悬殊，其性质、特点、色彩也迥然相异。钱玄同初至日本，即致力于两种文化的比较。1906年1月14日日记云：

> 父子之情，根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笔抹杀之也。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率有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尤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蠡贼，可以杖逐，可以鞭挞者，而开口辄曰“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④

这段文字矛头所指是标榜“家庭革命”的“维新志士”和“秘密会党”,而实际批判的是西方伦理。在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和孝父

① 《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8月29日，未刊稿，以下均同。
② 《钱玄同日记》第3册，1908年3月5日。
③ 《钱玄同日记》第5册，1909年1月22日。
④ 《钱玄同日记》第1册。

敬兄、长幼有序的家族关系面前，钱玄同很容易地作出了选择。他说："盖道德发达，我国究胜于欧西耳。"①

钱玄同不仅将"欧西道德"比了下去，而且也将西方宗教比了下去。他认为，墨子主张敬天，明鬼，堪称"中国宗教家"，但墨子不谈天堂，远比西方高明。他说："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



图二十四　钱玄同日记手迹(之一)
(采自钱秉雄先生家藏)

① «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7年2月27日。

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1]言外之意，"东儒"高于"西儒"，"神州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至于日本文化，更不在钱玄同眼中，他说："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2]钱玄同的这种态度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09年9月24日日记云：

中国自唐以来，古制沦亡，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年来渐觉其非乎。然藉以打倒谬说者，有用日本贤母良妻之教育者，是以火止火(奴隶)，且有甚焉。有倡西洋女子教育者，是荡检逾闲(妓女)也。[3]

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表明钱玄同不同于封建顽固派，他对于日本和西洋女子教育的不满，也不为无见，但他神往于中国的"古昔"。日记云：

盖论自来女子教育，于中国古昔最得其平。虽有阳尊阴卑之说，但学《诗》、学《礼》，无分男女，后妃、夫人、命妇、内子悉皆通《诗》、《礼》，男女真平等也。[4]

钱玄同认为，只要按照"中国古昔"的这条路子走下去，并且除去"阳尊阴卑"之说，"神州女学"就将大兴而为"世界之冠"了。

从孔子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后，中国文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尊古贱今观念。这种观念和长期的社会封闭形成的民族自大、文化自大主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钱玄同上述对东西古今文明的评判，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钱玄同所神往的"男女真平等"的"中国古昔"也确是周代。据钱玄同说，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1910年初，章太炎、陶成章与同盟会分家，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发刊《教育今语

①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12月13日。
② 《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3月29日。
③ 《钱玄同日记》第6册。
④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9月24日。

杂志》，钱玄同曾为该刊写作《缘起》，其中说："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昌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此后呢？据说就学术退步，思想闭塞，一代不如一代了。《缘起》说："秦汉迄唐，虽学术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国。宋元以降，古学云亡，八比、诗赋及诸应试之学，流毒士子，几及千祀。"而且，危险的是，到了近代，"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语有之，国将亡，本必先颠，其诸今日之谓欤！"①很显然，钱玄同担心"东渐"的"欧学"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危亡，并进而导致国家的危亡。

怎样振兴中国文化呢？钱玄同主张："师古"、"复古"、"存古"。他说：

> 吾侪今日作事，宜师古，宜复古，宜存古，而决不可泥古。古圣作事，往往因事制宜，求其合于情势，故所作往往少弊(封建、宗法之制为古代之大弊政)，后世辜不师古，好骛新奇，凡有造作更张，多不合情势，第求苟简，故中国后世不如古代，即是故也(自唐以后，凡百事物，无一不日退一日)。时至今日，西学输入，凡唐以来之叔世弊政，相形之下，无不见绌。趋新之士，悉欲废之，有心人忧之。愚谓新党之浇薄诚可鄙，但此等敝政得以扫除，亦未始无裨，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见诸实行矣。②

钱玄同承认"封建宗法之制为古代之大弊政"，承认"西学"输入之后，唐以后之"叔世弊政"相形见绌，也承认"新党"扫除"弊政"的作用，但是，他并不准备和"新党"站在一起，而要回到"古圣"和"古之善政"那里去。据钱玄同说：所谓"师古"，乃是师法古代"圣王"制作的"精意"；所谓"复古"，乃是恢复"后世事物不如古昔者"；所谓"存古"，乃是保存那些因时势不

①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②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9月30日。

同而“不适宜于今者”,以使后人得以“追想其祖宗创造之丰功伟烈”。①

钱玄同所说的“存古”,类似于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并不参预中国文化的再创造，可以不论，须要研究的是他“师古”、“复古”的内容及设想。

在思想流派方面，钱玄同主张兼取孔子、墨子，融合清代的乾嘉学派、今文学派和颜李学派。他说:“今日治学，虽不必确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能兼取孔、墨最好。”② 在钱玄同看来,“古圣立言垂教之旨，悉存于经”,③ 但“经”语过于简古，这就需要有乾嘉学派的精神来考订“经训”,同时以今文学派的精神来探求“经义”,并以颜李学派的毅力实行，这样，就“圣学昌明不难复睹矣”!④ 颜元反对读死书，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因此，得到钱玄同的特别推崇，认为“居今之事，诚能致力于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不特保存国故，尤足挽救颓波。”⑤

在音韵文字方面，钱玄同主张复古音，写篆字。他说：中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⑥ 他对唐、宋以后“故训日湮，俗义日滋”的状况极为不满，主张恢复中国文字的古音、古义、古体，废楷字，用篆体，或用篆与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隶古”。

在礼仪方面，钱玄同主张遵修古礼。他认为《仪礼》一书中婚礼“最为文明”,至于丧礼,“恐人所难行，惟衣服则宜从古。”⑦

在纪年方面，钱玄同主张恢复古代的太岁纪年法。例如中日甲午战争称为“阏逢敦牂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称为“上章困敦之

①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9月30日。
②③④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10年1月8日。
⑤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10月17日。
⑥ 《教育今语杂志章程》,《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⑦ 《钱玄同日记》第5册，1909年5月9日。

变”等。①

在定名原则上，钱玄同主张以《尔雅》一书为准。他批评今人“师心自用”，赞扬古人“煞费苦心，尽心下问，始定一确当之新名词。”②他认为当时的亲族名称“鄙俚不堪”，曾经检取《尔雅》一书，对录古称，准备以“古式”正“今俗”。③他的长子原名秉雄，但他认为不合于西汉人的命名原则，另行取名。

在上列内容中，钱玄同尤其重视学术、文字、言语、衣服的复古，他说：“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者。”④至于礼仪、风俗、宫室、器具等，钱玄同认为“虽不能全数复古，而当法古者，必居多数”。⑤钱玄同自信，通过他的“师古”、“复古”的途径，中国文化就会繁荣昌盛，腾驾于西方、日本之上。

戊戌维新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革新潮流，“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道德革命”等口号相继问世。在文字方面，也有人提出拼音、简化等方案。对此，钱玄同持强烈反对态度。1908年9月27日日记云：“今日见有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文，用通字云。通字系用罗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学部纷纷调王照、劳乃宣入内拟简字后，有此獠出现，何王八蛋之多也。”⑥情急而詈，可见其切齿痛恨的程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辛亥革命前，在钱玄同的文化思想中，有提倡实学、经世致用的成分，但是，又有着严重的保守和倒退的性质。

武昌起义、民国建立并没有丝毫减弱钱玄同“师古”、“复古”的热情，相反，他却认为是实现理想的好机会。1911年12

①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11月10日。
② 《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2月7日。
③ 《钱玄同日记》第5册，1909年3月15日。
④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9月30日。
⑤ 《钱玄同日记》第6册，1909年11月10日。
⑥ 《钱玄同日记》第4册。

月，他精研《礼记》、《书仪》、《家礼》等书，博考黄宗羲、任大椿、黄以周诸家学说，做了一部阐述古人服饰的著作《深衣冠服说》。1912年3月，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便穿上自制的“深衣”，头戴“玄冠”，腰系“大带”，昂昂然上班，企图为民国作出“复古”的表率。其结果，引起了同事们的哄笑。但是，钱玄同没有从这一场喜剧中接受必要的教训，相反，却认为世风比清季更坏了。1912年9月1日日记云：“时则土地虽复，人心之污浊则较清季愈况。颜公所讥弹琵琶、学鲜卑语者，世方以为能；弃国故废礼防者，比比皆是。”① 为了坚守“国故”，他宁可戴所谓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而不愿戴西方传入的“礼帽”；宁可采用中国古代的“肃揖”，而不愿学洋人的鞠躬。民国改用阳历，这使钱玄同很反感。《日记》云：“孔子行夏时之语，固万世不易之理。如中国以农立国、建国，岂可不依农时乎！”② 此际，他对1900年以后中国文化思潮的变迁作了一番考察，得出结论说：

> 余谓中国人最劣之性质在不顽固、不自大耳。计自庚子至今，一星终矣，上下之人，靡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儓隶。世有如此而能善立人国于大地者乎！③

20世纪初年，愈来愈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尝试着对中国社会和封建文化进行批判，开通、进化成为美称，然而钱玄同却对此加以指责，希望中国人更“顽固”，更“自大”。至此，人们已经很难发现钱玄同和清末那些反对一切外来事物的“冬烘”们有多大区别了。钱玄同曾说他自己当时“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④ 诚然。

这一时期，钱玄同热衷于从古礼中为中国人民寻找行为规范。

① 《钱玄同日记》第9册。

② 《钱玄同日记》第9册，1912年9月30日。

③ 《钱玄同日记》第9册，1912年12月3日。

④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

1914年9月，袁世凯举行祭孔仪式，钱玄同虽已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但不能亲往观礼，便设法找来“祭祀冠服图”。检阅之余，居然认为：“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①他对袁世凯这一举动的意图居然毫无觉察。

国粹主义是清末民初泛滥一时的思潮。鼓吹这一思潮的人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其动机也就大相径庭：顽固派借以维护旧秩序，革命党人借以鼓吹“光复”和救亡。②钱玄同主张“师古”、“复古”、“存古”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由于反清：“我以为保存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③这种解释当然符合实际，但并不全面，在钱玄同的思想深层，还潜伏着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对“欧化”的恐惧与排斥。他说：“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态度。”④1917年，他在分析章太炎主张“保存国粹”的原因时，除了痛心于“举国不见汉仪”这一层外，也还有感慨于所谓“满街尽是洋奴”的另一层。⑤将这两层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揭示当时部分革命党人畠言“国粹主义”的思想契机。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和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而西方文化的母国又正是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这就造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为了抵御帝国主义，钱玄同等人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增强凝聚力，达到所谓“种性固，民德淳”的目的，这是极为自然的；他们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怀有警惕并企图不同程度地予以限制或抵拒也是自然的。他们不了解：帝国主义侵略是坏事，而西学的东渐则可能是

① 《钱玄同日记》第11册，1914年9月27日。
② 参阅拙作《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见本书第287—303页。
③④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
⑤ 《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1日。

好事；中国濒临灭亡是坏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则不一定是坏事。他们更不了解：当时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昌言“保存国粹”，除了其正面效果外，也还会产生负面效果——助长旧质，抵排进步，窒息新机。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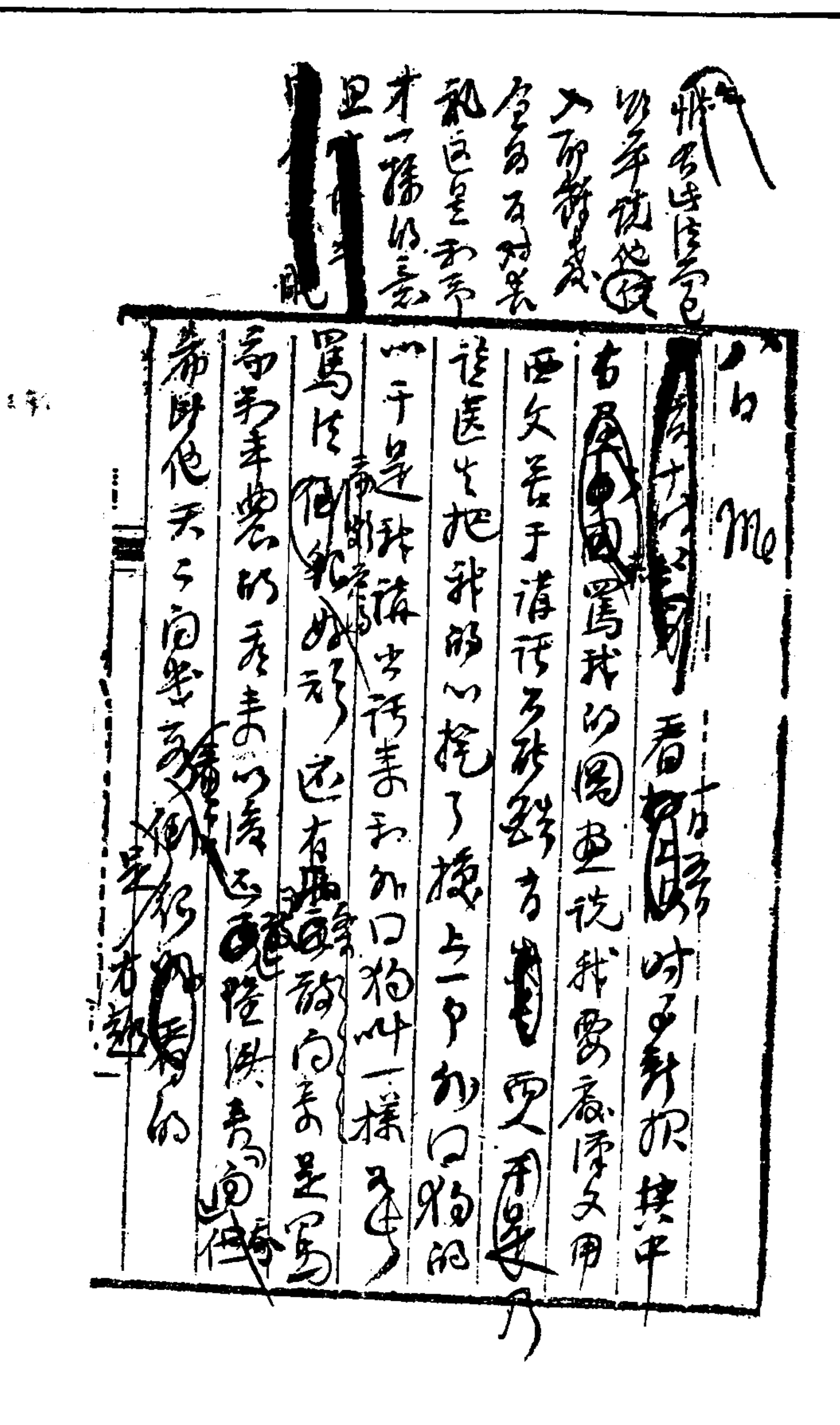
到了“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寻求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转变。

一反往日的“师古”、“复古”、“存古”主张，钱玄同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的批判，缺少深刻的理论思维，也缺少充分严密的论证，但其激烈程度却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比拟。

清代中叶以后，主张“阐道翼教”的桐城派成为散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与之并立的是讲究骈俪、华藻的《文选》派，钱玄同的批判锋芒首先指向这两个文学流派。1917年1月1日，钱玄同访问沈尹默，讨论文学改良问题。他说：“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至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①同年2月，他的《致陈独秀书》在《新青年》2卷6号刊出，该函第一次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指责，是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自此，钱玄同的批判遂一发而不可收。在内容方面，他指责两派“迂谬不化”，思想顽固；在艺术方面，钱玄同指责其为装填古典，故作摇曳丑态，只能称为“高等八股”②；在影响方面，钱玄同指责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③

由桐城派、《文选》派上溯，钱玄同的批判推广及于秦、汉以

① 《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1日。
② 《致陈独秀书》，《新青年》3卷1号，《通信》第7页。
③ 《新青年》4卷6号，第627页。



图二十五　钱玄同日记手迹（之二）（采自钱秉雄先生家藏）

后的古文。他认为，此类古文的病症在于言文分歧，和口语严重脱节，"专为替贵人搭'臭架子'，什么'典丽矞皇'，什么'气息高古'，搅到嘴里这样讲，手下不许这样写，叫人嘴可以生今人的，手一定要生数千年前的僵尸的"。①钱玄同指责西汉扬雄为第一个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②批评以后的文人们因袭模拟，陈腔烂调，"将甘蔗渣儿嚼了又嚼"。他说："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③

戊戌维新运动以后，小说、戏曲在文学门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新文化运动中，它自然成为热门话题。钱玄同认为，中国小说除《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少数作品外，"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④至于戏曲，他认为除《桃花扇》外，《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等，"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理想'、'真挚感情'之故，终觉无甚意味。"⑤"京调戏"是清末民初的新兴剧种，钱玄同评之为"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⑥对于"脸谱"等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钱玄同尤为反感。他说："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朱熹做《纲目》，学孔老爹的笔削《春秋》，已为通人所讥讪；旧戏索性把这种'阳秋笔法'画到脸上来了。这真和张家猪肆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⑦

---

① 《新青年》5卷5号，第542页。
② 《尝试集序》，《新青年》4卷2号，第140页。
③ 《致陈独秀书》，《新青年》，3卷4号，《通信》，第2页。
④⑤ 《致陈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1号，《通信》，第5页。
⑥ 《致陈独秀先生》，《新青年》3卷1号，《通信》，第6页。
⑦ 《新青年》4卷6号，第624页。

孔学和孔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热门话题。对于孔子，钱玄同表示对其“别上下，定尊卑”的学说，“实在不敢服膺”。①他认为，儒学的长期影响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两种性格，一种是富而骄，一种是贫而谄，“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②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对道教的批判。他说：“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③指出道教对中国民族心理有重大消极作用，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是颇为独特的，也是相当有见地的。

钱玄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是《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说：“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说，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④钱玄同的这段议论，对中国两千年来通过文字积累下来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摧毁性的攻击，令人不禁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钱玄同主张废孔学、剿灭道教，不读中国书。他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

①② 《致陈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4号，《通信》，第5页。
③ 《随感录》，《新青年》4卷5号，第464页。
④ 《新青年》4卷4号，第351页。

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① 由此，钱玄同进而批判曾经被自己认为是"世界之冠"的汉字。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严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②这里，钱玄同提到文法、词汇等问题，因而，它所说的文字实际上包含了语言。在《答姚寄人》一文中，他批评中国语言是单音，代名词、前置词不完备，动词、形容词无语尾变化，"根本上已极拙劣，"③这就连汉语也在批判之列了。

钱玄同认为，他的这种激烈的批判并不违背爱国主义原则。他说："我爱支那人的热度，自谓较今之所谓爱国诸公，尚略过之。惟其爱他，所以要替他想法，要铲除这种昏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不复使存于'将来子孙的心脑中'，要'不长进的民族'变成了长进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算得一个文明人。"④他严重警告人们，如果不进行这种"铲除"，那末，循进化公例，中国人种总有一天将会"被逐出文明人之外"，并被人家"灭掉"。⑤同时，他并声明，中国的历史、道德、政治、文章还是需要研究的，但是，这种研究，目的是为了"鉴既往以察来兹"，"明人群之进化"，而不是为了排斥新事新理，使社会生活倒退，"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⑥

①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第351页。
②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第354页。
③ 《新青年》5卷5号，第542页。
④ 《新青年》5卷2号，第173页。
⑤ 《新青年》5卷4号，第543页。
⑥ 《新青年》3卷5号，《通信》，第13页。

钱玄同其人，好说过头话，好走极端。章太炎曾经规劝他，“立论不可太过”。①鲁迅也认为钱玄同喜欢将十分话说到十二分。②在钱玄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里，人们不难发现他的偏激、偏颇以至谬误之处。例如，他较少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无视它在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中的伟大作用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了解经过分析、扬弃或创造性的转换之后，这一文化的许多部分可以成为发展新文化的营养并迸发出新的光彩，等等。这种偏激和偏颇反映了“五四”先行者普遍的弱点，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应该看到，钱玄同所批判的有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而不是它的历史价值。对于历史价值，钱玄同还是承认的。例如，他肯定周秦诸子是可以和希腊诸贤、释伽牟尼并立的“圣贤”，③孔子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④；肯定韩愈、柳宗元之文比初唐骈文和后来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诸人的文章“实在要好得多”，“在当时也还算有点价值”⑤；肯定《水浒》、《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⑥，等等。钱玄同认为，这种历史价值是永恒的，无论到了30世纪、40世纪以至100世纪，都不会“贬损丝毫”⑦。但是，在历史上具有价值的文化形态不等于在后世具有同样的价值。产生于宗法小农制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活

① 《致钱玄同书》，1910年12月9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页。

②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③ 《致胡适之先生》，《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19页。

④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4号，《通信》，第5页。又，当时朱希祖做了篇研究孔子的文章，认为“孔子以前是信神时代，孔子之学说不信神而信人，在当时原是进步，但他以信古尊圣为言，以至二千年来滞于信人的时代，至今尚未走到信我的时代，比之欧洲，瞠乎后矣”。钱玄同认为“此文极有价值”，为之圈点一过，并在日记中作了摘录。于此亦可见钱玄同对孔子思想历史价值的看法。见《钱玄同日记》第20册，1919年1月20日。

⑤ 《新青年》5卷5号，第531页。

⑥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8卷6号，《通信》，第9页。

⑦ 《新青年》5卷5号，第531页。

的需要。因此，从现实出发，重新估量其价值是必然的，它的逐渐式微并让位于新的、更高的文化形态也是必然的。这就是钱玄同所说的“退居到历史的地位”。① 如果在这一时刻，旧的社会力量企图利用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封建毒素干预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维护旧制度、旧事物，那末，一场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钱玄同从“师古”、“复古”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是1916年。这一年，以尊孔复古为复辟帝制前导的袁世凯毙命，但是，再兴的民国也不过挂着共和的招牌，文化领域里仍然弥漫着浓重的尊孔复古气氛。这一切给了钱玄同以强烈刺激。他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章‘弃如土苴’。如果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章，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② 这里，钱玄同所批判的就正是以“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他又说：“我是因为自己受旧学之害者几及二十年，现在良心发现，不忍使今之青年再堕此陷阱。”③ 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现实价值的批判。

钱玄同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使在辛亥革命前主张“师古”、“复古”的年代里，他也强烈反对君主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那时复古底思想虽然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④ 1916年，当他发现袁世凯们利用传统文化复辟帝制，并由此进而发现中国社会“沉滞不进”的状态时，也就发现了“保存国粹”的负面效果，其转变就是必然的了。

在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钱玄同热烈肯定西方文化。他赞美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

① 《新青年》5卷1号，第79页。
② 《新青年》6卷2号，第224页。
③ 《新青年》6卷6号，第649页。
④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

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或者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那男女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① 钱玄同认为："若是拿19、20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② 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自大主义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是，又产生了新的变种——文化上的精神胜利法。其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西方文明源于中国，说什么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子发明的，共和是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以至连礼帽和燕尾服也是孔子发明的等等。对此，钱玄同尖锐地嘲讽说："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③ 钱玄同认为"现在百事不如人"，要求中国人民正视现实，承认差距，承认落后，并且当机立断，急起直追。他说："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④ 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自视为"冠裳"之族，而将外国、外族视为近似于"鳞介"之类的野蛮人；在文化上则强调"华夷之辨"，反对用夷变夏。现在历史完全颠倒过来了，往日的"鳞介"之类竟成了"急起直追"的对象，而"冠裳"之族倒被认为有沦落为野蛮人的危险。这种认识的发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文化自大主义的进一步崩溃，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速而巨大的变迁。

---

①②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 3卷6号，《通信》，第9—10页。
③ 《随感录》，《新青年》 6卷2号，第216页。
④ 《新青年》6卷6号，第650页。

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中国文化，钱玄同主张“样样都该学外国人”，“完全学人家”。他说：

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①

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样子，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死帝国”。②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极〔皆〕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应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③

1918年7月，陈独秀曾经说：“若是决计更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④钱玄同的思想和陈独秀完全一致。尽管当时还没有“全盘西化”的提法，但实际思想已经有了。

基于对汉字、汉语的不满，钱玄同曾提出过一项惊世骇俗的主张，这就是以世界语或某种外国语来代替汉字，汉语。他说：

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一种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⑤

语言是民族文化中基本的、最有特色的因素。钱玄同主张以世界语或某一种外国语来代替汉语，这样，他的“完全学人家”的主张也就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也是少见的。

钱玄同认为，真理无国界，一切科学真理都是世界公有的。因此，他要求人们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念的束缚，勇敢

①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5卷4号，第425页。
② 《新青年》5卷1号，第81页。
③ 《随感录》，《新青年》5卷3号，第296页。
④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5卷1号，第3页。
⑤ 《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5卷4号，第425页。

地追求真理和文明。当时，周作人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曾经提出:“将他国的文学艺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①对此，钱玄同极为赞成。他说:“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②钱玄同自信，这种为追求真理去学外国，不会成为洋奴。他在提倡学外语的时候曾说:“有了第二外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③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各主要国家陆续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现代文化。中国当时还是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因此，以学习西方为途径，借以振兴中华和中国文化乃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西方文化并非一切都好，完美无缺。它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有适用于中国的，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因此，只能有选择地学，有分析地学，有批判地学，钱玄同的“完全学人家”的主张并不正确。这里，也有应予批评的偏激和偏颇。但是，去掉“完全”二字，他的‘学人家’的主张却正反映出钱玄同对历史必然的认识，表现着他对民主、科学和现代文明的渴求。事实上，钱玄同所倡导学习的也主要是那些使中国人民自强、独立、成为“20世纪人类”的新思想，新文化，并非一切都学，完全照搬的。

① 《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5卷5号，第527页。

② 《新青年》5卷5号，第528页。

③ 《新青年》5卷6号，第634页。

## 三

为了振兴中国文化,"五四"前后,钱玄同曾提出过不少方案,概括起来不外三点,即"输入"、"新做"、"改革"。

首先是"输入",广泛汲取域外知识。钱玄同认为:"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知识,以与本国参照。"他说:"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知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阙,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① 他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② 因此,他主张多译外国书,多读外国书,丰富"二十世纪之新知识","碰着与国人思想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③

第二是"新做"。翻译只是介绍和引进,它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因此,钱玄同要求"新做",④ 即在借鉴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人,又不同于古人的全新的精神产品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就是在钱玄同的一再动员下,"新做"出来的。

第三是"改革"。钱玄同认为,"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⑤"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⑥ 但他的努力主要在语文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些方案、建议,在他及身之年始终是空中楼阁,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

① 《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20日。
②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11页。
③ 《新青年》4卷2号,第121页。
④ 《新青年》4卷1号,第80页。
⑤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11页。
⑥ 《新青年》6卷2号,第242页。

成功的是他和胡适等人一起倡导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立即致函陈独秀，表示肯定和支持。随后，他又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条，将白话的运用从文学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十三条的头一条就是“以国语为之”。①1917年7月，他并带头实行，致书陈独秀说："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②1918年，他又为胡适《尝试集》作序，明确宣布“白话是文学的正宗”。自此，白话文和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的面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显著业绩。

为了与提倡白话文相配合，并使白话文更完善，钱玄同又响应胡适的建议，在应用文改革大纲中提出，“无论何种文章必施句读及符号”。③1918年1月，他总结《新青年》采用西文句读符号的情况，提出繁式和简式。④其中繁式采用的西文六种符号，已经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情况大体一致。

从黄遵宪起，近代中国不断有人提倡白话文。1903年前后。更出现了一批白话报刊。钱玄同自己在辛亥革命前也办过《湖州白话报》和《教育今语杂志》。但是，这一时期，提倡白话文都是为了普及和启蒙，对象是文化低下的农工和市民，并不认为白话有资格成为正规的文学语言。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以白话写作文学作品，钱玄同提倡以白话写作各体“应用文”，白话才真正昂首阔步地走进文学语言的圣殿，建立起对文言的绝对优势。1922

①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5号，《通信》，第8页。
②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11页。
③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5号，《通信》，第9页。
④ 《新青年》4卷2号，第183页。

年钱玄同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改古文为今语，是为改良，不是求通俗；今语比古文精密，不是比古文浅俗。"① 这些话，道出了两个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不同特点，是早期提倡者不可能具备的认识。

与提倡白话文的成功相反，钱玄同以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的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最初，钱玄同只主张"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建议在高等小学加设世界语一课。② 但他不久即头脑发热，认为世界进化已至20世纪，"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因而于1918年5月进一步主张废汉文，代之以世界语。钱玄同估计，此项工作有10年、20年工夫即可完成。③ 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社会的强烈非难，连不少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也表示反对。陶孟和认为"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④；任鸿隽批评钱玄同感情用事，"走于极端"；⑤ 蓝公武致函傅斯年，认为《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人家信仰革新的热情遂减去不少"。⑥ 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肯定钱玄同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热情，说明他是由于"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同时声明："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⑦ 在这一情况下，钱玄同虽然废除汉字的主张坚持未变，但不得不承认，世界语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汉字一时不能废去，不得不图改良，因此转而致力于"汉字改革"运动。

一切文化都发生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它既有其时代的普遍性，又有其民族的特殊性；既有其发展的飞跃性，又有其历史

① 《钱玄同日记》第27册，1922年10月22日。
②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4号，《通信》，第3页。
③ 《新青年》5卷5号，第543页。
④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8页。
⑤ 《致胡适书》，《新青年》5卷2号，第170页。
⑥ 《钱玄同日记》第19册，1919年1月7日。
⑦ 《新青年》6卷1号，第11页。

的连续性。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反对外来进步文化，反对革故鼎新，当然是错误的；同样，强调时代的普遍性和发展的飞跃性，无视民族的特殊性和历史的连续性，也是错误的。钱玄同的上述成功和失败表明，重大的文化改革决不能无视民族传统，更不能脱离民族实际，浮夸、激烈的空想只能使自己失去人们的同情，增加改革的阻力。

钱玄同还有若干改革建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付诸实施的：

1． 汉字左行横移。还在1917年初，钱玄同就认为："文字排列之法，横便于直。"① 同年5月15日，他致函陈独秀，论证"汉文右行，其法实拙"，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② 7月，他又再次致函陈独秀，建议《新青年》从4卷1号起，改用横式，信中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③

2． 数目改用阿拉伯号码，用算式书写。钱玄同认为，"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④

3． 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历纪元。此为他的"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条之一。1919年1月，钱玄同为陈大齐的《恭贺新禧》一文作跋，指出阴历不便于计算和应用，民国改用阳历是正确的；同时，他又指出，"民国将来如能改用公历记年，那就更便利了"。⑤同年10月，钱玄同发表《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批评中国传统的以皇帝纪年的方法，也批评戊戌维新以来用孔子纪年、黄帝纪年的主张，认为"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

① 《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6日。
②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3号，《通信》，第17页。
③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6号，《通信》，第6页。
④ 《致独秀先生书》，《新青年》3卷5号，《通信》，第10页。
⑤ 《新青年》6卷1号，第4页。

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应该爽爽快快地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①

4. 简化汉字笔划。钱玄同认为：“文字者不过是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②1920年2月，钱玄同发表专文《减少汉字笔画底提议》，认为拼音文字非旦暮之功可以制成，不可粗心浮气，草率从事，提出以简体字补救汉字难识、难写的缺点。他表示，将选取3000常用字进行简化，其办法有采用古字、俗字、草字、同音假借字、新拟同音假借字、借义字，减省笔画字等8种。③

上述建议的实施过程表明，文化改革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它最终不能脱离政治改革。1909年，钱玄同在东京时，与同学有过一次讨论。马裕藻认为，文化变革必须借助政治力量，“临之以帝王之威，始克有济”。钱玄同不同意，他说：“止须其理正确，则真理自有明白之一日，故在野讲学，效力亦不小也。”④钱玄同不了解，个人虽可以发现真理，宣传真理，但要根本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面貌，个人的力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仅仅靠“在野讲学”也是不能成事的。

自1918年下半年起，《新青年》同人逐渐分化，李大钊率先歌颂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开始了对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寻求。次年1月27日，钱玄同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话：“《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这个争端了。”⑤1921年初，《新青年》同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陈独秀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胡适“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钱玄同认为二人之间的分歧“其实是猪头问题

① 《新青年》6卷6号，第626—627页。
② 《致陶孟和书》，《新青年》4卷2号，第174页。
③ 《新青年》7卷2号。
④ 《钱玄同日记》第5册，1909年4月16日。
⑤ 《钱玄同日记》第20册。

罢了”。①他曾与李大钊商量，准备调解，但未成功。②此后，钱玄同一面致力于古书辨伪，认为“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③同时企图以甲骨文和金文为基础，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另一方面，则掮起“汉字革命”的旗帜，努力探索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他虽然没有沿着李大钊、陈独秀的路子走，但继续在“五四”精神的光照下活动。他的工作仍然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文化大潮的一部分。

## 四

从辛亥到“五四”，钱玄同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他在两个时期的不同寻求代表了近代中国先后出现的两个文化派别——《国粹学报》派和《新青年》派。前者在不同程度上将“西学”的传播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灾难，力主保存、发扬并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希冀从中筛选出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或在它的古老形式中灌注进某些时代内容。后者则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力主敞开大门，以向西方学习为途径创造新一代中国文化。此后近代中国的文化论争无不和这两派密切相关，也无不投下这两派或浓或淡、或密或疏的影子。从“师古”、“复古”、“存古”到主张“输入”、“新做”、“改革”，钱玄同作出了完全背反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反映了他不怕自我否定、勇于追求真理的不懈热情，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文化总流向和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总趋向。在钱玄同的寻求里，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警惕的教训。钱玄同和他的同事们解决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也留下了若干问题，例如，如何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或变革，使之适应现代

① 《钱玄同日记》第23册，1921年1月18日。
② 《钱玄同日记》第23册，1921年1月19日。
③ 《钱玄同日记》第27册，1922年12月24日。

生活的需要？如何在吸收西方文化长处的同时抵制其腐朽部分？如何立足现实，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等等，都是钱玄同等人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有些问题，当时明确了，似乎解决了，但后来又以新的形式发生，再度成为问题。例如，在中国人民从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又出现了所谓“顶峰”说，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封闭主义和文化自大主义，似乎中国人“向人家”学习的过程已经走完，今后的历史只是“人家”学我们了。结果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使我们远远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后面。

钱玄同的时代过去了，但是，钱玄同时代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他那个时代进行的文化论争还在继续。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华大地上再度掀起“文化热”的原因，也是我们重温“五四”历史的主旨所在。

（原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 儒学在近代中国

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命运多蹇，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孔子的地位就日益提高，以至于达到“吓人的高度”。[①]在漫长的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很少有人敢向孔子的这种崇高地位挑战。这种情况，到了近代，才有明显改变。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在西方文化和日本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了非儒反孔思潮。与之相联系，崇儒尊孔的主张也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多样化地表现出来。两种意见互相诋排，各不相下，成为思想史上引入注目、发人深省的现象。

龚自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对儒学独尊地位提出挑战的人。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亦尊，儒者颜亦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②]

九流，指的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分列的九个学术流派。龚自珍认为，儒家只是九家中的一家，并无特殊之处；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都有其符合真理的一面，不需要依附儒术；后代，儒家的地位被愈抬愈高，儒者的脸皮也愈来愈厚。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其他各家历史命运的关心。他甚至发出了儒家可能“先亡”的疑问。龚自珍的时代，中

①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②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7页。

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暮色苍茫、悲风四起的“衰世”，龚自珍的疑问反映了一种信仰危机和对一种新的学术派别的憧憬。但是，由于长期儒学独尊的影响，龚自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学的束缚，他只能借助东汉以来长期衰微的今文经学派，利用其“微言大义”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蒙受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对儒学的不满和怀疑增长了。魏源等人开始痛骂“腐儒”、“庸儒”，开始鄙弃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觉得西洋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高明了。后来，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又从“长技”发展到经济、政治等方面。但是，魏源以下一辈人，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一般地只敢批判程、朱、陆、王等后儒，而不敢批判先儒；只敢批判汉学和宋学，而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孔学。在他们看来，孔子和儒学还是完美无缺的，其崇高地位也是不能动摇的。例如王韬就说过：“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①这种情况，固然反映出思想家自身的特质，但更多反映出的却是儒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和深厚影响。

正是在这种儒学传统的重压下，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理论不能不包裹在儒学的外衣中，并力图借助于“孔圣人”的权威。他利用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来阐述自己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并利用对古文经的辨伪来动摇人们对传统的信仰。康有为力图说明，西汉经学，根本没有所谓古文经，所有的古文经书都是刘歆的伪造。刘歆之后，两千多年，千百万知识分子，二十个王朝礼乐制度的订立者都上了刘歆的当。这样，在龚自珍之后，康有为就进一步动摇了古文经学派的地位，引起人们对这部分儒学经典的怀疑。当顽固派在祖坟面前叩头礼拜，表示

① 《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录外编》。

要"恪守祖训"的时候，康有为却在旁边大喝，你这个祖坟是假的。这自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同时，康有为又力图说明，孔子是维新变法的祖师爷。他主张"法后王"，"削封建"，实行"大一统"，反对"男尊女卑"，创立"选举制"，最高理想是实行民主共和云云。① 因此，康有为称孔子为"万世教主"、"制法之王"、"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康有为建议，清王朝"尊孔圣为国教"，以孔子纪年，全国设教部，地方设教会，每七日还要公举懂《六经》、《四书》的人为"讲生"，宣讲"圣经"。②

近代以来，有不少人，例如曾国藩、张之洞以及清代统治者尊孔，目的是为了维护旧秩序；戊戌时期的康有为尊孔，目的是为了变法。两种尊孔，迥然不同。但是，康有为笔下的孔子明显地不符合孔子的本来面目，它是维新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需要改铸出来的形象。

和康有为比起来，谭嗣同的思想显得激烈、深刻、锐利得多。他怀着满腔悲愤批判儒学所鼓吹的纲常伦理，分析其"惨祸烈毒"，揭露封建统治者以之残酷迫害人民的事实。当时，一位朝鲜人曾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谭嗣同完全同意这一观点。③ 他尤为激烈地批判君主专制主义，认为君主是人民推举出来"为民办事"的，可以共举，也可以共废，其恶劣者，"人人得而戮之"。④ 谭嗣同的思想已经越出改良主义的樊篱，走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边缘。但是，谭嗣同仍然要挂上孔学的旗号。在谭嗣同笔下，孔子"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不仅是维新派，而且简直就是民主主义者。⑤ 他认为，孔门传人曾子、子思、孟子、子夏等人还是继承了孔子的民主传统，只是到了荀子，孔学才被篡

---

① 《孔子改制考》卷十一、九、八、三、十二。

② 《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摺》。

③④⑤ 《仁学》。

改为"钳制束缚"的工具，荀学也就因此统治中国两千余年。谭嗣同严格地区分孔学和儒学，认为儒使孔子之道愈见狭小，起了恶劣作用。① 因此，他以马丁·路德自励，立志为恢复"孔教"的本来面目而奋斗。

在维新派中，严复对西学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他的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批判儒学的理论武器都不是取自儒学自身，而是取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不仅批判"宋明腐儒"，而且破天荒地提出"《六经》且有不可用者"。② 出于对儒家学派的强烈不满，严复甚至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也并不过份。他以热烈的语言赞扬西学的完美与严整，认为中学重三纲，西学重平等；中学亲亲，西学尚贤；中学以孝治天下，西学以公治天下；中学尊主，西学隆民；中学夸多识，西学尊亲知；中学委天数，西学恃人力……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初也是最鲜明的中西文化比较论，标志着在"西学"冲击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怀疑和否定。③ 尽管如此，严复仍然维护孔子的权威，认为孔教不谈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千万不能破坏。④ 他甚至认为，精通西学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圣人的"精意微言"。⑤

戊戌维新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本应对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有较大的冲击，但是，历史展示给人们的情景却是，孔子的地位还要继续高上去。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传统的强大力量和历史缠住现实的痛苦情况。

作为弟子，梁启超支持过康有为的保教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开始反对师说．他认为，孔子是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保教

① 《仁学》。
② 《辟韩》，《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页、
③ 《论世变之亟》，同上书，第3页。
④ 《保教余义》，同上书，第85页。
⑤ 《救亡决论》，同上书，第49页。

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他指出，孔子思想中有“通义”和“别义”两部分，前者万世不易，后者则“与时推移”，应该博采佛教、耶教以及古代希腊以至“欧美近世诸哲”的学说，进一步光大孔学。① 尽管梁启超仍然断言，孔学将“悬日月，塞天地”，“万古不能灭”，但他承认孔学中有不适用、不够用的部分，毕竟是有意义的进步。

真正动摇了孔子和儒学独尊地位的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维新思潮的反映，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非儒反孔的著作家，如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久保天随等。在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下，章太炎一方面肯定孔子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学家、教育普及家和无神论者，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对孔子和儒学的激烈批评。1902年，他在《訄书》修订本中指出，孔子的名望远远超过了实际，其学术也并不十分高明，荀子、孟子都比他强得多。1906年，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孔子“最是胆小”，“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又说：孔教的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他明确表示：“孔教是断不可用的。”② 其后，他又根据《庄子》、《墨子》等书的记载，在《诸子学略说》中，批评孔子“哗众取宠”、“污邪诈伪”、“热中竞进”，是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由此，他进一步批评历史上的儒家学派投机善变，议论模糊，认为无论就道德言，就理想言，儒家均不可用。③ 1908年，日本《东亚月报》刊登孔子像，章太炎就此著文发挥说：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他的思想早已成为过去，“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④

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并不科学。第一，他的批评根据

① 《新民丛报》第2号。
② 《民报》第6号。
③ 《国粹学报》丙午(1906)第8、9号。
④ 《答梦庵》，《民报》第21号。

不少出于《庄子》、《墨子》，庄、墨都是儒家的对立面，所述并不可靠。第二，章太炎的批评矛头在许多地方实际指向康有为。在他所描绘的孔子形象中，我们依稀可见康有为的面影。现实的斗争需要常常使人不能严谨地对待历史，虽章太炎这样的大学问家亦不能免。然而，章太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作为议论、批评的对象，仍然是了不起的大事。在章太炎之后，各种批评孔子的言论就多起来了。

1903年，上海爱国学社的刊物《童子世界》载文认为："（孔子）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①《中国白话报》载文认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②同盟会员宁调元直呼孔子为"民贼"。他说："古之所谓至圣，今之所谓民贼也。"③1912年，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令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程。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明确宣布："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④同年7月，蔡元培主持临时教育会议，进一步通过"学校不拜孔子案"。⑤这样，孔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就被否定了。

随着非儒反孔言论的增加和孔学作为官学地位的否定，崇儒尊孔的呼吁也日益强烈。辛亥革命前后发表崇儒尊孔言论的人很复杂。一种是革命派，如《国粹学报》的邓实、黄节等，他们视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一种是康有为等保皇党，以孔学作为反对革命、维护君主制的工具；一种是清朝统治者及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利用孔学维护其统治或复辟君主制；一种是某些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人士，如林乐知（Y.J.Allen）、李提摩太（T.Richard）、李佳白（G.Reid）、庄士敦（R.F.Johnston）、盖沙令（H.Keyserling）、尉礼贤（R.Wilhelm）、有贺长雄等。1906年，清政府颁布《教育宗旨》，宣称孔子不仅是"中国万世不祧之宗"，

---

①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
② 林獬：《国民意见书》，《中国白话报》第18期。
③ 《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④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民立报》，1912年2月10日。
⑤ 《临时教育会议日记》，《教育杂志》4卷6号。

而且是"五洲生民共仰之圣"。[①] 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学"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②] 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等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10月，《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9月，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于1916年9月再次上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③] 他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④] 1917年3月，各省尊孔团体在上海组织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发动所谓"国教请愿运动"。同年7月，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

为什么近代的守旧复辟势力都崇儒尊孔，这不能不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于是，一场新的非儒反孔热潮因而兴起。

五四前夜发表批孔文章的先锋是易白沙，主将则是陈独秀，吴虞、鲁迅、李大钊等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和儒学维护尊卑等级制度，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易白沙称：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他阐述了历代帝王以孔子为傀儡，借以巩固其统治的情况，说明不能不归咎于孔子自身。[⑤] 李大钊认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⑥] 陈独秀提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⑦] 吴虞也说："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因此，"专制之威愈

①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2编。
②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
③ 《致总统总理书》，《孔教十年大事》卷八。
④ 《康南海与中央电》，同上书。
⑤ 《孔子平议》，《青年》1卷6号。
⑥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⑦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2卷2号。

演愈烈”。①

二、儒学伦理是片面的、不平等的、人压迫人的“奴隶道德”。陈独秀认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由此产生的忠、孝、节等道德都是不平等的“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种种人压迫人的现象因而发生。③吴虞从分析孝、悌等伦理规范入手，揭示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治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学伦理“专为君亲长上而设”，目的在要人们“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他说：“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④鲁迅则通过“狂人”之口，以形象的文学语言说明中国历史一面充塞“仁义道德”的说教，一面充塞着血淋淋的“吃人”现象的残酷现实。吴虞盛赞鲁迅的这一发现，说是“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吃人、杀人不成功”。⑤

三、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生活。陈独秀认为：宇宙间一切物质、精神，无时不在变迁进化之途。一定的学说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社会变迁了，学说也应随之变迁。他说：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命脉，盛行个人独立主义，经济上财产独立，伦理上个人人格独立，崇尚自由平等，而儒学则以纲常阶级(等级)为教，恰恰与此相反。⑥他们坚决反对在民国宪法上载入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类字眼。在当时，他们尤其着重指出，专制与自由不相容，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势不两立。吴虞说：“共和之政立，儒教

①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72—73页。
② 《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
③ 《答傅桂馨》，《新青年》3卷1号。
④ 《吴虞文录》，第5—6，17页。
⑤ 《吴虞文录》，第64、71页。
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

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① 陈独秀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势必复辟"。② 李大钊在"五四"前就认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遗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③；"五四"后，他又对此作了深层分析，说明孔学是"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他说："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他并进一步指出，西洋的工业经济打进东方以后，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了。④

**四、孔门缺少民主学风，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阻碍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易白沙认为：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⑤ 陈独秀认为：九流百家，无非国粹，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不仅遮盖了其他各家的光辉，而且窒息人们的聪明才智，摧残创造活力和独立思考精神，为害较之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要厉害。⑥ 李大钊认为：自孟子辟杨、墨之后，儒学形成了一种排拒异说的作风，自以为包揽天下的一切真理，完全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指斥别人为"淫词邪说"。他说："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词之中也。"⑦ 易白沙、陈独秀都指出，"人间万事，以竞争而兴，专占而萎败"，即以孔学本身而论，独尊的结果是失去竞争、辩难的对象，必然日形衰败。⑧ 据此，陈独秀等声称："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各家之

① 《吴虞文录》，第7页。
② 《复辟与尊孔》，《新青年》3卷6号
③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④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第178—180页。
⑤ 《孔子平议》，《青年》1卷6号。
⑥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
⑦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69—171页。
⑧ 《答常乃德》，《新青年》2卷6号。

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①

“五四”时期，陈独秀诸人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大体如上。经过“五四”，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树立起来的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遂轰然倒坍。

真理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任何人、任何学派对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局部的，以为一个人、一个学派可以穷尽全部真理，以为在这个人、这个学派的思想学说中不包含任何谬误，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域，并以之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是一种可笑的幻想和迷信。“五四”时期陈独秀诸人批判这种迷信，推倒了孔子和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而且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是深远的。

应该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并不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尤其不否定孔子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一个人，一个学派在当时当地的作用和它在后世的作用常常有所不同。前者可以称为当时价值，后者可以称为后世价值。由于时代、地域和传述者的情况不同，一个人、一个学派的后世价值是复杂多变的。陈独秀等人，包括最偏激的钱玄同在内，都一致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他们所否定的主要是孔子的后世价值，特别是它在20世纪初年中国的现实价值。陈独秀说：“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② 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任务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康有为、袁世凯们却力图利用尊孔维护旧道德、旧文化，复辟封建专制主义，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击，所以陈独秀又说：“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

①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2卷5号；易白沙：《孔子平议》(下)，《新青年》2卷1号。

② 《答常乃德》，《新青年》3卷2号。

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1] 显然，"五四"时期的非儒反孔思潮乃是一场从属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严格的科学讨论。它不可能是全面的、辩证的、充分理智的，而必然带有片面、绝对和情绪化的特征。这表现在谈孔子和儒学的当时价值少，谈现实价值多；谈积极面少，谈消极面多；谈教育学、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少，谈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缺陷多。至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孔学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凝聚剂，在高度工业化之后，如何利用孔学作为现代文明弊病的救正剂，这些问题，更非"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所能想见。

在世界文化史上，儒学是一个博大、深刻、有着鲜明特征的思想体系。它既有保守、落后的封建性一面，曾经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今后也将成为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障碍；但是，它也有反映人类社会普遍需要、普遍特点和普遍规律的真理性一面。有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作用；有些思想，经过改造和转换，会成为有益于现代社会的成分。李大钊曾经说过："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但是，"五四"时期的人们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历史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孔子和儒学，探讨它的当时价值和在今天的现实价值，评估它的未来价值，这是当代中国人的任务，也是一切关心儒学命运的人们的共同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许是一项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作于1991年4月）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1年11月在日本横滨第二次汉字文化圈国际论坛所作的讲演。

---

① 《复辟与尊孔》，《新青年》3卷6号。

# 何天炯与孙中山

##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①

在宫崎滔天的中国友人中，何天炯也许是其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今天，宫崎旧居还保存着何天炯的大量信札。它们提供了不少重要史实，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本文以何天炯和孙中山的曲折关系为线索，探讨这些信件所反映的历史内容。

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与宫崎通信时常用的化名为高山英太郎。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进入正则预备学校。1905年8月3日加入同盟会，曾任本部会计。1911年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爆发，至汉阳参加黄兴的中华民国战时总司令部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被孙中山、黄兴委任为驻日代表。1913年2月，随孙中山访日，3月归国。同年，二次革命失败，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现存信札，大部分作于此后至宫崎逝世的十年间。

原信仅署月日，封筒与信笺之间时有错乱，邮戳也有一部分模糊不清，因此，本文对各信所作系年大部分根据信件所反映的时事，为避免烦琐，不一一说明理由。

## 一、反袁时期

二次革命中，孙中山、黄兴之间发生矛盾。流亡日本期间，二人在检讨失败原因时又发生争执。何天炯于1913年9月16日

① 本文与狭间直树合作。1985年6月，杨天石访问东京宫崎旧居时，承宫崎智雄、宫崎蕗苳夫妇等盛情接待，得以见到这批信札。与此同时，狭间直树从已故《宫崎滔天全集》的编者小野川秀美、近藤秀树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批信札的复印件，并蒙宫崎夫妇惠允利用。现值本文发表之际，谨致谢忱。

抵达日本东京后，立即和宫崎滔天一起调和孙、黄的矛盾。根据日本情报人员的监视报告，9月16日下午，何天炯拜访孙中山，次日上午，拜访黄兴。此后，至11月1日，共拜访孙中山24次，黄兴4次①。最后一次拜访孙中山时，何天炯填写《誓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②。两天后，何天炯返国。11月9日，在上海致函宫崎，要求随时报告"高野先生（指孙中山——笔者）近况"。此后，对孙中山的意见就愈来愈多了。

1914年7月29日致宫崎滔天函云："弟非忘情世事者，所以流连沪上者，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弟本拟于八、九月之间东来卖画，今闻孙君望弟之来甚切，不知其意何居也？若谏不行，言不听，则并来无益也。"孙中山迫切希望何天炯再度赴日，但何因为调和工作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认为孙中山听不进劝谏，因此，抱消极态度。尽管如此，何天炯还是于当年9月底到了东京。当时，孙中山等人正在起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在17次讨论会中，何天炯曾经参加过3次③。12月16日，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长。同月22日，各省支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会议，何天炯担任主席。1915年3月3日，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为南洋各埠特务委员，负责向华侨筹募经费。同年归沪。8月27日致宫崎函云："弟自南洋回中后，个人经济已困不堪言，而顾瞻党事，益愤懑无聊。前月底曾致函于胡汉民、廖仲恺、邓铿诸兄，嘱其切劝中山公改订誓约，以维系人心。鄙函痛哭流涕，指陈得失，质之良心，尚无愧怍。闻三君对于此事，俱太息无法挽回。当时该函为孙公所见，不独毫无反悔之心，且责弟为不明事体，然则民党前途毫无希望，弟尚何有东来筹谋一切之事乎？"孙中山有鉴于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涣散，因此，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特别强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6141，2037—2503。
② 《党员誓约书》第28号，见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附录》。
③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讨论会议纪录》，《革命文献》第45辑，台北版，第9、15页。

调党员应无条件服从党魁。誓约中规定必须“附从孙先生”，而且必须“捺指模”。这一规定遭到不少革命党人的非议。本函表明，何天炯对此激烈反对，胡汉民、廖仲恺、邓铿等人也不以为然。同函又云：“东京地方虽小，有中山公一人之请负，不知革命事业可稍有起色否？一笑。”“请负”，日语，意为承包。誓约过分强调党魁的个人作用，忽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何天炯以“请负”相讥。它显示孙、何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当时，革命党人呈现四分五裂状态，在反袁斗争上各自为政。孙中山等曾投入大量金钱，准备在杭州起义，但没有成功。何天炯则计划在浙江嘉兴、湖州发动，也失败了。他在致宫崎函中说：“对于嘉兴、湖州二府之事，进行极密，同党中鲜有知者，至其成效之佳良，比之孙公处用全力以谋杭州者，实有天渊之别。唯该件近来误于廖仲恺氏为可惜耳。”何天炯陈述经过说：由于缺乏经费，不得不介绍该处代表于廖仲恺，廖仲恺指之为“无赖汉”，并称，此人旧年屡在孙宅乞钱，我已经驱逐过多次，切勿再为其所骗。该代表听说之后，忿火中烧，急欲起事以明心迹，因而仓促行动，遭致失败。何天炯为此向廖仲恺提出质问，廖自称“错误”。何天炯在信中向宫崎发牢骚说：“亦足见孙公处办事人之无聊也！”何天炯因对孙中山不满而牵连及于廖仲恺等人。

1915年9月，何天炯曾到日本一行。10月5日返沪。此间，在对“康派“的态度上，何、孙二人又出现了新的分歧。何天炯于8日致宫崎等人函云：“黄兄与此地之康氏颇有函件往来，若孙氏之绝对排斥康氏，真不知其是何用意也。一叹！”黄兴于1914年6月离日赴美。他与在上海的康有为“颇有函件往来”，这是迄今鲜为人知的事实。在对于共和政体的态度上，黄兴与康有为之间尖锐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上，双方又有其共同点。后来，李根源曾正式与康有为磋商合作，取得了暂不考虑其它，先

图二十六　何天炯为中华革命党「誓约」批评孙中山致宫崎滔天函手迹
（宫崎滔天故居藏，狭间直树教授赠）

行“戮力倒袁”的协议①。从何函可知，孙中山反对黄兴与康有为发生关系，何天炯则支持黄兴。1915年11月1日函又云：“冯、康联络之事，此刻尚在半真半假之中，然帝政问题如日紧一日，则将来成为事实，亦未可知也。且康之所图，范围颇广，比之神様，实有天渊之别。弟恐第三次革命成功，竟在官僚之手，果尔，则自称神様者，将变为泥菩萨，无人香花供养矣。有神様之顽迷，致使同志四分五裂，为官僚所轻视，乃出而自树讨贼之旗，虽目的甚同，而吾党将来不能在政治上独占优势，推原祸始，陈英士等实不能辞其咎也。”冯，指冯国璋。他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许多措施，但反对袁称帝。1915年6月，他曾和梁启超讨论帝制问题，并相偕入京力谏。此后，梁启超曾多次派人动员他赞助反袁起义。何函所言冯康联络，指此。神様，日语，意为神仙、上帝。宫崎滔天与何天炯都不满意孙中山神化党魁的作用，在通信中以此词代指孙中山②。顽迷，指孙中山拒绝许多同志的劝告，坚持中华革命党誓约一事。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陈其美“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因此，也为何天炯所不满。

11月7日，何天炯到达香港，企图运动龙济光及其部下倒袁。8日致函宫崎云：“各处情形均甚佳妙。唯龙济光之为人颇为愚蠢，刻虽有与冯、张提携之事，难保无中变之虞也（云南、广西均可靠）。然天下事求其在我，就使龙等俱树讨袁之旗，而纯粹民党不能在军界上占有优势，则其结果亦毫无良善，可断言也。”龙济光与冯国璋、张鸣岐在1915年曾一度“提携”反袁，这也是迄今鲜为人知的事实。但是，正如何天炯所分析，这一“提携”很快就出现了“中变之虞”。龙济光反袁是假，拥袁是真。同函又

① 《雪生年录》。

② 还在1913年10月17日致宫崎民藏函中，滔天就曾以“神様”一词讽刺孙中山，见《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93－394页。参见狭间直树：《孙文思想中的民主与独裁》，《东方学报》第58册，第334页。

云："神様方面，亦派人四出筹款，能达到目的，亦属疑问。就使能得多少，亦杯水輿薪，谓其能包办粤事，恐亦未必。"从这里看，何天炯的行动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两辙。信中，何天炯还表示，"若得十万元，弟敢不辞大言，虽为南粤霸王可也；若得半数，则粤事亦能中分而执牛耳。"尽管何天炯与孙中山在组党、联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靠金钱运动军阀部队倒袁上则一致，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11月20日，何天炯返沪。21日，致函宫崎云："以鄙意视察所及，则两广方面情形实较长江一带为佳，而广西则尤觉可恃。广东之龙济光虽甚蛮劣，而其部下实至易动摇，特所欠者，些少之运动费耳。"他表示："今大团体已难结合，所恃者各人猛进之精神也。"何天炯不了解，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大团体"，只靠各人的"猛进"精神是绝难成事的。

袁世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于12月12日称帝。25日，唐继尧、蔡锷通电宣告云南独立，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兴起。1916年1月2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今南方风云已告变矣。以天时、人事推之，袁政府当无所逃罪于天下。可虑者，一般拥兵大员，不知共和为何物，虽一旦反戈向袁，其结果于民国前途不能放若何之异彩。"只有民主主义的军队才能造就民主主义的国家。"不知共和为何物"的"拥兵大员"们虽然可以参加反袁行列，但决不会成为民国的柱石。何天炯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信中，何天炯介绍林国光去东京，会见宫崎和头山满，有所擘画。其内容，从此后的信看，仍是争取经费援助。2月24日函云："目下此间局面，如慢性淋病，不痒不痛，推其故，实因缺少药品，所以各方面俱难着手。且同人生活问题亦属异常辛苦，大有解散团体而为四方奔走之计。"何天炯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但其观点则和黄兴等人的欧事研究会一致。1915年11月，在形势的推动下，李根源、程潜等人陆续自国外返回上海，筹备武装讨袁。本函所称为"生活问题"所窘，"大有解散"之势的"团体"，当指欧事研究会在上海的机关。何天炯一度居住的法租界宝康里，正是程

潜等欧事研究会诸人回上海的聚居之地①。信中，何天炯向宫崎表示："除刻下电达尊处外，再为函达，实希望一勺水耳。"其拮据状态可以想见。

4月25日函云："上海驻在之海军有五万元即可得其树讨贼之旗。一周前，陈其美派已与之交涉成熟，唯以中山誓约及须挂青天白日旗(中华革命党旗也)两问题致谈判破裂，将该五万元交回陈氏，而在上海之民党，则无人有五万元之能力，诚可痛也。"1915年12月6日，陈其美等曾在上海运动肇和舰起义，未成。本函表明，此后，陈其美等仍在海军中继续活动，已有成约，但因"誓约"及党旗两问题受阻。同函中，何天炯向宫崎提出五个方面的问题：1.对华外交问题；2.有现款能否买军械；3.贵邦人士对于孙氏问题；4.孙氏在东洋之举动；5.黄兴何日回东京。五个问题中有两个是关于孙中山的，但这并不表明何对孙的态度有好转。这一时期，何天炯应胡汉民之请，准备回粤调和革命党人中的纠纷，动身前听说孙中山向日本借得了一笔款子，于5月4日致函宫崎云："闻中山处大款告成，惜弟兀傲性成，为保全人格计，亦不能再与彼接洽耳。"表现了不愿合作的态度。

5月25日函又云："沪事现归钮永建君主持，唯苦于经济，不克进行，殊可痛也。久原款事，此后想仍有希望，请先生与克强兄商酌进行，此款如告成功，则袁必多一致命伤，可断言耳。"钮永建是欧事研究会的主干，他回国后，即积极推进和中华革命党的合作。4月20日，双方决定，上海方面的讨袁活动由陈其美统一负责，钮永建协助。5月1日，两广护国军在肇庆成立都司令部，钮永建被任命为驻沪军事代表。本函所言"沪事现归钮永建君主持"，当即指此。久原，当指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何天炯不愿分用孙中山的借款，力图通过宫崎另谋财源，他与孙的隔阂愈来愈深了。

①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表示愿意独立，加入护国军。6月19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海军刻告独立，一切生机从而酝酿。报载克强行将返沪，炯颇为盼望。孙先生之中华革命党暗中仍极力进行。此回海军独立，纯是唐、钮运动而成，而中山派见之，颇生嫉妒。哀哀孙公，权利之心老而弥笃。蚩蚩信徒，衣钵相传，民国之祸，正未有已也。"唐，指唐绍仪，钮，指钮永建。尽管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已经在反袁中携手，但何函显示，两派仍存在严重的成见和摩擦。"权利之心老而弥笃"，这是何天炯信函中对于孙中山最严厉的指责。

## 二、护法战争及其失败以后

袁世凯倒台后，何天炯对孙中山的态度有所转变，但仍然不信任。1916年9月10日致宫崎函云："孙先生近来态度甚为谨慎，外界非难之声尚少。惜其行事，忽然积极，忽然消极，如生龙活虎，无从捉摸，则欲四万万人有依赖之信用也，恐不易矣。"同时，他对黄兴也不满，同函云："黄先生对于政界，暗中十分热心，然此刻决无出头之望。以黄先生之资格地位，将来本为有用之人物，惜其人好作虚言，老同志中甚为解体，且其自身之气欲，日见发展，是亦无良好之结果也。"但是，反袁斗争的胜利毕竟使何天炯看到了希望。他说："支那虽日见堕落，然世界必日进文明，请先生勿悲观可也。"此后，何、孙关系逐渐好转。

1917年6月15日，何天炯曾至北京一行，可能是动员议员南下护法。7月，孙中山等由上海启程赴广州。8月，南下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孙

① 《明正段祺瑞乱国盗权罪通令》，《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版，第209页。

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0月，孙中山颁布讨伐段祺瑞令，号召全国人民“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还我人民主权”①。同月，护法战争开始。11月，何天炯到达广州，孙中山命他赴日争取财政援助，但何天炯则认为时机未到。12月8日致函宫崎云：“刻下支那全局，自湖北独立，重庆收复后，形势又复一变矣。粤中军政府此刻惟有取稳健态度，以观时机之变耳。中山公屡欲遣弟东来，为经济之运动，弟以为此刻尚非其时，故局促于此也。”当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占领重庆。接着，黎天才等组织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告“自主”。但何天炯并不乐观，主张以“稳健态度”，观察时势。同函又云：“陈君炯明现得督军之允许，编练军队二十营(约五千人左右)。若能取渐进主义，不招当局者之大忌，则纯民党方面未始无活动之余地。刻下此军拟向福建出发，惜饷械不十分充足，不知先生有何良策以救助之否？”当时，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威逼，感到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他争得粤督陈炳焜的支持，以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为基础，建立了一支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并以护法援闽名义开入闽南。本函所述史事指此。函中，何天炯要求宫崎设法“救助”饷械，说明和孙中山新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但是，何天炯仍不同意孙中山这时的“用人”政策。10月20日函云：“刻下粤省大局，混沌中尚含危险性质，结果如何，虽神仙不能逆睹也。其原因虽由陆氏派之野蛮无识，而第一着由孙公做坏，其后种种办法，背道而驰，如作茧自缚，使一切民党毫无活动之余地，则不能不咎孙公之用人不当耳。可悲可惭，民党其从此已矣乎！”此次护法，孙中山所依靠的是唐继尧和陆荣廷等军阀，他们对孙中山多方掣肘，军政府任命的六个部长，除个别人外大多不肯就职，军政府成了空架子。何天炯批评孙中山“第一着”就“做坏”了是有道理的。果然，由于军阀的排挤和破坏，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于1918年5月离粤经日本返沪，第一次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孙中山曾准备和日本资本家联合开采汕

头附近的铁矿。1917年9月，孙中山电召日人塚原嘉一郎到广州洽谈。当时，日本军方正准备解决缺铁问题，对此异常积极。同年末，何天炯陪山田纯三郎到汕头调查铁矿，结果发现储量相当丰富①。1918年4月间，何天炯受孙中山之命赴日，进一步谈判开采事宜。6月归国，居留于上海。护法的失败使他消沉。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使他振奋起来。5月10日，他和张继、戴季陶联名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揭露日本的侵略政策，呼吁日本人民从根本上改造政治组织，爱和平，重信义，与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一起前进②。同月15日致宫崎函云："中日两国人民本有亲善之要素，徒为少数握权力者迷误其方向。日本以国家主义为前提，故以侵略为天职；北京则以权利为生命，故至万不得已时，则虽卖弃其国家而不惜。一买一卖，而东亚从此多事。为人民者，宜如何发愤，起而纠正其迷梦，为人道前途放一绝大光明也！"生活是最好的教师，何天炯终于认识到中日两国反动派"一买一卖"，相互勾结的事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把希望建立在纠正反动派的"迷梦"上，又仍是一种幻想。信中，何天炯又说："孙公现甚平安。唯南北和议，现又停顿，其前途安危如何，殊难逆料耳。中日风潮，影响于两国国民自由提携之实业者颇为重大，真不堪忧虑之至也。"当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开始。5月21日，宣告最终破裂。本函作于此前，当时孙中山仍在上海。函中向宫崎传达了孙中山的"平安"消息，显示了何孙关系的进一步好转。

6月7日函云："自昨日起，沪上情形暂暂不稳，大有买卖停止之势，民情之激昂亦可想见。不知北京、东京间之大买卖肯停止否？"6月5日，上海商界全体罢市，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6日，锐利机器厂、求新机器厂、华商电车公司等工人举行罢工。何天炯希望这种激昂的民情

① 参见樱井真清：《秋山真之》第263－264页，秋山真之会，1933年2月刊。

② 藤本博生：《日本帝国主义与五四运动》，同朋舍版。

能够阻止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勾结。当时何天炯正继续通过宫崎与日本资本家联系，除企图开发汕头附近的铁矿外，又准备开发芜湖附近的煤矿。他自称："抛却政治运动，而从事于实业，全副精神，俱注于此。"函中所言"两国国民自由提携之实业"，指此。在此后的通信中，大多谈开矿，较少涉及时局，也就更少谈到孙中山。这种情况，持续到1920年才有改变。当年4月7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目下滇、桂之风云急矣。孙、唐继尧、李烈钧、陈炯明、王文华俱联为一气，势力亦颇不小。福建方面，则陈炯明与方声涛正在交战中（闻方氏既完全败却云）。陈氏之言曰：方氏受岑、莫之密命，特来福建监视我等之行动，若不先行剿灭，则方氏为后顾之忧，我兵何能直入广东耶！此亦不得已之苦衷也。陆、莫在粤，人心既去，但强盗团体，颇为坚固，且其所处地势，指挥亦颇敏捷，反观孙、唐之气焰，亦颇不小，且其兵力亦颇足包围广东，惜运用殊欠联络。总之，今日之事，尚未知鹿死谁手。若长此'沉闷'、'混沌'、'欺诈'、'分赃'、'伪和'，诚不如大破坏、大杀戮，为少快人心也。"函中所指岑、莫，系岑春煊与广东督军莫荣新。自孙中山1918年离粤返沪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即为桂系把持。1920年，孙中山和唐继尧、李烈钧、陈炯明以及贵州将领王文华等人组成了讨伐桂系的同盟。3月27日，孙中山复王文华函，指出桂系是"革新的障碍"，"若不排除而廓清之，则其进步之难，难于填海。"①同时，孙中山并积极图谋收复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本函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形势。何天炯支持孙中山讨桂，但批评其"运用殊欠联络"，他对前途仍然悲观。同年，直皖矛盾日益尖锐，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7月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敝国时局，日趋混乱。皖直两派，终有破裂之日，而吾党行动，自有前辈主持，弟不敢过问。然以鄙意度之，则日趋堕落，可断言也。"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36页。

图二十七　“孙公之狂喜，如小孩得了玩具。”——何天炯致宫崎滔天函手迹
（宫崎滔天故居藏）

这里的前辈，虽然不单指孙中山，但显然包括他。何天炯对孙中山的态度虽然好转，但对孙的领导则并不放心。同月14日函云：“弟坐守此间，终觉无聊。加之直皖风云，急转直下，与民国前途关系至钜，我辈已不能强，又不能弱，虚生人世，终夜思之，汗泪交流。”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失败多而成功少。本函反映了当时相当多的革命党人的郁闷情绪。

在不懂得革命“必须唤起民众”之前，孙中山长期纵横捭阖

于军阀之间，依靠一派军阀以反对另一派军阀。1920年，为了反对直系，孙中山力图与皖系建立反直同盟。4月，他致函周善培，嘱其与段祺瑞协商推倒徐世昌的问题。但是，段祺瑞早已成为曹锟、张作霖等各路军阀的众矢之的。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旋即失败。8月2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段派失败，当然之结果也，倘不失败，则所谓与孙联络者，亦表面之事耳，与民国前途无关系也。今失败至此，民国多一革命党，殊可喜之事也。"孙中山认为段祺瑞"近日大有觉悟"，因此，决定与之携手"共图国事"①。但是，何天炯却看出了段祺瑞的联孙，不过是"表面文章"，显然高明一些。不过，他以为段祺瑞失败后会成为"革命党"，也还是相当糊涂。

但是，就在皖系一败涂地的时候，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20年7月，桂系头目陆荣廷在龙州召集会议，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攻在福建的粤军陈炯明部。8月11日，为桂系把持的军政府发出进攻福建的动员令。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决定打回广东。下旬，粤军大胜，桂军大败。9月6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广东风云，日急一日，此番想可得手。家乡在望，喜忧交集。久罹水火之粤民，天理循环，定能脱绿林酷虐之政治也(孙公之狂喜，如小孩儿得了玩具)。"陈炯明的粤军是孙中山亲手培植的军队，长期屯驻闽南，此次回粤，驱逐多年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孙中山自然极为欣喜。"如小孩儿得了玩具"一语，形象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孙中山当时的心情。其实，何天炯的欣喜之情也不亚于孙中山。9月19日致宫崎函云："惠州即时可以陷落，虎门要塞已入民军掌中。果尔，则广东事可以大定矣；广东定，则局面又大可活动。弟归心之急，不可言状。"30日函又云："广东大局如定，则民党地盘确立，南北之局成，天下事未可量也。"

---

① 《批姚畏青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4页。

陈炯明的回师很顺利。10月22日，粤军攻占惠州。23日，桂系官僚岑春煊通电退职。24日，宣布撤销军政府。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系残部逃回广西。11月14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本日晤中山先生，据云，前有两函奉询足下(即先生)，唯至今未见复音，特嘱弟顺便转询，有无收到。兹广东局面，已暂次归入吾党范围。中山先生拟二周内即偕唐、伍两君返粤，拟将旧日军府维持现状，然后逐渐改良，以图发展，此实辛亥以来未有之机会。"唐，指唐绍仪，伍，指伍廷芳。陈炯明的胜利给了孙中山以希望，他准备回广东重组军政府，本函即作于此时。同函又云："中山先生之意，拟俟返粤后，组织稍有头绪，即遣弟东渡，与贵国朝野人士共商东亚大局之前途。弟维国家之事，先有内政，然后有外交，吾党如果有坚固正大之团体，则世界之外交皆可转移，岂独日本！故弟拟即日返粤，观察各方面之情形，或补救，或开展，然后再定行止。中山先生亦甚以为然。"可以看出，孙中山能倾听何天炯的意见，因此，何天炯也就积极起来了。

## 三、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

桂系被逐，国民党人在广东取得了立足之地。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偕唐绍仪、伍廷芳返粤。29日，恢复军政府，宣言继续护法。其间，何天炯也跟着到了广州。他于12月21日致宫崎函云："日来军府极力整顿内政，国会重开，当必选孙公为正式总统，贯彻主张。外间所传孙、陈暗斗等事，纯是谣言。陈炯明亦极有觉悟，已宣誓服从孙公。湖南赵总司令恒惕及林省长支宇均完全加入盟约。唐、伍均听指挥。滇、贵相联，为〔惟〕军府之马首是瞻。四川事亦大有希望。广西陆荣廷则不成问题，粤军一到，彼内部必倒戈逐之矣。如此则西南联为一气，然后进窥长江，福建、浙江必首先响应，陈光远(江西)、

吴佩孚又必联翩加入，则北方不足平也。万岁！万岁！"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即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等联名发表通告，宣布将以原"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①。同时宣布废除桂系在广州假托军政府政务会议名义所发的各种伪令。12月4日，续开政务会议，研究刷新吏治，实行建设问题。函中所言"军府极力整顿内政"，指此。当时军政府已与贵阳代总司令卢焘、湖南总司令赵恒惕等取得了联系。因此，何天炯对形势的估计极为乐观，认为进军广西，驱逐陆荣廷，然后挥师北伐等都已不成问题，情不自禁地连呼"万岁"！同函中，何天炯又告诉宫崎，军政府已决定向英、法、美各国派出代表一人。他自己大约在明年正月，出使日本。何天炯表示："孙公视此问题极为重大，故弟亦不能不勉为其难，甚望先生等助吾一臂。头山、犬养两翁均请先为致意请安。"

孙中山急欲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和帮助，因此，多次催促何天炯启程，但何却认为出行之期不宜过急。1921年1月5日函云："弟东来之期，现仍未有一定。中山公虽时时催弟速行，唯弟个人之愚见，实未敢骤然赞同。盖历观今昔前后之外交，而不能出之冒昧者也。以弟愚见，至少程度须俟总统选举告成之后，然后有外交之可言。"此函发出后，孙中山又接到和田的电报，催促孙中山迅速派出驻日代表。1月25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孙公接到和田二十二日来电云，须速派代表等语，但同人佥以此次民党再兴，对内对外均须谨慎将事，刻下贵国政府，实有危害民党之存心，故主张不能乱派代表，以启人轻侮之心。孙公当嘱弟回复此电，弟即复以'接和田电，甚感，但派遣代表，须与各国一并发表，请转达。'想先生早日接到此电矣。"和田，可能指和田三郎。他是日本社会党党员，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早

① 《建设方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41页。

有关系。从信中看，孙中山再一次接受了何天炯的意见，暂不宣布派遣驻日代表。同函又云："年来贵我两国民之感情，恶劣极矣。弟与先生虽有中日联盟之主张，不知何日可能实现？念之不胜愤慨。然刻下则时机已到，倘贵政府仍恃强为生，则人类幸福，必无可希望也。"从孙中山开始革命之日起，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然而得到的总是失望。他们逐渐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有了认识。何天炯此函就是这一觉悟的表现。

军政府成立后，形势逐渐稳定。2月6日，孙中山授意何天炯发电邀请宫崎访粤。3月12日，宫崎到达广州，萱野长知同行。13日，何天炯陪宫崎拜谒史坚如墓，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欢迎宴会。14日，何天炯送宫崎到香港。第二天，宫崎又送何天炯回广州。二人依依难舍。18日，宫崎到达上海。3月20日，何天炯致宫崎及萱野长知函云："先生此回来去之匆忙，中日人士诸多误解，甚有不胜惊讶者，真不堪一笑也。东亚之风云真迫切矣。此回吾党能否活动，全靠两先生之力，敬候好音。"看来，孙中山邀请宫崎访粤，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有所委托，希望他代为向日本资本家借款，以解决财政困难。

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4月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此间各界人心，完全一致。唐继尧氏当时虽甚赞成，然时为政学会人极力煽惑，故时持两可之说。今则为其部下诸将领力劝其附从孙氏，始有回复势力与名誉之望。故唐氏至今日，对于孙氏，极其信仰，毫无问题发生也。"对孙中山，唐继尧一直首鼠两端。1921年2月，唐继尧被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蛰居香港。孙中山派人邀请来粤，给以礼遇。这时唐继尧正处于困境，自然力图利用孙中山。何函称："其部下诸将领力劝其附从孙氏，始有回复势力与名誉之望"，这是事实。但是以为他对中山已经"极其信仰，毫无问题"，则是被其假象骗住了。函中，何天炯还提到了唐绍仪："唐氏以要求内阁总理一席为条件，此事非独孙氏不承认，我辈亦不之许，现已敬鬼神而远之矣。"5

月6日，孙中山任命唐为财政总长，唐不就职。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唐绍仪不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所以不愿就职。本函透露的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了内幕。

除了孙、唐矛盾之外，还有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4月18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粤中自选出大总统后，人心甚为踊跃。惟困于经济，未定何日就职（大约五月初头可就职），因此反生出许多谣言，谓孙、陈不和云云，其实皆为北京侦探利用此等难局而施其手段耳。然则财政问题，诚粤中今日生死问题也。"4月7日，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但是，却未能立即就职，其原因，固在于经济，也在于陈炯明的反对。最初，陈炯明反对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后来又主张暂不就职。何天炯以为孙、陈不和是"北京侦探"制造的"谣言"，这是不了解内情的结果。但他认为"财政问题"为粤中"生死问题"，则是道出了部分实情的。

宫崎返日后，即积极向日本资本家活动，为此，何天炯于7月8日致函宫崎表示感谢，函中云："先生所示各函，鄙俱转达孙公，深以先生热诚宏愿，比之岁寒松柏，其人格尤苍健无匹云云，此诚吾党临风感激无已者也。"当时，正值日轮小川丸运输接济桂系军阀枪械一事被发现，广州各界掀起抗议和抵制日货运动。此事给予孙中山的外交政策以很大影响，何天炯在信中告诉宫崎："唯此间自小川丸事件发〈生〉以来，对于贵国外交，甚抱悲观。即如孙公对于东亚大局有伟大之计划者，亦云日本外交，不求其助，只希望不为我害，即大成功也。"在很长时期内，孙中山一直对日本政府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至此，算是觉悟了。

为了彻底消灭桂系军阀，孙中山于6月18日下达讨伐陆荣廷令。李烈钧响应号召，于桂西北成立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部，准备进军桂林、柳州等地。7月1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此间诸情，尚称顺手。唯李烈钧氏所部，因军饷缺乏，行动迟缓，不能即日前来援桂，友人多为之扼腕者。然李氏在今日之时

局，实有重大之关系。盖将来湖南、武汉之先锋队，不能不赖于此君。且李氏历年饱尝忧患，故对于孙公，颇能改其平日冷淡之态度，而极其诚服，而孙公亦倾诚相结，此真可为吾党前途欣幸者。”反袁斗争时期，李烈钧与黄兴的观点接近，因而也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自此，即与孙中山疏远。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终于使二人再度结合。何天炯为之庆幸，并盛赞孙中山的“倾诚相结”，说明何天炯对孙中山的态度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宫崎一直希望何天炯尽早访日，和资本家直接洽谈，但何则由于经济困难，迟迟不能成行。7 月 19 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目下小弟之境遇，有种种之障碍（以经济为绝大之原因，惭愧惭愧），实未能即日东行，虽中山公亦无如此问题何耳。”信中，何天炯表示，希望宫崎偕日本企业家到广东游历调查，亲自来看看“此间之真象”。何天炯透露，日本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池田正在与广东财政厅接洽，愿出“民间资本”3000 万元作为开发海南岛事业之用。同函，何天炯提出海南岛开发、广州大沙头商场以及士敏土厂改良等三项事业供宫崎考虑。

同日，何天炯接宫崎 7 月 10 日函，即持函见孙中山。孙中山读后，很高兴，对何天炯的东行任务作了明确的交代：“汝东行之事，余无日不希望早日实现之者，唯此番正式政府成立，汝须以代表政府之名义往，方为郑重。因此，汝之任务，固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汝之任务，在宣传新政府光明正大之宗旨于日本朝野上下，告于今后贵政府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非独不可有此野心之进行，即如从前二十一条之不当要挟，亦须一律取消。如此，则彼我两国，方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言。若一部分之小小实业问题，固无须政府特派代表以为之。且日本若不改变侵略政策，则小小实业亦不易成功，虽或能进行于初，其后亦必有困难之日。且以目下之情形而论，若政府贸然与日本生特别之关系（即经济及借款），则政府必受人民之攻击，或宣告死刑焉。盖以段祺瑞之强，其倒毙即在向敌人乞款以杀同胞，此皆可为殷鉴之事。”

孙中山指示何天炯，东行的任务“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要他转告日本政府，从此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日才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能”。这段话标志着孙中山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的重大转折和进步。孙中山又对何天炯说：你此次东行，至少须有一万元才能出发，刻下总统府财政颇为困难，你外间有无友人或商人可以借贷？若有，可由政府出名，或担保。何在信中对宫崎称：“鄙人闻孙公之言，乃有三种感触：一、甚佩孙公之言；二、甚怜孙公之遇；三、甚惜今之人借公为私，公款不用于公事。想先生亦有此感慨耳。”

不仅何天炯的访日经费无法解决，连他打一封电报给宫崎的钱都没有。上函两天后，何天炯再致宫崎一函，仍然敦促他陪同日本资本家南来。当时，粤军正在胜利地进行讨伐陆荣廷的战争。函中说：“弟意广西问题，总可早日解决，因此资本家之热度必又增高一番。故弟意先生处如有确实可靠之资本家，则总以促其早日南来为是。然非与先生同来，则弟等亦颇难相信。”对何天炯的嘱托，宫崎曾努力进行，并且找到了一个愿意投资的资本家。8月5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昨日接奉手示，当经转呈孙先生阅悉，深感先生热心毅力。此刻极盼先生携该有力者欣然来粤。”

讨桂战争进展迅速。8月13日，滇、粤、赣各军攻克桂林。21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广西问题完全解决，两湖之风云又急，孙公之焦心，盖可知也。”当年7月，湖北绅商发动“驱王运动”，反对军阀王占元的统治。21日，湖南总司令赵恒惕以“援鄂”为名，调集军队向湖北进军。25日，直系军阀在保定开会，决定“出死力”支援王占元。8月9日，徐世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湘鄂之战发展为湘直之战。17日，两军在咸宁、汀泗桥等地发生激战，湘军失利。函中所称“两湖之风云又急”，指此。“孙公之焦心，盖可知也。”何天炯已经与孙中山忧乐与共了。但“援鄂”战争很快结束，何天炯的兴奋中心再次转到外交及北伐等问题上，9月15日致函宫崎云：“粤政府虽日见发达强固，而对

于日本外交则甚为冷淡。受欺诈迫害之结果，无论若何之外交能者，恐亦不能疏通此鸿沟也。”9月21日函云：“出兵长江问题，本年内必见诸事实。今日虽盛倡中山出马之说，但事机成熟之时，则陈炯明氏必自告奋勇，而使中山坐守两粤。此虽弟今日推切之辞，然十必中八、九也。(反面言之，若事机而未成熟，则不许中山出马，此又陈氏自信之计划也。)”

关于日本资本家来粤问题，何天炯表示：“盖今日之大问题，在中日间之恶感未除，粤政府为维持人心计，决不敢公然向日本生若何之关系。反之，日本资本家则必向安全有担保处，然后投资，此为不能沟通一气之大原因也，”何天炯要求，宫崎前谈之资本家，能早日来粤。

9月28日函云：“近来米国方面，对于粤政府多有优礼之表示，倘兵力能及武汉，则先承认新政府者，必此君也。弟东行之期虽未定，然局面日开展，则出发之期亦不远矣。”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后，驻粤美领事曾于6月28日拜会孙中山，随后又到处交部拜会伍廷芳、伍朝枢。这些举动，给了何天炯以错觉，认为是美国政府对于“粤政府”的“优礼”，并且天真地设想到北伐占领武汉后美国首先承认的问题。何天炯的这种乐观情绪一直维持到1922年上半年。当年5月29日函云：“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决不致如外间新闻电报等之妄为猜度者。今江西军事，又日有进步。陈炯明氏亦觉悟自身前途，若长与孙公分离，则为取败之道。且广西匪乱颇亟，足使一般人心浮动，故陈氏已翻然允诺，担任剿匪事宜。孙公亦披诚相结。大约二、三日内，陈氏当由惠州回省任事矣。如此，则前方讨贼军，更可安心直进。此为吾党一大事件之解决，请宽锦念可也。”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各军集中韶州，即以韶州为大本营。但陈炯明拒不参加梧州会议，并电辞本兼各职。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务，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当晚，陈炯明借粤军总部人员

退居惠州。为了争取陈炯明参加北伐，孙中山于4月23日亲返广州，并派员劝告陈炯明回省。5月6日，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24日，致电陈炯明的部属叶举等，告以对陈，“始终动以至诚”。29日，任命陈“办理两广军务”。函中所称：“孙公亦披诚相结”，指此。同函中，何天炯表示，他对时局，“再抱一积极奋斗之愿”，准备在两广盐务或广东财政方面，担任一项职务。他要宫崎向日本资本家运动借款时，说明粤中情况，打消顾虑。

也许是何天炯不了解情况，也许是他为了争取日本资本家投资而有意隐瞒。事实是，陈炯明并没有“觉悟”，而是在本函发出的半个月之后，就发动了叛乱。它碾碎了孙中山的北伐梦，也碾碎了何天炯“积极奋斗”的愿望。不久，何天炯“携眷归里，养亲读书”①。同年12月6日，宫崎滔天逝世。

何天炯的隐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次年，何天炯出任大本营参议。1925年，再次被孙中山派赴日本。不久，孙中山逝世，何天炯“顿触山颓梁坏之感”②，同年病逝。

综观何天炯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中间，因观点分歧而对孙中山持激烈批评态度；最后，抛弃嫌隙，分歧消融，再次共同奋斗。这一过程，表现了何天炯对孙中山认识的深化，也表现了孙中山思想作风的改进和提高。如果说，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处事有时不免失之于片面和偏激，那末，到了广州时期，历经磨练之后，就日益恢宏大度了。革命同志之间，贵在能顾全大局，在坚持革命的长途中消融矛盾，共同提高。这一方面，何天炯与孙中山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①② 《何天炯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十四，726。

# 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一生始终重视革命政党的建设，多次进行改组。其中，获得成功的只有1924年前后的一次。这一时期，国民党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认真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 伟大的决策

1922年至1923年之间，孙中山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策，这就是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它是孙中山历尽辛酸、失败之后得出的结论，表现了他不断探求，敢于改革的巨大勇气和魄力。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依旧，孙中山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坚持奋斗。继讨袁之后，又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是，两次护法先后失败。1922年8月，他更被陈炯明赶出广东，经历了一次生平从未有过的惨酷失败。他回顾多年来走过的道路，痛苦地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① 他日益明确地感到，不仅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靠不住，唐继尧之流打着护法旗号的军阀靠不住，而且，陈炯明一类国民党人也靠不住。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孙中山懂得建设革命政党的重要。他说："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②"要以革

①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537页。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321页。

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1]为此，他在1914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希望由此出现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纪律严明的党，但是，事与愿违，孙中山的这一目的始终未能达到。他多次指出，民国以后，国民党混进了许多官僚、政客，大多数党员以入党做官为终南捷径，处处暮气很深，而且组织松散。他痛心地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2]必须抛弃以往的改组方针，另觅新途。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国际、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孙中山就密切注视俄国的状况。1918年夏，他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俄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同时希望两党"团结共同斗争"。[3]1921年12月，他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马林向他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系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1922年8月，他又在上海会见共产党人李大钊，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4]。这时，孙中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人"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感到在斗争中可以依靠他们，并且感到了"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5]于是，他作出决策，采纳共产国际意见，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增加新成分。此后，随着他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的奋斗。……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6]这样，他就又作出了一个决策，这就是以俄为师，学习俄

---

①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演讲，丙第10—11页。
② 《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③ И. Ермашев: Сунъ Ят-сен, Москва, 1964, p.211
④ 《李大钊狱中自述》。
⑤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宋庆龄选集》，第461、465页。
⑥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第546页。

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历史是伟大的教员。孙中山察乎往，观乎今，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适于时势，合乎潮流的伟大决策，这就使长期陷于困境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出现生机，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 改组的实施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医学上有所谓沉疴顿起的例子，政治舞台上也有突现异彩的情况。当孙中山将他的改组决策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国民党的面貌就迅速改观了。

就在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之后不久，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接受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他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① 接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相继成为国民党员。孙中山并不要求他们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相反，却同意他们保持双重党籍，共同工作，这就说明，这是一种特定的两党合作形式。

接受李大钊等入党可以看作国共合作的起点。此后，孙中山在各种改组活动中都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同时努力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

1922 年 9 月，孙中山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员 53 人座谈，讨论改进国民党党务。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并在会后被指定为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 年 1 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党纲》、《总章》。同月，孙中山重新确定中央干部，陈独秀被任命为参议，林祖涵被任命为总务部副部长。这以后，孙中山先后和越飞、马林等会谈，向苏联派出了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的代表团。10 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 14 号。

州，孙中山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鲍罗廷根据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向孙中山提出了修改党纲，制定党章，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组织方法”等方面的意见，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①]随即，孙中山聘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的到来加快了改组工作的进度。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5天后，委托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制定改组规划，同时成立有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改组工作。特别会议上，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和章程草案作了报告。会后，发表《改组宣言》，广州地区的党员登记工作开始进行。1924年1月，以改组为主要议题的国民党“一大”召开，这是国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参加了大会，李大钊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完成了下列任务：

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要政策。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它缺乏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革命需要。“一大”通过的宣言指出：民族主义实为“健全的反帝国主义”，其意义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指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和近世作为资产阶级压迫工具的民权制度不同。至于民生主义，除重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原则外，特别提到了国家给予农民土地和改良工人生活问题。宣言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因此，必须全力帮助农工运动的开展。上述内容，构成了新时期三民主义的“真释”。孙中山也特别满意，认为“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发表此项宣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鲍罗廷在广州各区分部组织员与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国民党周刊》第1期。

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① 在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问题上，会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方瑞麟等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案，借此阻挠两党合作。为此，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人发表了光明磊落的声明，廖仲恺则鲜明地表示："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党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② 经过辩论，会议否定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

二、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胡汉民说："大会认为，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③ 即：每个党员都有权利参与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选举各级执行机关，同时也有遵守决议、服从命令的义务。根据上述原则制定的党章，以各级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以区分部作为基层组织，依次而上，分别为区、县、省以至中央的执行委员会。在中央，于保留总理制的同时，实行委员制。此外，专章规定了纪律和在群众团体中组织"国民党党团"的条例。上述组织原则和党章显然吸受了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关于此，孙中山说："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示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④ 在国民党建党史上，或涣散松垮，或个人集权，两无一当。这个矛盾，在"一大"上很好地解决了。

三、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了较前健全的领导机构。其中，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人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执委、监委会议上，第一次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等部，谭平山、林祖涵分任组织和农民部长。

"一大"的召开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

---

① 《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孙中山选集》，第 595 页。
②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④ 《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 607 页。

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一大”以后，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下，各地改组工作迅速展开，大批工人、农民和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入党。以广东为例，截至1926年12月为止，党员人数发展至15万8千余人，其中农民6万4千余人，工人3万2千6百余人，学界3万4千4百余人。① 这就大大改变了国民党原来的阶级基础，壮大了它的力量。1923年11月，临时中央委员会曾经预言：“代表大会之结果，可使全党回复少年状态。苟全党改组完满，必能成为一强有力之党，足以指挥群众，共争胜利。”②这一预言是正确的。

## 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共合作

漫长的人类历史表明，任何重大的改革或前进都会碰到阻挠。在一段时期内，这种阻挠还可能颇具声势。伟大政治家的可贵之处在于：看准历史趋向之后，能够一任反对者的汹汹与哓哓，不受干扰，巍然屹立，始终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孙中山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还在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上书孙中山，以指责陈独秀为名，攻击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别有怀抱”，“谋毁吾党，其计甚毒”，理由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纲草案中列入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两条，目的是使国民党失去国际和国内“实力派”的同情，孤立无援。孙中山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件上作了批示，明确指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③ 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发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② 《敬告军人》，《国民党周刊》第1期。
③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1—308页。

表《致海内外同志训词》，阐明国民党改组原因和"一大"的基本精神，谴责造谣生事者所散布的种种谰言，"非出诸敌人之破坏，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训词》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可以使国民党"获得新机"，"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孙中山并表示，要和共产党人长期合作，"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4年6月18日，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攻击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此案，决议请孙中山召开会议讨论。随后发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② 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会上，张继、覃振等人公然反对共产党人"跨党"，鼓吹和共产党"分家"。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和郑重的研究，否定了张继等人的意见，通过了由孙中山裁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重申国共合作的必要。《训令》指出：当时中国环境险恶，情势危急，一切革命力量"其责任至重，其需要共同努力亦至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诚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但休戚相关，抑亦生死与共，至诚结合，始终无间"。《训令》特别指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并不抛弃共产主义，但也不要求它在中国立即实现，因此，和国民党的主义并不冲突；共产党员的跨党和民国初年各党党员之间的跨党"异其旨趣"；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的主义也并不违背。《训令》要求加强团结，消除分歧，自此不再因"共产派"问题而发生矛盾。③

---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30期。
③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在维护国共合作上，孙中山的意志坚如磐石。当右派一次次掀起“分共”暗潮时，孙中山甚至激愤地表示，要解散国民党，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①正是由于孙中山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才得以维系一段时期，从而保证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

# 余　论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合作以及改组国民党的决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一支懂得主义，愿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的党军正在筹建，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学生等阶级、阶层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一时间，中国大地充满了希望。对于这种情况，蒋介石在1925年末曾经正确指出：“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俱在。”②当时，西山会议派正在起劲地叫嚷“分共”，蒋介石驳斥道：“关于共产党之问题，若辈所以主张排除，不外两种理由。第一，谓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之三民主义根本冲突，故共产党在本党之内，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产党之加入本党，为总理所特许，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果使两种主义根本不能相容，以总理之明，与第一次全国代表之忠于本党，宁肯贸然决定以贻本党之危害？且总理已明言，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矣。故第一说决非总理之意。此在若辈亦未始不知。于是有第二说，谓总理之特许共产党加入，乃欲共产党完全化合于本党，而非本党为共产党所同化，今则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之危险。然总理果若是褊小耶？三民主义又果如是之易于撼动耶？此说之诬总

①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宋庆龄选集》，第467页。
② 《为西山会议告同志》，《政治周报》第4期。

理，诬本党，盖视第一说尤甚。”①应该承认，这些话讲得很透辟，很有道理。

黄河九曲，历史也复杂而多变。众所周知，由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合作大业在1927年春天破裂了。今天，事隔多年，当我们聚会在这里纪念国民党建党九十周年，讨论中国的前途时，我觉得有必要重温孙中山1924年的一段教导：“凡我党员，当知所负革命之重大与同志之感情团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期努力于将来，以完成革命工作。”②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国共合作是适于时势，顺乎潮流的伟大决策，“群力”强于“孤力”③，两党合作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国共两党能够弃嫌修好，实现第三次合作，那将是中华民族之福，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十分美好而璀灿的。

（原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附记]1984年12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发起召开学术讨论会，题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前途》（纪念中国国民党成立九十周年），邀请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参加。本文为赴会而作（后此会因故未能召开）。

① 《为西山会议告同志》，《政治周报》第4期。

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③ 《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第562页。

# 中山舰事件之谜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本文拟探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过程，以进一步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 一、"三·二〇"之前蒋介石的心理状态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多次谈到有关经过，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①现在，该是对这桩公案彻底清理的时候了。下面，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蒋介石这一时期的部分日记及有关信件、资料，对它进行一次考察。

根据日记、信件等资料，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先是表现在北伐问题上，后又表现在黄埔军校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增减问题上。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北伐。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②。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

---

① 《黄埔潮》第2期。

② 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毛思诚的分类摘钞本，一部分经修改后收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一部分未刊，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①。两天后，他在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又声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②。季山嘉反对蒋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张。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从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知其梗概。该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份，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份。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③文件未署名，但季山嘉身为顾问团团长，报告显然代表了他的意见。据此可知，季山嘉和顾问们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北伐应该从缓。然而，蒋介石容不得反对意见，二人的裂痕由此肇端。

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还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1.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2.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④。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1月20日日记云："往访季山嘉将军，商运兵往天津援助事。"28日日记又云："往访季山嘉顾问，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进行。余实决心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③ Document 22,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6, P.246。

④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据，其发展效力必大于南方十倍也。"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7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①。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从有关资料看，季山嘉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说："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季山嘉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曾于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等俄国同志，若非十二分信服蒋校长，则我等断不致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十二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若蒋校长以为照此即是倾信不专，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矣。"②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的直接反应是，决定辞去一切军职。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11日日记提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并云："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13日，日记中突然有了准备赴俄的记载："如求进步，必须积极，否则往莫斯科一游，观察苏联情况，以资借镜。"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第

①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稿本，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②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8日。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开始准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二大未就北伐问题作出任何决定。2月8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诚恳之态度，令铭十分感动”，要蒋介石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①。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则一再挽留，2月9日函云：“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因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②12日再致一函云：“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③14日，汪精卫并亲访蒋介石，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劝他打销辞意④。但是，蒋介石毫不动心。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当日日记云：“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共，劬劳讫（？）可小休。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同日，季山嘉到蒋介石寓所访问，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反应，于日记中写下了“状似不安”四字。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随后又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他认为广东有六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第八军。但是，现在却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必然是季

① 《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8日。
② 《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9日。
③ 《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12日。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

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军长①。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当日日记云："此人（指王——笔者）狡悍恶劣，唯利是视"，"其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次日，将王押送赴沪。

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王部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蒋介石驱王之后，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兢，至此稍获安定，然而险危极矣。"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又称："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下午，季山嘉在和汪精卫议事时，表示将辞去顾问职务。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称："不知其尚有何作用也？"

尽管蒋介石在驱除王懋功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仍然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月5日日记云："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反蒋"运动，这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危险感，觉得有人在陷害他，企图把他搞掉。3月10日日记云："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矣。"这时，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更形尖锐，以致于公然"反脸"②。12日，季山嘉和他讨论北伐问题，他居然"力辟其谬妄"③。蒋介石曾同意季山嘉由海路运兵往天津的计划，此时却认为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与孙中山的"北伐"之志完全"相反"④。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更认为是心怀叵

①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参见《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0—42页。

②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③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

测，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①。"赴俄休养"本来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而当汪精卫为了缓解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这一要求，催其"速行"②时，蒋介石却又恐惧起来。3月14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谈话后，在日记中写道："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3月15日日记云："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垓心〔下〕，天下事不可为矣！"这一时期，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③，就使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 二、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事件的开始是这样的："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饬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④孔主任，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赵科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⑤。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

①②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③ 蒋介石对曾扩情等人口述。见曾扩情：《蒋介石盗取政权和蓄谋反共的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陈肇英：《八十自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8月20日，台北版。

④ 《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各原件，均同。

⑤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2日、19日。

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 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他事后的陈述是：“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① 欧阳股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只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②。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③。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

① 《交通股王学臣报告》，原件，1926年3月26日。

② 《欧阳钟报告》，原件，1926年3月23日。

③ 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①。同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②。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口。7时，中山舰出口。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此函现存，内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③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略称：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命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④。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河否？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查团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省⑤。

中山舰的调动经过大体如上。这一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

① 《李之龙夫人报告》，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② 《季方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③ 《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海军局函》。
④ 《黄珍吾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⑤ 《李之龙供词》，原件。

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2. 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3. 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他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①，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欧阳钟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②。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 三、蒋介石的最初反应和“三·二〇”之后的日记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九点、十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

① 《欧阳钟报告》；又《欧阳钟供词》，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② 季方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回忆说：“在那年3月18日夜晚，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轮，于虎门驶过来遭到水盗的劫持后，即驶来军校要求缉查保护。当时由管理处（军校的后勤机构）的欧阳格（科长级干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校长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要调两艘炮舰到黄埔军校来。”见《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这里所说的管理处的科长级干部欧阳格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的误记。此点笔者曾函询季方同志，蒙季方同志之女季明相告，可以订正。

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① 当日，蒋介石有这样一段日记：“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提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在判断所谓“摆布陷我”的阴谋之后，最初的反应是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的这一段记载，证以陈肇英、陈立夫、王柏龄等人的回忆，当是事实。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②，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

---

① 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5—46页。

② 此说误，当时朱德尚在莫斯科。

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①。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②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③。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④陈肇英和陈立夫的回忆在回汕头或去上海上虽有差异，但在蒋介石一度准备离开广州这一点上却和蒋介石的日记完全一致。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确实相信有一个"摆布"、"陷害"他的阴谋，否则，他是不必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演出这一场戏的。

关于此，还可以在蒋介石"三·二〇"之后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明。

20日晨，根据蒋介石命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卫队枪械被缴。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⑤。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日记云："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

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

---

①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②④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75页，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湾《传记文学》第41卷，第8期。

③ 文心玨：《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作者在"三·二〇"事件后，曾亲自听陈立夫讲述有关经过。

⑤ 《时报》，1926年3月30日。

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①。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知去向。25日，蒋介石日记云："4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余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呜呼！是何居心欤！"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确实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② 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卫于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③。但蒋介

---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② 《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6页。

③ 陈璧君：《致介兄同志书》，原件，1926年4月1日。

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呈子，自请处分外，并无什么象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① 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 抑兄早为人间乎? 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 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② 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 据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③。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④。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⑤。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

① 《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② 《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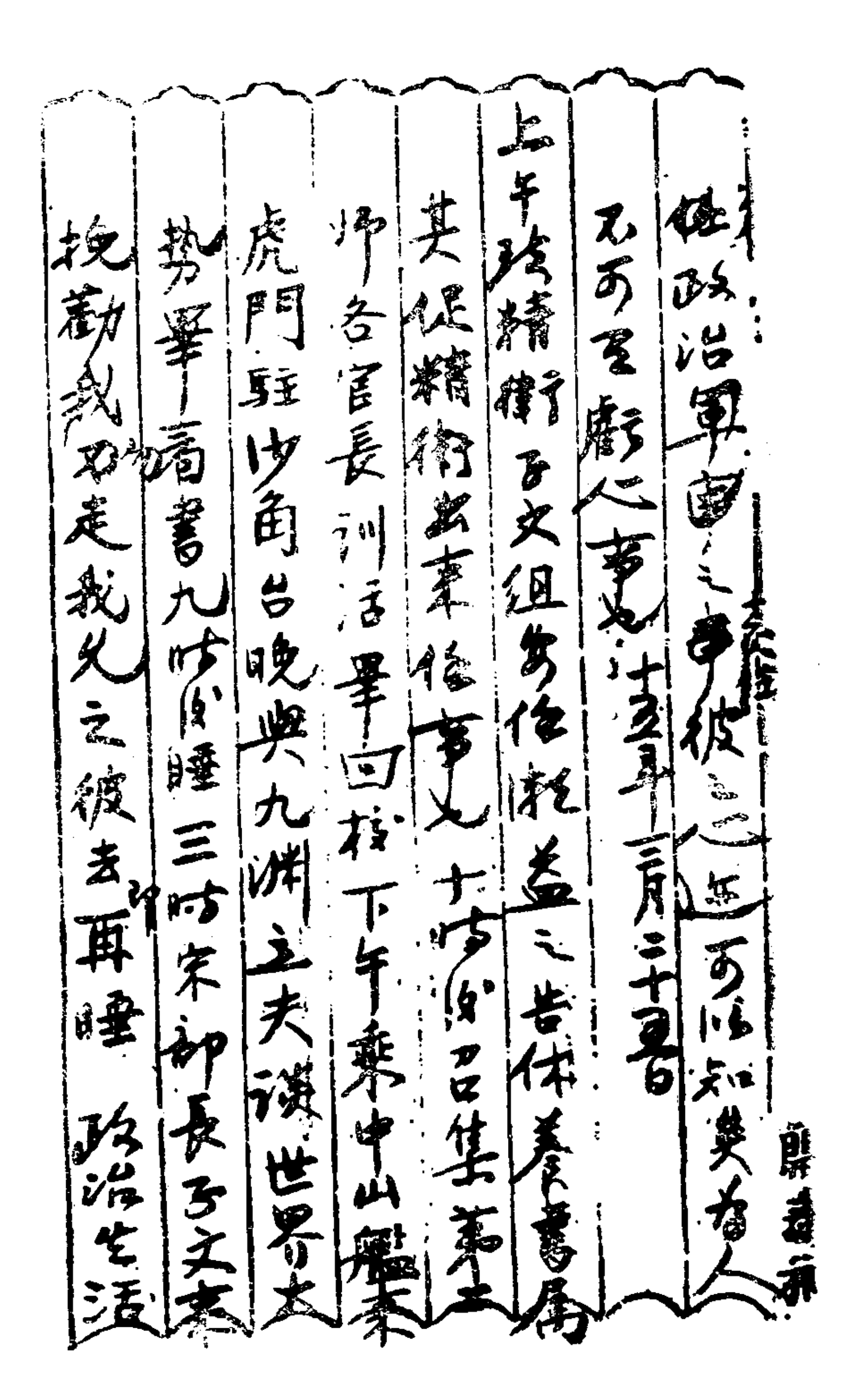
③ 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10月1日出版，发表时署名浮海。

④ 《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⑤ 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98页。

图二十八 蒋介石日记（毛

（采自中国第二


政治軍閥之爭彼之一無可恃知與有人
不可思議之事也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午張靜江子文組安任潮益之告休養書屬
其促精衛出來任事也十時召集第二
師各官長訓話畢回校下午乘中山艦來
虎門駐沙角台晚與九洲之夫談世界大
勢畢二高書九時後睡三時宋部長子文來
挽勸我不走我久之彼去再睡　政治生活

思诚分类摘录本）之一
历史档案馆）

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 四、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

据陈公博说，邹鲁在1930年曾告诉他：当时，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方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经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介石即自信判断不错。他更提出第三步试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日之变的真相”①。

这段记载说明了伍朝枢在挑起蒋介石疑惧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陈公博没有捏造邹鲁谈话的必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他材料加以验证。

1．这一段话的核心是蒋介石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

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

或"赶他"，以自请"赴俄休养"作试探，得到汪精卫同意，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怀疑。此点和前引蒋介石日记大体一致。

2. 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从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的不和谐，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卫的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要秘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①。陈孚木的这一段记载认定伍朝枢是编造谣言的主要人物，谣言的核心情节是利用俄船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陈并将这一谣言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凡此种种，均可与邹鲁对陈公博所述相印证。陈孚木当时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曾任《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他看过中山舰事件制造者欧阳格1927年写的有关回忆稿②，所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 1926年4月1日，柳亚子致柳无忌函云："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李之龙是一个共产派的军人（属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而蒋部下很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在那里捣鬼，他们制造一个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一方面对蒋说，李要请你到莫斯科去了，蒋大怒，即下令捕李。"柳亚子所述的核心情节是，有人造谣，以李之龙将劫蒋"去莫斯科"，煽动蒋介石反共，此点和邹鲁、陈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各方

① 《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

② 据陈孚木叙述，欧阳格的回忆写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想乘"清党"之机出版表功，曾请陈看过。后来送呈蒋介石，蒋约略一翻阅，脸色一沉，骂他道："吓！你懂什么？有许多问题你哪里知道，这种小册子可以出版的吗？把稿子留下来！"说着把稿本向抽屉内一丢，硬把这稿子没收了。见《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

面交游颇广，他的这一段话不会没有来历。同函中，柳亚子又说："在两星期前，沈玄庐（定一）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所以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的。"① 沈定一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上海。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枢"玩的小把戏"，是不会作出"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的判断的。6月4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也说："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② 这些材料，都可以反证陈孚木所述：伍朝枢曾将他编造的故事，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

4. 邓演达曾告诉季方，蒋介石之所以"仓皇失措"，是因为"得到密报"："共产党利用其海军局长李之龙的关系，将中山舰露械升火，与黄埔邓演达联合行动，图谋不轨。"③ 此说虽未提到伍朝枢，但在指出蒋介石"得到密报"这一点上，仍有可资参证之处。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广州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④；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

① 《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②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周报》第155期。

③ 季方：《白首忆当年》，《纵横》，1985年第2期。原文未说明消息来源，承季明同志相告，系季方直接得之邓演达者。当时，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们确曾企图将邓演达牵连在内。季方回忆说，3月20日晚，新任中山舰舰长欧阳格曾将中山舰开到黄埔，要求邓到舰上去商议要事。季方、严重、张治中等怕有阴谋，劝邓不要上当，邓因此托故未去（见上文）。关于此，陈肇英回忆说：当时曾由他和欧阳格"具函请军校的重要共产党分子来舰谈话，而后予以扣押或驱逐出校"。见其所著《八十自述》。

④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印发；参见《邹鲁、胡毅生秘密到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6日。

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邹鲁把中山舰事件完全说成是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功劳”也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柳亚子、陈独秀所指出的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作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李之龙说：“这种组织（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笔者）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遂与西山会议派结合，遂受其利用而扩大为倒汪、排共、仇俄之阴谋。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①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②。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又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③ 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④。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

---

① 《汪主席被迫离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
②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③ 马文车：《中山舰事件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陈孚木写道："那时伍朝枢所说的俄国商船已经到达，起卸军械之后，停在黄埔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① 章臣桐写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之侄)，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所谓得力的兵舰，即暗指中山舰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龙命令，上舰升火试笛之后，"欧阳格就在蒋的面前报告说：'中山舰已出动，正在开往黄埔，听说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② 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也有类似回忆。他说："三月十八日欧阳格侦知中山舰上发生混乱，戒备不严，有机可乘，密令欧阳钟伪称接到校本部电话，通知海军局立派一艘得力军舰，驶往黄埔听用。据说十九日上午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向蒋介石控告，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③。这就很清楚了：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④ 这不啻是自我招供。

---

① 《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

② 《中山舰事件》，《上海文史资料》第8辑。

③ 《中山舰事件亲历记》，《上海文史资料》第19辑，关于欧阳格谎报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一事，还可以从蒋介石当时的活动中得到佐证，据民生舰舰长舒宗鎏及黄埔军校军械处长邓士章回忆，3月19日(原文误记为3月18日)，他们曾接到"紧急通知"，要把黄埔库存的军火迅速装上民生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支，俄式重机关枪二百挺，装好后停泊于新洲海面。事后，蒋介石并登舰检查，对舒宗鎏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把军火交给任何人。"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如果没有欧阳格的谎报，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将军火搬来搬去，折腾一气的。

④ 《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卷第8期。

## 五、偶然中的必然

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10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千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向苏俄驻华使馆报告说:“总参谋部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组织。罗加乔夫,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又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我们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该报告又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订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

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①。

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③。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④。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⑤。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⑥。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继季山嘉之后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中心而已"⑦。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⑧。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曾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⑨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

---

① Document 22,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 PP.245—247.

②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2页。

③④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2—83、85页。

⑤⑥ 《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465、471页。

⑦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4日。

⑧ 王懋功：《致张静江书》，原件，1926年8月7日。

⑨ 转引自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俄人鲍罗廷操纵一切”，“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季新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云：“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中山舰事件之后

本文是拙作《中山舰事件之谜》的续篇。

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既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在制订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中共中央起了何种作用？凡此等等，史学界都还不完全清楚。本文将企图回答这些问题。

## 一、"反蒋联盟"的流产与汪精卫负气出走

1926年6月3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代理武官谢福林(Сейфулин)①有一份写给莫斯科的报告，汇报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广州形势。该报告一开始就说明，它以鲍罗廷同年5月底的一份报告为基础，因此，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该报告在叙述蒋介石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后说：

> 这样，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1.接受蒋的要求，以避免一场灾难，否则，它将必然来到。2.采取类似汪精卫在三·二〇期间为应付局势，而已为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措施，即组成反蒋联盟，依靠联盟的压力，迫使蒋不屈服于国民党中反共派的要求。(古比雪夫同志支持这一理论。)

据此可知，"三·二〇"期间，汪精卫曾组成反蒋联盟，企图采取措施，对蒋施加压力。汪精卫的这一做法得到苏联顾问古比雪夫

① 谢福林，真名阿利别尔特·拉宾(Альберт Лапин)，1916年参加俄国共产党，1917年—1921年参加红军，其后毕业于军事学院。1925年来华，先后在张家口、开封两地的冯玉祥军中任顾问。1926年4月调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代理武官。

（按即季山嘉）的支持，但遭到“我们”——苏方的反对，被认为“不适当”。

该报告又说：

> 许多人相信，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并不能促使右派转变，蒋将被迫反对右派。例如，鲍罗廷发现，尽管蒋知道汪在“三·二〇”及其后参加了反蒋联盟，但他仍然能使蒋相信，有必要让汪参加5月29日的会议，讨论北伐问题。汪已去巴黎的说法纯系谣传。①

这里，再次提到“反蒋联盟”，并明确指出，蒋知道这一事实。看来，研究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历史，首先要揭示“反蒋联盟”的真相。

在“三·二〇”事件期间，蒋介石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等做法引起了普遍不满；作为党政军领袖的汪精卫更为愤慨。据陈公博回忆，20日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二人见汪，汪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并称：“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②当时，谭、朱决定见蒋，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和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提这一问题，说明他有了调动军队的念头。③

谭延闿、朱培德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据谢华回忆，谭曾经说了下面一段话：

> 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④

---

① Document 52,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Harvard Press, 1989, pp.718—719.

②③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7—38页。

④ 《大革命的一点经历》，《谢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谭的原话未必是这样说的，但谢华当时是谭部政治工作人员，此段话必有一定根据。综合考察谭延闿当时的态度，他对蒋提出质问是可能的。

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苏联顾问团并得知，汪精卫虽正抱病昏卧，但也称蒋的举动为“反革命”。顾问团的印象是：“全体皆对蒋表示反对。”①

谭延闿、朱培德提议的“严厉反蒋之法”，有关文献没有说明内容，但是，在蒋介石已经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只能是以武力对付武力。据亲历者的回忆，谭延闿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②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③。还有人回忆，听说汪精卫当时曾主张，“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④谭延闿处事一向以沉稳圆滑著称，他跑到苏联顾问团去提议“严厉反蒋之法”，并准备去韶关调兵，如果不是出于汪精卫的授意或同意，这是不能想象的。

3月20日这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并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⑤。有关资料说明，

①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4页。

②④ 方鼎英：《补叙中山舰事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文心琟：《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③ 《关于1924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⑤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反击蒋介石的主张①。谭延闿此举，也可能出于汪精卫的授意或同意。

至此，谢福林报告所称汪精卫组织的“反蒋联盟”的轮廓就大体清晰了——它是在蒋介石已经动作的情况下，为“应付局势”，企图联络第二、第三、第四等军的力量(也许还包括共产党人)，进行反击。

然而，“反蒋联盟”很快就胎死腹中。尽管专车已经备就，谭延闿却突然中止了韶关之行。

21日傍晚，蒋介石以探病为名访问汪精卫，只见汪“怒气勃勃，感情冲动，不可一世。”②但是，23日，汪精卫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迁地就医”，不知所去。

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苏方认为汪精卫的“反蒋联盟”及其措施“不适当”，主张并实行妥协、退让。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是，他对于用兵和与蒋介石破裂都还有顾虑，而且，当时在广州，有比季山嘉地位更高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在。

20日下午，蒋介石根据季山嘉的要求，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鄂利金(Ольгин)③去蒋介石处。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④。这以后，布勃诺夫亲自出马，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商谈以后问题。蒋提出俄国顾问“许多错误”⑤，应允次日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介石坚持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⑥。当日，苏方在广州人员会议，认为情势严重，决定撤去

①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3月21日，未刊稿。

③ 鄂利金，真名拉兹贡(И.Я.Разгон)，来华之前曾任军事学院副院长。

④⑤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4页。

⑥ 《关于斯切潘诺夫报告之问题及批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40页。

季山嘉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蒋答：对人。索洛维也夫称：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加乔夫各重要顾问回国①。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索洛维也夫列席。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作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已无可奈何。因此，会议决定：1.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2.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3.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②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就得到了承认，政治上又赢了一个回合。会后，汪精卫就隐匿不见，失踪了。

王若飞在作党史报告时曾经指出过："三·二〇"事件后否定反击蒋介石计划的是布勃诺夫③；显然，主持苏方人员会议，决定撤换季山嘉、罗加乔夫等重要顾问职务并令其回国的也只能是布勃诺夫。他于当年2月率领考察团来到中国，负责调查并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显然只有他，才能作出上述重大决定。

汪精卫当时以苏联为靠山，和季山嘉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击，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如何不生气？失去靠山，他就无所作为。于是，先之以决定隐匿，继之以决定出走。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他于5月9日已经离开广州，转赴法国，但鲍罗廷对此却毫无所知，还在期望争取他和蒋介石一起会谈，讨论北伐问题。这只能说明，他对苏方既失望，又愤懑，心头有一口难平之气，因此，不告而别了。

---

①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一，第83页。罗加乔夫（В.П.Рогач,1921年来华，1925年7月任参谋团主任。同时决定调回苏联的还有拉兹贡。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录»。

③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1页。

## 二、苏方的妥协逻辑及其“利用蒋介石”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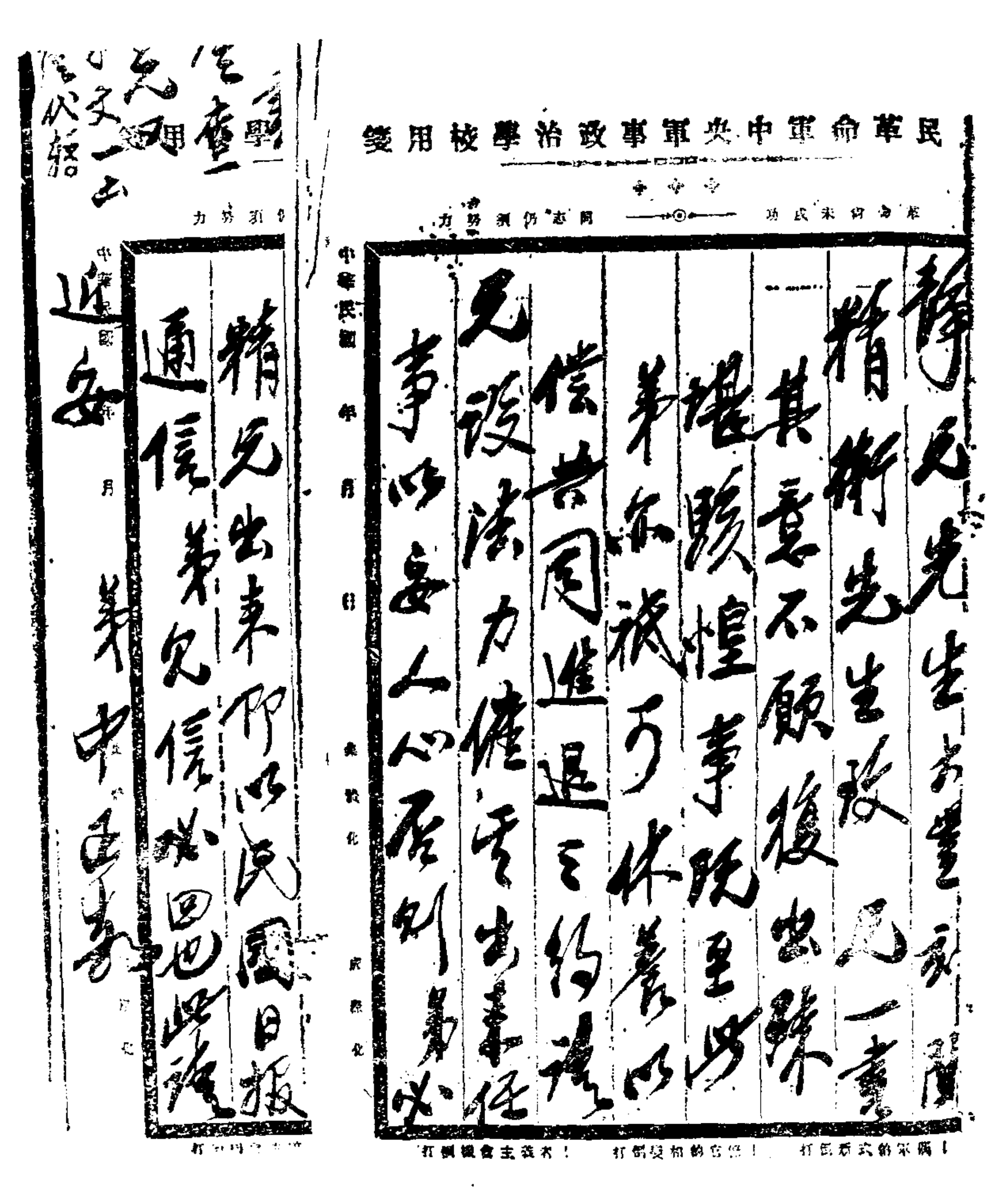
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有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三·二〇”事件是由“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这表现在：1.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及其在军队中的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3.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重大的冒进做法。4.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5.将领们受到过分的监督。他说：“中国将军们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① 他提出，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任何过火行为都将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复活军阀主义、加剧左右翼矛盾等严重后果，从而激起反共浪潮。

不能认为布勃诺夫的分析完全没有道理。苏联顾问们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缺点。例如，顾问们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以至于国民党一概视为自己的“政治领导”之下的组织，经常包办代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工作。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加伦、罗加乔夫、切列潘诺夫、斯切潘诺夫、列米等顾问召开军事会议，除决定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顾问外，居然决定由顾问直接出任军职。例如，由罗加乔夫任军务处长兼总参谋长，由切列萨多夫任军务处副处长兼副总参谋长，楚巴廖瓦任军务处通信调查部主任，郭密任总司令部政务处处长，马玛也夫任军务处情报科科长等②。顾问团的一份报告说：

参谋团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②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卷首影印俄文原件及中译件。




图二十九　蒋介石致张静江书手迹（1926年，局部）
（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长助理，按，指罗加乔夫——笔者）的正式位置是总参谋长顾问，但他实际上担任总参谋长……当时下列部门从属于参谋团：作战与情报局(包括通讯服务)、管理与检查局、军需局、海军局……我们作为指导者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长的顾问，但事实上是这些部门的头头。12月末，我们甚至占有海军局局长（按，指斯米诺夫）和航空局长（按，指列米）的官方位置。不过，一有机会，他们必须再次成为顾问。因为我们作为指导者占有官方位置政治上不方便，再次成为顾问不会丝毫有损于我们的影响。①

显然，越俎代庖，或顾问权势过大都会引起国民党人，特别是军官们的反感。

1925年11月1日，季山嘉代替加伦出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作风、性格和鲍罗廷、加伦都有明显的不同。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致力于加强军队的集中管理。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

接替加伦任南方政府总顾问的季山嘉（古比雪夫）就比较直来直去，他错误地认为，南方军队中的转折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该是转向严格集中，并使军队具有明确任务、划一组织和统一纪律，服从于中央军事机构的时候了。②

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季山嘉的做法本无可非议，但是，急于求成，方式简单粗暴也必将引起国民党人和军官的反感。在这一过程中，和力图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必将加剧。王若飞说：季山嘉“不以同志态度对待国民党，以自己为统帅，引起了国民党很多不满”③，指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

① Document 26,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p.602—603

②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06页。

③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112页。

纠正缺点、错误以及某些急躁、冒进的做法都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为，主要是为了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打击汪精卫，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布勃诺夫看不到这一点，其决策的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季山嘉被撤职后，于3月24日随同布勃诺夫等一起回国，接替他的职务的是斯切潘诺夫，蒋介石称之为史顾问。①

“史顾问”同意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分析，但他又增加了两条：1.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在军队中的激烈宣传不尽适当。2.中国共产党在党务及军队宣传中，“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鲜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②。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3月23日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理由，自请从严处分。4月2日，拘留在事件中起了恶劣作用的欧阳格③。这些，又使得斯切潘诺夫感到，蒋介石“似又略向左派演进”④。他对蒋介石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又认为蒋“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⑤。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1.对蒋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2.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⑥，其具体位置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说：“就喜欢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⑦为此，他指示顾问们要“处处迎合其意，与以让步”⑧。

---

① 斯切潘诺夫(B.A.Степано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4年10月来华，在黄埔军校工作，曾任蒋介石及第一军顾问，参加过两次东征之役。

②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5—36页。

③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4月2日)云：“静江、子文兄来谈，适值欧阳格舰队司令被拘留，以欧阳联合右派，不利于其党也。”

④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8页。

⑤⑥⑦⑧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8页。

在对中共的批评上，尼洛夫①比斯切潘诺夫更为激烈。他说："当初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公然攫取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②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召开国共两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规定相互工作的程序；在现时，应先开预备会，"以安慰蒋介石为最近之目的"。他并提出，将共产党全体名单送交各高级长官，共产党在军队中完全公开③。

布勃诺夫的妥协、退让还只涉及苏联顾问，而斯切潘诺夫等人的妥协、退让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后来陈独秀提出，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显然受到斯切潘诺夫等人意见的影响。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一种愚蠢的权术。

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闿、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们感到，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④；中山舰事件之后，联共(布)中央

---

① 尼洛夫，真名萨赫洛夫斯基(Сахновский)，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4年来华，先后在第四军及第一军中任顾问。1926年曾北上向布勃诺夫考察团报告。

②③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40—41页。

④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决定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1]；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前夕，斯大林还主张对蒋介石“利用到底”[2]。显然，布勃诺夫、斯切潘诺夫及其后的鲍罗廷都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 三、中共中央试图改变对蒋策略与鲍罗廷的否决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们是晴天霹雳，对在上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来说，也同样如此。

中共中央曾企图从莫斯科得到指导，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在归国途中经过上海。这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4月3日，《向导》所发表的伊文诺夫斯基对该刊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就是布勃诺夫对中共中央的谈话。自然，在他的影响下，只能根据既定方针依样画葫芦。同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3]。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反映出中共中央当时对形势的认识与对策。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又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4]。张国焘到广州后，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

① 格鲁宁：《论三·二〇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转引自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史》，上海向导书局，1947年版，第84页。

③ 《中国革命势力的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5页。

略。斯切潘诺夫在报告中曾说："关于蒋介石之个性，余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会长等观察略同。"又说："中国共产党亦同具此眼光，而完全赞成此种根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谓彼离去上海之前，中央委员会亦有此种决议，以为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① 这里所说的从上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会长"或"主席"，当均指张国焘。

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②。中共中央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以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两种选择之一："采取类似汪精卫在三·二〇期间为应付局势，而已为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措施，即组成反蒋联盟，依靠联盟的压力，迫使蒋不屈服于国民党中反共派的要求"云云，显指中共中央的这一新的政策。

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

1926年2月，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离开中国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取消返国计划，经张家口、库伦，转道海参威，在那里和自莫斯科

①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8页。

② 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前卫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参见《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屋版，第72页。

来的胡汉民等会合，于4月29日一起回到广州。

鲍罗廷回到广州之后，即面临着所谓“右派政变”问题。

据谢福林向莫斯科的报告：三·二〇之后，右派认为蒋介石向右转了，企图靠近蒋。但是，在4月20日蒋解除了吴铁城的职务之后，右派认为，蒋不可能投入自己的怀抱，因此，开始接近李济深和其他各色广州将军们。李济深曾有可能被争取过去，但在胡汉民回国之后，右派便将胡看作自己的头目和组织者。报告说：

> 右派利用汪精卫不在的机会，没有通知国民政府，计划为胡汉民的到来举行精心安排的庆祝典礼，向其致敬。他们甚至准备为他建立一座凯旋门，并且举行示威以支持胡汉民成为政府首领。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宣言，同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他的报告和宣言表明，他不想和我们合作。他秘密地会见了伍朝枢、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和其他反动派，并且使李济深、陈铭枢和其他广州将军们站到自己一边。他告诉蒋，鲍罗廷将开始解决三·二〇事件，怂恿蒋逮捕鲍罗廷，试图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①

谢福林的报告并称：右派正在散布共产党即将“共产”的谣言，并且正在煽动银行家和商人罢市，结果，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极大地扰乱了政府的财政。报告特别提到，5月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分别组织示威，孙文主义学会的潘佑强和杨引之被打得半死。最后，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成员。5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谢福林的报告系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写成，显然，上述内容反映的是鲍罗廷对广州形势的了解和分析。

鲍罗廷回到广州之际，蒋介石颇为惴惴，担心在汪精卫问题

①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p.717—718.

上产生“纠葛”,[1] 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之点”[2]。但是，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就迅速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他对彭述之说：“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象法兰西大革命中的罗贝斯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3] 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象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接受蒋的要求，以避免一场灾难”，与鲍罗廷对彭述之所说的话，精神完全一致。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也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时在广州的赵世炎表示：“我们应当信任鲍罗廷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实行。”[4] 随后，鲍罗廷指示陈延年召开干部特别会议。会上，鲍罗廷一再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必要，为了合作，必须向蒋介石妥协。会议在没有进行讨论的情况下表决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5]。三年以后，陈独秀回忆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6]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4月26日。
② 同上，1926年4月30日。
③ 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8页。
④⑤ 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9—10页。
⑥ 《告全党同志书》。

以上所云，应是事实。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 四、"党务整理案"的通过与蒋介石掌握最高权力

从5月12日起，蒋介石即与鲍罗廷商谈"党务整理办法"。鲍罗廷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都接受了[①]。14日，蒋对鲍说："对共产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此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这段话，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际上认为孙中山的"容共"将导致国民党"亡党"。对于这一段本应反驳的话，鲍罗廷"默然"[②]。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会上，委员们"相顾惊惶"，蒋介石也自觉"言之太过，终日不安，精神恍惚异常"[③]。16日，蒋介石再晤鲍罗廷，声称："余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又以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又以本党党员消极抵制共产而不能积极奋发自强为忧。"[④]据说，鲍罗廷"颇感动"云。17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作为《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通过。至20日，会议共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四件。

---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三节。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4日。
③ 同上，1926年5月15日。
④ 同上，1926年5月16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党团曾讨论对“党务整理办法”的态度。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说明不能接受，但提不出具体办法。反复讨论，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接受”①。

根据谢福林的报告，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共三条：1.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2.将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②。在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此外还增加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等规定。至此，蒋介石的限共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会议并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③。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步步进攻，至此可谓赢得了全盘胜利。

鲍罗廷指望以让步换取对右派的镇压，蒋介石在这方面给了鲍罗廷以某种满足。5月8日，蒋介石拒绝和胡汉民会谈，迫使胡于次日离开广州④。30日，逮捕吴铁城。同日，通过张静江和孙科、伍朝枢商量，希望孙科充当党政代表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伍朝枢暂时离粤⑤。鲍罗廷觉得自己的策略成功了，兴致勃勃地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城市变得很平静，所有的商会都在以很大的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表达忠诚”⑥。作为对蒋介石的回报，鲍罗廷又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愧力辞”的时候，鲍罗廷居然以去就力争，声言如蒋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顾问一职⑦。

---

① 周恩来《关于1924年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第123页。

②③④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719.

⑤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7日。

⑥ 《郃元冲日记》，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⑦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

6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鲍罗廷终于使斯切潘诺夫的策略成为现实——满足蒋的“喜尊荣心”，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可以说，没有苏联方面的“利用”政策，蒋介石在取得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不会那样顺利。

1926年4、5月间，广州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谢福林报告所述胡汉民企图离间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的关系①，右派准备举行欢迎胡汉民的游行②，要求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③，谣言蜂起，金融紧张，左右派公开冲突等情况，都是事实。吴铁城、马超俊、古应芬等人并曾有一个计划，准备以突击检查的办法逮捕在广州的全部共产党人④。吴铁城的被捕使这一计划破产，从而消弭了危险，但是，通过旨在限共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将蒋介石捧上总司令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使他掌握至关紧要的军权和党权，中国革命就陷入更大的危险中了。

自邹鲁、林森等于1925年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随后又在上海另立中央，召开对立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都把和这一个右派集团作斗争看成主要任务，完全忽视了革命阵营中正在发展的新右派。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⑤，正是这一忽视的明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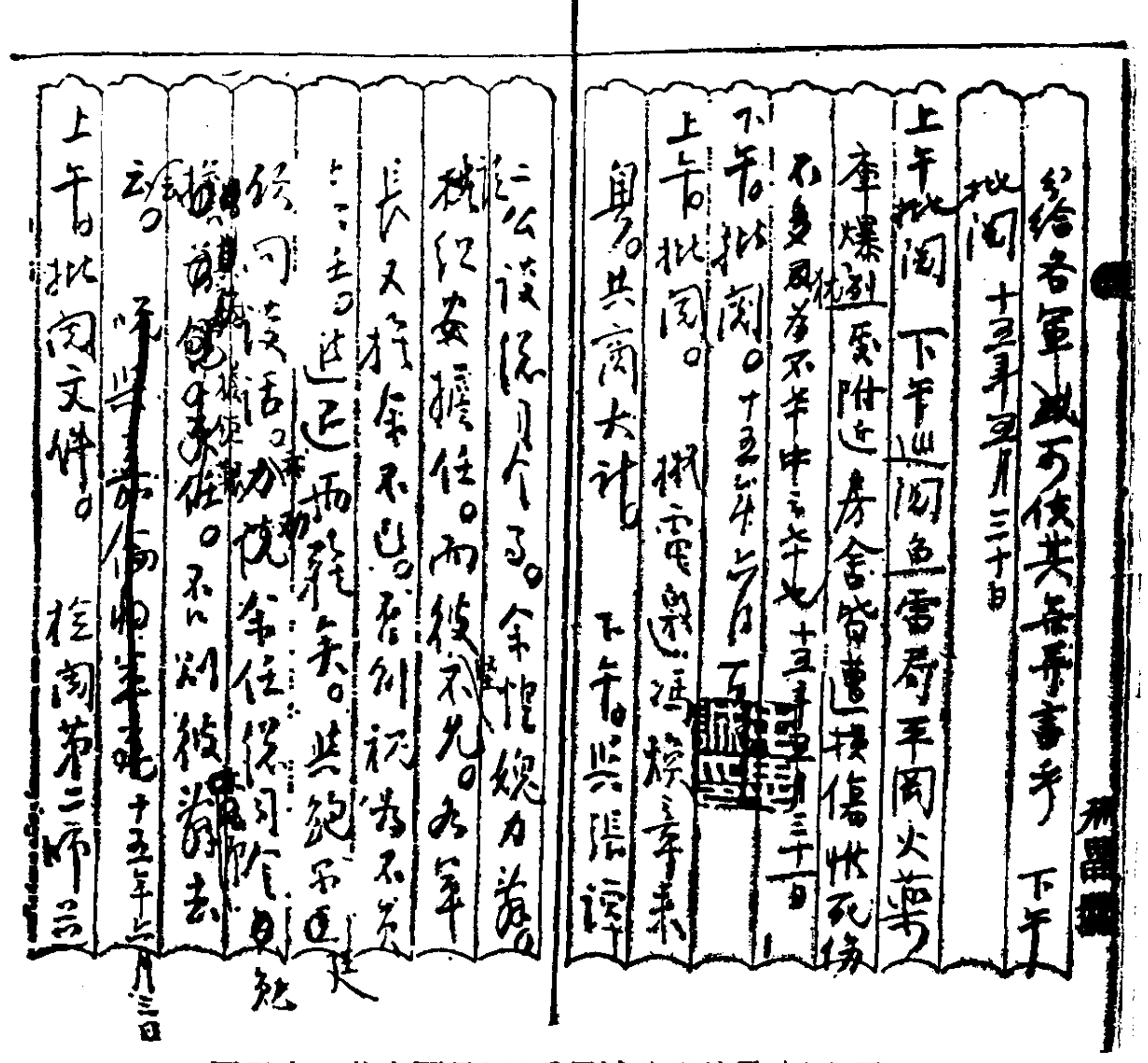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4月30日)云：“下午与展堂兄谈天，其言近挑拨，多不实，心甚疑之。”

② 《各界欢迎胡展堂先生大会筹备会启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11日。

③ 《胡汉民抵粤后情形》，《申报》，1926年5月12日。

④ 郭廷以等：《马超俊第六次访问谈话记录》，1961年8月29日，未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参见马超俊：《吴铁城先生和我》，《吴铁城回忆录》，《台湾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72页。

⑤ 《国民党左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148期。



图三十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之二
（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五、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理论与新的反共要求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部长或代理部长的职务，并且，各省、市党部均将陆续改组，但是，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整理党务案的范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还在4月上旬，蒋介石就声称，国民革命军以三民主义为主义，只能以三民主义者为干部，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①。同月20日，他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时发表讲话，声称："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企图进一步提出反共要求②。不过，限于时机，他的话讲得比较含蓄。二届二中全会后，他觉得时机成熟，便直言不讳了。5月27日，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③。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他并称："如果一党中间，有另外的一个小党的党员在里面活动，一班党员便起了猜忌怀疑之心，由这猜忌怀疑便发生一种恐慌，由这恐慌便生出冲突，由这冲突使自己的势力互相残杀，同归于尽。"因此，他要求共产党作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他说："一方面主张世界革命统一，中国革命要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一方面，中国革命是中国国民党来领导中国各阶级革命，要请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④次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⑤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共产

---

①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8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74—75页。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30日。
⑤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79页。

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①。

联合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是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策，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更是孙中山的选择。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完全违背孙中山的决策，他的“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的理论更明确地暴露了他反对以至取消共产党的用心。但是，这一切都未能引起鲍罗廷的重视。相反，他却继续鼓吹“绝对团结”。6月16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称：“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② 7月20日，他又在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③ 结果是，敌人尚未打倒，蒋介石就动手打倒共产党了。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之类的言论。6月4日，陈独秀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说明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有各阶级的“别信”；除了共同主义之外，也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④。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表示出和蒋介石抗争的意味⑤。但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制订不出正确对待蒋介石的方针。在陈独秀等人心目中，蒋介石还是中派，还要“爱护”、“扶助”，“使之左倾”。自然，基于这种认识，只能响应鲍罗廷的号召，“在蒋同

① A.Б.列兹尼科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0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60辑，184—185页。

② 《鲍顾问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7日。

③ 《蒋总司令就职后宴会盛况》，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0日。

④ 《向导》，第157期。

⑤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志之下，共同前进”了。

## 六、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道义上处于劣势，军事上只掌握第一军的部分力量，实力处于下风。如果在这个时候组成反蒋联盟，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坚决的回击，那末，胜利者显然是左派。然而，苏联考察团和苏联顾问计不出此，一再对蒋妥协、退让，并帮助蒋达到了他当时可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及至蒋介石率领重兵开始北伐后，鲍罗廷等才慢慢感觉失策，于是先有迎汪运动，后有提高党权运动，目的都在于夺回蒋介石已经取得的权力。但是，文斗敌不过武斗，党权敌不过军权。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武汉政府才下决心利用程潜第六军的力量逮捕蒋介石，然而，那时候，蒋介石重兵在握，岂是轻易能够就范的呢！

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

（原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江西战场是北伐时期的三大战场之一。它由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对手是直系军阀的后起头目孙传芳。研究这一战场上的两军作战史，不仅有助于了解蒋介石其人及其军事活动，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北伐战争，获得军事史上的某些经验。

## 一、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保住到口的肥肉，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①。1926年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无论何方军事，均主以消极眼光应付之”，“不加入任何旋涡”②。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不愿意为吴火中取栗，他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付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又说：“目下情形，南方实严重于北方”，“最好将北方之事，完全交奉方主持”，吴佩孚“尅日南来，对付湘粤”③。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

① 《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② 《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③ 《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1926年8月1日。

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但吴佩孚正忙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使"讨赤军内部之团结"臻于"圆满"，对湖南战事，则请孙"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①。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②，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③。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悠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④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枬、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⑤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⑥。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⑦。随后，南京部分绅士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入湘、粤战争漩涡"⑧。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

---

① 《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1926年8月1日9版。
② 《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1926年8月6日4版。
③ 《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1926年8月4日7版。
④ 《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1926年8月2日9版。
⑤ 《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⑥ 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
⑦ 《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1926年8月9日13版。
⑧ 《南京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议决七项，其要者为：1.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2.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3.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4.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5.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6.发表和平宣言①。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②。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伯桢）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③。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醮醮”④。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遑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蠹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⑤ 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我始终以和平为怀，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⑥。20日，孙传芳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1.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2.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3.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⑦。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

---

① 《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1926年8月12日13版。
② 《全浙公会请孙蒋维持和平》，《申报》，1926年9月9日13版。
③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昨讯》，《申报》，1926年9月14日9版。
④ 《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1926年9月5日15版。
⑤ 《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3日13版。
⑥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1926年9月12日。
⑦ 《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1926年9月22日6版。

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①。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并非孙的嫡系，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电本省各部队各机关：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②。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以赣北修水、铜鼓两县为驻扎地点。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岐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10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③。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赵恒惕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④由于两湖军事节节失利，吴佩孚心急火燎地盼望孙传芳出兵，至此算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① 何成浚致谭延闿等密函，1926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参见《芜湖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② 《苏省援赣之先声》，《申报》，1926年8月21日10版。

③ 《孙传芳世电》，见《蒋中正致孙传芳电附录》，《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19页。

④ 《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1926年9月7日2版。

## 二、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虽然出发了，但他仍然在观察风色，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①。次年2月、5月，孙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②。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③。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④。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其具体条件也”⑤。何成浚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浚提出：1.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2.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成浚表示：“停战未始不

---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2月8日。
② 《苏粤代表会晤》，《晨报》，1926年8月1日2版。
③ 《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三，第77页。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17日。
⑤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出版。

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①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国民革命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成浚则要求孙传芳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在岳停止一节，亦可商议"②。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①。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涡"④。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要求张群转达蒋介石，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⑤。

除派代表磋外商，孙传芳、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彼此都要求对方撤退。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传芳已命我军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以免误会"⑥。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⑦，蒋介石则于9月10复电孙传芳，建议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⑧。13日，再电孙传芳，声言"执事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应速撤退驻赣各军"⑨。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⑩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

---

①②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13版；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③ 《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13版。

④⑤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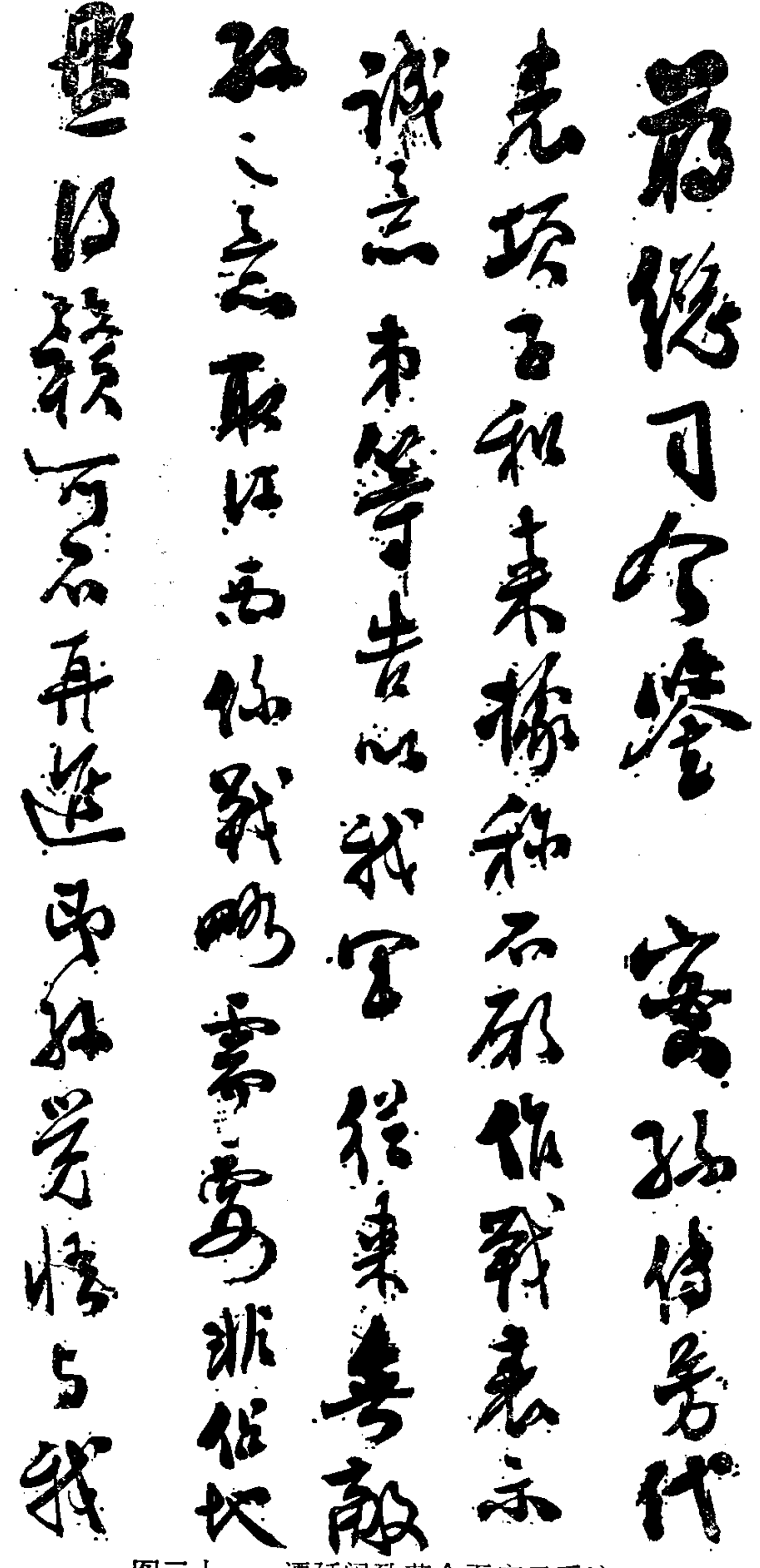
⑥ 《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1926年9月9日2版。

⑦ 《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1926年9月9日6版。

⑧ 《蒋介石致孙传芳电》，《晨报》，1926年9月17日2版。

⑨ 《驳复孙传芳阳电》，《民国十五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34页。

⑩ 《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1926年9月22日9版。



图三十一　谭延闿致蒋介石密函手迹
（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8月16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济南；9月7日，到达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①。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②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对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在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③靳建议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④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⑤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⑥。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文和、吴家元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⑦。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之军事，鲁方决不干预⑧。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

---

① 《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1926年9月12日4版。
②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3日4版。
③④ 《奉宁对南军事之结合》，《申报》，1926年9月17日6版。
⑤⑥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4版。
⑦ 《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1926年9月18日9版。
⑧ 《苏鲁合作问题》，《申报》，1926年9月20日4版。

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①。20日，匆匆返宁报命。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②。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③。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④，因此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⑤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 三、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口号。8月5日，

---

① 《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1926年9月22日6版。

②③ Sir R.Macleay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No.374, Tel., September 15, 1926.FO405/252A, P.218.

④ Sir W. Tyrrell to Sir R. Macleary, No. 269, Most Secret, Tel., September 27, 1926. FO405/252A, P.223.

⑤ 《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1926年9月27日2版。

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讨论攻鄂攻赣战略，加伦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取守势”，蒋介石赞同加伦的意见①。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提前入赣。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如侦知敌有向我攻击之企图时，即以第二、第三军进占萍乡，并相机进取南昌、九江，同时，以南雄第五师及赣东独立第一师协同攻取赣州，进占吉安②。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③。27日，电告程潜，我军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④。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⑤，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⑥。9月1日，决定攻赣计划。2日，他下达了二、三、六军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的命令。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的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为此，蒋介石会同朱培德制订了一项迎战计划，以第二、第三军入赣，进攻萍乡、万载、袁州等地，在将该地区之敌扑灭后，以必要兵力协同第六军夹击修水方面孙军⑦。

其二是和唐生智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入湘以后，即与唐生智不和，其日记称：“入湘以来，为其当道怀疑抱怨〔怨〕，拒之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5日；参见《北伐阵中日记》(油印本)，1926年8月6日。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第八编三，第89页。

③④ 同上，第130页、第133页。

⑤《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编》第6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⑥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1日。

⑦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8页。

不得，迎又不愿。"① 这里所说的"当道"，即指唐生智。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8月22日克岳州，27日克汀泗桥，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②，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③ 同月23日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此后入于四面楚歌之境，惟有奋斗自强耳。"④ 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⑤。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经"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⑥，国民革命军进展迅速。9月6日，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新近归附北伐军的赖世璜部及第一军第五师谭道源部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急匆匆地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⑦。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

---

①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7日，1926年8月29日。

③④ 同上，1926年8月20日、23日。

⑤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9页。

⑥ 参见《孙传芳鱼电》，《申报》，1926年9月9日4版；《浙中所得卢香亭捷电》，《申报》，1926年9月28日4版。

⑦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29页。

600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①。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②。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第十九师等部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③。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200余人潜入南昌城内，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1万余人。第六军政治部李世璋在会上宣讲了北伐军的政策，对人民的支援表示感谢。江西群众也登台发言，控诉军阀、官僚的罪行。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第一军第一师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④。这样十九师便成了深入敌巢的孤军。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第十七师应向城南靠近赣江西岸的生米街急进，并由该

---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第478页。

② 蒋介石1926年9月5日日记云："少顷，程潜又来辞职，以不愿受益之指挥，且入他人萋菲(斐)耳。"

③ 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4页。

④ 方之中：《回忆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1页；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第479页；《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8页。

处渡江，向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因为中山舰事件后即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去，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靠了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①。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回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②。孙军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到妓院作乐，军中无主③。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第十九师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25日，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俵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④。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孤军深入向为兵家大忌。程潜首攻南昌失利，其原因即在于此。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⑤。南昌一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中。

## 四、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

---

① 程潜对蒋介石的报告，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上，第175页。

② 马葆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309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第408页；韩梅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35页；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④ 《李宗仁回忆录》，第408页。

⑤ 《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日。

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4日蒋介石日记云："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他自悔不能早出江西，将武汉交给唐生智。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①]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鄂东南的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②]。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2000余人[③]，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④]。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军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⑤]。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1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86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第392—396页。
④ 《谢鸿勋昨晨伤重逝世》，《申报》，1926年10月17日13版。
⑤ 雄鸷：《平赣右翼总指挥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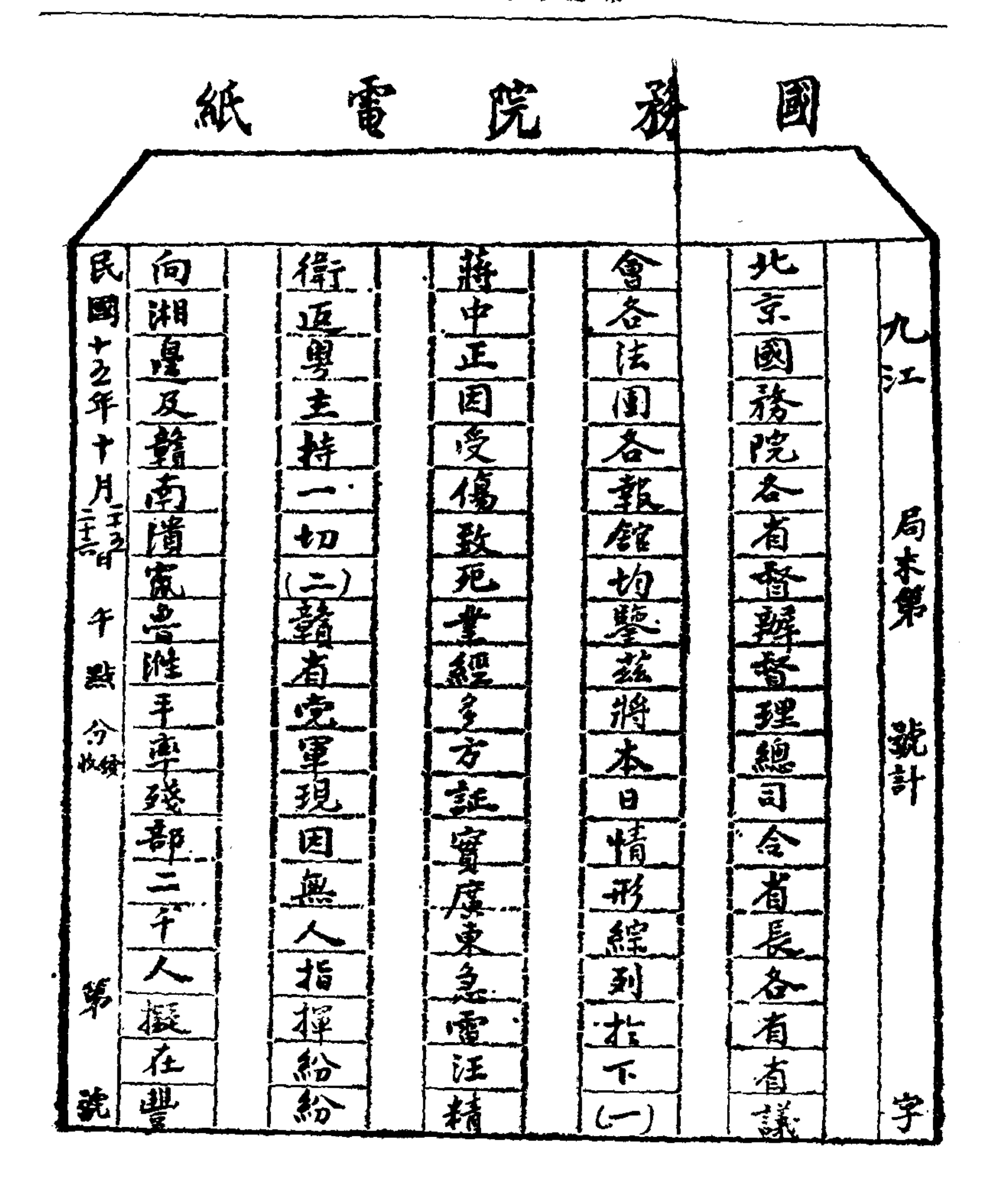
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孙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①。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②。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五、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敌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著名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国民革命军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③，守军凭借城防固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④。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⑤"。混战中，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

①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0月5日3版。
② 《第二师刘师长报告》，《北伐阵中日记》(油印本)，1926年10月8月。
③ 肖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79页。
④ 《李宗仁回忆录》第409页。
⑤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1日。



國務院電紙

九江 局來第 號計 字

北京國務院各省督辦督理總司令省長各省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茲將本日情形綜列於下(一)蔣中正因受傷致死業經多方証實廣東急電汪精衛返粵主持一切(二)贛省党軍現因無人指揮紛紛向湘邊及贛南潰竄豈淮手率殘部二千人擬在豐

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午 點 分收發 第 號

图三十二 孙传芳等宣传蒋介石"受伤致死"致各方电

(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①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云："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②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急急忙忙地宣传起来了③。

## 五、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在两湖战场上屡建功勋的第四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④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⑤。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⑥。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13日。

② 《孙军总部捷报》，《晨报》。1926年10月19日。

③ 参见拙作《北伐中蒋介石负伤身死的风传》，《团结报》，1988年2月2日，

④ Document 44,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er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415.

⑤ 《张国焘回忆录》，第15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⑥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9页。

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①。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10月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进攻孙军侧翼，三战连捷，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②。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③。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1.浙江归国民革命军；2.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3.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④。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答以孙传芳确定撤兵之期再言其他，限于

①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92页。
②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20页。
③ 《持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前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109、117页。

11月1日前用无线电话答复①。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②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仑、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1.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指挥。其中又分左、右纵队。2.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3.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二师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订为11月1日拂晓前。10月20日，由第十四军组成的右翼军右纵队攻克抚州。30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将士，"务将孙之势力迅速扑灭"，"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为最后之牺牲，始博最后之胜利"③。11月2日，第二军第四、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11月3日，第二军第六师和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围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④。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据苏联顾问回忆：当时，"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

①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0月29日、11月1日。

③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141页。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

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指加伦——笔者)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①。7日，右翼军占领瀛上、牛行，切断了南昌地区孙军的陆上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总预备队第一、第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②。随即分东西两路向涂家埠攻击前进。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西路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的3000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剧烈。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③。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只图逃窜。孙传芳见不可收拾，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岐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

① 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第204—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关于占领芦坑和乐化的时间，《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认为分别在11月4日与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15页。按：此说误，本文所述，据《呈报攻克芦坑、李庄、乐化作战经过状况文》(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1931年版，第69—70页)及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电（《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六，第7页)。

③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两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7日，蒋介石至南昌车站与朱培德商量监视城内敌人计划。8日，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退出城外。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①。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汊口附近，将准备沿鄱阳湖岸东逃的孙军主力截住，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派使者请降②。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3万余枝，各种大炮20余门，机关枪30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名，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2万余枝，机关枪20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③。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兵伤亡约达1.5万人。

江西战场最初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急于显露自己，在敌人还保有强大兵力时就企图迅速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结果遭到挫败。其后，不得不增调骁勇善战的第七军与第四军，同时改变战略方针，首先致力于截断交通线，击溃孙军主力，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态势，这才取得了胜利。

江西战场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直系军阀势力，使北伐军据有的广东、湖南、湖北得到屏障，这是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但是，它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使他有了一块立脚之地，成为不久以后同国民党左派进行迁都之争的"资本"。在北伐过程中，鲍罗庭、加伦和中国共产党人曾企图在取得武汉

①③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6版。
②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3—44页；下册第828—829页。

后，出兵河南，而蒋介石则力图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便取得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反共，建立新的军事独裁统治。江西战役胜利以后，蒋介石的这一意图就更加不可逆转，并在复杂的历史合力作用下最终得以实现。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① 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②。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8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7月16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③。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8月10日，她在中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75～600页。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5日。

常会第47次会上临时动议："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① 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② 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9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1.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2.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③。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④ 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1926年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⑤。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⑥ 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⑦ 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

---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635页。

② 《吴玉章回忆录》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③ 《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中央政治通讯》第4期，1926年9月20日。

④ 《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71页。

⑤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0日。

⑥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⑦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

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①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②。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③ 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1．迎汪倒蒋；2．汪蒋合作；3．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④。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1.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⑤。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30日。

② 《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中央政治通讯》第5期，1926年9月22日。

③ 《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1926年9月15日。

④ 《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中央政治通讯》第4期，1926年9月17日。

⑤ 《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

以避免冲突①。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②。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③。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④。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7人。从9月14日起至29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

① «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27日。
③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9月29日。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5页。

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①。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② 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至28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③，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1/4，左派占1/4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1/4。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④ 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⑤ 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⑥。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0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② 《陈果夫回忆录》，见吴相湘著《陈果夫的一生》，第10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③ 《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926年9月16日。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22页。

⑤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55页。

⑥ 《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

来"①。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②。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③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可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④。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5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⑤。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⑥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件。
②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④ 《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3号。
⑥ 《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

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①。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二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八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②。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③。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

①②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
③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①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②。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

① 《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105页。

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①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②。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③。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④。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⑤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

① Document 44,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pp.413—421.

②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③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六，第59页。

⑤ 《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变为泡影①。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②。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③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④。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⑤。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1.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2.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⑥。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⑦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⑧。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

①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9日。

② 《中央致粤区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4日。

③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15页。

④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初。

⑤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6日。

⑥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七，第58页。

⑦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七，第15页。

⑧ 《复武汉各界团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

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①。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②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③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

① 《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月24日。
③ 《各界欢送党政府北迁盛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

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①。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讨论的机会。"② 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③。7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④。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⑤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⑥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

---

①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

② 陈公博：《苦笑录》（1925年至1936年），第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 《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1927年1月（上）。

⑤ 《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记录》。

⑥ 《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

鄂。

武汉方面既坚持原议，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1月12日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①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illegible]相容了。

1月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

---

① 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①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②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③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1月21日、22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④。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⑤。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

① 《临时联席会议第13次会议记录》。
② 《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③ 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出版。
④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⑤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①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②2月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③。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8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季陶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20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结束联席会议；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3.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④。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方面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① 《徐桴致蒋介石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1926年1月29日。
②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
③ 《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2月5日。
④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3月8日。

## 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①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②。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③13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④15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1.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2.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6.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

① 《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6月版。

②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26年2月10日，见《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另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25页。

③ 希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

④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①。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②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③。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④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⑤。次日，武汉三镇15000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⑥。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② 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
③ 《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
④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⑤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
⑥ 《武阳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2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汉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 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② 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③。28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④。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①。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又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②。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5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③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④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⑤。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⑥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⑦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⑧吴玉章说：“革命是共

① 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

③ 《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④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台北版。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43页。

⑥ 同上，第744页。

⑦ 同上，第746页。

⑧ 同上，第748页。

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① 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②。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兼补充革命学识"③，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同日，邓演达、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均表示"绝对服从党"④。

3月10日至17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⑤。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凌驾于全党之上。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⑥。孙科

---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

② 《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③ 《陈铭枢留别邓演达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47页。

⑤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页。

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56页。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第二日開會議事錄 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地 點—漢口南洋大樓

時 間—下午二時

出席者：

譚延闓 陳公博 周啟剛 許甦魂 丁惟汾

顧孟餘 朱霽青 謝晉 彭澤民 鄧懋修

丁超五 董用威 林祖涵 宋子文 于樹德

經亨頤 孫科 江浩 吳玉章 夏曦

惲代英 鄧演達 徐謙 王法勤 王樂平

陳其瑗 陳友仁 何香凝 孫宋慶齡 詹大悲

毛澤東

图三十三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议事录(1927年)

(采自上海图书馆)

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①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4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②。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③。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④。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⑤。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0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38页。

③ 同上，第316—317页。

④ 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8—326页。

⑤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06页。

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① 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由大会宣言，"令农民放胆去做"②。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10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25%、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③。《对全国农民宣言》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④。《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东9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此外，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30页。
② 同上，第845页。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28—330页。
④ 同上，第308—311页。

会令其从速改选”①。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中央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他曾试图动员李宗仁取蒋自代，遭到拒绝②。3月下旬，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再遭拒绝③。4月5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已经没有实际效用，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38—339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41页。
③ 参见拙作《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见本书第521页。

# "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政变并不是突然的，事前，他早已公开表态，并且在南昌、九江、安庆、南京、杭州、福州等地大打出手。因此，武汉政府对于蒋介石可能采取的行动并非完全没有警觉，曾经采取过一些对策。但是，从总的方面看，麻痹天真，优柔迟疑，失去时机。"四·一二"之后，武汉政府处境困难，政治谴责取高调而军事上则回避和蒋介石决战，对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又判断失误，终于未能挽回颓势。中国现代史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 以党权限制蒋介石

武汉政府是在和蒋介石激烈冲突中的产物。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本来是蒋介石的主张。1926年11月16日，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孙科、鲍罗廷等北上，筹备迁都。同年11月26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出发。12月13日，先行到达武汉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议决，在国民政府未迁来之前，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同月底，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等人抵达南昌，蒋介石突然改变主张，提出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企图将党和政府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样，在联席会议和蒋介石之间就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初，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顾问鲍罗廷准备动员李宗仁反蒋。他们纷纷去李处游说，告诉他：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

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鲍罗廷并曾推心置腹地动员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总司令位置，遭到李的拒绝。[①]此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们决定以党权来限制蒋介石。1927年2月15日，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在汉口举行会议，到会的有邓演达、顾孟余等30余人，提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促汪精卫销假复职；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等主张。会议通过的《党务宣传要点》指出：“封建思想在党员头脑中潜滋暗长，不即加以纠正，必定演成个人独裁。”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要点》主要矛头指向张静江，但是，也没有点他的名，而是以“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一词相代。《要点》表示，要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肃清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②]自此，各地即掀起恢复党权运动。2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武汉正式办公。

对于这一切，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总司令部南昌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③]21日，他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就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为，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④]这实际上已是政变的预告。

恢复党权运动在二届三中全会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次会议原定3月1日召开，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一直推迟到3月10日。会议于3月17日闭幕。这次会议纠正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许多错误决定，是国民党制度上的一次大改革。会议通过了统一党

①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437--442页。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

④ 《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统一财政决议案和统一外交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的主旨都在于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实际上解除了蒋介石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项职务，蒋介石被从最高领导的地位上拉了下来，权力大大缩小了。会上，孙科点名批评蒋介石："蒋介石同志之在南昌宣言，则为军阀及帝国主义所欢迎。"① 会后发表的《本会经过概况》虽然不点名，但却对蒋介石进行了最严厉的指责。《概况》认为：自"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来，"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政策被其破坏，即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又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② 《概况》高度评价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认为是"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个人独裁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概况》表示，将不再采取"委曲求全"的方针。

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反蒋呼声日趋激烈。湖北省党部要求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结队请愿，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武昌第三区第四分部致电蒋介石，表示要以"革命的手段对待"，"临电枕戈，伫候明教"。③湖南省党部则公开电称："与其爱一蒋介石，以延长中国反动之局；何如去一蒋介石，而树立真正民治之基。"④

蒋介石不想以口舌、笔墨进行论争，他用暴力来回答武汉政府。3月16日，他强迫解散南昌市党部、南昌市学联，封闭《贯彻日报》。17日，制造九江惨案，杀害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负责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七日速记录》。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
③ 《民众纷起责问蒋介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
④ 《省党部电请罢免蒋介石》，《湖南民报》，1927年4月10日。

同志四人。3月23日，制造安庆惨案，捣毁安庆省党部和总工会。同时，处心积虑，控制南京、上海。

在很长时期内，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一直担心蒋介石抵达东南后，会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此，也力谋控制南京、上海，进一步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3月21日，上海发生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方案。会议决定派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赴沪，又指定孙科、顾孟余、陈友仁、宋子文、徐谦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以陈友仁为主席，研究上海方面的外交策略；派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导员。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即任命程潜等11人组成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其中共产党人和左派占绝对优势。27日，武汉政府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武汉政府对南京、上海地区的控制，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不理睬武汉政府这一套，继续任命行政、外交等方面的人员，并且干涉武汉政府的用人权。3月28日，孙科在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最近军事长官，往往干涉交通部用人行政事宜，上海方面交通部派员不能接事，一定要总司令委派才可以。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军事机关，嗣后不得干涉用人行政。4月1日，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上，鲍罗廷提出："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于树德提出："军事领袖擅自拜访各国的外交官是否合法？"孙科说："现在越闹越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① 会议根据鲍罗廷和孙科的提议，将二届三中全会统一外交、财政各决议案通知蒋介石以及各军，"饬令遵照，并警告不得违反，否则以反革命论"。② 武汉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录》。

政府很天真，以为蒋介石还会按照它的命令行事。蒋介石也在某些方面麻痹武汉政府。不仅于3月30日发电请示军事、外交进行方针，而且同时呈报安徽省政务委员名单，要求委派钮永建为新编第七军军长。这一切也给了武汉政府以错觉，似乎蒋介石还准备听它的话。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孙科提出：蒋总司令自江西到上海后，即被反动势力包围与利用，形成一个反动中心，建议立刻下一道训令给蒋介石，要他立即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去，专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他说："蒋在上海，帝国主义只看见他一人，不见有中国国民党及中央政府，外交、财政、交通都被其破坏。""这是给蒋总司令一个最后机会，试验他能不能够有觉悟，服从中央命令，抑或一意孤行。"① 会议通过了有关电文，声称："同志在沪，已有不能团结革命之表征，徒为外人所乘，于此紧急之外交形势殊属不利，必同志离沪，中央始可对上海之严重形势指挥自如，而负完全之责任。"决议要求蒋介石"对于外交未得政府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② 武汉政府以为，只要蒋介石离开上海，就可以使他摆脱反动影响。鲍罗廷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③

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呈请，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对蒋介石没有任何实际影响。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② 《明令蒋总司令离沪赴宁电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以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

## 逮捕蒋介石与迁都南京计划的搁浅

武汉政府还准备了另一手。

3月下旬，武汉政府草拟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谭廷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3月27日，林祖涵将密令缝在衣服内，以代表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的名义东下。① 同时，张国焘则以机密方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就近予程潜以协助②。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命林祖涵为驻宁办事处主任，林未到任前，由李富春代。

武汉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程潜身上，但是，程潜却并不愿意执行命令。林祖涵东下之际，程潜正与何应钦一起应蒋介石之召，赴上海商谈。到沪后，程潜力主调和，并表示愿意去武汉劝合。③ 此外，程潜还和李石曾、吴稚晖作了交谈，了解到他们正在准备"清党"。程潜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便于30日离沪返宁。当晚，林祖涵也到了南京。程潜得悉交给他的任务后，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中山先生。"④ 六军政治部主任李世璋以形势危急相劝，告诉程潜："蒋介石已经把何应钦派进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高地，恐怕来意不善。"程潜却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⑤

程潜的态度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是，逮捕蒋介石的时机也已

---

①③ 程潜：《对谢慕韩〈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的订正和补充》，《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31页。

② 《张国焘回忆录》第8章。

④⑤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失去。南京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乘舰过宁，没有上岸。这以后，他一直处在重兵的护卫中，要逮捕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祖涵也没有其他办法。在南京期间，二、六两军都有人表示对蒋介石"深致怀疑"，"希望中央早日讨伐"。林祖涵只能含混相答。4月1日，程潜下令"除渡江部队外，其余概行集结南京"，同时，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即随林祖涵返汉。他将军长职务交杨杰代理，将卫戍南京的任务交贺耀祖负责。程潜自以为万无一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杨、贺二人都已经倒向蒋介石一边。①

程潜离宁后，蒋介石即接连下令驻守南京的二、六两军于4月6日全部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时命何应钦的东路军火速向南京集中。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曾向蒋介石建议，六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复元，应该暂留南京，为蒋拒绝。② 在此情况下，六军密电程潜请示，程复电不得渡江，不幸，程电被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截获。其间，鲁涤平也知道二期北伐尚在计划中，蒋介石此举，必系排除异己，别有他图，急电武汉请示，但未能打通。这样，二军和六军的大部分都被派北上，留守的少数六军战士被包围缴械，南京完全落到蒋介石手中。

武汉政府虽然下了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是，并不感到政变迫在眉睫，还在准备北伐，并订于4月5日誓师，同时庆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和沪宁克复。3月31日，顾孟余在宣传委员会上说："党权运动的发展，上海方面军事领袖并未极端反对，但表面虽服从，内中或准备一两月后某一种发展。他们的方法，大概是在上海或南京集中力量，对北伐不进行，而坐观成败，但中央则非迅行北伐不可！"③ 4月1日，军事委员会对全体将士训令称，

① 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42页。
② 《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9页。
③ 《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记录》，《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1] 4月4日，程潜到汉，报告了上海方面准备"清党"的情况，李富春也密电陈述蒋介石、何应钦即将来宁建立政治组织的消息。这样，武汉政府就紧张起来了。当日以"筹备尚未就绪"为理由，宣布将北伐誓师典礼展期。[2] 4月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迁移日期另行决定。会议指定顾孟余、邓演达、谭平山三人负责迁都的宣传工作，下令军事委员会制订以南京为中心的作战计划。[3] 当夜九时，军事委员会开会，决定军事进行计划。武汉政府决定迁都的理由，据孙科、谭平山等人所述，基于五个方面：(一)对付帝国主义。武汉政府认为，英、美帝国主义正联合日本，准备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封锁上海、南京、天津等口岸，武汉政府必须先发制人。迁都南京、坐镇南京，帝国主义就不敢明白进攻。(二)统一外交。武汉政府感到，地处武汉，不便于"对付长江下游的外交"。(三)掌握财政。长江下游是富庶之区，迁都有助于控制下游财政。(四)团结下游革命力量，控制蒋介石。谭平山说："最近长江下游，帝国主义利用种种机会，用挑拨的方法以分离革命势力。现在一部分同志已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但我们知道，在反动军事领袖之外，还有许多革命领袖在长江下游。这些同志，我们要拉他一路走。"又说："少数在下游的军事领袖，想利用军队造成自己的地位，但中央要在长江下游，就完全能指导他们。不能用电报来指挥，我们要到军队势力中来指挥他革命。"[4]（五)沿津浦路北伐。武汉政府认为，京汉路北伐有确实把握，必

---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② 《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筹备处紧急通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决议录》。

④ 《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报告》，《湖南民报》，1927年4月18日。

须将注重点转移至津浦线。在上述五项理由中，最主要是第四条。8日，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孙科的说明。孙科慷慨激昂地表示："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全体送去受他压迫，看蒋介石有无决心？"①孙科的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决定接受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当日，举行了东下的誓师典礼。

武汉政府这次确实准备行动了。

据吴玉章等人回忆：当时，武汉政府已决定派张发奎率四军和十一军去加强南京的防御，支持上海的革命力量。军队中迅速作了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4月9日，四军登轮，准备东征。同时武汉方面命令六军留在南京，不要听命于蒋介石；又命令已进至长江北岸的二军回师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但是，就在此刻，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是：一、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二、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事实上，汪精卫已于6日起程来汉)。参加会议的共十人。瞿秋白、邓演达支持吴玉章的意见，加伦也表示："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但是，与会者大多数不同意吴玉章的意见。四军登轮的当天，就得到在船上待命的通知。11日，又得到命令退回原地。②四军、十一军东下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迁都南京的决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②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144页；黄霖：《八一起义前后的几点回忆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页；朱雅林：《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101—102页；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93页；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俄文版），1927年4月8日至4月11日。

吴玉章说："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的力量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① 但是，事实上，四军东下的决定也已为时过晚。就在武汉政府作出有关决定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在一场紧张的争夺时间的赛跑中，武汉政府落到了后面。

武汉政府的动摇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缺乏应有的警惕有关。2月31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文章称："国民党内的分裂和工人阶级与革命军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在目前绝无可能"，"蒋介石这样的一位革命家不会去和反革命的张作霖合作行动"。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称："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什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匹疲瞉的老驽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② 大约是11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临时会议，魏经斯基认为蒋介石"有办法"，罗易也认为蒋介石"还有办法"，主张国际代表团中一人去上海会见蒋介石。③ 4月13日，罗易又致电蒋介石，声称"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表示"将乐于访问南京"。④ 而在这前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

① 《吴玉章回忆录》，第144页。

② 转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史》，中译本，1947年版，第183—184页。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④ 《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

## 政治谴责的高调与军事决战的回避

汪精卫在4月10日到达武汉。

从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避居国外之后,就不断有人主张迎汪回国,以抵制蒋介石日益增大的影响。在1927年春天的"恢复党权"运动中,"迎汪"的口号更喧腾一时。人们对蒋介石愈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也就愈殷切。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但是,他并没有给武汉政府带来福音。

4月13日下午4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正在举行,得到了蒋介石的通电,要求中央各执、监委员在14日以前赶到南京开会,随即又得到了上海市党部的来电,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汪精卫当即表示:"这件事比南京会议还要严重,简直是反了!"① 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事件的主动者和负责者。电文说:"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② 随后,汪精卫又在湖北省市两党部的欢迎宴会上宣布了消息,他说:"反共产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献给军阀帝国主义者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他故作慷慨地表示:"我现在什么嫌疑也不怕了,非为这些工友复仇不可,就如有一批数十年的老师友,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③ 当日在会上演说的还有徐谦、何香凝、孙科、高语罕等人。何香凝说:"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

②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派。"① 孙科表示："我们今日若对蒋再不予以处分，则他仍要利用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来违法作恶。现在已经不是讲情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中央对蒋严厉处分。"②

14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处分蒋介石、张静江，取消蒋介石一切本兼各职、开除党籍，由国民党政府将其撤职查办。

15 日，汪精卫手书《对三大政策之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③ 汪精卫这里的表态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缺乏气节，善于见风转舵，3 个月之后，由于形势变化，他就高叫"分共"，跟在蒋介石、吴稚晖后面，完全背叛了三大政策。

同日，武汉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参加者 28 人，列席者鲍罗廷、唐生智、张发奎三人，主席徐谦。先后发言的有董用威（必武）、邓演达、潘云超、詹大悲、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林祖涵、江浩、吴玉章、邓懋修、王乐平、顾孟余、何香凝、王法勤、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黄实等，普遍态度强烈，要求中央改变迟疑态度，作出决定。董用威说："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彭泽民说："如再犹豫，不是蒋氏自杀，是我们自杀。"高语罕说："（蒋介石）自四川杀起，一直杀到上海。（我们）日日不作声，等待他杀，这是何等麻木啊！"其中，仍然以孙科最为激烈，他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蒋介石是革命敌人，尤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敌人，无论对蒋介石有无私人感情，今日皆不能缄默的。"④ 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上，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免去职务，明令讨伐，以

①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 4 月14日。

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7 日。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邓演达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顾孟余为代表，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会议最后同意顾孟余的意见，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①该项决议至18日以国民政府命令形式发表。

18日同时发表的文件还有《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罪恶："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复不能喻之以理，似此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本党为革命前途计，不能不决然毅然，执行党纪，加以严厉之惩治。"②

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等行为。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③

上述种种，都是对蒋介石一种政治上的谴责，较之武汉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坚决、鲜明多了，但是，政治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军事上的打击。这方面，武汉政府仍然顾虑重重。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在慷慨讨蒋的高调声中，也时时可以感到这种顾虑的存在。詹大悲说："今日中央应行决定，失败是不必顾虑，更不应该顾虑。"江浩说："党求胜利，不全在军事上，如果全在军事胜利，党就根本要糟。在此状况之下，虽然军事上稍失败或吃亏，于党还是好的。"邓懋修说："纵败犹荣，终有胜利之

① 《革命生活》第58期，1927年4月19日。
②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③ 《中央委员联名讨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一日。”吴玉章说：“如果是革命的，是不怕强力，不怕武力的。”①这些语言诚然是壮烈的，但却反映出武汉政府的领袖们缺乏斗争胜利的信心。何香凝说得很坦率：“我对军事上、财政上很是担心。”②正是这种担心，使武汉政府回避马上和蒋介石决战。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两面受敌，军事方针陷入动摇不定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一种主张北伐讨奉。两种方针各有利弊。向东讨蒋吧，奉军正沿京汉路南下；向北讨奉吧，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这是很难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于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也表现于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中。4月16日，汪精卫以政治委员会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积极北伐”与“肃清东南”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影响下，反对立即北伐。罗易认为：新的军事行动对革命有害。“它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以便摆脱群众的影响。”“政府必定以战争为借口，呼吁后方的安宁。这样，将给予反动势力以时间，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并且采取攻势。”罗易建议，在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推行土地革命，以加深它的社会基础。他提出：1.消灭农村的反动力量，即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绅士；2.向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扩展实力；3.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向南调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军队。③也就在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意见，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④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只能采取占领河南南

①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③ M.N.Roy: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Bobay, 1938, pp. 56—57.

④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部、安徽西部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但是罗易和中共中央都同意“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莫斯科也主张北伐，同时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发展革命。①这样中共中央便于4月18日撤销前议，双方一致同意立即派军队北上。大约在此期间，李宗仁也曾派参谋长王应榆赴汉，向武汉政府领导人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和平会解决党内纠纷。武汉政府领导人接待了王应榆，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②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这一艰难的决策过程，邓演达回忆说：“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的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致力于东南的肃清。”③当时，奉系有六个集团军，20—25万人，第一集团军驻守开封和兰封地区，由张学良统率，约6万人。冯玉祥的队伍号称30万人，确是一支可以和奉系匹敌的力量。此外，还有个阎锡山，有军队5万人。武汉政府认为，有可能倒向自己方面。因此，毅然于4月19日在武昌南湖誓师。20日，各路军队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第二期北伐开始了。

这一时期，武汉政府领导人的言论中，讨奉和讨蒋是并列的。南湖誓师典礼上，汪精卫说：“我们要使全国民众能得到解放，必须要打倒奉系军阀。”“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④但是，实际上，讨蒋已被暂时搁置到一边。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

① M.N.Roy: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Bobay,1938, pp,56—57.

② 《李宗仁回忆录》第467页。

③ 《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① 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空想。

尽管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这时唱的是响入云霄的高调，但是，高调中仍然可以觉察出细微的低调。这就是武汉政府处境很困难。4月27日，徐谦说："是要往北，才能打出一条生路。"② 5月13日，汪精卫说："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与西北革命军同志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的唯一出路。"③ 所谓外交形势变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委婉说法。武汉政府的领导人除了害怕和蒋介石正面冲突外，还害怕和帝国主义正面冲突。他们想走"西北道路"，即必要时退到西北。据罗易回忆，当时，鲍罗廷认为，由于革命力量太软弱，武汉将不能保持，建议将残余的力量安全地撤退到在西北的新基地。那里，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不会有武汉这样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④ 武汉政府的决策显然反映了鲍罗廷的影响。

武汉政府寄希望于冯玉祥和阎锡山，以为他们会忠实于自己，但是，这两个人都靠不住。武汉政府既失去了东征的时机，北伐也中途夭折。中国近代史证明，依靠军阀，而不依靠人民的政府是没有出路的。

（原载日本《东方学报》，第59期，1987年3月）

〔附记〕本文是作者1985年6月在日本京都大学国民革命研究班及神户孙文研究会所作的报告。

①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北伐将士大会记录》。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④ M.N.Roy: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pp.56—57；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8章。

# 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

有一段时期，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很紧张，其发端与冲突经过，表现出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

## 一、发　端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向会议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内称："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此等分子之危害党国，已成为社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陈德征抱怨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均以移解法院为唯一办法，而法院又"碍于法例之拘束"，常以"证据不足"为词，加以宽纵。他建议党部直接干预。提案说：

> 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①

这就是说，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确定谁是反革命，只须一纸"书面证明"，即使"证据不足"，法院也必须遵命治罪。胡适反对这种以党代法的意见。3月26日，即陈德征提案见报的当日，胡适即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说：

>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议，不知作何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6日。

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陋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夸耀于全世界了。①

胡适讽刺说，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执行，"皆归党部"，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除致函王宠惠外，胡适又将该函送给国闻通信社，要求转送各报发表。29日国闻通信社复函胡适，告以各报均未见刊出，听说已被检查者扣去，将原稿退给了胡适。②此事本来已经终结，不料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却出现了陈德征的短文《匕首》，中云：

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1928年8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宣布开始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决议宣称："吾党同志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遗教为准则"，"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③陈德征文中所称："一切国家底最高

① 《胡适的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缩微胶卷(以下均同)，1929年8月26日。

② 胡适存国闻通信社来信，《胡适的日记》，1929年8月29日。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版，第654—656页。

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即本于该项决议。陈德征由此进一步推论：违反孙中山的"遗教"就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文末所说"胡说博士"隐指胡适。胡适读了之后，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没处发表，而陈德征的反响却登出来了。"①

同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声称：

>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②

胡适认为这道命令令人失望，于5月6日写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向南京国民政府质疑。他批评该项命令说：1."自由"究竟是哪几种自由？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没有明确规定。2.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他说："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3.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他说："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胡适指斥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说：

> 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③

文中，胡适并以致王宠惠函被扣一事为例说："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我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此外，胡适还引证了当时人权无保障的其他两个

① 《胡适的日记》，1929年4月1日。

② 《国民政府公报》第147号，1979年4月23日。

③ 《新月》2卷2号。

例子：安徽大学某校长因在语言上顶撞蒋介石，被拘禁多日，其家人亲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当地驻军一百五十二旅指为收买枪枝，擅自抓去审问，刑讯逼供，经全市罢市后才释放。胡适提出：如果真要保障人权，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他说：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①

控告“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胡适认为，也可以控告并依法制裁“国民政府的主席”，在中国历史上，这就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语了。

文末，胡适呼吁：“快快制订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该文旋即在《新月》2卷2号上发表。

## 二、胡适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批评

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些朋友担心胡适吃亏，劝他罢手。6月2日，张元济致函胡适说：

先生写了信给王博士，又把信稿送给国闻通信社，又被什么检查者看见，我只怕这《新月》里雪林女士所说的那猛虎大吼一声，做一个跳掷的姿势，张牙舞爪，直向你扑来，你那一枝毛锥子，比不上陆放翁的长矛，又他不住。古人道：“邦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原不是对共和国民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共和国国民的面具很新，他几千年的老客气摆

① 《新月》2卷2号。

脱不掉，所以他几千年的话还是有用的。①

次日，张元济再次致函胡适，进一步补充说：

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那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疯狗，那有个不赞叹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②

但是，胡适不怕被"咬"，他以"少一事不如多一事"③的态度，又撰文提出："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他说：

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那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④

胡适的这些话，锋芒所向，触及到了国民党长期标榜的"以党治国"的根本方针。

不仅如此，胡适又进一步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孙中山思想。

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将建设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所谓训政时期，又称过渡时期。1923年以前，孙中山始终主张训政时期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与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但是，在1924年的《建国大纲》里，孙中山却没有再提起约法，也没有规定训政时期的年限。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对这一现象作过解释，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遗漏。他说：《建国大纲》不过是孙中山先生一时想到的一个方案，并不是应有尽有的，遗漏的东西多着呢！但是，胡适在进一步研究之后，却于7月20日写成《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一文，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胡适认为：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

① 《胡适的日记》，1929年6月2日。
② 《胡适的日记》，1929年6月3日。
③ 《胡适的日记》，1929年5月6日。
④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2卷4号。

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孙中山，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也还没有宪法。据胡适分析，孙中山之所以一再延迟宪政时期，其原因在于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需要训练。胡适批评孙中山说："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胡适由此进一步指出，人民固然需要训练，但党国诸公也同样需要训练，他说：

> 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
>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①

胡适力图说明"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批评孙中山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制订宪法。文末，胡适说：

> 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

① 《新月》2卷4号。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曾经要求："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将《建国大纲》及军政、训政、宪政三大程序宣布为"中华民国不可逾越的宪典"①。胡适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不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南京国民政府既定国策的批评。

同时，胡适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胡适认为，这一学说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就积极方面说，它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可以鼓舞人们不怕艰难，勇往进取，北伐胜利即其功效。但是，这一学说又存在着两大"根本错误"，其一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他说：

> 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觉，教人服从领袖者，但他的说话很多语病，不知不觉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类的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三家村的豆腐公也不是完全没有知识；他做豆腐的知识比我们大学博士高明的多多。②

胡适指出，孙中山志在领导革命，自任知难，而勉人以行易，其结果是："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箝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654—656页。
② 《吴淞月刊》第2期，又见《新月》2卷4号。

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①

胡适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第二个“根本错误”是不懂得：知固是难，行也不易。他以医学为例，说明读了许多生理学、解剖学、化学、微菌学、药学，并算不得医生，只有从临床的经验上得来的学问与技术才算是真正的知识。一个人，熟读了六、七年书，拿着羊皮纸的文凭，而不能诊断，不能施手术，不能疗治，才知道知固然难，行也大不易。由此，胡适进一步批评当时纨袴子弟办交通，顽固书生办考试，当火头出身的办财政，旧式官僚办卫生等现象。他说：

> 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②

胡适这里就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都骂进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浙江民报》发表文章，其中有“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一语，胡适认为这句话“最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昏愦”，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如此美好，那末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回到“觉罗皇帝”以前就是了。11月19日凌晨，胡适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文章进一步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文化政策，从维持古文、骈文寿命，压制思想言论自由，高唱“抵制文化侵略”，

①② 《吴淞月刊》第2期，又见《新月》2卷4号。

提倡旧文化等方面，论证“国民党是反动的”。他说：

> 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①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认为他们“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孙中山曾经有过“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一类说法，胡适在详加摘引之后评论说：

> 这种说法，在中山先生当时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②

胡适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1927年以来，“钟摆又回到极右一边”，“国民党中的守旧势力都一一活动起来”。他说：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胡适要求：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同日，胡适在梁实秋陪同下，以上文为内容在暨南大学作了讲演。讲毕，文学院长陈钟凡对胡适吐舌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③ 但是，胡适仍然将该文在《新月》2卷6、7号合刊上发表了。其后，胡适又

①② 《新月》2卷6、7号合刊。

③ 《胡适的日记》，1929年11月19日。

以同样题目在光华大学作了讲演①。

12月，胡适将他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人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计收胡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罗隆基《论人权》、梁实秋《论思想统一》、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罗隆基《专家政治》、胡适《名教》等文。13日，胡适为这个集子写了篇小序，中云：

>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②

文中，胡适在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则鹦鹉救火的故事后说：

>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 三、国民党的反应

胡适的激烈言论自然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

1929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召开全区代表大会，提出临时动议一项，认为胡适"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的顽旧迷惑青年"，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撤去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并予以惩处，决议通过。③ 2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开会，陈德征等出席，决定将第三区党部的决议转呈中央。呈文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

---

① 《光华大学大事系年录》，《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第30页。

② 《人权论集》。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13日；参见胡适存《教育部训令》。

大公報

## 胡適擔不起的罪名

### 侮辱總理 背叛政府

滬市黨部攻擊胡氏之文

【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時七分發上海專電】市黨部以胡適近所作「知難行亦不易」「人權與約法」及「我們什麼時候始可有憲法」三文、認為侮辱總理、詆毀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衆、今議決呈中央嚴辦、（按胡氏「知難行亦不易」及「我們什麼時候始可有憲法」二文、皆載諸近刊之新月雜誌第二卷第四號）

## 胡適應加警告

### 中訓部致國府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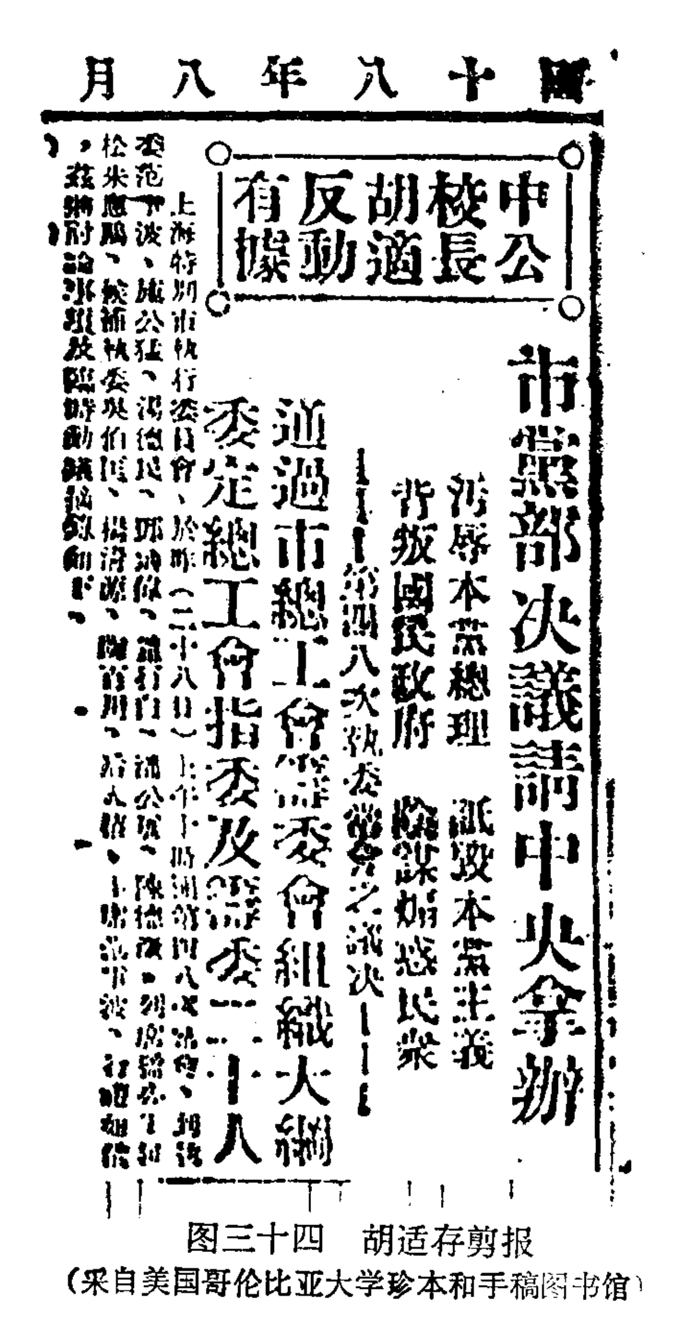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時發上海專電】中訓部函國府、胡適發表知難行不易文、誤解本黨主義、總理學說、不明我國社會情形、越出學術研究範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失大學校長尊嚴、使社會對黨政受不良影響、請令飭教部嚴加警告、

月念二

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於昨日（二十一日）上午十時開第五十四次會議、到執委吳開先、施公猛、陳德徵、范爭白、潘公展、鄧通偉、列席監委朱應鵬、王延松、候補執委楊清源、周大椿、吳伯匡、陶百川、主席潘公展、紀錄黃之枕、茲將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摘要錄后、

第二

[illegible]四、併案討論、五、七、本部呈、為詆譭總理反革命之胡適、應即時撤消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案、決議、再呈中央、六、第二直


國十八年八月

中公校長胡適反動有據

# 市黨部決議請中央拿辦

汚辱本黨總理 詆毀本黨主義
背叛國民政府 陰謀煽惑民衆

——第四八次執委常會之議決——

通過市總工會整理委員會組織大綱
委定總工會指委及整委二十八人

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於昨（二十八日）上午十時開第四八次常會、[illegible]

图三十四 胡适存剪报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影响”，“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1] 28日，再次开会，通过宣传部的提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2] 接着，北平、天津、青岛各地的国民党党部和部分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25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29日。

党员纷纷表态，响应上海市党部的要求，北平市黄汝翼等人的呈文并将胡适和共产党联系起来，呈文称：

> 当此各反动派伺机活动，共产党文艺政策高唱入云之时，该胡适原为一丧行文人，其背景如何，吾人虽不得而知，然其冀图解我共信，摇我党基之企谋，固已昭然若揭，若不从严惩处，势必贻患无穷。①

其中，态度最严厉的要数青岛市执委会，除指责胡适"摇动革命信仰"，"影响党国初基"外，竟要求将胡适"逮捕解京，予以严惩"。②

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将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交给中央训练部。21日，中央训练部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内称：

> 查胡适近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高论。

呈文在表示"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讨论"之后，接着指责说：

> 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予以纠正，以昭警戒。③

中央训练部要求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警告胡适，同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精研党义，以免再有类似现象发生。不久，国民党中央就规定，各级学校教职员每天至少须有半小时自修研究《孙文学说》等"党义"。9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转饬教育部。10月4日，教育部长蒋梦麟训令胡适："该校长

①② 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1929年9月9日，20日。

③ 《教育部训令》，《胡适的日记》，1929年10月6日。

言论不合，奉令警告。"①

在教育部警告令发表前后，上海《民国日报》、南京《中央日报》等并发表了一批文章，对胡适进行批判。这些文章在同年11月由上海光明书局结集，出版了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综观这些文章，其论点大略不出以下数点：

一、指责胡适动机恶劣，态度狂妄。张振之撰文称："孙先生的学说与主义是最完备、最准确的真理，是领导革命的最高原则，我们只有坚确地信仰，不能丝毫怀疑。"② 他批评胡适说："胡先生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仅攻击孙文学说，而且想修正孙文学说，我们除佩服胡先生的妄诞以外，几乎无话可以形容了。"③ 张文并指责胡适，"感情用事，毫无理性已达极点"。

二、指责胡适照搬西方理论，迷信西方民主。陶其情在该书序文中说：

> 欧美政治潮流的趋势，便以人权做中心，由人权而民权。这种人权的民权，正是民治主义的真义所在，乃虚伪的不普遍的民权，建筑在各个个人自私自利的人权上。资产阶级暨特殊阶级，为着自家人权的发展，势必行其侵略主义或操纵主义，法律为其护符，政治为其转移，便造成种种人为的不平等，还谈什么真正的民权呢？大多数民众既已得不到民权，处在不平等地位，更谈什么人权呢？

陶其情宣称：只有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以大多数民众做中心"，才是真正的"民权"；胡适学着"立宪派的论调"，"泥于民治主义的见解"，不过是一种"洋八股"的精神罢了。有的文章更批评胡适，"到了欧美，只看见坐汽车、住洋房的人们生活享受愉快"，"没有看见工厂里面做资本家奴隶的工人"。④

① 《教育部训令》，《胡适的日记》，1929年10月6日。
② 《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72—73页。
③ 《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7页。
④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90页。

三、指责胡适破坏“中心”，破坏“统一”，造成思想与社会的混乱。文章说：

> 现在除了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可以为中国社会中心以外，别无他种可以为中国社会之中心。①

还有的文章说：

> 我们相信，中国的统治，是需要国民党的统治；救中国的主义，是需要三民主义。②

基于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胡适的文章只能引起“更大的混乱”，“更大的纠纷”，“中国社会将从此失去其重心，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地”。③有的文章更由此进一步指责胡适“深中共产党、改组派及帝国主义者反宣传之毒”，④“为帝国主义与奸商张目，蹈卖国汉奸之所为”。⑤

此外，还有的文章认为，当时“政局初定，人心浮动”，对于人民之自由“稍加限制”，以至采取“相当压制、防制”手段，都是必要的。文章说：

> 我们现虽踱入训政时期，然外有赤白帝国主义之勾诱，内有共产党与其他反动分子之隐伏，则政府取无形戒严的状态以制裁此辈之活动，实非常必要。⑥

他们逐一反驳胡适所举的国民党违反人权的几个例子，认为都是合理的。关于安徽大学某校长事，文章说：“胡适既谓该大学校长挺撞蒋主席，则被拘禁数天亦宜。”关于胡适致王宠惠函各报均不能发表事，文章说：“与其公开后而引起不良之影响，要不如予以扣留以减少无谓之纠纷。”如此等等。⑦

批判之外，国民党当局又进一步采取行政措施。

---

①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77页。
②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43页。
③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23页。
④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32页。
⑤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30页。
⑥⑦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31—132页。

1930年1月20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开会，陈德征主持，认为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刊登胡适诋毁本党言论，“兹又故态复萌，实属不法已极”，决议查封新月书店，同时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褫夺胡适公权，严行通缉，使在党政府下不得活动。[①]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上海市党部，声称《新月》第2卷第6、7期载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谟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没收焚毁”[②]。5月初，国民党中宣部又下令查禁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与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③]

胡适对国民党的批判、警告、禁令一概采取蔑视态度。他逐一将有关消息、文章剪存，并批上“上海的舆论家真是可怜”，“这样不通的文章，也要登在党报上丢丑”等字。[④]1929年10月7日，他将教育部的警告令退还蒋梦麟，附函列举部令所引公文的种种矛盾，纠正了其中两个错别字。胡适并说：“这件事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⑤]1930年2月15日，胡适读到新月书店送来的上海市党部宣传部的密令，中有中央宣传部“没收焚毁”《新月》6、7期的密令。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密令而这样公开，真是妙不可言！此令是犯法的，我不能不取法律手续对付他们。”[⑥]16日，胡适找到徐士浩律师，徐认为“没有受理的法庭”。当晚，胡适与郑天钧、刘崇佐二人商谈，刘表示可以起诉，于是，胡适决意起诉。[⑦]

然而，胡适最终没有起诉。

---

① 《时事新报》，1930年1月20日。

②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令》，《胡适的日记》，1930年3月17日。

③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训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 《胡适的日记》，1929年8月27日。

⑤ 《胡适致蒋梦麟函》，《胡适的日记》，1929年10月7日。

⑥ 《胡适的日记》，1930年2月15日。

⑦ 《胡适的日记》，1930年2月16日。

## 四、自由主义者的赞誉和革命论者的不满

胡适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后，国内外报刊纷纷介绍、转载，它为胡适赢得了大量社会赞誉，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满。

赞誉者大多是和胡适怀有同样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6月10日，蔡元培致函胡适，肯定他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振聩发聋"。[①] 9月10日，张謇的儿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写了一首诗给胡适，诗云：

> 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
> ——《读适之先生论政近文因赠》[②]

张孝若的这首诗高度肯定了胡适的文章和精神，誉为浩然正气，鞭辟入里。"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云云，明确地划出国民党"一党"和"万人"的不同是非界限。

和张孝若同样高度评价胡适文章的还有张元济。1930年5月3日，他致函胡适说：

> 承赐《新月》一册，大作一首，真人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当日连读两过，家中妇孺亦非终卷不能释手。苦口婆心，的是有功世道文章。安得世人日书万卷读万遍也。[③]

唐朝的韩愈为了歌颂平定藩镇叛乱的业绩，写过一篇《平淮西碑》，诗人李商隐曾表示"愿书万本诵万过"；张元济此函，赞美胡适言"人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希望"世人日书万卷读万遍"，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5页。
② 胡适存来信，《胡适的日记》，1929年9月10日。
③ 胡适存来信，《胡适的日记》，1930年5月。

隐约地将胡适比作韩愈。

许久不相见，異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氣满纸。
義正词自嚴，鞭辟真入裏。
中山如再生，也定说你有理。
他們那懂得？及放無的矢。
一黨说你非，萬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適之先生论政近文因贈。
張孝若稿　十八、九、十

图三十五　张孝若赠胡适诗手迹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当时像张孝若、张元济一样对胡适击节称叹的颇不乏人。《光报》有一篇文章说："胡以不党之学者自居，而社会亦以是称之，故'胡说'一出，遂大得社会之同情，尤其智识阶级，大为称快。"① 这确是事实。原北大学生胡梦秋致函胡适说：

《申报》的记载，《人权与约法》的大著已有单行本了！在我们追佩着法国卢梭的《民约论》时，又于言论界得到一个卢梭第二的伟作。②

① 《光报》第8期。

② 胡适存来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高梦旦的哥哥写信给高梦旦说：

> 自梁任公以后可以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①

这位作者由于佩服胡适的勇敢，居然“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义”。继此函之后，高凤池致书高梦旦说：

> 承赐胡君所著之书两册，甚感。谢谢。揭奸诛恶，大有董狐直笔气概，读之如炎暑饮冰，沁人肺腑，既爽快，又警惕，一种爱国热忱与直言之胆魄，令人起敬不已。尤可重者，胡君心细思密，每著眼在人所忽而不经意处，不愧一时才子。②

把胡适喻为中国古代的“良史”董狐，也是一种极度的推崇。同函又说：

>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刚愎之政府，肆行其矛盾自利政策，不加以反革命罪名，亦云幸矣。

确实，当时很多人都为胡适捏着一把汗，写了那样激烈的文字，却只得着一纸“警告令”，真是“亦云幸矣”！

对胡适文章表示不满的大都是社会革命论者。1929年6月，《白话三日刊》发表过一篇《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中云：

> 什么自由和法权，并不是没有，只是我们穷苦的人们没有罢了。胡适之不曾分开来说，以为他们也可以拿自由和法权给我们，所以他起先虽然愤愤不平，结果只好跪地求饶了。老实告诉你罢，现时固然没有约法，但是，假使由他们定出来，也决不会对于民众有利的(于胡适之这一等人或者是有利的)。我们革命的民众决不会向统治者要求颁布什么约法，请他们保障什么人权。我们只有向着敌人猛攻，以取得我们

---

① 胡适存来信，《胡适的日记》，1930年1月30日。

② 胡适存来信，《胡适的日记》，1930年5月8日。

的法，我们的权，和我们的自由！胡适之的口号与要求，无裨于实际，只有帮助统治者缓和民众斗争的作用。我们必须排斥这种哀求敌人的投机理论。①

以向敌人"猛攻"为唯一的斗争手段，将胡适的有关文章斥之为"帮助统治者缓和民众斗争"的"投机理论"，完全是二、三十年代左派的口吻。

与上文观点相近的是《自由》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云：

民权与约法是"争"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是用铁和血所换来的，不是用请愿的方式所能得到的，何况事实上连请愿都不可能呢！我们倘若真正想要民权与约法，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大踏步走过来，加入全国革命的组织，以铁和血的力量，去打倒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打倒袁世凯第二的蒋中正。②

反对一切合法斗争，主张诉之于"铁和血"，显然，这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宣言。

## 五、质问胡汉民

在国民党元老中，胡汉民一直以孙中山思想的捍卫者自居。胡适批评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大程序和知难行易学说，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制订宪法，自然不为胡汉民所喜。当时，他担任立法院长。1929年9月，他先后在立法院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说，阐述知难行易等有关理论，批评胡适。他说：

人民不知如何运用参政权，宪法岂不是假的，故训政乃〈必〉要的，殊不知我们现在已有宪法，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三全大会已经确定并分期实施训政工作，如再要另外一个宪法，岂非怪事！民元时代，因不遵守总理训

① 《白话三日刊》，1929年6月6日。

② 《自由》，第1期。

政方案，已误国家。总理著的《孙文学说》，至今尚有人怀疑。足见一般人是爱假的，不要真实的。①

胡汉民的这段话，处处针对胡适，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1930年11月，胡汉民在立法院再次发表讲话，中云：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的急切要求。

胡汉民由此批判说：

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②

胡汉民这里所说"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哲学博士"，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指的是胡适。"居心之险恶"，"不与共中国"云云，批判十分严厉。

对于1929年9月的讲话，胡适未加理睬；这一次，胡适忍不住了。11月25日，他致函胡汉民，中云：

这一段文字很像是暗指着我说的，我知道先生自己不会看《泰晤士报》，必定有人对先生这样说。我盼望先生请这个人指出我在那一天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何种长长的文章或短短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的话。倘蒙这个人把原来的报纸剪下寄给我看看，我格外感谢。③

12月10日，胡适再次致函胡汉民，要求他"务必拨出几分钟的工夫，令秘书处给我一个答复"。信中，胡适强调说："先生既认这句

① 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1929年9月24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1月22日。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2—33页。

话犯了'可以不与共中国'的大罪，便不应该不答复我的请问"。①

胡适从未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过胡汉民所指责的那一类文章，所以胡汉民当然指不出哪一天，更无从把报纸剪下来寄给胡适。12月9日，即胡适发出第二封信的前一日，胡汉民的"随从秘书处"复函胡适，说明原委，原来是：胡汉民的一位送"熟谙英文"的朋友说：当中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的照会到达英国时，《伦敦泰晤士报》曾引述"中国某哲学博士"的言论，说明"中国司法与政治种种不善"，以此"反证中国政府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无当"云云。胡汉民认为"某哲学博士"的言论竟成为帝国主义者维护在华利益的借口，足以证明当时"极端言论自由者"的过错，因此在谈所谓"言论自由"时"纵论及之"。复函并称胡汉民"始终不欲举著论者之姓名，殆亦朱子'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之意欤！"②

胡汉民"随从秘书处"的这封信实际上承认胡汉民的指责没有根据，但又声称胡适的言论"竟为帝国主义者维护其在华特权之借口"，而且引朱熹的话，讥刺胡适，当然不能使胡适满意。由于《大公报》的胡政之在一篇访问胡汉民的文章中有同样的记载，因此，胡适又于12月21日致函胡政之，询问胡汉民在谈话时，是否曾明确地说到自己的姓名。信中，胡适说："请你看一个被诬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面上，把当日的真相告诉我。"③25日，胡政之复函胡适，证实胡汉民谈话时，确曾指明胡适。胡政之并告诉胡适，21日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的检查，函面上留有检查图记，希望他注意。④

胡适自认受了"诬蔑"，按照他的可以控告国民政府主席的理论，他完全可以控告胡汉民这位立法院长，然而，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他对国民党仍然有种种不满，但是，他的态度却逐渐软化了。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4—35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4页。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5页。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6—37页。

## 六、调解罗隆基案

在批评国民党问题上，罗隆基是胡适的战友。从1929年4月出版的《新月》2卷2号起，罗隆基连续发表了《专家政治》、《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人权》、《我对于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罗隆基并不像胡适那样把矛头指向孙中山，相反，他却在某些地方以阐发孙中山思想的形式做文章，但是，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仍然是相当显豁、激烈的，例如《我对于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就说：

> 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上的榜样。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①

国民党不能容忍胡适的批评，当然也不能容忍罗隆基的批评。1930年10月，国民党上海第八区党部向上海警备司令部控告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并称罗是"国家主义的领袖"，有"共产党嫌疑"云云。11月4日，罗隆基在中国公学被捕，书包、身体，从内衣到外套，从帽到袜，都被搜查。同日，罗隆基被保释。事后，罗隆基立即写了《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向社会披露有关事实。文中，罗隆基激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党治"。他说："这段小故事，是很简单的，然而又是很严重的。在一个野蛮到今日中国这个地步的国家，我上面的那段故事是许多小市民很通常的经验。"罗隆基认为："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政府和党魁。"②当时，罗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讲授政治学，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理由，要求该校解除罗隆基的教职。

① 《新月》2卷8号。
② 《新月》3卷3号。

事关自己的同志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因此，胡适不能不出面干预。但是，他这一次的做法不同了——不再写文章诉诸于舆论，而是走上层路线，疏通化解。

当时，陈布雷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部长蒋介石兼），胡适便托和陈有关系的经济学家金井羊去游说，告以"此事实开政府直接罢免大学教授之端，此端一开，不但不足以整饬学风，将引起无穷学潮"，劝陈"息事宁人"。胡并称，必要时，他将亲赴南京一行。[1] 但是，陈布雷坚决不同意收回成命。1931 年 1 月 15 日，胡适致函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的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杂志对舆论界的贡献在于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用书面驳辩，认为有干法律，可向法庭控诉，法律以外的干涉只足以开恶例，贻讥世界，胡适并称：

> 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讦或阴谋叛逆之路上去。[2]

信中，胡适并以美国哈佛大学和五四前的北大为例，说明"在大学以内，凡不犯法的言论，皆宜有自由发表的机会；在大学以外，凡个人负责发表的言论，不当影响他在校内的教授的职务"。胡适称："此事在大部或以为是关系一个人的小问题，然在我们书生眼里，则是一个绝重要的'原则'问题。" 17日，陈布雷复函胡适，声称对他的意见"殊未能苟同"，"此事部中既决定者，当不能变更"，但陈布雷表示，便中当将胡函转呈蒋介石；对胡适提到的"原则"问题，陈布雷邀请胡适到南京一谈，"若能谈出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来，亦为甚所希望的事"。[3] 18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人言布雷固执，果然。"

---

①② 《胡适致陈布雷函》，《胡适的日记》，1931年 1 月。

③ 《陈布雷复胡适函》，《胡适的日记》，1931 年 1 月 18 日。

同日，胡适将《新月》2卷及3卷已出的三期各两份托金井羊带给陈布雷及蒋介石。在致陈布雷信中，胡适说：

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①

此信金井羊认为过于强硬，未带。

19日，胡适在罗隆基家中与潘光旦、王造时、全增嘏、董仕坚等人商议，胡适提出三条办法：1.先由教育部承认“我们的原则”，后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去呈文，请教育部自己转圜，然后罗隆基辞职；2.教育部已说不通了，可由张寿镛发表一个谈话，说他不能执行部令，如此，罗隆基也可辞职；3.教育部与张寿镛皆不认此“原则”，则由罗隆基自己抗议，声明为顾全光华大学而去。②同日，张寿镛拟具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密呈，中云：

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词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署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并非以光华教员资格教授学生。今自奉部电遵照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之福也。③

呈文强调罗隆基意在“匡救阙失”，要求蒋介石“爱惜士类”，“稍予矜念”。此呈经胡适修改并经罗隆基同意后发出。二人约定，此呈经蒋介石批准后即发表，发表后罗隆基即辞职。当时，金井羊仍然要求胡适去南京与陈布雷谈话，胡则要金转告陈；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1.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2.友意的批评，政府应

① 《胡适的日记》，1931年1月18日。

②③ 《胡适的日记》，1931年1月19日

完全承认。无此二项，没有“共同认识”的可能。①

在与胡适等商谈之后，张寿镛见到了蒋介石。蒋问：“罗隆基这人究竟怎么样？”张答：“一介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蒋再问：“可以引为同调吗？”张感到气氛转变了，连答：“可以！可以！”21日，张寿镛向胡适转述了这次会见的经过，胡适听了之后，忍不住笑出声来，说：“话不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同调的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的问题。”② 胡适劝张寿镛将呈文抄给罗隆基，劝罗辞职，并请罗声明：反对政府的“原则”，但不愿使光华大学为难。

实际上，胡适选择了一种不使南京国民政府“为难”的办法。

## 七、胡适逐渐和国民党接近

尽管胡适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然而，他并不反对国民党，当他写作《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时，就同时保持着和国民党要员宋子文等人的密切联系。胡适在日记中曾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③ 胡适对孙中山思想和国民党的批评，其实只是一种“补偏救弊”。这一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们糊涂，而有些读者却是清楚的，例如，有一位山东读者就致函胡适说：

> 我要向党国的忠实同志进一忠告：《人权论集》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因为此书把党国不自觉的错处，都历历指出，党国能翻然改悟，再不致惹民众的抱怨，可以有甚么危害？所以不但

① 《胡适的日记》，1931年1月19日。
② 《胡适的日记》，1931年1月22日。
③ 《胡适的日记》，1929年7月2日。

> 不必禁售，非党员固当各具一本，即党员亦应手置一编，以自策励。①

这位读者显然要比国民党的党国要员们高明。还有一位外国人在《星期字林报》上发表文章说："一个政府与其把胡适抓起来，不如听听他的劝告。"② 这位外国人也比国民党的党国要员们高明。

大概蒋介石多少懂得这一点，所以尽管上海等地方党部一再呼吁严惩以至通缉胡适，但蒋介石却在1931年任命胡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他询问张寿镛，罗隆基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引为"同调"，这句话虽然被胡适讥笑为"话不是这样说的"，但至少表示出，他企图将罗隆基一类人收为己用。

大概胡适也看出了蒋介石这一点，所以1932年11月，他在武汉将自己做的一本《淮南王书》送给蒋介石，希望他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③ 1934年4月，又托蒋廷黻带信给蒋介石，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而当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某些意见时，胡适就认为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④

此后，胡适和国民党就逐渐接近起来，"抛却人权说王权"了。

(原载《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8月)

---

① 胡适存来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1930年1月30日。
③ 《胡适的日记》，1930年11月29日。
④ 《胡适的日记》，1934年4月4日、10日。

#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 ——海外访史录

1990年7月，我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承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善本室主任戴廉先生热情接待，惠允披阅该馆珍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这批函电分订数十巨册，或系原件，或系抄稿。不少函电字迹潦草，未署时间，或所署不完整，而且大量使用隐语、化名，例如四工、工、延、福、门、门神、蒋门神、阿门、容甫、水云、远、马、马鸣、衣、力、黄梅、秋梦、不、不孤、跛、跛哥、桂矮、矮仔、某兄、爵、马二先生、香山后人、渔洋后人、八字脚等。但是，一旦突破这些困难，人们就会从中发现大量30年代中国政坛内幕，特别是一个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

笔者在哈佛访问时间仅两周，匆匆披阅，匆匆摘录，以下所述，系对这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的一点收获。

## 一、逼迫蒋介石下野

1931年初，因制订“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尖锐化。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长。蒋介石的这一蛮横做法立即激起了巨大政潮。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

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于广州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诘责其“违法叛党”，“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大员”。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蒋介石在举国震撼，呼吁团结对外声中，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香港与汪精卫会谈，决定两个国民政府同时取消，召开和平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10月13日，蒋介石迫于粤方压力，释放胡汉民。

1927年蒋介石“清共”之后，胡蒋之间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汤山被囚使胡汉民既愤怒又沉痛。释放后，胡即决意反蒋。他在一封密札中说：

>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①

这里的“门”，和其他密札中的“门神”、“蒋门神”，均指蒋介石，盖取《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这封信道出了胡汉民对蒋介石的认识，也道出了他晚年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及其策略、手段。

10月14日，胡汉民抵达上海。15日，致电非常会议委员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认为外患急迫，为甲午战争以来所未有，其原因在于“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人每欲扶党内之一部力量为己有”。他鼓励非常会议的委员们“彻底觉悟，力图团结”，改正过去种种错误。② 16日，对报界发表谈话，批评南京政府“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

---

① 《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未刊函电，均藏该馆，不一一注明。

② 《致粤非常会议各委员电》。

唯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1] 25日，又致函广东省市党部，认为国民党已到了非进行彻底改革不可的时候；不改革，不但无以对国民，而且等于自掘坟墓。函称：

> 自袁世凯以来，军阀不一，其始莫不骄横一时，而其罪恶既显，终莫不相继仆灭。历史可信，公理不诬。[2]

胡汉民这里明骂袁世凯等，暗斥蒋介石。他要求粤省国民党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警惕“阴谋分拆手段”。上述电函及谈话表明，胡汉民甫经释出，立即高揭抗日旗帜，准备团结广东国民党人的力量，与蒋介石周旋。

“九·一八”以后，冯玉祥忧心国事，派代表到上海与胡汉民接洽。10月27日，胡汉民复函冯玉祥，认为“辽吉事起，知非举国一致，无以御外侮”。当时，宁粤双方代表正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胡汉民称：“结果如何，似难预料，惟默察形势，则暗礁孔多。”[3] 同月28日，古应芬逝世。30日，胡汉民致电在广州的妻兄陈融（协之），请其转告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萧佛成诸人：

> 一、此间决坚持不挠，以继湘翁之志；二、无论如何，弟与汪决不入京；三、追某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4]

湘翁，指古应芬，他是广东方面的反蒋中坚。某，指蒋介石。“弟与汪决不入京”云云，表明胡汉民正和汪精卫联盟，摆开和蒋决战的阵势，力图追蒋辞职，并对国民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此电可以看作是粤方代表参加和平统一会议的斗争纲领。会上，粤方代表攻势激烈，以致宁方代表蔡元培等人不得不一再以私人资格表示：“蒋下野不成问题，要盼广东同志不要相迫太紧，不要给

① 《亡国之三无主义》，《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
② 《致粤省市党部函》。
③ 《致冯玉祥》。
④ 《致粤中央电》。

他面子太难过。"[①] 在党政改革案中，粤方代表提出军人不能担任政府主席，不得为五院院长，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职位等建议，显然都体现着胡汉民的意图，其矛头直指蒋介石。

宁粤和平统一会经过激烈争吵，确定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进而谋求合作。在广州"四大"上，要求蒋介石下野仍然是重要议题。胡汉民除主张"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外，又提出"推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的口号。12月5日，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由胡汉民领衔通电，催促蒋介石下野，解除兵权，否则，决不到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国难深重，加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的做法极为不得人心，各方吹起了强烈的反蒋风。在粤方的坚持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总司令等本兼各职，胡汉民的"迫某辞职"计划取得胜利。

## 二、广泛联络，组织反蒋力量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随即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制度改革案，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1932年1月1日，胡汉民等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此，胡汉民即留居香港，成为西南方面的精神领袖。

孙科内阁虽然成立了，但这个内阁既无权，又无钱。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孙科无奈，电邀蒋介石重返南京，并于25日辞职，由蒋介石重掌大权。28日，汪精卫背弃了"决不入京"的诺言，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长，从而形成蒋汪合作局面。

① 孙科：《广州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的当夜，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鼎等指挥下，奋起抗战。30日，孙科密电胡汉民云：

宁方对十九路抗日事，最初主退缩，避免冲突。战事起后，则硬责将领，不得违背命令，擅起战端。嗣知军民一致，不可遏抑，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云。预料日方援军日间必到，如京方仍无彻底决心，十九路必为牺牲。闻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届时南方若无相当组织，中国将成无政府之局，望公与粤中筹继续存亡，以维民族生机。①

南京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爆发完全没有准备，缺乏坚决抗击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孙科对此有清晰的了解。他估计，南京政府将会崩溃，建议胡汉民在南方建立“相当组织”。但是，胡汉民却比较冷静，他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洛阳，准备抵抗，特别是对十九路军是否继续支援等情况尚不清楚，“我方如决裂过早，反使其有所藉口”，主张“暂时审察”。②

尽管胡汉民一时还不准备在广州另立政府，但是，他却在广泛联络，组织力量，待机倒蒋。其联络重点，一是湖南与西南各省，一是华北，一是海外。

当时，湖南与西南各省分别为何键、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王家烈、龙云等实力派所统治，矛盾重重，各自割据。胡汉民企图将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支和南京政府抗衡的力量。2月2日，胡汉民致函何键，试探其态度。函称：

幸十九路军持正不屈，上海得不为辽沈之续，而政府当道未闻筹战守之策，遽以迁都洛阳闻。国难益迫，陆沉无日，丁兹时会，不识先生将何以教之？

---

① 《广州转来上海电》。
② 展：《跋〈广州转来上海电〉》。

十九路军由于得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初撤离上海。5月，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胡汉民派杨芷泉携函西行，联络刘文辉、王家烈。函称：

今宁中当局所以谋分拆我西南者，其惟一方策在以西南制西南；弟则反之，以为惟有以西南结西南，始足以确实齐一西南各省之步骤，以自保此干净土，亦即为来日推进大局地。

在此前后，胡汉民又致函龙云称：

弟以为今后欲复兴革命，推展大局，首在党务之整理，次则为政治上之改革，而西南之精诚团结，力谋建设，尤为当务之急。

自1932年起，胡汉民还曾派出使者会见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目的都在于调解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结成西南反蒋联盟。

华北方面，胡汉民的主要联络对象是冯玉祥。1932年3月，冯玉祥得知南京政府正在上海与日本侵略者谈判，准备签定密约，非常悲愤，命部属张允荣密函胡汉民，告以北方情况，要求西南方面联络闽、赣、湘、鄂等省，合谋举兵。函称：

蒋氏谋粤之急，已自胡宗南等入浙可睹。惟奸憝毒计，对粤亦将对北，韩遂当其冲。向方亦心愤于沪败与东北之亡，颇思及时举义，因请焕公于适当时间入鲁主持北方局面。至将来与事诸军，宋、梁等部已有约定，他在〔者〕尚在协商。设西南能呼应于闽、赣、湘、鄂，因对日之失，动全国之听，蒋氏可倒也。①

向方，指韩复榘；宋，指宋哲元。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汾阳峪道河，北方反蒋势力暂时蛰伏。此际，由于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又企图乘时发动。此函写于3月18日。24日，冯玉祥自徐州到达泰山，隐居普照寺。过去，人们只知道是为了养病、读

① 张允荣：《致展堂先生函》，1932年3月18日。

书，“努力充实学问”。此函说明，冯玉祥此行是应韩复榘之请，目的在于准备北方起义。

对于冯玉祥的反蒋计划，胡汉民自然是支持的。5月5日，胡汉民复函称：“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他表示希望知道得更具体一些：

> 亦欲稍闻方略，俾得先事预图，南方同志精神团结，意志不移，遇有举措，必竭诚襄助也。①

自此，冯、胡二人声息相通，联系日益密切。当年9月，冯玉祥决定以张家口为抗日基地。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元。②

冯玉祥之外，胡汉民与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等人之间也均有信使往还。11月13日，胡汉民致函孙殿英，首称：“今日党国外遭于方张之寇，内劫于独裁之魁，前途危险之极。”次称：“南北当一致而不当分岐，在动作上，南北当互相促进，而不当各存观望。”可以看出，胡汉民期望，一旦举事，能够出现一个南北并起的局面。

华侨历来是革命党人的支柱，因此，胡汉民十分重视对国民党海外支部的工作。1932年，他致函美国总支部，指责蒋介石为“劫持本党之军阀”。函称：

> 过去所施行者，实为民国以前相承一贯之军阀之治，而非本党之党治。盖在事实上，本党以军阀为梗之故，实未尝一日得行是政策也。

同年，又再次致函美国总支部，指责蒋介石等对日妥协。他说：“苟政府当局甘冒天下之不韪，而实行屈辱，则为党为国，必须严重反对。盖我人可一致于抗日，不能一致于降日也。”胡汉民的这些观点，符合海外华侨的民主、抗日要求，因此日益赢得美

---

① 《致冯玉祥》。

② 曹四勿回忆，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其具体时间则据曹四勿先生向本文作者面述情况考定。

国、加拿大、日本、南洋等地国民党组织的支持。

当时，国内出现不少抗日或反蒋组织。公开的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讨倭军，秘密的如黄埔革命同学会、浙江革命同志互助社、中华民族自救会、励进社、青年军人社等，胡汉民均一一联系，予以支持。

胡汉民一贯标榜党治，在广泛联络各地反蒋力量的同时，便着手组建新国民党。该组织的建立时间，大体在1932年5、6月间。同年，胡汉民复蒋振函云："所列重建本党之十问题，弟亦表同意，刻正分途进行，务以严明之纪律，团结同志，恢复民十三年以前一种自动革命之精神。"该组织秘密活动，以胡汉民为主席，邹鲁为书记长，"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①，入党须宣誓，有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中央领导机构称为"中央干部"，地方领导机构称为"地方干部"。例如，在上海即设有"地方干部"，由陈嘉祐、熊克武、柏文蔚、程潜、刘芦隐任"干部委员"，以刘芦隐为书记长，其工作范围为苏、浙、皖、赣、湘、鄂、川七省，每省再设分部。② 不设分部的省份则设有特派员。它虽建立在国民党的基础上，但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新组织。

## 三、派遣部队北上，"以抗日为倒蒋"

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日益为国人所不满，胡汉民由于主张抗战，逐渐争得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拥护。1932年12月，张学良派秘书陈言赴港，会晤胡汉民。19日，胡汉民复函，鼓励其振作精神，坚决抗日。函称：

> 比月以来，外侮日深，晏处覆巢，宁有完卵。所期兄以决死之精神为民族求生路。桑榆之失，断可收于东隅，至于

① 曹四勿回忆，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② 《致上海各同志》，1933年11月。

内政意见及南中同志意，经与陈同志详谈，俱托归报，希深察为幸。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袭山海关，3日，山海关及临榆县城失守，张学良命陈言致电胡汉民，表示决心抵抗之意。2月4日，胡汉民因不见张的实际动作，派陈中孚携函北上督促。函中，胡汉民分析日本侵华的特点与中国面临的危险说："弟谓日之于中国，其侵略方式为蚕食而非鲸吞，故经一度之攻城掠地，即出之以延宕和缓之手段，巧为解脱。当局受其愚蒙，国联受其欺骗，而日人之计乃大售。苟不能窥破此点，积极抵抗，并进而收复失地，则日人本此政策进行，华北殆将沦亡，中国且为日有。""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有口难言，但他曾将个中情况含蓄地告诉胡汉民。对此，胡汉民表示：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独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

胡汉民称：西南虽主张抗日，但限于地域，效命无所，希望张学良能团结华北将领，振奋一心，抗击日本，自已将力为应援。2月25日，张学良复函胡汉民，表示抗日御侮的坚决意志，希望西南能从精神、物质两方面给予鼎助。函称：

良以不才，遭值多难，只思少裨艰局，庸敢计及一身，御侮决心，誓当不二。

然而，事情并不决定于张学良个人。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进迫长城脚下。7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不久出洋。

当时，蒋介石专注于"剿共"。但是，他不能不顾及华北的危急局势。3月8日，蒋介石抵达石家庄。胡汉民认为蒋介石的北上将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危及将领间已经形成的联合局面。同月，胡汉民致函陈济棠、萧佛成、邹鲁、李宗仁、邓泽如、刘芦隐等六人

称："某为不抵抗主义者，华北为某所有，则抗战之希望已成灭绝。在此时对内对外，非设法打破某在华北之阴谋必无以策善后。"他提出四项对策：

1．选派军队北上，参加抗日。胡称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一以示西南抗日之诚，一以作华北将领之气，亦以戢某对日妥协之谋。"胡并指示："此项部队对内对外必须与华北将领取同一之态度。"

2．成立华北军事组织。西南方面除同情赞助外，还须调遣人材，接济经费，作实际促进。

3．华北军事组织必须"以抗日救国为名"，并须笼罩鹿钟麟、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及东北各旧部，西南方面亦应选派军事人员参加。

4．在北方成立西南统一办事机构，委派富有资望、能力的同志前往主持，统筹外交、政治、党务、军事各方面的工作。

函末，胡汉民表示："万不能更持徘徊观望之态度"，"惟有投袂奋起，知其不可而为之"。①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但蒋光鼐、蔡廷锴等不忘抗日，逐渐与胡汉民等结合。1933年2月初，西南方面成立了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方的国防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林云陔为委员。其后，胡汉民陆续致函冯玉祥、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等，建议华北能建立同样的组织，以便"整齐抗日步调，俾南北两方于捍卫国家能互相促进"。② 3月1日，方振武变卖家产，在山西介休成立抗日救国军，首树义旗，誓师援热。当时，华北将领大多主张抗战，旧西北军方面并推鹿钟麟为总指挥。同月24日，鹿钟麟致电胡汉民、李宗仁等，欢迎西南方面"雄师北指"。电

① 《致伯南、佛成、海滨、德邻、泽如、芦隐》。
② 《致韩复榘、石友三》。

称："此次西南若能从速出兵，督促作战，必能转移局势，确定抗日大计。"① 鹿自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即闲居天津。25日，胡汉民复电鹿钟麟，对他的"投袂奋起"表示欣慰，告以西南方面正在选派军队，对于华北将领的"自救救国"行动，愿提供"实际之援助"。②

在胡汉民的倡议下，广东、广西、福建迅速筹组西南联军。胡汉民并致函刘湘、王家烈等，要求同时出动。3月下旬，福建援热部队自漳州、龙岩出发，计划经潮汕、东江至粤汉路与粤、桂两省部队汇合后通过湖南北上。4月4日，方振武部经过艰苦跋涉，抵达河北邯郸。15日，胡汉民致函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三人，认为联军北上问题，期在必行，但联络北方抗日军队亦不可缓。③ 同月，胡汉民派其女木兰访问程潜，争取支持。当时，正是陈诚进攻中央苏区惨败之后。23日，程潜复函称：

> 木兰侄来，敬悉一切。关于各方情况，尽告木兰侄面达。自陈诚失败后，庆父大露恐怖之象，为西南出兵抗日最好时机。若失此机，经彼多方弥缝，将来必更棘手也。④

庆父，借指蒋介石。古语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信中，程潜不仅支持西南出兵抗日，而且表达了强烈的反蒋情绪。5月18日，胡汉民复函陈嘉祐、程潜，告以一项绝密计划：

>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〇［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⑤

胡汉民要求程潜密告湘军将领，"忍受此一关，以静俟大局之推展"，"华北局势必有急变"。贤初，蔡廷锴的字。他于4月12日被推为西南抗日军总指挥。此函表明，胡汉民、蔡廷锴等准备在师

① 《广州转李德邻先生转季雨农先生》。
② 《致鹿钟麟》。
③ 《致伯南、德邻、贤初》。
④ 《致展公》，1933年4月13日。
⑤ 《致护黄、颂云》。

出武汉之后，与北方协同动作，掀起反蒋高潮。

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因此，当时不少爱国人士(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都认为抗日必先倒蒋，胡汉民等人的上述绝密计划，正是这一思想主张的体现。

## 四、支持华北抗日力量，筹备粤桂闽三省独立

华北果然动作了。

热河省会承德失陷后，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仍然专注"剿共"，无心对日本侵略作坚决、持久的斗争。5月15日，黄郛受命北上，谈判停战问题。在何应钦支持下，黄郛于22日与日方达成协议。26日，冯玉祥、方振武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与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①

华北既经动作，胡汉民就准备把他的"师出武汉"计划付诸实施。5月29日，胡汉民在《致衮尧》函中说：

> 手书到时，宁府之对日屈辱已成事实。此间同志早经决定，联合华北将领一致反对。焕章同志刻已于26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统率长城外各路义军及西北军旧部。西南抗日军亦积极北进，同时则大举剿共，使西南兵力推入长江。

胡汉民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回到国内，宣布讨蒋，主持一切。同函又称：

> 须察省外交、军事、财政各事准备完竣，然后对误国、

① 《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

卖国之奸徒声罪致讨，方易收旋转乾坤之效。弟现正努力为根本之规画，诸事就绪，自必返国亲行主持一切也。

31日，塘沽协定签字，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与热河，胡汉民极为愤怒，立即向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拨款，并密电冯玉祥云：

> 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黄○○，即行讨蒋以抗日……此间当即一致动作。刻拨充○○元。①

末署“延、马、远、衣”。“延”为胡汉民，“马”为萧佛成，远为邓泽如，“衣”为邹鲁。② 电稿中所称“何○○”、“黄○○”，当指何应钦与黄郛(膺白)。

在粤、桂、闽三省实力派中，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对抗日讨蒋都持积极态度，只有陈济棠犹疑不定，因此，南方要一致动作，必须首先说服陈济棠。6月3日，萧佛成致电胡汉民云：

> 昨与爵密谈约三小时之久。弟反复开陈，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③

爵，指陈济棠。对于陈济棠说来，最重要的是巩固他已经取得的地盘和“南天王”的地位，要他参加抗日讨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萧佛成反复开导之下，“爵似大觉悟”，表示了讨伐蒋、汪的决心，但同时声称，必须待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白崇禧等来粤共商。7日，陈铭枢、蒋光鼐、李宗仁、李品仙等抵达广州，萧佛成再度与陈济棠商谈，提出：1.西南独立，与南京脱离关系；福建公开加入西南；若福建出兵浙江，军饷由粤担任；2.华北、华中各将领仍须派员与之联络，若能先由彼方发动为佳。当

---

① «致焕公»。

② 延为胡汉民自署；马，马鸣，萧佛成化名，取佛教中马鸣菩萨之义；远，邓泽如化名，邓字远秋；衣，邹鲁化名，取邹鲁为衣冠文物之邦之义。

③ «广州来电»。

日下午，萧佛成、邹鲁、邓泽如、唐绍仪、李宗仁等会谈。邹鲁问李宗仁，如果三省独立，粤不出兵而闽出兵，桂当何如？李宗仁初时感到难以回答，继而慷慨表示说："不惟牺牲我们，且牺牲全省人民之利益以从其后。"① 在此期间，邹鲁、萧佛成、陈融等与陈铭枢也进行了紧张的会谈。陈铭枢称："抗日、剿共必要倒门神"，"门神现时虽未倒而等于倒，倒之之后，应如何办法，我们应极注意。"陈并再三声明，他自己并未组织社会民主党。邹鲁等人对陈铭枢的态度很满意。6月10日，陈融致函胡汉民报告说："跛兄连日所谈，均甚接近。"② 1931年陈铭枢在香港时，所住旅馆失火，从窗口跳下，足部受伤，自此不良于行，胡汉民等因此在密札中称之为"跛兄"或"跛哥"。

三省会谈有了初步结果，但是西南联军的进展却并不很顺利。在福建援热部队出发之后，广东派出了独立第四师，广西派出了第二十四师，准备联袂北上，何键并电令沿途各县妥为招待，但是，塘沽协定签字之后，蒋介石电令蔡廷锴，命援热部队火速回闽。当时，福建援热部队已经抵达湖南郴州、耒阳一带，不得已忍痛回师。

蔡部回闽，胡汉民的师出武汉计划便遭到挫折，但他仍积极活动，力图把握时机。6月17日，派程天固东行，探询对美外交；23日，派曾伯兴北上，联络阎锡山；7月3日，致函叶夏声，建议将各方捐赠援热部队的款项移赠方振武部。29日，致电海外国民党人黄滋、陈雨亭、李白传云：

> 今两粤业已一致，福建方面尚有饷项问题未能解决，如磋商完善然后正式揭露，一面树立党政中枢，号召全国，一面组织联军，北出长江。长江、华北各军半有接洽，推倒国贼，指顾间也。

可见这时候，胡汉民还在准备"北出长江"，并准备"树立党政中

① 陈融：《致福兄电》。

② 《黄梅致福兄》(陈融致胡汉民)。

枢”，“推倒国贼”，公然和南京政府对着干。电中说明：“福建方面尚有饷项问题未能解决”，显然包含着向海外募捐的意思在内。

在粤、桂、闽三省实力派中，粤方最富，桂、闽比较拮据。倘使陈济棠不肯拿出钱来，桂、闽二省很难长期支持一场对蒋介石的恶战。据蒋光鼐复邹鲁电云：

> 所示办法，本无不可，但未审已否商得桂方同意？本军穷饿，倘无两月积粮，不敢轻动……乞予一次先拨百万，以资应付。①

末署“光。文。”文为12日。此电虽未署确切月份，但所述内容可与上述胡汉民电相印证，其时间当不会相距很远。

有几天，财政问题似乎不大了。8月1日，胡汉民致函陈嘉祐云：

> 今财政问题粗告解决，惟西南军事动作如何进求一致，财政问题如何筹划挹注，俾达粤、桂、闽三省联军分出长江之目的，仍在详密规画之中。

然而，胡汉民乐观得太早了，财政问题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果然，8月18日，胡汉民《复衮尧》电又云：

> 此间一切仍在计划推进中，粤将领所视为困难者厥为财政，故一切措施，遂未能放手做去。至内部意见，虽有小小不同，然于倒某救国一点固甚一致也。

电中所称“粤将领”，当指陈济棠，这位财神爷不肯拿钱，其他种种，当然无法“放手做去”。

正当胡汉民在南方为财政和内部“小小不同意见”而苦恼之际，北方却风云突变。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浴血苦战，迅速收复察北大片失地，进而准备规复东北四省。然而南京政府一面组织大军“围剿”，一面分化瓦解，同盟军的境况日益艰难。8月5日，冯玉祥通电收束军事，交出察省军政大

① 《秋梦致福兄函》(陈融致胡汉民)。

权，随即回泰山隐居。冯的失败给了胡汉民巨大打击。24日，胡汉民电冯云："左右入鲁，抗日工作亦由此告一段落。观察大势，时局更新，似尚有待。"30日，致电柏文蔚，除了希望他继续维系"长江军事"外，特别说明，"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①可见胡汉民对陈济棠已经很失望了。

冯玉祥退入泰山以后，中共河北"前委"决定支持冯部方振武、吉鸿昌两军继续奋斗。方、吉将抗日同盟军易名抗日讨贼军，明确揭起反蒋旗帜，准备沿热察边境，经十三陵、小汤山等地，东进冀东。② 9月20日，方、吉两军进入河北。23日，方部进占牛栏山，作袭击北平准备。对抗日讨贼军，胡汉民曾力图予以支援。9月25日，致电萧佛成等，声称方部"且进取密云，当不忍其给养之不给，坐视其覆亡"。29日，方振武致电胡汉民，宣称"在钧座指导下抗日讨贼"。"即令牺牲万有，亦所不辞"。方并称，华北外交关系重要，要求胡选派干员，常驻天津主持一切。③10月5日，方振武致电胡汉民，报告在南口、昌平、汤山一带的胜利，声称计日可达北平城郊，要求胡汉民"推动各方火速出兵，以收南北夹击之速效"。④ 6日，再电胡汉民：

> 不日直捣北平，务希火速推动，群起讨贼，国家幸甚！倚戈陈词。⑤

方振武的崛起再一次燃起了胡汉民的希望。他致电陈融说：

> 假如其遂能入北平，或可造一与西南同样局面，为联军会议制以待各方之进展耳。⑥

6日，胡汉民决定以广东后援会名义一次拨给方部军费三万元至五万元，但是，这笔款项未及寄出，方军即因孤立无援失败。⑦

尽管冯玉祥、方振武先后失败，但是，胡汉民仍然认为，华

① 《致烈武》。
② 《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③ 《天津来电》。
④⑤ 《广州来电》。
⑥ 《致力兄》。
⑦ 胡汉民：《致陈济棠》，1933年10月19日。

北是具有潜力的地区。10月19日，胡汉民任命何子佩为华北军事联络专员，要求他代为慰问华北同志，说明胡的内政、外交主张以及对于全国的规画。胡汉民为其规定的工作方针为：

1. 切实团结华北革命将领，通电讨贼，并肃清盘踞北平之反动势力，树立华北之中心救国组织。

2. 以相等于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之组织为最宜。华北将领之通电发出，组织成立，西南即树立党政中枢，正式宣告与卖国政府断绝关系，并领导华北及长江之革命力量，声讨独夫，从事抗日。

3. 为外交上之运用计，不妨暂以安定华北为主张，而不以抗日为标榜，但华北将领之通电必须痛数独夫罪状，示与卖国政府绝缘，无复有妥协余地。

4. 华北将领通电发出、组织成立后，此间即派遣大员北来，规画一切。其财政外交上之责任，纯由西南革命政府负之，但华北将领必须于抗日目标下切实坚持并接受西南革命政府之领导，完成讨贼抗日之全功。①

在派出何子佩的同时，胡汉民又分函阎锡山、冯玉祥。致阎函总结前数月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不独南北未能一致，即北与北间亦多隔阂”，要求阎“领导群伦，使华北力量团结，与西南为一致”。②致冯函则通报南方情况，说明“此间主旨，仍在团结粤、桂、闽诸省，相时而动”。③

## 五、福建事变期间

胡汉民计划中的西南独立，由于陈济棠迁延犹疑等原因，终于未能发动，然而福建方面却终于等不及了。

① 胡汉民：《致何子佩》，1933年10月19日。
② 《致阎锡山》，1933年11月2日。
③ 《致冯玉祥》，1933年11月11日。

十九路军调福建"剿共"后，陈铭枢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压迫，无法在南京立足。1933年1月，愤而赴欧洲考察，同年回国，活动于香港、福建之间，联络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计划反蒋，同时派人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讨论合作问题。9月，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10月陈铭枢、李济深等在香港聚会，决定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11月16日，李济深派其弟李济汶持函面见胡汉民，函称：

> 深南归，已历一载，本意在追随吾师之后，团结西南各省，共同讨贼救国。顾蹉跎一载，数失良机，而有实力之当局者持重如故，循此而往，势不至任国贼断送国家不止。而十九路军以处境较困，责任较明，有义无反顾，迫不及待之势。连日得其函电，促往商讨讨贼大计，照连日报章上所载情形，亦似有即行发动讨贼之趋势。故深决定即行前往观察督促，进行一切。

李济深要求胡汉民"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18日，李济深与陈友仁、徐谦等到达福州。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中华民国年号，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旋即组织生产人民党。同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名致电胡汉民、萧佛成等，指斥蒋介石独裁祸国，媚日残民，追述三省近年来共谋反蒋的历史。电报以"陈涉发难于先"自喻，以"沛公继起于后"喻胡，要求胡汉民等"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①

三省联合倒蒋本来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福建方面改国号，造新党，特别是联合共产党等做法，都超出了胡汉民所允许的范围。因此，最初他颇为迟疑，不知道应该如何答复陈铭枢

① 《陈铭枢等来电》，《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

等人的来电;"措词太硬，则宁方得意，桂方怀疑;太软则虑跛等有以藉口为反宣传，发生其他之不利"。①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了如下对策:

对宁闽——两罪两责而偏于责宁。11月27日，胡汉民致电冯玉祥称:"大致对宁对闽，今后将同在我人反对之列。"同日，又致电杨虎城称:"闽中之变，亦实南京卖国政策激之使然，否则何至铤而走险，自弃其抗日剿共之历史至于此极，故我人固宜罪闽，然尤当罪宁也。"当时，广东有人主张蒋介石下野，胡汉民赞成这一主张，认为这样可以:1.示天下以公道;2.消释十九友(指十九路军——笔者)一部分之热愤;3.使桂方及其他反蒋者同情于我。② 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根据胡汉民的意见，曾经发电要求蒋介石、汪精卫"避路让贤"，电称:"推寻祸始，不能不深咎于独裁政局之罪深恶极也。"

对粤桂——"救正调和"。陈济棠和陈铭枢有矛盾，因此，他的兴趣一在于防闽，二在于防共;李宗仁则急于反蒋，福建事变后立即致电陈济棠等，建议三省合兵，开府广州③，树立中枢。胡汉民对这两种态度都不满意 他曾在一封信中说:"爵专心对闽，故反蒋不敢太着力;不专心对蒋，几欲与闽附和而忘却共匪之为祸。"④ 这里说的"不"以及其他密札中的"不孤"，均指李宗仁。11月下旬，广西方面两次派人会晤胡汉民，催促行动。第一次，胡汉民答以"派人与各方接洽，为召集各省代表一致反蒋之预备";第二次，胡汉民答以"讨蒋以桂为前方，粤为后方;防共以粤为前方，桂为后方"。⑤

尽管胡汉民对福建方面的做法不满意，但是，事变的发生毕

①② 《致力兄》。

③ 《致福兄》。

④ 《致力兄》。按，李宗仁，字德邻。《论语·里仁》有"德不孤，必有邻"之法，故胡汉民等以"不孤"、"不"作为李宗仁的代名。

⑤ 《致力兄》。

竟造成了一种形势，使他觉得有机可乘。因此，一度考虑过组建政府问题。11 月 31 日，他致函陈融说：

> 开府地点是一问题，而第一步似以广西为适当，其理由有五：人心信仰，无复怀疑一也；素无财富之名，则不必铺排，而各方来者易于应付二也；因湘鄂吃紧易于联络应援三也；外交较易应付，不遽为红毛、矮子之威胁四也；敌用飞机袭击及闽中大军之使用俱不便五也。①

胡汉民并告诉陈融，闽变初起时，他曾就此和李宗仁商量过，如果现在陈济棠仍以先发为难，不愿意在广州开府，则不如选择广西。12月中旬，他又致电在上海的陈群、孙科、胡毅生等人称："前此欲以组府号召天下讨蒋，今则当促动与联合反蒋之战线进行，至蒋势穷蹙，然后组府。"② 18 日，致驻美国三藩市总干部电称："组府一事，尚非今兹所可实行。"显然，胡汉民的"组府"计划碰到困难，不得不向后推延了。

福建事变后，南京政府企图拉拢胡汉民及西南实力派。12月 11 日，张继等到港，与胡汉民会谈，呼吁团结，邀其入京。胡汉民答称："你们请我到南京，我想请你们出南京，何以故？因为要你们认清自身的地位，尊重自身的人格，不附和军阀去叛党卖国。"他提出，南京当局是导致事变的"罪魁"，必须实行政治和党务的根本改革。③ 15日，胡汉民发表《对时局宣言》，声称："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的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宣言》提出："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以组织一真能代表国家人民利益之政府。"④《宣言》并提出"带兵者绝对不得干预政事"，"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制度"等主张。22 日，张继等访问粤、桂后回港，再

---

① 《致力翁》。
② 《工致力翁》(胡汉民致陈融)。
③ 胡汉民：《政治上之责任问题》，《三民主义月刊》第 3 卷第 1 期。
④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

次与胡汉民会谈。关于此次会谈内容，胡汉民密告陈融说：

> 弟见渊时，已动以闽事无论如何必先赤化而终落倭人之手，倭得闽则两广亦将为其他之某国之染指，故此时粤桂难以坐视，而桂尤不能久忍，故惟有政治解决之一途。①

渊，指张继。所谓“政治解决”，胡汉民概括为“蒋汪下野，福建回头”八字。当时，南京政府积极准备对闽用兵，胡汉民担心此举会使十九路军与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加深，竭力加以反对。他说：

> 如此，不论胜负，闽军与八字脚之结合必愈深而无从自拔矣。彭德怀、朱德附八字〈脚〉后已使门神办不了，假如十九号赤化……走险愈深，岂易收拾耶！②

同月28日，胡汉民在《复袁冠新等》函中又说：

> 人民生计垂绝，国脉危于累卵，凡可以循和平轨道以贯革命之主张者，皆当遵从。总之，南京统治弟以为实不足定。

此函表明，在军事倒蒋屡屡失败之后，胡汉民“政治解决”的意识再度萌生了。

福建事变领导人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12月中旬，十九路军将领致电胡汉民，声称“事先未明真相，全为一二野心家包办，致铸此错”③，要求胡派人前往指示办法。胡旋即派黄河鲤〔澧〕前往，指示以“复国徽、复党籍为先决，捕八字脚为贡献”。④所谓“复国徽、复党籍”，即要求废止中华共和国称号，恢复国民党党籍；所谓“捕八字脚”，即反共。1934年1月，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发动“讨伐”，福建人民政府日益危急，李济深、陈铭枢电告胡汉民，表示愿按其办法，“取消一切组织，回十九路军

①② 《工致松兄》（胡汉民致陈融）。
③ 转引自胡汉民：《致驻三藩市总干部》，1933年12月18日。
④ 《工致力翁》。

本来，连属西南"。[①] 胡旋即致电在上海的程天固，请其迅速与孙科商量，设法使蒋军停止进攻。[②] 但是，第十九路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1月21日，沈光汉、毛维寿等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其后，胡汉民曾为保护十九路军的残余力量做过一些工作。24日，胡汉民致电阎锡山云：

现闽中荒谬之政党组织已无形解体，故于善后一切，正督促各方进行，务使此抗日讨贼之力量得以保护。

2月2日，陈济棠派人至龙岩会晤蔡廷锴，接洽收编十九路军残部，得到蔡的同意。该部旋即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 六、再次联络张学良

胡汉民一直将东北军视为重要的抗日反蒋力量。1933年3月，张学良决定下野出洋，12日，抵达上海。25日，胡汉民派何思毅持函劝阻，函称：

自热河沦陷，吾兄去职，华北局面，日趋混沌。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闻将有远适异国之志，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恝然远行，似非其时。即不得已而行，亦须力策善后，挽回危局。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此间同志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

4月8日，张学良复函，对胡汉民的关怀表示感谢，声言决不敢抛弃救国责任。函称：

良乍息薪劳，闭门自讼，乃蒙远垂记注，勖以方来，高谊殷隆，曷胜感奋。抚时多艰，耻痛毋忘，苟图少补涓尘，敢委匹夫之责。

但是对于胡汉民的建议，张学良却完全没有任何答复，仅说："尚祈时锡教言，俾其待罪之身，多叨宏益。"

---

①② 《致力、海》(致陈融、邹鲁)。

福建事变爆发，张学良得到来自国内秘书的电报："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务请立即返回。"① 于是，张学良决定东归。他一面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同时电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12月23日，胡汉民派刘显丞迎接张学良，报告国内政情及胡的意图。1934年1月6日，张学良，胡汉民在香港会晤。8日，张学良抵达上海。12日，陈言北返，邀刘显丞同行。胡汉民委托二人再次向张学良陈述自己的意图，劝张"彻底做去"，函称：

至对大局主张，亦断不以环境之转变而有所移易也。国事至此，有救亡之责者，不当狃于目前之小利，惟宜彻底做去，则中国庶有可为，想存亡绝续之间，先生必能熟之。

刘显丞抵沪后，张学良为了躲避特务的注意，于深夜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约见刘。张称："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张并称该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嘱刘显丞回港报告，如西南方面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切商。② 胡汉民得到刘显丞的报告后，即致函陈融，命其与陈济棠密商。函称："弟意我人此时宜厚结广西而密与北方联络，沉机观变。如伯兄意亦谓然，弟当令刘秘密上省，以备伯兄面询一切。"③ 3月1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胡汉民认为此事"利害各半"，再次致函陈融说：

我已嘱刘显丞可即与小张切商军事之联络，小张就"剿匪"职，其部队将来必调长江上下游，此点利害各半，利在与南方联络，而害在易被分割、分化也。④

同月27日，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联席会议，李宗仁自桂前来出席，他积极赞成联络张学良的方

①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②③ 《四工致松兄》(胡汉民致陈融)。
④ 《致力翁》。

针。会后，陈融致函胡汉民说："此间联小张，亦政策之一变，此事不孤亦甚著力，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挟门神不可。"① 西南的反蒋派们一直渴望着能演出《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痛快淋漓的场面，张学良的归来使他们增添了几分希望。

哈佛所藏胡汉民档案中没有胡、张之间进一步联系的资料，看来是张学良逐渐怀疑反蒋抗日而倾向于拥蒋抗日了。

## 七、开府西北与军事倒蒋梦想的破灭

福建事变失败后，胡汉民一面联络张学良，一面将目光注视到西北。

胡汉民和阎锡山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和杨虎城也早有联系。6月7日电杨，希望他"内除奸凶，外抗暴日"。8月26日，再电云："望团结各同志，密为策进。"11月27日，三电云："尚希一致奋起，共为主义效力。"同日，致电吉鸿昌云：

> 今后救国大计，厥惟归本主义，致力于西南，西北之联络。今平津各地势为暴日所必争，曷若萃我主力，树军事力量于西北。②

此电表明，胡汉民的目光在向西北转移了。

1934年1月，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准备就任青海西区督办一职。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孙殿英部曾在赤峰英勇阻击日军，得到舆论好评，因此，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常黎夫等人随孙部工作，准备在适当时机，会同红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摧毁宁夏、青海的回军，通电反蒋抗日。③ 胡汉民不了解上述情况，但他也企图依靠孙殿英，联络阎锡山、杨虎城，开府西北。1934年2月10日，胡汉民致电孙殿英，指示其"巩固宁夏，进图甘

① 《致延兄》。
② 《致世五总指挥》。
③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7页。

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同月 15 日，胡汉民致函陈融说：

> 孙殿英势力似不可侮，晋阎为助，已成公开之秘密。局面展开，或有如梯云所云，晋、陕、桂联合倒府、组府之望。①

梯云，指伍朝枢。“晋、陕、桂倒府、组府之望”云云，反映出胡汉民等屡遭失败之后的新寻求。

然而，胡汉民过于乐观了。宁夏、青海一直是马家天下，南京政府命令孙部西进，一是为阻止孙部和冯玉祥等抗日力量结合，一是为了借刀杀人。孙军一进入宁夏，即与马鸿逵部交火，屡战不利。同年 2 月，何应钦下令对孙部实行围剿，孙殿英饷尽弹缺，一再致电胡汉民、陈济棠呼吁援助。陈济棠本已答应资助数万元，但不见行动，口惠而实不至。20 日，胡汉民再函陈融，要求由总部拨借 20 万元。函称：

> 孙之成败，实与南北大局攸关。未审伯南兄前许之数万元已汇去否？弟意此时牵制门神，不使即以全力对我者惟此一路，且可因此牵动晋、陕抗△〔蒋〕，最低限，阎、韩、杨、孙亦不能不因此团结自保。②

21 日，胡汉民致电李自立，提出孙部给养断绝，希望杨虎城与晋绥当局予以实际援助。3 月 7 日，胡汉民再电孙殿英，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

在西北各种军事力量中，杨虎城是愿意援助孙军的。孙、杨之间约定，共同通电，呼吁抗日反蒋，稿子已经拟好并经孙殿英签字，未及发出，孙殿英就失败了。③ 20 日，孙殿英通电下野，离开部队。

在旧中国，完全缺乏从事公开的民主政治活动的条件，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最后都不得不取决于军事。胡汉民是一介文人，他

---

① 《四工致松翁》。
② 《四工致松兄》。
③ 米暂沉：《杨虎城传》，第57页。

所依靠的主要是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这些实力派，各有山头，各有利益所在。他们往往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很难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

抗日讨贼军失败后，方振武南逃香港，吉鸿昌隐居天津，但二人都斗志弥坚。方振武草拟了一份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军事工作计划，经胡汉民、邹鲁等同意后，自动申请去广西、湖南边境活动。①吉鸿昌则与南汉宸等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积极联络各地抗日反蒋力量。胡汉民一度派熊克武去天津活动，准备在当地建立“北方军事委员会。”②1934年9月，又派刘少南北行，联络于学忠、吉鸿昌等。③11月9日，吉鸿昌等在天津国民饭店研究工作，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包围，刘少南当场牺牲。④

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胡汉民的军事倒蒋梦想终于破灭。

## 八、抵制五全大会

在胡汉民的支持下，西南不仅长期维持着半独立状态，而且在党务上，也对南京国民党当局采取不合作政策，尽力抵制各种会议。

还在1932年3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胡汉民即以“政见不同”为理由，拒绝参加。⑤1933年3月，国民党中常会筹议于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月20日，胡汉民致电阎锡山说：

> 今日当局对日既出于不和、不战、不守、不走之一途，大势所趋，惟归屈辱，欲嫁其屈辱之罪责，则必力求为分谤

① 胡汉民《致邹鲁函》，1934年5月16日；1934年6月2日；《致佛成、海滨》，1934年6月。

② 胡汉民：《致萧佛成》，1934年1月4日。

③ 胡汉民：《致于学忠函》，1934年9月21日。

④ 《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第59页。

⑤ 《对十九路军以援绝撤退淞沪之谈话》，《远东日报》，1932年3月4日。

计，故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说，遂为南京党部所决议。西南同志于宁中此议，固持反对，如反对不成，则惟有为对抗会议之筹备。

4月4日，唐绍仪、胡汉民等通电反对，认为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不独无此必要，且不当行"，迫使南京方面取消此议。

根据国民党党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1933年11月召开。当年8月，唐绍仪、萧佛成、陈济棠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反对，迫使南京方面不得不宣布展期一年。1934年7月，胡汉民鉴于大会期近，于23日致电陈雨亭、李白俦说：

关于五全会问题，海外支部不妨准备参加。倘西南发动能早，不参加固无问题，否则亦可运动各方拟具重要提案，根据党纲，就现状抨击其殆〔贻〕误党国。

8月12日，南京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五全大会，讨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总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等四项议题。胡汉民仍然反对召集这样一次会议。24日他致电李烈钧等，表示将"从根本上破坏"宁方计划，但如来不及，也准备派人参加，提出西南方面的根本主张。9月8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21人致电国民党中央，认为南京方面所提议题，"空洞落漠"，"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胡等自提议案四项，要求"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① 该电通称"齐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置而不议，受而不答"，严禁各地报纸登载。25日，胡汉民等29人再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两项要求：1.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之建议及批评。2.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及批评之完全自由。胡汉民等激烈地批评南京方面"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

① 《齐电》，《三民主义月刊》4卷4期。

变本加厉”。电称：“苟不能恢复党员对于时政之建议、讨论、批评之自由，则此种大会断不足以代表全党之意志，徒为少数人所把持，以施展其僭窃本党之阴谋。”胡汉民等并要求，给予党员以选举代表之完全自由权。该电通称“有”电。① 10月17日，胡汉民发表《为五全大会告同志》，声称五全大会“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② 胡汉民作了宁方不接受齐、有两电的充分思想准备，计划在必要时单独召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同时，建立新的党的“中枢”。③

对于胡汉民等人的做法，南京方面自然很恼火。但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拥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周围又团聚着一批老国民党人和地方实力派。南京方面不能无视这一股力量。为了促进宁粤合作，10月8日，南京方面推孔祥熙出面致函胡汉民，声称五全大会开幕在即，邀请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10月中旬，王宠惠携孔函南下，面见胡汉民、萧佛成等。王称：“此来只以第三者之资格，作双方意见之传达，绝非代表北方任何人或任何方面。”④ 又称：“南京中央同志很盼望和平，希望西南同志对于南京种种举动，予以谅解。”⑤ 王并称：汪对胡展堂先生毫无恶意，蒋则力促余迅速南下，征求西南对时局意见，以便合作问题得以早日解决。⑥ 10月28日，胡汉民对法报记者发表谈话，对王宠惠此行表示不满。胡称：“当道诸人仅于口头上希望余等对彼所实行之政策予以谅解，忽略事实及国家之危机，而趋重私人之情感方面，以求私人间之谅解。此种态度，恰与余历来对事不对人的主张相反，极为余所不取。”胡并进一步指责：“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

---

①② 《三民主义月刊》4卷4期。

③ 《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1934年9月25日；《致邹鲁等函》，1934年9月30日。

④⑥ 《萧佛成先生关于宁粤合作之谈话》，《三民主义月刊》4卷5期。

⑤ 《和平运动》，同上。

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而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①

自1933年1月起，胡汉民即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作为反蒋舆论机关。王宠惠南来前后，胡汉民多次致函《三民主义月刊》和邹鲁等人，要求加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10月18日函提出"就时局现状及本党主义、历史，总论南京军阀蓝化中国政策之荒谬"，同时指定《三民主义月刊》4卷5期为"反蓝专号"。胡汉民并亲为该刊撰写《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指责蒋介石"保存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变更中国国民党的实质"，"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

召开五全大会本来是汪精卫的主张，蒋介石的兴趣并不很大，西南方面既然强烈反对，蒋介石也就主张从缓，指示南京方面宣布五全大会延期，于12月10日先行召开四届五中全会，以便腾出时间，继续做胡汉民等人的工作。

胡汉民终于胜了一个回合。

## 九、王、孙说合与蒋、胡通信

胡汉民既不肯入京，又不同意召开五全大会，蒋介石只好作让步的准备：一是部分采纳胡汉民的"均权"方案，一是设法使对日妥协、名声不好的汪精卫下台。

胡汉民被释后，即积极提倡"均权"。1931年11月，他从上海到广州，在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②广州"四大"中，胡汉民又与孙科、陈济棠、李宗仁、伍朝枢共同提

① 《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三民主义月刊》4卷5期。
② 《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3卷2期。

出“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1934年2月至3月，他连续发表《论均权制度》、《再论均权制度》等文，提出具体方案，同时指责南京方面标榜集权，实为“集权于南京军阀”。胡汉民声称：“实行均权制度，是中国今日唯一的需要。”

同年11月，蒋介石、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方案，提出：法制方面，中央规定政治原则，地方制定实施办法；用人方面，地方可选择保荐，由中央任命等。该方案于27日由蒋、汪以联名通电的形式发布。同月末，蒋介石派王宠惠、孙科再次赴港，会晤胡汉民。王、孙携有蒋介石及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叶楚伧、陈果夫、于右任等中央常委的函件。蒋函云：

> 兹请亮畴、哲生两同志代谒左右，商承党国大计，祈与详洽一切，并恳早日命驾莅沪，俾得面罄所怀。

蒋介石等六人函云：

> 党国大计，亟待解决，深盼先生驾临京沪，无任跂祷。

12月3日，王、孙到港，次日会谈。王、孙“郑重”代表蒋介石要求胡汉民等人谅解，并称：蒋介石已认为内政外交确有改革必要。王、孙特别谈到蒋汪27日通电系由蒋定稿，汪副署，声称其所以要求与胡见面，乃是为了“当面决定一切方案，期于施行适当”。胡汉民则批评27日通电不是“根本办法”。王、孙又称：蒋介石的意思是：“不只局部问题可以改造，即全个问题亦可改造，对水云不成问题”。水云，宋代词人汪元量的号，这里借指汪精卫；“不成问题”云云，暗示汪精卫可以下台。对此，胡汉民表示说：“我向来对事不对人，但以为如此可使一切事情圆滑易行，则我亦不反对。”[①] 在多年的矛盾冲突之后，蒋介石采取主动，派人道歉，胡汉民感到了某种满足，因此会谈气氛“和好”。

在此后的会谈中，胡汉民提出治本与治标两个方案。所谓治

---

① 胡汉民：《致松兄》。

本，即要求蒋介石接受1931年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和齐、有两电；所谓治标，即开放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确定入川剿共，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对于此间朋友同志，不得敌视，而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① 孙科和胡汉民有联盟反蒋的历史。某日下午，他和胡汉民作了一次深谈，孙称："先去水云，终是一手段，且此时不须西南说话，只作为改用比较可以接纳西南政府之人，则两方接触，不致急剧。"孙并称，他本人无意重作冯妇，建议推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他说："门之诚意，尚不可知，什么院长滋味，我亦不愿再尝，不如再用门之所暱，如庸之者。"胡汉民认为倒阁一类运动不足以救亡，撤去汪的院长，换汤不换药，也不足以求谅解，因此表示说："此事我不反对，然亦不能说是赞同，至于门无诚意，则我看得甚为清楚。"②

12月8日，孙科先行北返，行前，孙科问胡汉民还有什么具体意见，胡称："须先确定今后之政治基础为军权统治，抑为民权统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和平便有了途径，协作也有了头绪。③他托孙科带一封信给蒋介石：

>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俦、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视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认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惟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

这封信有原则，有礼貌，冷淡中略露几分情谊，显示了胡汉民对宁方的合作要求既不接受，又不拒绝的态度，留有充分的伸缩余地。

但是，在其他场合，胡汉民对蒋介石的攻击火力并未减弱。

---

① 胡汉民：《致松兄》，1934年12月17日。
② 《工致力兄》。
③ 《和平协作之真伪》，《三民主义月刊》5卷1期。

12月15日，胡汉民发表文章指责南京方面“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①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姿态。1935年1月20日，王宠惠分访蒋介石、汪精卫，商谈迎胡入京及合作问题。28日，胡汉民派李晓生北行，与王宠惠、孙科会谈。2月初，蒋介石接见李晓生，11日，蒋介石致函胡汉民称：

弟决入川剿赤，以后道途日远，关山间隔，徒切想念。党国危急，四顾茫茫，甚盼后方同志，无间彼此，以谋团结，以挽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晓生同志转述厚意，故人情殷，敢不心领，亦望先生为国珍重。

表示“入川剿赤”，算是答应了胡汉民的一项条件，“故人情殷”云云，算是表达了重修旧好的愿望。

本来，在王宠惠等开始说合之际，胡汉民密告胡毅生等称：“必须掀起更大的风潮，形成分裂、对抗，乃有效果。”② 现在，经过王、孙说合之后，胡汉民的态度变化了。3月5日他复电李晓生说：

入川剿赤与对日坚持，皆与我人意见上已渐趋近，而彻底改革一切错误政策更为必要，惟有暂以分工为合作。③

虽然还强调“分工”，但毕竟出现“合作”的字眼了。

## 十、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引诱

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利于日本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力图加深并扩大中国的分裂。福建事变后，日本方面不断派人拉拢胡汉民，表示愿意提供武器和金钱的支援，甚至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相饵。胡汉民的原则是，坚决要求收复东三

① 《军权与均权》，《三民主义月刊》4卷6期。
② 《致湄、毅两兄》。
③ 《四工致晓兄》。

省，可以接受日方援助，但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

1934年2月，日本有几个武官到港，“问候”并探询胡汉民对中日前途等问题的主张，胡答称：

日本是侵略国，中国是被侵略国，中日两国要恢复友好关系，唯一的办法只有日本自动交还东三省给中国。

日本武官诡称：“日本并没有侵略满洲，满洲独立，是三千万满洲国人民的愿望，这种民治精神，日本不能干预。”这几句话引起胡汉民的厌恶，他立即正颜厉色地斥责说：

你们来是拜候我的吗？来拜候我，是应该讲实话的，不讲实话，就请你们出外去。我不知道甚么是“满洲国”人民的民治精神，只知道东三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你们做这种假戏来欺骗世界，还把这假戏来向我巧辩吗？①

其后，胡汉民即发表文章，阐明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他宣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确立于“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一基点上。“凡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个目的的，德谟克拉西的国际也好，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也好。我们不妨同情协作。”② 还在1933年，胡汉民就鼓励西南方面与苏联发展贸易关系，并派陈群赴沪致力此事。③ 这里，联俄制日的思想就更加明确了。

日本武官的初次探询失败。同年4月8日，又由萱野长知出面致函胡汉民，鼓励中国实行“不战”政策。函称：

今东四省已成独立，而外蒙、伊犁、青海、新疆、康藏等处，亦归英俄竞夺之区。云南一角，忽成英国势力范围，东亚危机实不堪寒心也。弟以为保全中国之道，唯有不战二字而已。

同函并称：救国之大策，在于继承犬养毅与孙中山的遗教，实行

①② 胡汉民：《国际现势观察远东问题》，《三民主义月刊》，3卷3期。
③ 胡汉民：《致啸林》，1933年3月30日。

"日华和平的合作。"萱野说：

世界大和平者，即在国境之撤废，在世界大同，是吾人之最终理想也。但现在缔结日华两国关税互惠条约，为平等资格而实行木堂、中山两先辈之遗志，打世界的大和平之先手，长江南北皆可望风合流无疑也，则是和平统一之初步。

萱野声称：如胡汉民赞成此意，"即应宣布西南独立，进就总统之职，弟必行积极之援助，亦运动敝国迅速承认西南政府。"他表示，将于5月上旬来华接洽。①

萱野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同盟会时代曾积极支援中国革命。胡汉民的复信称：

手教诵悉，言及孙总理平生之主张，尤令人感慨不已。盖现实之状态，去之益远，其责任果谁负耶！

言外之意是，蒋介石和南京当局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中国现状和孙中山的遗愿相距甚远。胡汉民表示："足下能来一游，至所欢迎。"

同年，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在中秋节前实现"华北自治"，疆域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察哈尔、绥远与宁夏等地，由吴景濂负责政治，吴佩孚负责军事。计划确定后派唐宝锷赴粤，与邹鲁商谈，声称如粤方军队讨伐蒋介石，可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②此事胡汉民未予理睬。

这一时期，到广东活动的还有日本特务和知鹰二，由曾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接谈。胡汉民指示说：

弟处无论如何仍抱定收复失地之议，而地方局部之接洽，纪文等既已进行，则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自不妨与之斟酌也。③

---

① 此函仅署4月8日，年代据内容及萱野行踪考定。
② 《力致福兄》。
③ 胡汉民手迹，未署年月。

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希望从帝国主义得到援助，这是胡汉民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不少爱国人士的悲剧。

对于日方的拉拢和引诱，胡汉民一概采取“推而远之”的应付办法，他曾在一封信中说：

> 去年以来，矮子之俦，多方求门路，弟皆推而远之，与谈三民主义，与谈日本立国之精神，与言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蒂。①

1935年3月2日，土肥原亲自到香港会见胡汉民，标榜“中日提携”，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以便日本出兵华北；胡汉民则阐明孙中山的“中日亲善”思想，“实以中日平等为基础”，要求日本改变侵华政策。②土肥原密询日俄交战时，中国孰为左右袒，胡称：“须交还满洲。”福建事变时，陈铭枢等和日本方面有联系，胡汉民告诫亲信说：

> 福建信使往还，门神乃详知之以为口实，而跛哥等则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也。故外交无定则，惟视本身利害如何而定，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场一也；不可上当如跛哥二也；粤与英密切，不使猜疑而敌视三也。③

胡汉民是个有操守的政治家，他在和日本方面的交往中，确实不曾丧失民族立场。

## 十一、出国与归来

塘沽协定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日益成为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迫切要求。同时，由于形势逼迫和各方推动，蒋介石也在作抗日准备。1935年春，邹鲁向胡汉民建议，改变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帮助蒋

① 胡汉民手迹，末署：工，十六日。
② 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三民主义月刊》5卷3期。
③ 胡汉民手迹，末署：工，十六日。

介石抗日。[①] 胡汉民接受邹鲁的建议，于6月9日离港赴欧。行前，发表谈话，声称此行目的在于“易地疗养”，“外间传言种种，殊非事实”，“余之主张政策，亦不以时地为转移而有所变易”。[②]

在国外期间，胡汉民和国内始终保持密切联系。9月12日，黄季陆致胡汉民函云：

> 陆定明日启程赴沪一行，目的在对时局有较深之观察，以便应付，同时颇欲乘宁方倒汪失败之后，对宁渐呈离心之势力者必多，能乘时利用，或于吾人之进展不无裨益也。陆之所虑者为宁方对日外交似渐有头绪，若待其成而后反对，不利殊甚。今次所定之计划，惟一目的即在鼓动政潮，明显对立，一面造成汪精卫卖国政权之不稳，同时即所以使其屈辱外交之不易进行也。

当年6月19日。蔡元培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率先向汪精卫发难，质问其“对日外交究持何策”。吴稚晖、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继起响应。30日，汪精卫称病休养。7月24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院务。但是，日本方面随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只好请汪精卫复职。函中所称“宁方倒汪失败”指此。从此函可以看出，汪精卫复职后，西南方面决定继续斗争，掀起更大的政潮。16日，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致电国民党中央，旧话重提，要求将1934年9月8日齐电所列“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等案列入五全大会议题，但南京方面仍然以种种理由加以推拒。其后，西南方面又要求重选代表，并提出：“党的精诚团结，当团结于大会合法进行之下；不当团结于一二人玩弄党权之下；国家之精诚团结，当团结于有效救国方针之下，不当团结于一二人丧权辱国之下。”[③] 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

① 邹鲁：《回顾录》，《邹鲁全集》(二)，台湾三民书局版，第454页。

② 《出国谈话》，《三民主义月刊》5卷6期。

③ 《西南中央根据齐有两电主张向五全大会从新提出议题之铁、巧、东、文四电》，《三民主义月刊》6卷5期。

汪精卫在致开幕词后即遇刺，妥协派遭到一次打击。会议通过了冯玉祥、李烈钧等22人提出的救亡大计案，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为了打开僵局，蒋介石于11月4日派戴季陶、马超俊飞赴广州，会晤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等，敦促留粤中委参加五全大会，一面派王宠惠的亲信魏道明赴欧，邀请胡汉民归国，共同主政。戴、马之行大致顺利，魏道明则碰到较多困难。胡汉民态度强硬，不忘旧嫌。他委托程天固与魏会谈，程提出："倘胡先生在党的地位得到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又称："(胡先生)现在主张以抗日救国为唯一主旨，故一切政治措施应以军事之准备为至要，而负此责任者，他早已认定非蒋氏莫属。党与军之责，各有攸关。其他问题，自易商量。我信党军分负责任一点，为蒋胡归好之先决问题，不得不先向蒋氏说明，并须得其同意之确实表示。"① 魏立即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赞成。11月15日，五全大会开幕，蒋介石声称："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② 12月7日，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胡汉民听到这一消息时，"面有悦色"，随即与程天固等草拟改组中枢计划，拟以王宠惠为行政院长，颜惠庆为外交部长。②

在蒋介石及有关方面的一再电催之下，胡汉民于12月27日自法国启程回国。1936年1月6日，蒋介石派魏道明先期至新加坡迎接。其致胡汉民函云：

> 尊驾返国，欣感之怀，非言可喻。兹先请伯聪兄专程代表来新迎接，并候长途起居之劳，无任想念。务请即日莅临

① 《程天固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版，第284—287页。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第14卷，381页。
③ 《程天固回忆录》，第287—288页。

京中，共济时艰。伫候之诚，不尽缕缕，伯聪兄必能代致一切也。

1月15日，胡汉民抵港，在书面谈话中要求："党应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力除过去灭裂涣散之错误"；"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1] 25日抵广州，多次发表谈话，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人民多务压抑，不务领导"。[2] 他说："余今日之工作，为如何促进政府之觉悟，并如何团结全国抗战之力量，俾中华民族最后之自救。"[3] 从主张反蒋抗日，推翻南京政府，到主张"促进政府之觉悟"，"团结全国抗战之力量"，反映出胡汉民思想的巨大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5月12日，胡汉民因突发脑溢血于广州逝世。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① 《抵港时书面谈话》，《三民主义月刊》7卷2期。
② 《在广东各界欢迎大会中之演说词》，同上。
③ 《胡汉民先生对国事之谈话》，1936年2月22日，《胡汉民先生归国后之言论》(二)。

# 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多次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所谓"和平"谈判，这些谈判的策划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但也有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例如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①

萱野长知(1873—1947)，号凤梨，日本高知县人，1895年与孙中山订交，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1907年被任命为东军顾问，负责购置并运送枪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萱野应黄兴之邀赴汉阳参战。1915年，再次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义反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受首相犬养毅派遣，秘密来华商谈日本撤兵问题，因军部反对，不久即被召回。②

小川平吉(1869—1942)，号射山，日本长野县人。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8年加入东亚同文会。190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武昌起义爆发，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组织有邻会，援助中国革命。1912年初在南京访问孙中山、黄兴，商议两国"提携"方针问题。1914年出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同年11月，日军攻陷青岛，小川曾向内阁建议，缔结日中两国同盟条约，使南满洲、内蒙成为两国共同统治区域。1925年任司法大臣。同年发刊《日本新闻》，标榜"纯正日本主义"。1927年任铁道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筹建伪满洲国。1936

① 《小川平吉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2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版，第632页。

② 《犬养密使·萱野长知の日誌》，《中央公论》第690号，1946年8月1日。

年因铁道大臣任内受贿案下狱，次年 6 月近卫文麿组阁后被保释。

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日本九州福冈县人。浪人首领，右翼组织玄洋社的头目，煤矿资本家。1911 年 12 月来华，与犬养毅一起劝说孙中山与岑春煊合作，共同对付袁世凯。1913 年 4 月，与犬养毅、萱野长知、宫崎滔天等组织日华国民会，宣称以“增进两国国民永远的福祉”为目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头山满曾积极予以帮助。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头山满曾到神户与孙中山会谈，要求保障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1931年组织满鲜问题同盟会，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38 年 1 月致函孔祥熙，表示将竭平生之力使两国复归于好，要求蒋介石集团“速改旧图，更新其策”。①

秋山定辅(1868—1950)，日本冈山县人。1890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3年创办《二六新报》。1899年经宫崎滔天介绍认识孙中山，得到信赖。此后一再劝说日本财团向中国革命党人提供借款。1927年会见访日的蒋介石与张群。1936年派实川时治郎来华，要求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②卢沟桥事变爆发，又商得近卫文麿同意，派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来华谈判，但龙介离日时突遭宪兵队逮捕，未能成行。③

由于上述历史渊源，蒋介石集团极为重视和萱野等人的谈判。初期通过孔祥熙，后来直接控制，由亲信柳云龙、杜石山④等在香港会谈，宋美龄亲到当地指导。自1938年春至1941年夏，在各次日蒋谈判中历时最长。蒋介石多次指示：无论如何，必须“保留此线交谊”。⑤因此，研究这一条谈判线索，有着特殊重要性。

① 《头山翁致孔氏电报》，日本外务省档案；《支那事变善后措置》，A—1—1—0号。

② 《对支政策觉书》，《秋山定辅关系资料》，第 157 页，《秋山定辅传》第 3 卷，樱田俱乐部1982年版。

③ 《秋山定辅关系资料》，第 541—545 页，同上书。

④ 柳云龙，陈诚书记官，日方资料或称为蒋介石外甥，或称为蒋介石母妹之子；杜石山，亦作石珊，蒋介石设在香港的秘密办事处负责人。二人真实身份待考。

⑤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 634 页。

# 萱野长知和孔祥熙之间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同月，萱野长知来到中国，在上海景林巷公寓设立机关，开始找寻和蒋介石政权接触的机会。同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移汉口。次年1月，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长后，即努力开辟渠道，和日方进行和平谈判。23日，孔祥熙致电头山满，希望他"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法〈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①。3月末，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和孔祥熙的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见面。贾称："如果任凭中日两国同归于尽的话，将给整个亚洲招来不幸，必须设法讲求和平之道。"② 4月20日，双方在同一旅馆第二次会见。松本传达了萱野提出的和平条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承认日本关于内蒙的立场；贾存德则要求日本全面撤兵。其后，在松本的安排下，萱野与贾存德见面，萱野声称："我和孙先生是朋友，中日是兄弟之邦，不应以兵戎相见。"③他要贾存德转信给孔祥熙，大意为：中日交战犹如萁豆相煎，如孔有意出面解决阋墙之争，化干戈为玉帛，他愿意为此奔走。5月，贾存德携该函赴港，与宋霭龄同机飞抵汉口。同月，贾存德携孔祥熙复函返回上海。其内容，据贾存德回忆，孔祥熙对萱野肯出面斡旋表示感谢，声称解铃系铃还在日本当局，如果萱野能以百年利益说动日本当局早悟犯华之非，则孔祥熙当共襄此举。④据松本回忆，孔祥熙并提出了和平条件：1.中日双方即刻同时停战；2.日本尊重中国主权，声明撤兵；3.日本方面要求解决满蒙问题，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

---

① 《支那事变善后措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号。

② 松本藏次回忆，见三田村武夫：《战争と共产主义》，日本民主制度普及会1950年版，第170页。

③④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68、70页。

具体问题待中日两国商谈。[①]孔祥熙另有一函复头山满，要求头山对日本军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使之"幡然改悔"。[②]

萱野收到孔祥熙的回信后，于6月9日回国，向小川平吉汇报。萱野声称：和贾存德、宋霭龄等孔祥熙、汪精卫的代表反复会见，结果孔祥熙等人的媾和决心愈加确定，准备不通过第三国，直接进行谈判，促使蒋介石下野。萱野期待在媾和之后，解散国民政府，与北京、南京的新政府合作(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汉奸政权——笔者)，建设新政府。当时，中日两国已经断交，小川对萱野打开了和国民政府的谈判通道表示高兴，但他声称：关键时刻必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和谅解，本人近来主张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和谈，不依靠蒋介石的力量而想驱逐共产党是困难的。[③]10日，小川访问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当晚，与萱野一起访问首相近卫文麿，萱野向近卫呈交了孔祥熙复头山满函副本等文件。11日，萱野单独会见了宇垣。

1937年11月，日本政府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谈判迁延到1938年1月。中国政府未按日本规定的期限作出答复，日本首相近卫于同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④]小川平吉主张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和谈，这就和近卫声明发生矛盾。在会见宇垣时，小川提出：既要求蒋介石下野，又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谈判不也可以吗？[⑤]目的在于调和这一矛盾。

在日本政府中，宇垣的观点与小川接近。他就任外相时即向近卫提出，"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必要时取消1月16日声明。[⑥]

---

① 《战争と共产主义》，第172页。

② 《支那事变善后措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号。

③⑤ 《小川平吉日誌》(二)，1938年6月9日、10日。

④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⑥ 《宇垣日记》，朝日新闻社1956年版，第314—315页。

# 中國革命之秘話（七）

頭山滿

約逗留東京一星期。然後旅行日光。鹽原等地以後是否赴美或歸返中國。還沒有決定。

蔣在帝國飯店卸除旅裝。暫作休息。便即到我的家裏來。他說：「一定要在先生左右起臥！」。所以我就叫他寄宿鄰宅的川野邸。他一上京。就希望拜謁孫文的知己寺尾亨的墓一道。而且親選美的花朵供獻在墓前。

他住在我處的時候的印象嗎？不消說。我和日本一塊兒跑到底。決不可依靠共產主義」又並說：「不論如何。日本和中國應該結刎頸交。我所說的就是這兩種。倘若誤了這一點。國家和國家的邦交固是不消說。就是兩人間的交情也難保完全」！

那時候的蔣介石。同孫文一樣憎惡英國。所說的也是在日本的力量。應該和中國的力量併合。以圖應付的正論只是這傻子自從西安事件以來。頭腦竟發瘋狂

蔣在翌年一月五日入南京。再膺任總司令。指揮北伐軍。勢如破竹。到處擊破北軍。於是繼承孫文的遺志。成就民國的大業。

迄這時。確是完成中國的不世大業的人。但他終竟是傻瓜。對應該提攜的日本反戈。以致難免自滅。他現在已在作最後的掙扎了。他命這樣盛。實在我也是料想不到！（待續）



图三十六　头山满著文，辱骂蒋介石是“傻瓜”
（采自广州市中山图书馆）

近卫也感到这一声明是个"大失败",① 同意宇垣的意见。因此，他们都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宇垣表示，不必对蒋持坚决排斥态度；近卫则要求萱野将谈判情况及时电告小川，再由小川传达给他。②

6月17日，萱野离日赴沪，就蒋介石下野问题与贾存德协商。7月4日，孔祥熙致电萱野，要求日方尽量放宽条件，表示愿承担责任，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以代替蒋介石下野。③ 5日，萱野、松本藏次、贾存德等人转移到香港继续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已于6月23日开始会谈。④ 这样，为着同一目的，由孔祥熙牵线，在香港同时进行着两场谈判。为了保证成功，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两个家庭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松本藏次说："二者之间没有日本、中国的区别。居正夫人作为孔祥熙行政院长的代理。一人是生母，一人是养父，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谈判决定两国命运的重大问题。"⑤ 谈判中，贾存德、马伯援等人表示，共产党正积极发展势力，汉口陷落将导致赤化蔓延，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他们提出，由孔祥熙、居正、何应钦、李宗仁出面会谈，并可由战胜者方面的日本提出议案。⑥ 但是，蒋介石下野这一难题仍然无法解决。7月22日，萱野致电小川说："中国国内形势不允许蒋下野。蒋本人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周围的状况决不允许如此，担心引起混乱，以后无法收拾。"他表示将离港返国，借助头山满的力量，促使日本政府对要求蒋介石下野问题再作考虑，电称："此点倘能办到，相

---

① 风见章：《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会1951年版，第79－80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385—386页。

③ 《萱野长知致小川平吉》，1938年7月4日；参见《小川平吉致近卫文麿》，1938年7月8日

④ 参见中村丰一：《知られざる宇垣・孔秘密会谈》，《知性》别册，第261—265页。

⑤ 《战争と共产主义》，第173－174页。

⑥ 同②，1938年7月27日。

信时局将急转直下，趋于解决。"①

萱野等人赴港之际，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正赶赴东京谈判。高宗武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关系密切，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卢沟桥事变后，受命找寻"对日折冲"的途径。他早有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面实现"和平"的打算。到日后，发现日方正在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便迎合日方意图，提出由汪精卫、张群等二三十人协力一致，迫使蒋介石下野。②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提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的政权"。③日本政府所谓"第一流人物"，即指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1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通过了《中国新中央政府建立指导方案》，准备在攻占汉口后建立所谓"中国新中央政府"。④在这种情况下，萱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自然要碰钉子。

在日本政府内部，陆相板垣征四郎属于强硬派，对蒋介石持坚决排斥态度。他表示："按照原来的估计，汉口陷落时，国民政府将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没有必要发表规定撤兵的声明。"⑤宇垣属于柔软派，他仍然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但不敢过于拂逆陆军意志，表示蒋介石可在签订和约之后下野；如孔祥熙等出面会谈，他本人亦可出面。⑥近卫文麿动摇于板垣与宇垣之间。为了争取支持，小川、萱野并动员病中的头山满致书近卫，要求他排除军方的反对，与蒋介石集团媾和。

---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3页。

② 《萱野长知致松本藏次》，《战争と共产主义》，第177页。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S491。

④ 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页。

⑤ 《战争と共产主义》，第175页。

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第400—401页。

萱野返日之初，曾致电贾存德，声称如蒋介石决心“铲共亲日，媾和而后有办法”。① 9月上旬，萱野返沪，继续通过贾存德与孔祥熙联系。8日，萱野致电小川：“孔祥熙、蒋介石、居正等密约反共，如提出停战时，可否同意？”同日，小川请示宇垣后复电：“规定反共、和平后〈蒋〉下野是必要的，此点首须明确。对方提出停战，军部方面也许会附加麻烦的条件，不如孔祥熙等出面时，外相前往谈判为宜。”② 次日，小川以书信作了详细补充说明，信称：“日本希望蒋介石下野，但已大体谅解到，他在收拾时局之前不可能做到此点，倘蒋能在披沥反共诚意之时，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③ 从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到允许事先“规定反共、和平后下野”，表明日方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因此，孔祥熙表示，愿意出面与宇垣谈判。其地点，宇垣提议在长崎附近的云仙，但萱野认为，在云仙谈判，孔祥熙等须在香港、上海、长崎换乘轮船，中途不仅危险，而且易为新闻记者侦悉，不如与海军交涉，在军舰上会面。④ 9月15日，萱野第二次赴港，与贾存德等继续谈判。行前，致函小川，内称：“彼等因面子关系，对使蒋介石预先表示，在反共、和平后坚决下野一事颇感困难，以密约办理也感到非常为难，孔祥熙等共同保证，将于事后自动实行。”⑤23日，宇垣将萱野的信件提交五相会议，要求海相米内派军舰供谈判使用，米内表示同意；同时，宇垣并要求板垣对与孔祥熙等人的会晤不持异议，板垣明确地表示同意。此间，宇垣还曾上奏裕仁天皇，得到秘密批准。⑥ 这样，近卫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393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5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6页。

④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7页。

⑥ 《小川平吉日誌》（二），1938年9月23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421页。

的主张似乎取消了。25日，马伯援离港，经河内赴重庆，与蒋介石、孔祥熙具体磋谈；重庆方面也派郑介民绕道滇桂，赴港会商。

然而，日本陆军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他们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为了反对宇垣与孔祥熙谈判，他们不仅指使少数人面见近卫，指责宇垣为"国贼"，声言绝对反对和议，而且提出建立兴亚院，在外交一元化的旗号下削弱外务省的对华外交权。① 近卫顶不住陆军的强大压力，于接见新闻记者时声明："帝国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方针始终不变。"② 在这一情况下，宇垣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萱野长知等积极为之拉线搭桥的宇垣、孔祥熙会谈也随之流产。

## 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香港谈判

日军侵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进攻汉口和广东的计划。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4天后，占领武汉。日本主战派认为战争即将结束，可以在中国建立亲日的新政府。但萱野却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日本孤军深入，四面皆敌，包袱愈来愈重，前途渺茫，因此，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此同时，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③ 但是，蒋方人员又连续致电萱野，表示"我方和平殊不便"，请求给予谅解。④ 11月5日，萱野有一长函致小川，详细分析蒋方形势，告以蒋介石定可派郑介民来港，马伯援将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后回港，蒋介石的代表及孔祥熙的代表均在港等待。小川收到此函后，立即转示近卫、新任外相有田八郎、头山

①② 额田坦：《秘录宇垣一成》，日本芙蓉书房1973年版，第179页。
③ 《新蜀报》，1938年11月1日。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00页。

满及朝日新闻社主笔绪方竹虎等人。这时，近卫刚刚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内称："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更换人事，改途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帝国亦不加拒绝。"①这样，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有所修正。因此，小川告诉萱野：我方仍以"收拾大局，确立和平"为活动目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有共产党的存在，对蒋的苦心要有充分的谅解，中国的事务"只能慢慢地进行"。②

在此期间，日汪关系有了迅速发展。11月20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达成"日华协议"，规定日华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俟机成立新政府。12月21日，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逃到河内。为了表示"小贺之意"，近卫于次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将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③。日汪关系的进展和汪精卫的出逃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集团，一度停顿的日蒋谈判再度恢复。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因内外交困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陆相、外相等留任。5日，萱野致电小川，告以"和平有望"。④次日，萱野返国，向小川汇报，蒋介石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和平"之意不变。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决心起用嫡系复兴社人物。除郑介民、柳云龙外，增派杜石山参加和谈。杜是蒋介石在香港的秘密办事处负责人，对蒋可以发挥重大影响。⑤14日，小川、萱野访问有田外相。17日，小川访问

① 《太平洋战争史》，中译本，第231页。

②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8年11月25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02—603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7页。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05页。

⑤ 《小川平吉日誌》(二)，1939年1月13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436—437页。

平沼首相。在争取到新内阁的支持后，萱野于23日致电杜石山，告以日本方针不变，询问蒋方态度如何。当时蒋方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同时，通过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2月3日，陈诚致电柳云龙，告以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奥秘，电称：“参政会与五中全会俱不足以为和平之根据，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①陈诚要求柳云龙将此意转告杜石山与萱野。2月19日，杜石山致电萱野，内称：柳云龙表示，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等均有代表与日方接洽，“似此不统一，双方俱属吃亏，如果勿与汪、孔、何等代表接洽，则吾人所商者，更为速于实现。”②柳云龙传递的上述信息使日方兴奋异常，连板垣也认为，陈诚握有军事实权，电报大可注目。他和小川一向政见相左，但双方却得出了共同结论：国防最高委员会断然排斥共产党人加入，和平将易于实行，中央军实力强大，打击共军并非难事。③头山满则要求小川赴华，和萱野一起谈判。他表示，倘有必要，自己即便躺在船上，也扶病成行。④2月25日，小川致函先期回沪的萱野，声称头山满日益健壮，旅行当无问题，倘蒋介石圈周围之事对讲和犹豫不决时，可由头山满代表我等加以劝告。⑤

蒋介石于3月4日致电杜石山云：“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⑥甩开孔祥熙，起用嫡系人物，表明蒋介石对谈判的重视，此电则

①②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39年2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08页。

③ 《小川平吉日誌》(二)，1939年2月1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446页。

④ 《小川平吉日誌》(二)，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449—450页。

⑤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0、611—612页。

柳雲龍科長譯轉

石山兄台鑒：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于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蘆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蔣中正豪。

三月四日蔣介石電報

图三十七　蒋介石密询日方“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电
（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进一步表明，蒋介石将直接控制谈判。杜石山接电后，即电邀萱野来港。萱野于7日离沪南行，9日抵达香港。行前，将有关情况电告小川。此后数日内，小川即紧张地访问平沼首相、有田外相、板垣陆相等人，阐述蒋介石的和平诚意。

3月16日，宋美龄以治牙为名到港与萱野进行了非正式的晤谈。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会商，柳云龙提出7条：1.平等互让；2.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日方)撤兵；5.(签订)防共协定；6.经济提携；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①]会后，杜石山致电蒋介石，劝他抢在汪精卫之前与日本言和，电文称："且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多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19日，得蒋介石电，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②]

3月24日，小川亲赴香港。30日，在港听取萱野汇报，将备忘录交给萱野，令其转交柳云龙，其要点为：1.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委员长有和平诚意，希望派遣要人为代表，此为表示蒋委员长意志之最良方法；2.媾和基础条件为近卫声明，五相中至今尚有希望国府改组者，而国府又认此为不可能之事，此点之解决为最先首要之问题。小川声称："予反复思忖，苦心焦虑，别得一便案。"[③]关于"便案"的内容，小川故弄玄虚，要求面见蒋介石或其心腹要人"详细谈议"。其实，小川的"便案"很简单，不过是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实行局部停战。萱野询问杜石山，讨伐共产党是否可能，杜回答可能，同时表示要征询宋美龄的意见。宋的回答是，可用密约办理。此后，杜石山又电询蒋介石，蒋复电同意"用密约办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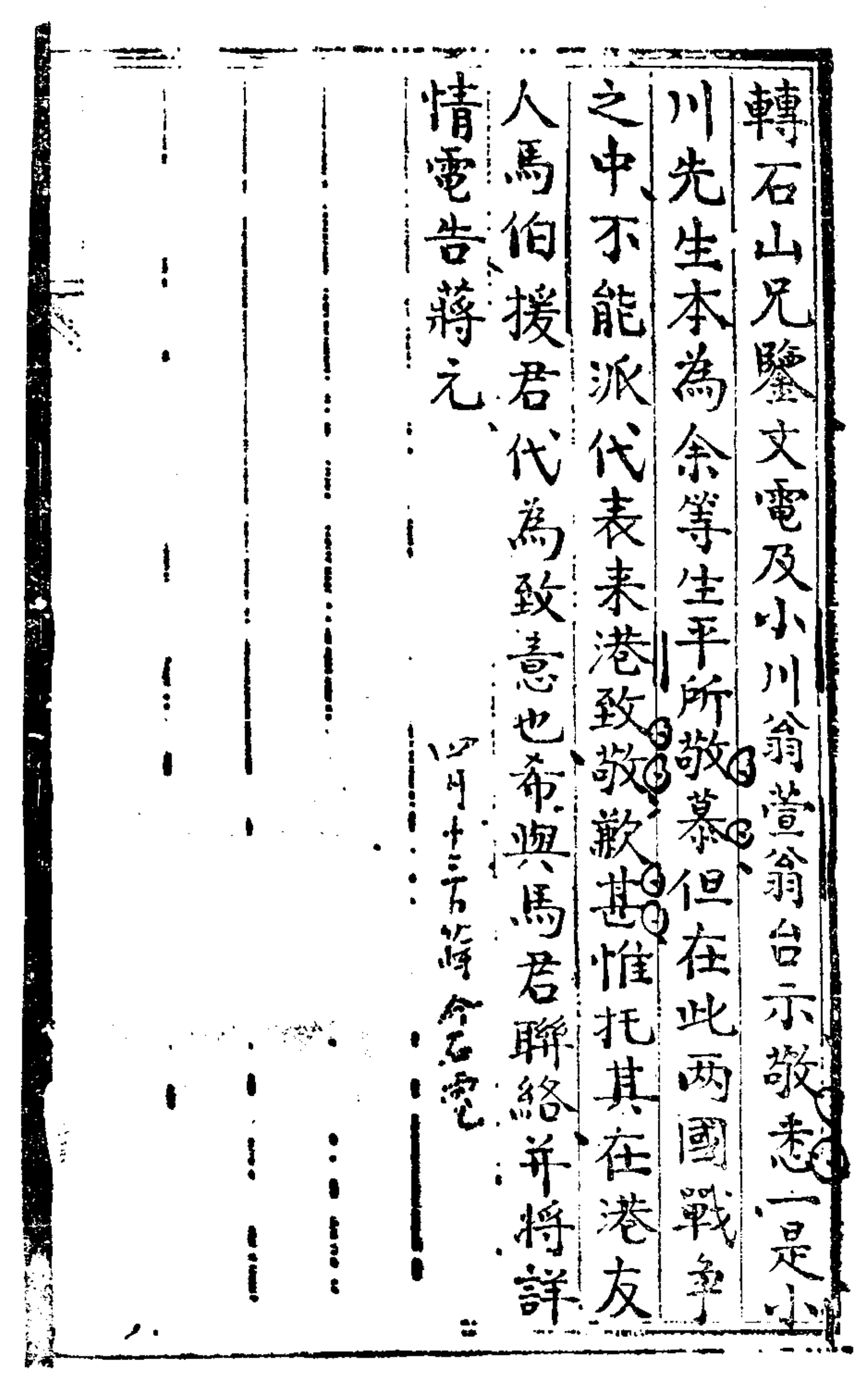
①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页。
②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5—616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615页。

杜对小川称："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① 4月10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声称"小生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要求蒋介石明确表态。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② 蒋介石要小川和马伯援联系。对马伯援，小川是满意的，认为他是适当的人选，准备通过他摸清蒋介石的本意。但是马伯援却因脑溢血于14日突然去世。

马伯援去世后，小川立即要求重庆方面补派有力人员来港，未见答复。4月25日，陈诚致电杜石山，内称："文日以来各电，俱已译呈委座，惟未得批示，请暂待为要，小川翁等务恳切实联络。"③ 29日，蒋介石原配毛氏夫人之弟返渝，萱野托他带信给蒋，声称与蒋"叨为盟友，谊若弟兄"，劝蒋速决。④ 5月6日，小川和张季鸾会谈。小川提出，日本战争的最大着眼点为排共。张季鸾则称：迄今为止，共产党一直在和蒋介石一起从事抗战，要蒋立即讨伐，难以做到。⑤ 5月11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劝他排除畏难情绪，当机立断，函称："讲和之影响，内外上下，复杂多端，畏其难而不为，是非英雄，则终于难而已矣。惟知其难而为之，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⑥ 小川再次要求蒋介石派要员来港，并称愿与萱野共同赴渝，否则即束装归国。16日，重庆方面根据小川要求，派侍从副官贾某乘专机到港携走该函。此前，杜石山也致电蒋介石，声称马伯援已逝世多日，事悬未决，要求蒋介石"迅于电示"。⑦

① 《赴香始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53页。
②③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0、621—623页。
⑤ 《赴香始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53页。
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4—625页。
⑦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6页。

特秘


轉石山兄鑒文電及小川翁萱翁台示敬悉一是小川先生本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兩國戰爭之中不能派代表來港致敬歉甚惟托其在港友人馬伯援君代為致意也希與馬君聯絡并將詳情電告蔣元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電

图三十八　蒋介石“特秘”电

（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萱野、小川急于和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却于16日致电柳云龙，声称萱野及杜石山连日各电均已收到，"请石山兄暂勿与小川翁往还，但须随时报告小川翁行动"。① 蒋介石的这一突然变化，杜石山曾根据重庆来人所述，对萱野作过解释，其原因为：1.蒋介石历次宣言，皆肯定抗战，一时不易改口；2.蒋介石已嘱孔祥熙，命张季鸾、原顺伯②、贾存德等继续与萱野及小川会晤，然后由孔祥熙根据各人报告，联络重庆元老及握有实力者，向蒋介石要求和平，再由蒋提出国防会议，议决后再派代表来港。③ 尽管如此，小川仍然觉得受到冷淡，便向蒋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将于6月3日离港，14日由上海归国。

香港谈判期间，日军始终采取咄咄逼人姿态。5月，日机多次轰炸重庆。26日，蒋介石派副官张铭新到港，退还小川、萱野原函，对轰炸重庆一事提出质询，认为足以证明"日本军、政二界之不协调"，同时，张透露了蒋不敢轻易言和的心事。张称："蒋自'九·一八'后'已受国人唾骂，讥为卖国贼、日本走狗"，"今后各事，欲不小心自亦有难为之处，因自己失败，政权即落红军之手，两国前途苦恼更多，所以委曲求全，无非想到彻底处也"。④ 杜石山也向小川说明，蒋介石选派代表，"视为心腹者便可"，选派大人物，易于泄漏，"事无成，且自己失败也"。⑤

张铭新、杜石山的解释多少消溶了小川的怨气。29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对蒋的"苦心"表示谅解，但他仍然表示："如别有便法，至获好机会，未必吝于陈述鄙见也。"⑥ 该函于6月2日由杜石山用专机送蒋。同时，杜石山、柳云龙也对小川表示挽留。6月4日，副官杨洁自重庆来，进一步说明蒋介石退回函件的原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6页。
② 原顺伯，孔祥熙秘书。
③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39年5月20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7页。
④⑤⑥ 《杜氏笔谈》，《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9－631、632页。

因。杨称："蒋氏将小川翁函提出嫡系干部会议，事为共产党所闻，迫蒋履行西安约言，不得中途妥协，并迫蒋迁都西安。事弄糟了。广西系亦出而反对，说如中途妥协，广西决单独抗战。"杨并称："蒋氏密嘱，无论如何，欲保留此线交谊，并须再作紧密联络，俟时机一至，便可进行。"①

杨洁到港前一天，宋美龄再次秘密到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当时，正值日本五相会议确定以汪精卫、吴佩孚组成中国"新政府"之后，汪精卫已经到达东京，正在与平沼首相会谈。9日，杜石山对小川说："为中日两国早日结束战局计，以及种种考虑，在汪氏未成立机体组织之前，和平尚可实现。如果汪氏成立政府，深恐将来适如西班牙状况，演变更多，问题更不易收拾。"② 10日，杜石山会见小川，明确要求小川回日后，阻滞汪精卫成立"新政府"。③ 当夜，宋美龄、柳云龙等密议后，再次由杜石山出面通知小川，已议决要求蒋介石指派人员到此面商和平，蒋"此时已有决心进行，惟内部尚须措置"，希望小川"无论如何，设法阻滞汪氏计划之成功"。④

6月11日，小川回日。两个多月前，当他开始中国之行时，曾经踌躇满志地写过一首诗，中云："胸中自有回天策，笑上南溟万里舟。"此次归国，他再也没有这种心情了。

## 再次谈判的洽商与搁浅

小川回国之后，日、蒋双方都不愿中断已经开始的谈判。1939年6月14日，孔祥熙再度出面，致电萱野，要求在具体方

①② 《杜氏笔记》，1939年6月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34—635页。

③ 《小川平吉日誌》（七），1939年6月10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488页。

④ 《杜氏笔谈》，《杜柳二氏要求》，《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37页。

法上给予指导。①当时，汕头已被日军攻陷，萱野企图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孔祥熙的关系加速谈判进程。与此同时，小川则在东京与平沼首相、有田外相、近卫文麿及板垣陆相等多次交谈。平沼等认为，香港谈判表明，蒋介石缺乏诚意，"已经到了正式决定倾全力于汪精卫的时机"。②小川则竭力说明，蒋介石仍有诚意，对汪精卫不可希望过奢。当月，汪精卫自日本到达北平，企图与吴佩孚会晤，磋谈"合作"问题。汪提出在顾维钧住宅见面，吴则坚持"行客拜坐客"，要汪到他的寓所拜见。双方坚持不下，未能达成协议。③这使小川感到气氛好转。自7月上旬起，他多次致函萱野，指示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方法。7月4日函提出甲、乙两案。甲案：日本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中国接受排共亲日主张，双方同时停战，以互让妥协的精神开始和平谈判。乙案：订立讨伐共产党的密约，提出局部停战条件。小川表示，希望与蒋方重要人物会谈，并设想，在9月份汪精卫建立新政权之前迫蒋接受"和平"条件。④7月7日函强调，先在有力的个人之间进行接触，再向日本政府提出，一气呵成。他认为日本对蒋介石、孔祥熙有抓紧的必要，建议采取前外相宇垣的办法，双方在军舰上会见，"顺势要求解决对日问题"。⑤7月16日函重申个人接触和军舰会谈两种进行方法，认为有田外相与宇垣不同，中途接手，有必要重新得到蒋介石的承认。他要萱野特别注意，日本方面由于对重庆绝望，在中国北方建立"特殊国家"的意见正在抬头。函末，小川要求萱野将本函秘密示知蒋介石与孔祥熙。⑥十多天之内连发三函，显示出小川重新打通与重庆谈判道

①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6月17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37页。

②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9年7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2—643页。

③ 《吴氏思想表现一束》，见《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第10页。

④⑤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0—641、642、643页。

路的迫切企图。

尽管小川态度积极，但萱野则认为尚非其时。7月7日，蒋介石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等一系列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18日，萱野致函小川，认为蒋介石受到英国大使的迷惑，正在观望形势，"此时并非我方提出问题的时机"。①8月3日，萱野再函小川，告以已遵嘱将7月16日函件出示杜石山、张季鸾、罗集谊、原顺伯等人，并命其致电重庆，促使蒋介石、孔祥熙等反正。他声称，正在研究使重庆方面"不得不下决心的妙计"，其内容有二，一是策动华侨要求"和平"，一是策动江西九宫山地区蒋军倒戈，协助日军攻陷武宁、修水，给予重庆以军事打击。②杜石山也赞成萱野这一"妙计"，致函小川说："现在除照旧进行外，并邀集武装同志多人，拟别出计划，以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③杜石山在小川归国之后，对蒋介石也产生了某种怨望。6月15日，蒋介石曾要他"来渝面谈"，但杜却以婴儿病危为由拒不奉命。④

除杜石山之外，柳云龙在日、蒋谈判中继续发挥着特殊作用。7月16日，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人选，规定蒋介石有权实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11条的规定——国民政府有与外国宣战、议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下旬，柳云龙致函杜石山，告以此次军事委员会改组，有极重要的地方：1.排除共产党人员，不使参加；2.委员长有宣战、议和之权力的规定；3.蒋介石力辞大元帅之职而专任委员长职务。⑤8月1日，杜石山致函小川与萱野，摘要报告柳函内容，并称："蒋氏已有与共产党分离之决心与准备，且已有议和之决心与准备。"⑥8月初，蒋方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同月20日，蒋介石又派副官张某到港，向杜石山

①②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4、645、649页。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39页。

⑤⑥ «杜石山致小川平吉、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8—649页。

提出，要求见到小川7月16日亲笔信。杜石山建议将原信借出进行拍照，为萱野拒绝，张某于是将信熟读之后归渝。[①]此际，张季鸾曾向萱野表示：“如日本使汪兆铭之运动具体化时，和平将永远无望。”[②]

小川得悉军事委员会改组消息后，也视为蒋介石“对共之准备”，立即向当局大臣汇报，并向各相分发杜石山的信件。他向萱野指出：“汪兆铭在双十节前组织国民政府的计划仍在进行中，因此，最好在此前促使停战协议成立。”[③] 8月10日，小川走访近卫文麿，当夜进京，与首相、外相、陆相会谈，此后又提出一项所谓显示“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即小川携带首相的书信亲自出马与重庆谈判，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或者相当于孔祥熙的人物进行预备会谈，其地点可在香港、重庆或其他任何地方。小川表示：“倘此次交涉仍以不顺利告终，我等将断然与重庆绝缘，突飞猛进地建立新政权”；同时，“自认推荐和信任蒋介石这种人物的不明智，除向天下认罪之外，别无可言”[④]。

当时，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议决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同日，柳云龙电告萱野，国民参政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委托张君劢提出和平方案，倘使日方不提出蒋介石下野问题，全体可以议定。[⑤] 9月3日，柳云龙飞港谈判，6日返渝。此际，重庆政府得到汪兆铭新政府延期成立的情报，大为高兴。小川后来向日本政府汇报说：重庆方面力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成事，孔祥熙准备以牺牲一身的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但是，由于军方的压力，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将扶植汪精卫成立“中

①② 《萱野长知致小川平吉》，1939年8月2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52页。

③④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9年8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9、650页。

⑤ 《萱野长知电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53页。

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重庆方面对此感到疑惧，形势急变，多数意见主张，"宁可将讲和的机会置于新政权的实力试验之后"。9月16日，参政会否决了和平案云云。按，9月9日至18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根本不曾讨论过所谓"和平案"，小川得到的显然是柳云龙等人提供的假情报，但有一点是确实的，由于日本政府发表了支持汪精卫的声明，重庆方面改变了与小川等人再开谈判的计划。① 10月13日，萱野离开香港回国，谈判再次搁浅。

## 尾　声

萱野归国之后，小川等人的"和平"工作陷于停顿。

1939年12月2日，萱野会见外相野村吉三郎，陈述重庆方面情况，阐明对汪精卫政权的见解，没有明显成效。1940年1月，米内内阁成立。3月9日，小川致函陆相畑俊六与外相有田八郎，希望在发表政府声明时，避免排斥与重庆政府交涉的言论，以免杜绝收拾战局的通路。②同月30日，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小川曾致函汪精卫，劝他和蒋介石合作，函称："民国内地抗战意识今尚颇旺，绥靖招抚之事真非容易。若欲速收战局，举和平统一之实，不如使重庆政府停战讲和。"小川表示："阁下与蒋介石相会之机会必将到来。"③ 4月30日，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发表文告，声称"对中国要彻底讨伐"，同时又称，重庆政府"如有悔过之意，可以宽恕"。次日，小川致函板垣，赞许其后一语，认为它将大有助于"收拾残局"。④

就在萱野、小川等"静观"之际，蒋介石方面却又积极起来。同年6月，日军占领四川门户宜昌，威逼重庆。19日，汪伪

① 《重庆方面关系经过概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60页。
②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69页。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70页。

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表广播谈话，声称："蒋介石肯为国家打算，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我们不但可走开，并且可以死。"①21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要他邀请萱野来港，谈判"和平"。26日，曾政忠再次致电杜石山，声称蒋介石获悉有关经过后，表示后悔，以前之所以不能拜受萱野诚意，其原因在于状况不明和情势不许，现在形势变化，汪精卫宣称，倘实现和平，彼等不仅将引退，即死亦所不辞。这样看来，和平有了可能。②杜石山奉命之后，不敢怠慢，连电萱野，告以夜长梦多，要萱野把握机会，乘时进行。

此前，蒋介石已经派特务曾广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和日方的今井武夫等人在香港、澳门多次磋商，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举行三人会谈。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桐工作"。但是，蒋介石愿意多线进行，又派郑介民、柳云龙等到香港活动，传达蒋介石的"和平"决心，准备恢复与萱野等人的会谈。7月29日，小川致电板垣，告以经慎重研究结果，萱野将于8月2日赴港。③不料板垣这时正热衷于"桐工作"，不愿另生枝蔓，要求萱野延期出发。④8月上旬，杜石山致函萱野诉苦，声称受到重庆方面"联络欠确实"的责备，要求萱野勿因少数人的阻难而坐失良缘，尽快确定来华日期。⑤10月初，萱野再次准备赴港，但外相松冈洋右正通过银行家钱永铭与重庆联系，仍然不愿另生枝蔓，萱野之行再度受阻。⑥

汪伪政权是在日本卵翼下成立的。举行典礼的当天，日本政府即声明支持，并期待各国承认。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自己却未立即予以外交上的承认。从长期的军事和政治实践中，日本侵略

---

① 袁旭等：《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②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40年6月2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73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83页。
④ 《重庆方面交涉经过概要追加》，《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64页。
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87页。
⑥ 《重庆方面交涉经过概要追加》，《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64页。

者终于认识到，要如愿以偿地解决中国问题，撇开蒋介石及其政府是不行的。因此，他们不得不留有余地，以便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并促进汪、蒋合作。板垣的"桐工作"，松冈的"钱永铭工作"，目的都在于此。但是，他们也感到，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他们在对重庆开展"和平"工作的同时，又在积极准备承认汪伪政权。[①] 9月中旬，"桐工作"失败；继之而起的"钱永铭工作"也困难重重。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承认汪政权。

蒋介石否定了今井武夫、宋子良等人的会谈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板垣提出的条件过于"苛细"[②]，但是，他并不拒绝"和谈"。11月1日，杜石山再次致函萱野，说明蒋介石的苦心。函称："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指张学良——笔者）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函中，杜石山并通知萱野一项特别消息——美国已"积极备战"，要求日本"鉴于世界大势之安危，临崖勒马，以符永保太平洋之宗旨"。[③]同月上旬，松本藏次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三到达澳门，向杜石山传达日本政府即将承认汪政权的信息以及头山满的意见。12日，杜石山返港，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不久，杜石山得复电，已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合签发命令，限红军五天内退驻西北方边区，并拟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缓和苏俄，免为和平之梗。[④]杜石山得电后，派门人林某携电赴澳门，但松本等已返日。杜石山于是通过日本人八谷致电外务省，力陈承认汪精卫政权的利害关系。[⑤]16日。蒋介石又派待从

① 参阅《中国事变迅速处理方法》，1940年9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WT47号；又，《对重庆和平交涉之件》，1940年10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88号。

② 《杜石山致头山满、萱野长知》，1940年11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97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96页。

④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40年12月15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702页。

⑤ 《杜石山致头山满、萱野长知》，1940年12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700页。

副官陈某乘专机飞港，对松本和头山秀三远涉重洋前来报告有关消息表示感谢，同时表示："自七七以还，只是委托石山兄维持立云翁、秋山翁、萱野先生等与中国及国民党以及个人之历史的感情，无论直接间接，未曾选派任何人员，提出任何事件，则以职责攸关，不得不谨慎也。"①然而，不管蒋介石集团如何表示"殷勤"之意，日本政府还是于11月30日承认了南京汪记政权。杜石山于12月15日致函头山满和萱野，满腹牢骚地表示："岂知不数日而承认汪氏之讯至，真如天际巨雷，使弟不知如何解说！"函件同时批评日本政府失策："今以两无准备之局势，而遽予汪氏以承认，故英、美轻之如鸿毛，而以泰山视渝也。"②1941年2月，杜石山派人去上海找寻松本藏次，企图重建联系，结果未能如愿。

还在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配合华南作战的政务处理要纲》中规定："对华侨方面，配合政治及其他措施，领导他们反蒋亲日"，"同时促进对南洋贸易的发展，以利获得不足资源。"③1941年5月5日，萱野为了调查华侨情况，以南方协会顾问身份到达澳门。在此之前，重庆方面已经得知这一消息，派柳云龙及侍从副官一人来港，通过杜石山征询萱野对"和平"的意见，重申蒋介石"绝对维持此线"的主张。5月12日，杜石山抵澳，与萱野相见，萱野提出："可以无条件委托头山翁。"④14日，柳云龙返渝向蒋介石报告。6月，蒋介石秘密召开嫡系干部会议及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一切委托头山满办理。会后，蒋介石赠头山满及萱野相片各一张，附言表示："望今后协助处置共产党。"⑤

① 《杜石山致头山满、萱野长知》，1940年11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98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701—702页。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UD49。

④ 《报告书》(第四回)，《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第665页。

⑤ 《萱野长知致小川平吉》，1941年6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707页。

6月11日，小川通知萱野，当谈判地点决定时，头山将参加。⑥

然而，这时头山对蒋介石集团已经很失望，正在逐渐采取亲汪立场。6月14日，汪精卫访日。在此前后，头山发表连载文章，尖锐地抨击蒋介石："他终竟是傻瓜。对应该提携的日本反戈，以致难免自灭，他现在作最后的挣扎了。他会这样蠢，实在我也是料想不到。"文章又称："于兹期待继承孙文遗志的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活动。"②头山文章的发表，宣布了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对蒋"和平"工作的破产。此后，双方虽仍有若断若续的联系，但始终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

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条船，对抗战是动摇的。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屈服。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泄漏，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香港谈判中，他之所以顾虑重重，其原因即在于此。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还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和谈"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的，有些显然具有策略目的。或为了延缓日军进攻，或为了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风云诡谲，谈判桌上何尝不如此！历史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看法都将妨碍对事物全貌和本质的认识。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

①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708页。
② 《中国革命的秘话》，广东《迅报》，1941年6月8日—18日。

[附记] 收集本专题资料过程中，承日本国会图书馆广濑顺晧先生指点，承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惠赠大量资料，写作过程中，又承日本冈山大学石田米子教授，寿祝衡、邹念之二位先生，尹俊春、周兴梁二同志帮助，谨此致谢。

#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

## 一、一份“极机密”文件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稍加研究，便可以发现，它是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制订的一份秘密计划。

文件共8页，以毛笔写成，分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分为目的，共四条：

(一)统一事权，集中力量；

(二)改革政治，刷新阵容；

(三)建立和稳定革命根据地；

(四)抗拒与肃清腐化与恶化势力。

乙部分为“方针”，分“急进的作法”与“缓进的作法”两项。所谓“急进的作法”共六条：

(子)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

(丑)彻底驱除在粤之一切顽固分子(或停止其活动)并改组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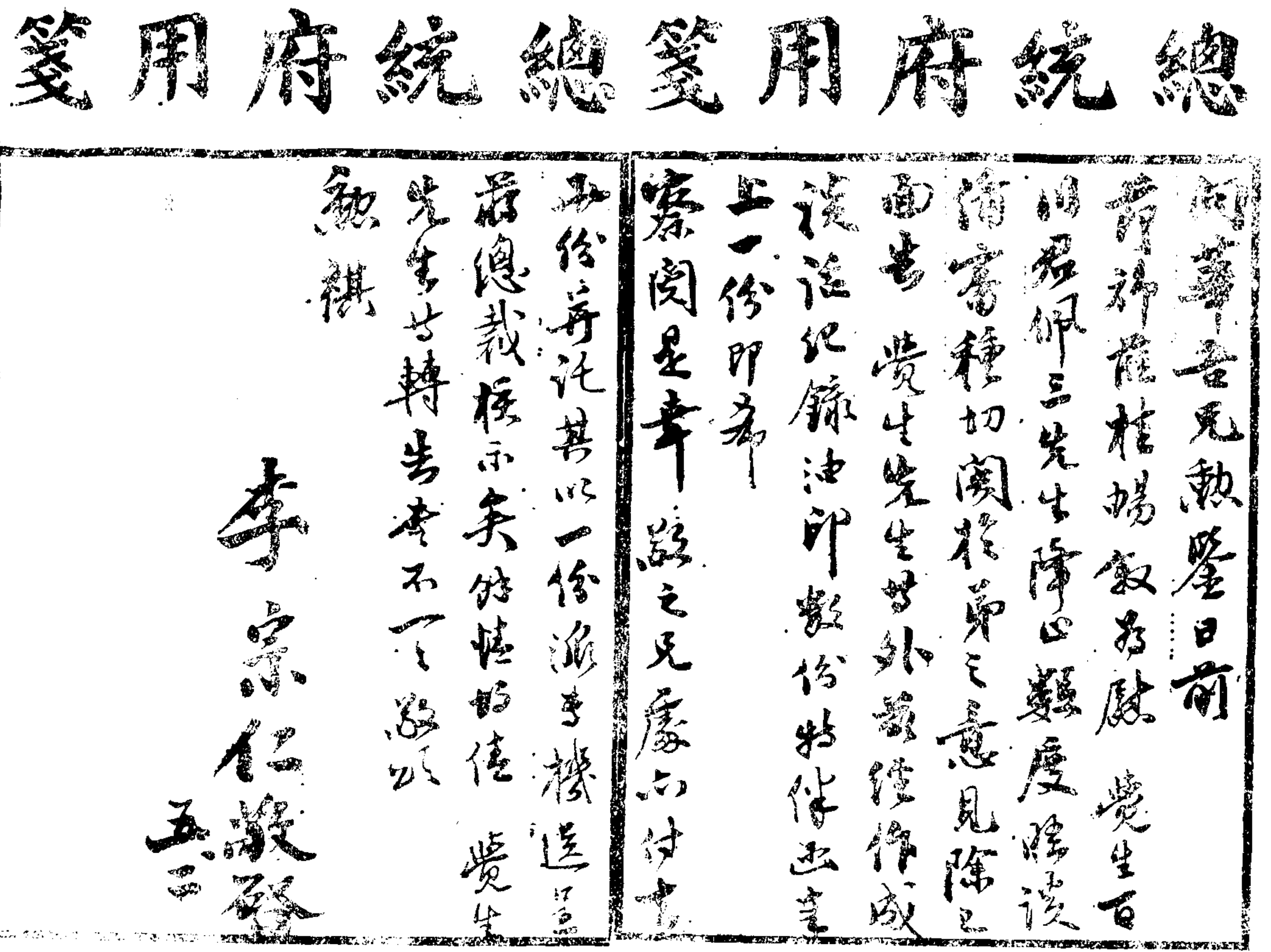
(寅)废除以党统政之制度。

(卯)改组国防部。

(辰)加强两广合作，以两广为中心，树立革命根据地。

(巳)改革政治，肃清一切贪污无能自私之分‹子›，重整革命阵营。

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所谓“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其



總統府用箋　總統府用箋

向華吾兄勳鑒：日前……
[illegible][illegible]權桂暢叙為慰。覺生、百
川、君佩三先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度[illegible]談
備[illegible]種切，關於節之意見，隨之
面告。覺生先生另外[illegible][illegible]修成
談話紀錄，油印數份，特[illegible]函呈
上一份，即希
察閱是幸。茲之兄處亦付十
五份，再托其以一份派專機送[illegible]
蔣總裁，[illegible]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　覺生
先生甘轉告，本不一一，順頌
勳祺

李宗仁敬啓　五、三

图三十九　李宗仁致张发奎函（1949年）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中的×，指的乃是蒋介石。文件接着叙述采取"急进"作法的理由，共五条：

(子)×之原则既决不肯轻易放手，不如与之作具体的最后谈判，使之无法推诿。

(丑)必须迅速处理一切，才能争取时间。

(寅)必须彻底改革，才能争取民心与国际援助。

(卯)必须彻底改革，才能肃清内部一切矛盾，达到集中与统一。

(辰)必须彻底改革，才能破灭×再起之幻

其后，文件叙述"顾虑与困难"，也是五条：

(子)与×破裂，无法获取其拥有之资本。

(丑)×可能即调兵入粤，以图镇压。

(寅)目前军政费无法自给。

(卯)立法院顽固分子之势力甚大，仍可能利用立法院牵制政府。

(辰)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共军或×军之侵入。

以上各处的×，也均指蒋介石。

文件提出的"缓进的作法"共三条：

(子)对×作较温和之表示，仍请其将全部军政权及资财交出，以便统一指挥。

(丑)对顽固分子逐渐隔离。

(寅)一切改革措施，均采缓进，使力量充实，基础较稳固后再进行上述"急进的"各项办法。

文件的制订者认为，取"缓进的作法"理由如次：

(子)希望诱致×交出若干资本。

(丑)×或可不至即派兵入粤。

(寅)对×不即时决裂，留有斡旋余地。

但是，文件的制订者又认为，这种作法也有其弊端：

(子)时机迫切，不容许获得逐渐改善之机会。

(丑)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决不肯交付全部资本(甚至一部分亦不可能)。

(寅)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可能仍派兵入粤。

(卯)不能即时有所表现，无法争取民心，提高士气。

(辰)与×不绝缘，不能获得国际之信赖与援助。

(巳)无坚强明朗之态度表现，新的分子不能号召集结，反动分子无法肃清。

文件的制订者在比较权衡之后，认为"急进的作法"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文件最后部分为"一般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计六条：

1.两广兵力如何充实(包括肃清土共问题)?

2.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3.以党统政之制度如何废除(包括非常委员会)?

4.立法委员如何争取?

5.与×"摊牌"之方式如何?

6.对中共之战略部署。

文件未署日期，也未说明起草人姓名及有关情况。

## 二、文件形成的背景及其产生经过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在"引退"之前，即在人事上作了种种布置，同时下令将国库中大量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引退"后，仍然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掌握着种种实权。因此，李宗仁就职后，事事遭到掣肘。他曾命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国库金银及外汇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有关人员拒不奉命。他企图改变长江防务布局，撤换指挥将领，但无法执行。这样，李宗仁的左右就经常发牢骚："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张治中见此情况，便动了劝蒋介石出国的念头，以便让李宗仁放手

做事。他征得李宗仁等同意后，于3月3日偕吴忠信访问溪口。见蒋后，蒋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又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说得张治中开不得口。

张、吴溪口之行虽然没有成效，但要求蒋介石出国的呼声却日渐公开化。3月12日，南京《救国日报》居然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为大字标题，发表评论。当时，南京代表团正在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李宗仁感到，有蒋在，势难接纳和议。4月9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程思远、邱昌渭等人会议，认为蒋、李只能有一人主政，如果蒋不出国，李就应当辞去代总统；维持现状，和战均将无望。4月12日，李宗仁委托居正、阎锡山赴溪口，面交蒋介石一函，声称如蒋不采取步骤，终止目前的混乱局势，则他自己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14日，蒋介石通过张群传话，邀请李宗仁、白崇禧赴杭州面谈。

形势发展出人意料地快。4月20日，和谈破裂，华东野战军陈毅所部迅速渡过长江。22日，蒋介石再邀李宗仁及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在杭州会谈。会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李宗仁正准备在会上与蒋介石"摊牌"，白崇禧的话正合李宗仁的心意。李宗仁完全没有想到，会议却通过了一项提议，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李宗仁满肚子不高兴，快快返回南京。当时，行政院等政府机构已经迁移广州，但李宗仁决定不去。23日，李宗仁偕程思远、邱昌渭、李汉魂等人飞抵桂林。当日，李宗仁决定派程思远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派邱、李二人去广州会见美国公使衔参赞刘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及张发奎。

克拉克当时在广州主持美国大使馆驻广州办事处。他对邱昌渭说："美国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即将重订对华政策。目前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立即援助，情势上实不可能，除非有事实显示，李代总统确实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者，蒋介石确实不再干预政治，才能逐渐转换美国人的视听。"其后，克拉克并亲赴桂林，和李宗仁谈了五个小时。

张发奎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李宗仁托李汉魂、邱昌渭带了一封信给他，函称：

> 和谈因中共不能改变其武力征服全中国之企图，终告破裂。刻共军已渡江，威胁京沪，此实为本党及国家生死存亡之最后关头，非革新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自救。吾兄爱党心切，忧国情殷，知必具有同感。弟因广州住所尚待修饰，兼以连月劳烦，须稍事休息，拟在桂勾留几日后即来穗面商种切，共策进行。兹嘱伯豪、毅吾两兄代表趋诣，面达鄙悃，诸惟鉴照。

李汉魂于1949年3月初到南京任总统府参军长，后任内政部长，他向张发奎诉说了到南京工作后的苦衷："在最高控制之下，致全局的人事及军事，殆俱不能调整，政治亦难改革，全部之守江计划，同时不能实施，坐令对共无法阻止。"29日，张发奎飞往桂林。他劝李宗仁作出抉择，或者公开声明，他的出任总统只是一场滑稽戏，然后辞去总统职务，请蒋复位；或者从蒋介石手中夺过全部权力，组织战时内阁，争取美国的支持。5月1日，张发奎飞返广州。

据程思远回忆，张发奎返抵广州的当天中午，白崇禧、张发奎、程思远三人在马仲孚家里午餐，张谈到：

> 在桂林时曾由李宗仁约李品仙、甘介侯、韦永成、韦贽唐、黄雪村、李新俊、尹述贤等同他会谈两次，由黄雪村记录，最后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

张并强调指出，无论实行甲乙两案中的任何一案，必须清除广州

阵营里的CC分子。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写于1980年，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所谓甲乙两案及“促蒋出洋”，“要蒋交出权力来”等等，正与上述“极机密”文件相合，因此，可以判明，该份文件乃是1949年4月29日至5月1日张发奎飞桂时的产物。它反映出当时李宗仁等的企图——索权、逐蒋、以两广为基地反共。

## 三、又一份秘密文件

政府在广州，代总统却在桂林，这总不成局面。5月1日晚，白崇禧访问何应钦。二人认为，李宗仁不愿来广州，是因为对杭州会谈的结果不满意，决定请居正、阎锡山出面劝解。同晚，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推吴铁城、李文范赴桂，催促李宗仁来粤主持政务。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联袂飞桂。当晚会谈，形成了一份《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力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决无转危为安之能

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决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1）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2）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3）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4）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5）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6）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談話紀錄　卅八年五月[illegible]日　於桂林

（一）自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鑒於頻年戰禍，民苦已深，亟盼謀和，成為舉國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之軍事政治經濟之失敗，其根因所在，即由於政治之不修明，貪污腐化遍於全國，遂造成今日民怨沸騰，士氣渙散，經濟崩潰之惡果。故自主政之日起即為順從民意，針對時艱，決以謀取和平與革新政治為當前兩大急務，以冀消弭戰禍，詎料時[illegible]演變[illegible]以致[illegible]願違，終致毫無成就，和談決裂，固由於中共所提條件過於苛刻，使政府無法接受，不得不斷然拒絕，然我方[illegible]不一，步驟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謀和措施之不能執行，未能取信於人，以致亦不能不承認為一重大的原因。至於革新政治一端，欲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推行政府所定之主張，更進言之，徹底改革因之[illegible]努力意已付諸[illegible]

图四十　李宗仁桂林《谈话记录》(1949 年)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文件原件共四页，油印，用墨笔标有“密”字，亦见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张发奎档。

上述文件表明，李宗仁经过深思熟虑，并与各方商谈，决心将“极机密”文件付诸实施，不仅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言词虽温和、婉转，而态度则相当坚决，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

《谈话记录》既产生，同日，李宗仁再次致函张发奎，函称：

> 日前节旆莅桂，畅叙为慰。觉生、百川、君佩三先生降止，数度晤谈，备审种切。关于弟之意见，除已面告觉生先生等外，兹经作成《谈话记录》一份，油印数份，特件函奉上一份，即希察阅是幸！敬之兄处亦付去两份，并托其以一份派专机送呈蒋总裁核示矣。余情均倩觉生兄等转告。

据此，可知这份记录天壤间只有几份，一份给了张发奎，两份给了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其中之一由专机送给了蒋介石。

## 四、蒋介石的答复

5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见到了李宗仁的《谈话记录》，非常生气，立即复函何应钦，要求何转达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央诸人。信中，蒋介石要求李宗仁“莅临广州，领导政府”，说明他本人“无复职之意”，对于李宗仁六项要求中的前四项，蒋介石一一表示同意。他说：

> （1）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
>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产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
> （3）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

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对于李宗仁要求中的第五项，蒋介石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说：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对于要求他出国的第六项，蒋介石坚决反对，他说：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障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他并称，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虽告解除，而革命责任自觉无可逃避。凡李宗仁有垂询之处，无不竭诚答复，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函末，蒋介石表示：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蒋介石此函于5月5日以专机送到广州。6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赴桂迎接李宗仁。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交《谈话记录》，目的在索取权力，蒋介石既已答应了六条中的前四条，李宗仁觉得面子挣到，目的已基本达到。8日，李宗仁飞广州，继续履行代总统职权。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仍然是个空头，蒋介石并未交出任何权力，也并未“遁世远引”，而是积极活动，多方安排，在作复职的准备。

（作于1991年）

# 后 记

年轻时做过许多梦。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正在扩建鞍山钢铁厂，于是，想当钢铁工程师；其后，地质勘探工作展开了，又想当地质学家；再以后，认识了数学的重要后，又想当数学家。只是，做过的梦虽然很多，却完全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1955年，怀着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一度废寝忘食地写诗、写小说；后来，对美学发生兴趣，又想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一类问题；再后来，中国古典诗歌读多了，又想研究唐诗，仍然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我研究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事。1958年，盛行“拔白旗，插红旗”，不幸，我被视为“白旗”。于是，一切美好的梦都不敢做了，只想如清人龚自珍诗所云，“至竟虫鱼了一生”，为古书作点注释。不想，连这一点愿望也无法实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培训拖拉机手的单位。本该从此革面洗心，和学术研究分手，但无奈秉性难移，仍然挤时间读书、写作。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南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于是常常星期六晚上进城，借住在朋友单位的传达室里，星期天一早赶往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闭馆后再赶回南苑。有时误点了，末班车已过，就只好步行几十里回去。同事见我星期天都不在，问我是不是去会女朋友了。那时候，在不少单位，谈恋爱，打扑克，侃大山，遛马路，都是合法的，不会有人干涉，但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就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我只能微笑着默认。1962年，调到城里工作，到图书馆看书方便了，但工作很忙，能用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只能挑灯夜读。本职工作做得是出色的，但仍然被有些人目为异端。

“史无前例”的年代来到了，于是，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天晓得，那时我才发表了很少一点东西)。那时，别的研究无法作了，就研究鲁迅；还曾偷偷地跟吴则虞教授学佛，帮他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理学。关于王阳明、朱熹、泰州学派的几本书就是那时候写的。当然，这一切都是绝密的“地下工作”。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拨乱返正，多年的“左”的思潮得到批判，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才真正有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

我在大学后期对近代诗歌有兴趣，深深感到，研究文学，研究作家，必须研究历史，研究社会思潮。因此，又由研究文学史而旁及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这本集子中的«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的‹明良›四论»、«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等几篇文章，写于60年代，大体上反映了我从文学到思想史、近代史的研究趋向。其它文章则都写作于1978年以后。

历史学的任务在于记述和说明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一切。首先，它必须忠实地记述历史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历史，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作出价值评估，总结经验，探讨规律，为人们提供借鉴。这里，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这种分析、评估、总结、探讨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那末，其结论就极易陷入谬误。人们常常可以读到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必要的史实还没有搞清楚，或者还没有说清楚，就急于作分析，下结论。这样的著作也许可以流行于一时，但终将被历史所湮没。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真相常常被种种烟雾所遮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环境还会为史家立下许多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因此，要忠实地记述历史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要求史家有董狐的直笔，又要求史家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求实精神，充分掌握一切必要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缜密的比较分析，清理出真实的历史进程和

本来面貌，作出必要的理论概括。既有的成说、观念、原则都必须接受史实的检验。史家应该有勇气抛弃那些虽然盛行但却被史实证明是不正确的观念，也应该有勇气提出自己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一时不为人们所喜的看法。

比较起来，中国近代史更为复杂，血与火的政治斗争常常和诡秘多变的权谋相结合，因此，历史的真相也就掩埋得更深，未知领域也就更广，不少重大的事件就象难解的谜一样困惑着人们。要正确而生动地再现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就必须抉幽钩隐，解开这些谜团，将那些深藏的历史奥秘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但是，历史的海洋实在太深了。这里用得着一句话："余虽有志，而力不逮焉。"本书命名为《寻求历史的谜底》，只是表达作者企图正确地记述和说明历史的志向而已。

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社会政治运动受社会思潮指导。史家不仅要善于发掘产生于幕后和密室中的奥秘，而且要善于发掘人们头脑中的奥秘。不了解社会思潮的起伏涨落及其彼此间的排拒与融会，就无法理解斑斓多采的社会政治运动，也无法理解政治家的思想、理论、纲领、政策及其变化发展，同样不能揭开历史之谜。本书中有几篇文章，论述在近代中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几种社会思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本书凡已发表过的文章均在文后注明出处，说明修订情况；未刊者则只署写作时间。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曾经和其他学者有过合作。现将主要由本人执笔的部分收入本集。其中，《关于宣南诗社》与季镇淮师合作，《何天炯与孙中山》与狭间直树教授合作，《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等文与王学庄教授合作。《龙华会章程探微》主要由王学庄教授执笔，本书仅收入由我执笔成分较多的第一部分。特此说明，并向上述诸学者致谢。

金冲及、狭间直树、汪荣祖三位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为作者阅览，利用资料提供了最大方便，刘彦成和首都师大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此致谢。金祖芳女士多年来支持作者的研究和写作，本书自然也包括了她的心血。

作者

1992年6月于北京东厂胡同

